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卷三

许子东讲稿

SELECTED WORKS OF XU ZIDONG

volume III

越界言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子东讲稿.第3卷 / 许子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712-9

I. ①许… II. ①许…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1073 号

责任编辑 郭娟 刘伟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0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8.5 插页 3

印 数 1—15000

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02-008712-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就在我准备为第三卷“讲稿”写一篇短序的时候,今天,2011年7月14日,我打开凤凰网搜索栏(站内),结果在许子东的名字下面出现了这样一连串标题,着实吓了我一跳——

2011年7月

许子东:达芬奇公司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

许子东:明星被人娱乐围观,同时也玩弄观众

许子东:人肉搜索郭美美与“文革”有重要区别

许子东:男同性恋朋友一般都很帅很有修养

许子东:郭美美是反贪英雄,为反腐做出巨大贡献

2011年6月

许子东:祸是说出来的,病是吃出来的,烦恼是比出来的

许子东:不要求飞机开得快只要求它准点

许子东:中国大型工程喜欢赶工期让人费解

许子东:有人看《功夫熊猫》联想到中国崛起

许子东:曲阜孔庙旁边有人办“高考辅导”

许子东:林丹让球不算阴谋,反映团队精神

许子东:西方攻打利比亚借用60年代老借口

许子东：卡扎菲搞的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民主

许子东：“锋芝婚变”传闻牵涉到千家万户

许子东：高考题目越优秀，批改越困难

许子东：列宁与理发师的故事是胡编出来的

许子东：香港教育背后的想法是职业培训

许子东：中国科举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许子东：学术界为追求见效快而“塑料化”

许子东：技术进步让香港色情光碟店铺一夜消失

许子东：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影响香港人口结构

2011 年 5 月

许子东：医生灰色收入高 或起源于中国红包文化

许子东：男人扮演角色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情况很常见

2011 年 4 月

许子东：《3D 肉蒲团》里中国女星不如日本 AV 外援

许子东：打假应该从每个人自己开始

许子东：中国苍蝇有“文化积淀”，很难抓到

许子东：美国同样看病贵，子女面临伦理难题

许子东：男子聪明易偷情，女子聪明易结婚

许子东：现代人谈恋爱太多，恋爱太少

许子东：三里屯泡到妞三种男人，到兰桂坊只剩一种

许子东：中国高铁世界上最领先，美国都要学中国

许子东：狗的地位提升凸显现代城市人的孤独寂寞

许子东：有钱的男人玩女人，有钱的女人玩狗

许子东：说真话需要一定的社会空间和地位

2011 年 3 月

许子东：城市人从“人工制造”，感触自然元素

许子东：网络策划激发创意同时钝化社会同情

许子东：五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名利双收

许子东：古代诗人社会地位高 不靠稿费生活

许子东：《集结号》的剧情或有彭德怀的影子

许子东：男性骨子里存在一夫多妻的倾向

2010 年 10 月

许子东：钓鱼岛事件日本出现罕见全民共识

许子东：房价分化了中国城市阶层

许子东：香港的经验就是要让穷人活得下去

许子东：限购房稳固阶级分化 征房产税政府最受益

许子东：中国七成人有房 但仍对房价不满

许子东：日本拼命购买稀土 中国却大力开发

2010 年 9 月

许子东：女性主义最高理想是单性繁殖

许子东：中国文化生态背叛了鲁迅方向

许子东：中日之间迟早还有一次甲午海战

许子东：民间保钓船出海 政府很头疼

许子东：新《红楼梦》是电视上的一股清流

许子东：中国男人做不了宝玉 就要做曹操

许子东：《三国》《水浒》都是河流《红楼梦》是大海

许子东：男人当贾宝玉有难度 必须有后台

许子东：中国严法宽刑为权力寻租创造空间

许子东：看堵车有快感 可比拟历史研究

许子东：深圳容不下老人 是个很自私的城市

许子东：深圳只有一所大学太不应该

2010 年 8 月

许子东：医生说身体里动脉有堵塞

许子东：解救人质不力暴露菲国文明程度低下

2010 年 7 月

许子东：既然有人喜欢 就必定会有人出来秀

许子东：示众围观者的麻木在于他的旁观心态

许子东：抓卖淫女示众是群众道德教育专政

许子东：对女人来说射门像恋爱进球像结婚

许子东：西班牙挫败德国是浪漫主义的胜利

2010 年 6 月

许子东：男人看球时精神裸体 易被女人看穿

许子东：天才球员没得分 他的球队才会赢

许子东：西班牙的浪漫主义输给二流现实主义

许子东：西班牙队前戏太多 总不射门

许子东：中国球迷看世界杯心里装着中国足球

许子东：朝鲜是世界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阳光

许子东：中国人看世界杯有潜意识意淫

许子东：相亲节目很好看让观众有投入感

许子东：日记“内衣外穿”让我们学会撒谎

许子东：政府需解决住房难而非买房难

许子东：国企老总经营能力和职务升迁无关

许子东：中国油价比美国贵始终让我想不通

许子东：偏方土方成潮流 是中国独特现象

许子东：华人的学习具有太多功利性

2010 年 5 月

许子东：日本人临终存款率是最高的

许子东：写完人性之恶一回头 一步一光明

许子东：人性再恶也是人性

许子东：批冯小刚的孙海英真把自己当老干部了

2010 年 4 月

许子东：毛泽东为什么破例为周恩来接机

许子东：郭沫若对李白故里的考证有政治动机

许子东：副教授换偶案 网络争议壁垒分明

许子东：“淫乱”是形容词 难据行为判定

许子东：互联网在美国开花，在中国结果

许子东：中国作家离世界主流文学越来越远

2010 年 3 月

许子东：房价上升将造成城市竞争力下降

许子东：中国文化核心之一是“可做不可说”

2010 年 2 月

许子东：过年期间远离电视机 过传统民俗年

许子东：中国春节功利化 民工回家要花一万

许子东：领导来过就好，不要破坏黄山

2010 年 1 月

许子东：香港反高铁的人其实被忽悠了

许子东：中西方民众遇到红灯的不同表现

许子东：《阿凡达》贯彻了毛泽东思想

许子东：上海人大智若愚瞧不起自己

许子东：“被”字飞天下，显示个人权利被漠视

.....

这仅仅是过去一年半的部分话题。都是网站工作人员每天听了“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后，为我的发言作的简短概括。有的概括得很准确精辟，也有些并非我的原意。平时神马浮云只言片语闲聊天也不觉得，突然从网页上抄下来集中放在一起，真的使我后怕：子东何德何能，如何有这般知识能力，怎么有这样的文化资格，哪里来这等政治勇气，来谈论这么多这么广泛的重要敏感复杂的话题？涉及社会、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及心理、性别、医疗……而且还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好像很有看法？！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虽然在上海、洛杉矶、香港前后读过几个学位，也教过若干年书，但研究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知识能力十分有限。已有的学术成果，也大都收集在《许子东讲稿》的前两卷里。所以这第三卷，只能称之为“越界言论”。“越界”的意思，一是从学术研究越界到电视传媒，是从学者工作越界到公民议论；二是书中言论很可能挑战、冲击、违反了某些界线。什么界线？却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而且常常在变化之中。所以“越界”与否，因时因地而不同。因此，我必须在这一卷讲稿中，梳理检讨反省自己的言论，并向读者观众坦白交代：第一，这些越界言论是怎么产生的？经过一个怎样准备、讨论和传播的过程，有些什么“言论生产过程”的背景和“内幕”？一个客串传媒、试图表达书生之见的人，怎样又被传媒所操控和改造。在“言论”有意无意的调整策略后面，是否也记录了十多年来“界线”（禁忌）的变化痕迹？第二，这些“越界言论”背后有没有真的属于我个人的一贯的想法和思考？第三，归

根到底,我为什么要“越界”?为什么会有这些言论?这些言论与我所处的公众空间,和我的个人生活,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讲稿》这个书名,前两卷是“讲座”和“文稿”的意思,在这一卷里则尽量保留谈话言论的原生态,目的就是希望呈现电视言论的生产机制。本卷中有两篇《方言与政治》、《批判黄段子》,一字不差收录了每期半小时的全部电视谈话内容。《方言与政治》我还逐段加上事后的注解,诠释我和窦文涛、梁文道即兴谈话的现场气氛、潜台词及事后反省。作为一个普通案例,可以分析“锵锵三人行”这个中国历时最久的电视谈话节目的生产过程。《批判黄段子》我则不避“低俗”,全文刊录,旨在供人批判。这篇稿子也完全是三个人即兴发挥,完全没有事先的脚本、策划或其他准备。除了这两篇“谈话实录”外,本卷还收入了我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和王蒙、陈丹青、王跃文、刘索拉、吴淡如、查建英等很多文化人的对话。我想说明的是,上述列出的这么多吸引眼球的标题,十年来电视屏幕里出现的那么多忧国忧民、风花雪月的意见,也许言论是我的,但话题是电视台编导定的,编导又参考了网络上的热点和网民的意见。即使我们说话时,也要有意无意考虑一些限制和策略,也会在事前或事后考虑网络民意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所以,归根到底,前面抄录的这很多标题看法,其实是和电视台编导、网站与网民以及这么多朋友,尤其是和文涛、文道一起“共创”的。我只是这些集体言论的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如果有些言论被认为是有意思的、引起共鸣的甚至深入切中时弊的,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而我在这十多年参与电视言论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远比贡献的东西要多。

第二个层面,电视言论每天面对报纸网络的热门议题,即兴随意,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放在一起看,背后是否也有一些比较连贯的思路和想法呢?这也是我所编辑本卷讲稿时的一个自我反省。本卷分“国家政治”、“社会风景”、“情色男女”、“看电影”和“读书笔记”五辑。虽然不同文体的文章,记录的是不同时间、不同语境面对不同嘉宾时所议论的不

同的具体的热门话题：巴蜀烈女、周正龙、打酱油、大阅兵、土地流转、艳照门、中国足球、红十字……但多年的议论后面，我发现自己的一些基本想法——关于“人民”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关于法治与道德的关系，关于爱、艺术、性别等等，并没有大的改变。或者说我的兴趣也许“与时俱进”，但我的思想一如既往。前面说的言论可能“越界”，因为“界线”常变，无法也不想迎合，所以能够问心无愧的，也只有不合时宜地“固执己见”了。有些想法在电视言论中无法完整表达，这次特地以讲座或文章形式收入这本讲稿（如《1949 和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等）。

可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一如既往”的想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本卷最后部分“自己的故事”想回答的问题。这些类似回忆录的文字，原来是应编辑的要求，勉强而写。没想到，自己的故事如此琐碎平凡无意义，写出这种平凡无意义，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感伤，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义愤，生活在这个时代，真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是个人独特拥有，有多少是时代的压模。因此，这放在卷末的“自己的故事”，倒成为这本论及政治、社会、情欲、文艺的言论集的一个具体真实的注解——不仅是本卷所有“越界言论”产生的背景，也是《许子东讲稿第一卷：重读“文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注解。

2011 年 7 月 14 日

目 录

序	1

第一辑：莫谈国事

1949 和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	3
房价问题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23
三种道德	29
严法宽行	35
严法宽行以后	40
“人民内部矛盾”	42
信与服	
——对话王蒙(1)	46
给“形而下”磕头	
——对话王蒙(2)	51
官场潜规则	
——对话王跃文	59
阅兵	67
棋牌规则	71
对面堵车	74

拉登之死 77

关于红歌的传闻 79

第二辑：社会风景

方言与政治 83

房地产符号与公众想象方式 97

“80 后”与“90 后”的英雄 105

人才与“奴才” 109

人为什么下跪？ 114

北京奥运之后 118

世博排队有感 123

第二次抢劫 127

分类 129

历时最短的“运动” 133

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 136

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139

再说“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141

特殊的爱马仕包 143

哥本哈根的自行车 145

网摘语录 148

第三辑：看电影

入戏太深 155

建国大业 157

谁没听到“集结号” 163

谢晋时代 166

大话《赤壁》 171

关于《色，戒》：从小说到电影 175

电影中的政治学 180

我看《赵氏孤儿》 182

后现代情色暴力版唱红打黑 184

分红，买楼，做梦 186

重回电影院 188

第四辑：情色男女

男人的两个梦 195

多数、少数与聚众淫乱 198

一夫多妻制的“最后霞光” 204

情欲与创作

——对话刘索拉 209

权力与春药 212

关于 AV 次文化 222

女性“丑角”的社会需求 226

剩女、爱情与细节 228

足球与女人 239

原始男女的故事 243

批判“黄段子” 245

第五辑：读书笔记

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常识 261

“文革”是“兄”，今天是“弟” 265

王朔语言的背后 266

新白话与简体字

——对话陈丹青(1) 270

走不出的“五四”

——对话陈丹青(2)	283
海上文学百家	294
幸福的“围城”:《我们仨》	299
重读《活动变人形》	302
见证的危机	310

第六辑: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自己的故事

一 二哥的入团申请书	315
二 另外两个兄长	318
三 我的造反经历	320
四 革命风暴	323
五 抄家	326
六 天台山下	332
七 中学时代	338
八 广昌路上	344
九 米和柴	348
十 “同意杀尧毛仔”	351
十一 开头路	356
十二 “搞西洋”	360
十三 上海图书馆	364
十四 1976 年	370
十五 轧钢工人	378
十六 “七二一”	383
十七 废“铁”从文	388
十八 第一篇论文	392
十九 杭州会议	398

二十 初到香港 403

二十一 “芝加哥学派” 408

二十二 UCLA 413

二十三 慢船回港 423

二十四 “锵锵三人行” 431

二十五 两个梦魇 436

后记 438

第一辑：莫谈国事

1949 和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①

什么叫网络上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大家都上网，网上的意识形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常规的意识形态管理。当我们上网时，我们以为很自由地在选择资讯，从政治新闻、汽车广告到名人走光、球星“双飞”等等。乍一看很像民国早期的报纸，新媒体充满旧文化。其实这些门户网站的版面编排，都是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考虑的。什么东西上首页，哪一篇博客上头条，怎样的新闻排在前面，何种广告要醒目，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考量、安排、组织、或者说操控。以前办报纸，控制宣传，除了社论组织采访写报道以外，看上去最自由的一个环节叫“读者来信”。大家以为你是读者，你写信，他就会登你的来信。其实是在一千封一万封里边找出几封符合总编符合上级愿望的信，登在“读者来信”。从读者看来，有了什么“读者来信”，下一期可能就有相关的“编者按”和批判文章了。近年有学者研究 50 至 70 年代中国特殊的“纠错机制”，认为知识分子的理论辩论在其中也有很大作用。我怀疑是读书人有点自作多情，分不清是报纸上的争议导致上层“纠错”，还是秩序颠倒过来：上层要“纠错”了，通过报纸透露消息。同样的道理，今天，你在门户网站上看到有博客。博客千千万万，为什么这几个博客会放在首页上？有些是

^① 本文是 2010 年 3 月 6 日在广东南海图书馆的演讲。

搜索引擎根据点击率,但也有消息说某网站的点击率可以买。更多情况是有安排的。根据吸引眼球的程度,根据经济利益,也根据和谐稳定需要。比方说你笑的博客就不上,你含泪的博客就上首页。这背后都有很多运作。

但,这些最多只是网络意识形态的一半,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那另一半是什么? 另一半就是我们大家的参与。网络的好处是,任何一条点进去,你可以跟进。至少有很多表情让你选择让你表达。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呢,在畅销、群众、民意这些压力之下,还有一个因素现在把大家追赶得很紧。以前我的朋友北大教授黄子平说过一句在文学圈流传甚广的话,说现在的作家,都被创新这条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现在呢,后来的作家说,不是被创新这条狗,而是被销量这条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这句话的最新版本是,今天所有在网上生活的人都被什么狗追得不行啊? 点击率! 现在所有能上博客排行榜的人,一方面很光荣,有那么多人关注自己。另一方面又天天晚上做噩梦,就是自己的点击率突然下来了。上去是糊里糊涂的很开心,下来糊里糊涂的就很悲伤。因此,网络的意识形态有另一部分,就是网民的意见。

网民的意见这个意识形态看上去是五花八门,因为网上意见的身份无法捉摸。可是,网上的意识形态有没有规律呢?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2009 年有东北钢铁厂的工人为了反对国营的工厂要被北京的一个私人公司收购,他们包围了前来收购的经理,最后把这个姓陈的经理打死了。整个事情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我在节目里有评论。所以我先讲我自己曾在上钢八厂做过轧钢工人,太知道今天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国企被私人收购的时候,工人的利益怎么受到损害。我个人就认识一些国企的老总,告诉我有关中国所谓高层管理层收购的一些内情。什么是 MBO? Management Buy-out 主要是指公司的经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或股权交易收购本公司的一种行为。比方说这个企业有一万个人,价值十亿。现在大家买我们企业的股票。有些人买不起,有

些人因为担心企业变差就不愿买。企业做得不好,这时管理层找人来估价,说哪有十亿,根本只有两三亿。于是股票就拼命跌。职工怎么办?股票就要卖出去。卖出去谁买呢?管理层。管理层一两百个人心中有数,借钱也拼命把它买进来。买进来了以后,管理层少数人有了产权上的发言权,就出售给民企了。其实民企由这些管理层组成,人也就是原来的书记厂长等。低价买进变成民企后,企业很快就做得很好,上升到十亿二十亿。与此同时,原来这个一万人,可能有八千就要裁掉,因为生产效率要提高。那么工人常常要吃亏。这一套游戏规则现在被叫停了,因为郎咸平等很多人去抗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很多工人的利益受损,本来不必退休的也逼得退休,等等。所以我非常理解东北的这些工人,他们害怕自己的企业被一个私人集团买去以后,他们命运会改变。因此他们的抗议变成了个群体事件,最后把人打死了。但是我在节目里说,我自己也是工人,除了同情工人以外,我最后说了一句,说可是这个经理打死以后,有工人还放鞭炮……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节目正好结束。我觉得打他也许还有一点合理性,但是你把一个人打死了你还放鞭炮,总有点……好了,第二天我就看到我们这个网站爆满,啪啪啪——反应非常强烈。大部分的网民意见是什么?打得好!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姓陈的经理他把前辈子的钱都花完了,他一年年薪是一百多万哪,给他烧一百万纸钱送终吧!跟着有几条网民意见就说,共产党应该立法,打死贪官不犯法,这样中国就太平了!还有点名道姓说许老师你不知道我们放鞭炮为什么啊,这个就是打得好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例子。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的,大家知道很有名叫“巴蜀烈女”。有三个干部喝醉了酒跑到一个按摩的地方,找到一个女孩就说要特殊服务。那女的说,我不做特殊服务的。这三个男的,据说最典型的一个细节就是带头的那个干部拿着一个一沓钞票,拍在女的脸上:“你不干?给你钱你不干?我给你钱你不干?”就这样。最后那个女的就反抗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身怀一水果刀,捅死一个,一个重伤,一个没事。结果

这个事情网上又是轩然大波，“巴蜀烈女”就是网上提出来的。妙的是“烈女”，怎么会叫她烈女？大家读过鲁迅的一篇散文，叫《我之节烈观》。鲁迅曾经说过，在明代的时候，节妇烈女要立很大的牌坊，作为社会伦理精神文明的支柱、主流价值观。什么叫节妇呢？就是老公死了，不再嫁人，坚持一辈子一女不侍二夫，叫节妇。可是在贞节牌坊里，节妇地位是一般的，名字很小，排在下面。排在上面的是烈女。我在香港上课问什么是烈女，现在的学生答不上来。有的人说是什么壮烈牺牲哪，总之搞不清楚什么是烈女。仔细想想，刘胡兰、赵一曼也不叫“烈女”，叫“烈士”，“女烈士”。我们这个语文有问题，值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好好研究。烈女的模式大家知道，一个女的，夜里走在路上，有男人上来要强奸，女的宁死不屈，啪，直接跳到河里死掉了。这样就立贞节牌坊了。跳河要及时，跳晚了，被污染了，也做不成烈女。后来网上有个“俯卧撑”事件，也是民女跳河，不知算不算烈女。鲁迅当初不满，说道德标准，须人人能做。节烈非人人能做。为什么？我很想做节妇，可是老公不死怎么办？那更多的人想做烈女，可是没人来强奸你，你怎么办嘛？好了，现在这个“巴蜀烈女”碰到网上什么反应啊？一面倒的同情。使得当地的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判这个事情。最后大家知道判决是怎么样，防卫过当，但免于处罚。防卫过当，结果却是免于处罚。没有网络，这件事情不是这么一个结果的。这件事情绝对是因为网民参与、影响了司法审判。

再举第三件事情，其实第三件事情是一连串事情。在杭州，在全国各地大家常常会看到一种新闻叫“宝马撞人”、“保时捷撞人”、“保时捷撞拖拉机”。要是这个新闻倒过来，拖拉机撞保时捷，没人看。要是 TOYOTA 撞保时捷，也没人看。TOYOTA 撞 TOYOTA，更没人看，那是天天发生的事。以上三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网上的舆论，对我们的社会的看法，有一套规律。我们的社会大致有这么几类矛盾：第一，“穷人”跟“富人”；第二，“老百姓”跟“当官的”；第三，“多数人”跟“少数人”；第四，“好人”跟“坏人”。这是我们每天大家要面对的问题，这四大分类。当然

我们还可以无限地分下去，“外国人”跟“中国人”、“男人”跟“女人”……我们先定在前面这最基本的四类。通过刚才讲的三个事情，能不能归纳出一个网络民意的规律？一个无数中国网民有意无意参与制造的主流价值观？

当我们作为网民围观一个社会政治道德事件时，如果发生冲突的双方一方是穷人，一方是富人，我们帮谁？（听众：穷人！）如果是当官的和老百姓冲突，我们帮谁？（听众：老百姓！）如果是多数人跟少数人，我们帮谁？（听众：多数人！少数人！）穷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啊？（听众：多数人。）所以我们帮的是多数人，对不对？简单说来，公式已经出来了。穷人，老百姓，多数，是好人。大家明白吗？有钱的，当官的，少数的，是坏人。同意吗？同意拍一下手。（掌声）有没有不同意的？我们一条一条来。穷人比富人好。3位。今天在座至少一二百人，3%反对。老百姓比做官的好，谁不同意？4位。多数人比少数人好，谁不同意？还是少数人。

可是，我提醒各位，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双重身份，双重价值标准。第一，你是一个真实的肉身，你要吃要穿要住，在现实生活当中；第二，在网络上你是一个匿名的旁观者。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就有点像在街上看到人打架，我们跟在后面，“哎，是你不对”，“哎，你不像话”，“你这个男的怎么打女的呢？好男不跟女斗”，“你穿制服，就能动手动脚吗？”……不管什么道理，我们都会在后面做一个匿名的陪审员，一个民间的法官。但是，如果我们突然发现冲突争执的一方，是我的“自己人”，自己的家人、亲属、领导、朋友等等，我们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两个身份当中。你们已经说明了，当你们做匿名的网上的观众的时候，你们赞成的是穷人比富人好，老百姓比做官的好，是多数人比少数人好，对不对？但是在现实真实的肉身里，有多少人愿意做穷人不愿意做富人的？多少人希望自己钱少一点，不希望自己车、房子大一点的？有多少人希望一直做老百姓而不希望做官的——假如你有

机会被提拔的话，你一定说“千万别害我”？有多少人愿意只做弱者不愿意做一个精英？比方说，多少人不愿上只有少数人能进的北大清华或哈佛剑桥？

大家明白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没有？我们真实的每一个个人，我们在追求财富，我们在追求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想做一个特别的少数的人（人上人？）；而当我们做一个匿名评审的时候，我们支持穷人，我们反对做官的，我们要做多数人。是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啊？我们把这个矛盾先放一放。

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这一套网络民意道德原理。这一套原理不是今天刚刚形成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它出现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就是我说的 1949 年。你看《建国大业》，当你被毛主席，当你被周总理，当你被里面那么多形象，被刘德华，被甄子丹等等感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就根深蒂固地相信了这一条，否则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中国人那个时候支持共产党，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穷人比富人好，我们相信民众是好的，做官的是坏的，国民党的官是坏的，而我们相信多数人的意愿是对的，我们好人会成功。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许晴扮演的宋庆龄走出她的寓所，看到解放军无声地睡在大街上。这个场面我父亲也跟我讲过。宋庆龄那座房子，在陕西路怀恩堂旁边，丁景唐后来带我去过。丁景唐，上海文艺出版社老社长，当年就是代表地下党陪着宋庆龄度过上海解放那段日子。我父亲那时是医院的院长，对解放军毫无任何认识，他在寓所听到外面通宵枪响，然后第二天早上外面一片安静，谁都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等他打开窗户一看，他吓呆了：街上睡着无数的军人。这跟国民党的军队太不一样了，而且他们的衣服全是破的，他们的武器是非常差的。就在那一瞬间，我相信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我父亲就此就去买《资本论》了，买《联共布党史》等等，家里买了一大堆，就此就相信马列了。他原来只是一个医生一个学者，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一瞬间建立了这么一种信仰。就是我刚

才讲的那三条。这一套理论根据是建国的意识形态的根基，是毛主席被喊万岁的在人心里的理由。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整个这套理论，在 1949 以后要发生一个变化，要做一些修改。哪一条需要修改的？穷人好，富人不好，要不要修改？50 年代现实的情况是把很多地主杀掉，把地主跟富农定为先天的罪行。当我们从小都知道穷人好，富人不好，所以这第一条不需要修改。土改运动、合作化，后来阶级斗争、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条不仅一直不改，而且得到强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谁跟谁斗争啊？不就是穷人跟富人斗争吗？（其实是有人代表穷人和富人斗。）要是这条修改掉那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多数比少数好，要不要修改啊？共产党当然是得到多数支持。穷人多嘛，天下总是穷人多，穷人与多数，至少在中国，总有天然的惯性的联系。给农民分了地，过几年收掉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分地的时候很开心。打仗的时候打过长江去，那口号都是“你家里可以分到地”。当时解放军厉害在这个地方，向着对面国民党的士兵都给他举出一个条幅，“你们的家里都分了地啦”，动摇军心，那国民党没法往下打了，我家里都分了地了，那我还打什么啊？很多历史学家、文艺作品、我们的常识都知道，（解放战争）并不完全是军事优势，很多是土地政策的优势。所以，多比少好，也不需要改。好人比坏人好，这是废话，不用多讲。所以，说到底，哪一条要改的？大家发现，老百姓已经养成习惯了——是当官的不好，老百姓好，可是啪一转，现在当官的变了！当官的变成新的政权了！你要还是说当官的不好，说老百姓好，那这事就麻烦了。大家现在发现，50 年代我们的意识形态，就要做这项修改。

张天翼写了个有名的小说叫《华威先生》，里面就讲一个官僚，每次开会都迟到，来了以后“我讲几句话”然后马上就走掉了。《华威先生》是抗日的时候写的，到了 50 年代初，很多人一读《华威先生》，说张天翼你写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局长还是这样。把张天翼给吓的。张天翼马上

发表一个声明说,我这个小说只写国民党,我只写国民党,你们不要乱用。这个事情非常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其实当官的,至少一部分永远是那样的。当官的永远都是“哎呀我很忙啊”,然后“哎呀你们先发表意见吧”,然后最后“有个什么会?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没向我汇报?”写得活灵活现,今天我們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华威先生,连我自己忙的时候我的学生都叫我华威先生。可是,重要的是在 1951 年,张天翼特别要强调:“这部作品不是一般的反对官僚主义,而是特定的反对抗日期间国民党的不抵抗。”因为那个时候,笼统地反对官僚,你就是反对新政权了。要用什么方法使得大家扭过“官民对立”这个弯来呢?三个方法,一个都不能少。

第一,名称上不叫官(听众:公仆),对,叫公仆。还有什么?干部。还有呢?同志。对。还有呢?(听众:领导。上级。)千万叫上级,别叫上司、上峰。上司上峰就是国民党的。外国人学中文,这点最麻烦了。美国人学中文就搞不清楚。我们的 wife 他们搞不清楚:“你们这个 wife 里边,有爱人啦,有老婆啦,有妻子啦,有夫人啦,有糟糠啦……”还有一个也搞不清楚,“我党”,是指哪个党啊?“本党”是指哪个党啊?以前电影里拍的,术语千万别弄错,一个台湾特务跑到福建,怎么抓住说他是特务?因为他嘴里说“韩战”。我们不叫“韩战”,我们叫“抗美援朝”对不对?所以回头来说,那个时候,你不能叫“官”。“勤务员”、“勤务兵”、“公仆”。有一个中国最早的 3D,中国最早的宽银幕彩色立体电影,桑弧导演的《魔术师的奇遇》。那时候上海有一个东湖电影院,多少年只放这一部电影。陈佩斯老爸,陈强演一个爱国华侨归国,找他失散的儿子。里边有一细节,爱国华侨回来碰到派出所的警察,就说“长官”,“哎,不能叫长官,现在叫同志。”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为什么不能叫长官?我们现在明白了,“官”是一个坏的字。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坏的字。所以,难得有一个官是好的,那我们就要特别加上一个字,叫“好官”,叫“清官”。你别说啊,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

没有“官”字，大家都渐渐觉得好了。有次和王蒙对谈，讲到周扬，王蒙说周扬就不能接受像“仕途”这样的概念。我也记得有次访问多年劳改后才放出来的陈企霞，却很反感年轻人用“当局”来形容政府。可见话语的改变，当年真的影响观念、信仰的改变。

第二，官、民生活水平相对接近。50年代，共产党非常注意。虽然还有级别，但是那个时候的局长、处长能比一般老百姓多多少，跟今天无法比。为什么毛主席要这样要求啊？很简单，这关系到我们整个意识形态的根基。我们这三大支柱，刚才不是讲了吗，穷人比富人好，多数比少数好，老百姓比当官的好，要是你少了哪一支柱，这个意识形态就可能不稳。所以，一定要做官的俭朴。那个时候我真的见过，我有亲戚做高官，搬来搬去家具全是公家的，省级的干部沙发都是硬的。但是，单靠生活俭朴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远远不够呢？大家知道，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团结，需要什么原因啊？需要思想。需要领袖。需要共识，共同利益。对，但20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家叫 Foucault，福柯他认为社会的团结，有时需要“敌人”，需要有另类，来证明我们是同类。需要有“不正常”，来说明我们“正常”。福柯有本书叫《疯狂与文明》，说每一个时期的文明，重要的标志就是他怎么处理“疯狂”。他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个人的行为跟别人不一样，历史上有至少四种不同处理方法。第一种，是把他看作鬼。我们大家都坐在会场里，突然有一个人他不穿衣服，在很古的时候大家就说他鬼附身，他是妖魔，是巫怪。然后我们就要把火点起来把他烧掉，让我们大家都安全。第二种方法，说他是坏人，邪恶的人。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可以不穿衣服，他显然对我们是一个侮辱，他诱惑我们这里的男性——假如她是女的话，如果他是男的，他欺负我们这里在座的女性，这个人显然是道德败坏，所以我们要把他关起来。第三种，发展到近代以后说，既不是鬼，也不是坏人，它是什么？它是发疯了。是一个病人。我们要把他保护起来，因此就出现了现在的精神病院。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还可能会说他是天才。他领到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

新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跪下来了，就像有几千个学生跟着李阳学英语一样，居然有那么多人为了他下跪。按照福柯的说法，怎么处理这个“不正常”，是保证我们社会“正常”的重要条件。这个话稍微有点绕口，请大家稍微想一想。通俗地讲，我们在人群找出极少数“坏人”，我们才可以证明大多数人都是“好人”。要不然全都是好人，没有分别，好人还有什么意思啊？就好像嘲笑难看的人，我们才可以假定自己是美女帅哥。总之，要排斥少数的异类，以维持最大多数人的统一跟团结。这个方法，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用。在中国的民间社会里，找出一个女的说她偷人了，对她吐口水最厉害的不会是男人，也不会是小孩，是什么人啊？是别的女人。这些女人可能自己也偷。或者想偷而不敢偷。未来要偷、曾经偷过，等等。但唯有这个时候当着自己的老公面，对着那个小寡妇吐一口口水“呸，你太不像话了，你一点贞节观念都没有”这样的话，自己就贞洁了。同样情况下，“文革”当中痛斥一个知识分子“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这是对着群众，甚至也是对自己表态，我是“像话的”。排斥少数、异端、另类的过程，就是你要把自己维系在你的大团体当中。而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重要的词汇，我们天天在用的一个名词：人民。人民币、人民法院、人民邮政、人民银行、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这个当代中文里第一重要的关键词，貌似“社会”、“主义”等日语汉字的转用，其实在我们的古文早就存在。有时泛指“人类”（《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有时特指“百姓”（《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① 人民这个词，古代汉语里是没有的。我们

^① 《辞海》（1979年版）对“人民”一词的定义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302页。）换言之，“人民”是一个变数，范围、性质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确定。30年以后，2010年版的《辞海》基本沿用上述定义，加了一句：“人民”是“敌人”的反义词。

古文里有“人”，有“民”。“人”“民”凑在一起，应该是日语汉字带过来的。这个词现在在英文里是很难翻译的。英文可以翻译成 people，可是 people 是指代 everybody。英文的杂志《People》是在超级市场写八卦新闻的，所以我们把《People》翻作中文我们不翻成《人民杂志》，我们翻作《众生相》。因为老登一些像陈冠希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不能把这样的杂志叫做人民杂志。“人民”这个词，我们不妨把它和相近的一些词拿来比较，一个是“国民”。国民跟人民不同在哪里？国民就是国家的民众。那人民是什么？就是参加革命的人们。换句话说，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国民，有一部分不是人民。“反革命”就不是人民了。人民跟公民也不一样。公民，每个人都是公民，公民是个法律的范畴。还有什么概念？民众。民众是一个跟领导相对立的概念。人民也不等于是民众，因为什么？刚才讲的，人民勤务兵，是不是人民啊？人民公仆是不是人民啊？大家发现没有，换了一系列其他称呼以后，“官”也成了“人民”的一部分。你能说局长不是人民吗？他没有“拥护、赞成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吗？所以，他也是人民，虽然他不是民众，他不是老百姓。换言之，50——70年代中国特定语境下，“人民”不再泛指“人类”（“反革命”也是“人类”，但不是“人民”），同时“人民”又不同于“百姓”，其间区别既微妙又重要（流氓小偷可以是穷人百姓，但不属于“人民”，干部不是百姓，却是“人民”的一部分）。说到底，“人民”是“敌人”的反义词，而“敌人”这个名词十分主观，其定义范围在不同时期阶段区域会随政治集团的战略策略而调整变化，于是“人民”的定义、性质也不是常数。昨天你可以是“人民”，明天你可以不是“人民”，在这件事上你可以是“人民”，在那个问题上你也可以不是“人民”。但听上去，“人民”这个词又总是带有管仲、孟子赋予的古意，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大家知道，人民是总数的多少？（听众：大多数。）有具体比例的。最基本的说法，我们的人民大致比例就是95%。可是问题是中国的人口比较多，就算以10亿人口计算的话，5%就有一个法国。人民这个概念，最微妙的功能就是，有一些公民，有一些

国民,有一些群众,有一些民众,有一些老百姓,他们可以不是人民。他们为什么不是人民?不只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乱搞男女关系,他就变成坏分子;因为他脑子里或者行为上不同意官员的执政方式,他就是反革命;因为这个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就成右派。当然,加上资本家、叛徒、特务等等,还能加一大堆。总之,这些人,他们还是公民,但不是人民。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说社会上的矛盾有两种。一种,发生在我们 95% 人民里面的。另一种,是 5% 跟 95% 的矛盾。所以,当时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后人外人不明白的词。“敌性内处”听过没有? 敌人的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资本家,帮你得到这么一个处理的话,你都会跪下感恩戴德。因为你明明是敌人,可是我们当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还有,“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摘帽右派”,右派是坏的,过了一些年给他“摘帽”了,不要高兴得太早,他的帽子变成四个字,叫做“摘帽右派”。还是右派。还有一种就是不戴帽,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几十年前很多中国人生活的动力不像今天这么世俗庸俗,整天追求房子啊,车子啊,LV 啊。那个时候,很多人的心血都在追求一个名称,一顶帽子。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不要戴上帽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成为努力奋斗的目标。为了这个帽子,几栋房子完全可以交公,一点都不犹豫。你要房子不交的话,你可能会戴上一个什么“小业主”的帽子。但是政策是很宽大的,经过努力,是可以“敌性内处”的。当然了,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党宣布说这些做法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全废除,没了。从 1978 年邓小平执政以后,就宣布说我们再也因为一个人的有钱没钱,或是官是民,或是多数少数而直接从法律上判断他是好人坏人及是否有功有罪。

可是今天呢? 时代发展到 21 世纪,我们在先进的生产力加先进文化的因特网博客微博上,重新无意识地使用了 1949 年的意识形态观念。我自己也一样。我看到那个宝马跟拖拉机撞,我当然帮拖拉机。看凡爸

爸叫李刚的,天然反感。但是,我们要理性地反省一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革命党转成了执政党。革命党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穷人比富人好,多数人比少数人好,老百姓比当官的好。从大家刚才热烈拍掌的情况看,在座大部分人都是相信革命党。革命党的理念是很美好的,所以能夺取政权。但是革命党是代表一两个阶级(或者至少名义上代表)来统治其他阶级。执政党,却要代表(或理论上代表)全体国民,包括不一定拥护、赞成和参加但也没有实际行动反对这个执政党的国民,所以执政党要追求并遵守法制。形象地说,革命党以人民的名义为梯,站在社会之上。执政党受大众利益所困,处在社会之中。法制的原则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的性别、相貌、财富、身份、种族来对他加道德判断。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讲的好人跟坏人,道德是非善恶美丑,跟穷富、官民、多少,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任何假定的逻辑关系,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个本来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是不是现在的社会走到了这么一个理想的法制状态呢?我们今天开始正视官民对立。解决官民对立的方法,一是找好人做官,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期待好人天然为民甚至救民。二是假定权力会使人腐化,所以要有机制监督人的权力。今天在座的道德很高尚的一个民工或老师,明天做局长说不定他也包二奶,对不对?想想以前自己喜欢的女人曾经被人包去的经历,他今天或者包得更起劲。中国农民甚至学生造反从来也会腐化。你看看中国近些年搞民主运动的人出国以后的行为你就知道,中国的反对派腐化的速度比执政派还要快!不是好人坏人的原因。就是位置的原因。可是,因为权力虽然使人腐化,可我们又不能没有人有权力,否则无政府主义情况也不妙。英国人霍布斯说,我们为什么要国王来掌握权力,掌握暴力,就是因为要是没有他来掌握权力、暴力,我们每个人就互相厮杀。想自己生活比别人好,是人的天性。霍布斯说人的天性有两个部分。第一,无限地追求快乐。第二,人害怕突然死亡。因此,他说人类为了避免互相残杀,才把权力交给国家交给

警察,我知道他坏,但是没办法,要是不交给他的话,我们自己更坏。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不是好人,所以要监督他。所以他们想出了很多制度,这个监督那个,那个监督这个。

可是在我们这里,有两个理由反对霍布斯的理论。现在虽然已经无法不正视官民冲突是结构性的社会矛盾,而且很清楚地提出来反贪腐是保证执政集团的生命力。但是,有两条始终不能接受。第一,不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重要人物说过的话,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我估计将来中国一定不照搬欧美模式,要搞我们也搞四权分立:在立法权、司法权、执政权之外,至少加上一个我们网民监督权,这样也就不违反领导精神了嘛。对不对?这是一条。第二条,更根深蒂固的,我们的文化,相信人性本善。刚才霍布斯的理论假定我们会争夺,就是性本恶。而我们更多的人不相信荀子,我们相信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此,我们网民还是愿意相信,上去做官的,不是坏人,不单是好人,是大好人。现在公务员“国考”,据说几百上千个人只取两三个。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挑最好的了。所谓最好的不仅是最聪明、最能干,我们不在乎长得漂亮不漂亮——不过最近很难说,一些二十多岁的女干部,副局长啊,什么长啊,不知道怎么选出来的,长得都好看。最近特别感动的就是有一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上到春晚上去我看比那些明星漂亮多了嘛!可想而知空军现在怎么考试的。(听众:20多万招16。)所以其中至少有一个条件“五官端正”对不对?在这样的选择下,难道我们选一个一般人吗?难道我们选一个要贪污的人吗?我们当然是选最好的人。很多人怀念50年代,那个时候,有谁会想要监督毛主席吗?他是太阳。大家知道主席不大坐飞机的。(听众:他害怕。)你们这都是“以小人之心度主席之腹”,主席是考虑到“低碳经济”。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书桌上放着一张照片,就是主席坐在飞机上,下面有郭沫若的一首诗,因为他老放在那里,我小时候就多看看,现在都背得下来了。“在一万一千尺的高空之上,在图104的飞机之中,难怪阳光是格外

的明亮，机里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两个太阳，你还敢监督吗？把你眼睛给烧坏了。今天虽然伟人已逝，大家还是无限怀念。所以今天挂在出租车前，今天印在钞票上……我总觉得毛主席一辈子最不看重钱，我们现在把他的像印在钱上面，他要是地下有灵一定不赞成。开什么玩笑，把我的头印在钱上面？你们整天在那数啊数啊。以前是“毛刘朱周”，全世界都有一个惯例，就是要把开创国家的人印在钞票上，但是都是开国元勋好多个。没有说只印一个的。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不在乎钱的。大家同意吗？（听众：同意。）毛主席在乎名，在乎权力，在乎理想，在乎感情……毛主席什么都在乎，就是不在乎钱，可偏偏把他印在这张纸上。（听众：他最有钱哪。）他哪里是最有钱……所以，讲回正题，由毛主席创建的执政集团的人，都是不需要监督的。所以外国的三权分立是不可取的。所以同志们，要在网上改变我们的偏见，不要认为做官就是不好的。我们的官都是人民的勤务兵，做公仆很不容易。大家明白没有？中国讲民主，对民主，有各种不同解释。第一种解释说，你是民我是主。这个解释，你们摇头？不赞成？因为你们是民。第二种解释是，你是民，我为你做主。为民做主嘛，对吧？要是不为民做主，回家捉老鼠！（听众：回家种红薯。）说错了，是回家种红薯。所以大家想想看，为民做主，这个主体是不是民啊？不是民。这是第二种解释。当然，还有第三种解释就是人民自己做主。但说实在话，我们现在很多好官也停留在第二层解释上。曾经有过一个口号叫“以民为本”。郑必坚，是胡耀邦的高参，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提出来，改成“以人为本”。一字之差，非常重要。大家想想，以民为本，这讲的是做官之道、帝王治国之道。就好像梁惠王孟子的水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今天是2009年了，还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当然，能为民做主已经不错了，现实程度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在理论上，“以人为本”这个口号提得是很好。

穷好富坏，其实这个公式不是现在才有的。古代农民造反不讲，五

四以后新思潮，曹禺的一个话剧叫《日出》。后来我请学生把《日出》的人物按照他们的经济状况画了一张表。最上面的是金八，然后是潘月亭，然后是李石清，然后顾八奶奶，然后胡四，然后到中间就是陈白露。陈白露虽然地位很高但是欠债很多，没什么钱，她有个茶房黄省三，虽然是茶房，钱比她多，还能嫖妓呢。所以黄省三跟陈白露在一个档次。往下最惨的是翠喜、小东西。结果大家发现，划一条中线，比陈白露有钱的都是坏人，比陈白露没钱的都是好人。其实这个公式也在巴金的《家》里面出现。把《家》里面所有的人物按年龄画一个表格，觉新为中间线，比觉新大的都是坏的，比觉新小的都是好的。这是受进化论的影响，年轻，新，必然是好。现代文学作品里出现的“官”，从刚才讲的《日出》、《华威先生》，一直到后来的《三毛流浪记》，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一直告诉我们自己，有钱人是坏的。你跟美国人说比尔·盖茨是坏的，甚至你跟香港人说，李嘉诚是坏的。他们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说“不一定”，“不相干”。你说某一个老百姓好还是李嘉诚好，不会有一个直接回答的。受过现代公民教育的任何人就会回问他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你先拿出证据来说。”

回过头再来看那几个案件，“巴蜀烈女”防卫过当，因为她是弱势集团的女人，来嫖她的是三个做官的。万一这三个不是做官的，是民工，她也这么捅了一刀，这个案件会怎么审？总之不大会像现在这样。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管制需要影响司法判决。中国历来有一个叫“以法治国”。“文革”期间，看到所有判死刑的布告上总有一句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直接构成罪状，而现在的民愤是由网络产生的。我们每个人在上网的时候我们都在使用这个权力。我先说明，我一点都不同情那三个官员。那三个人太不像话，不像话到什么地步？他们居然能把这种事情合伙做。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单个就可以做。大家不要无限地联想。我看到大家的笑就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维特别活跃。周立波说马路上贴一条“抢劫警车是犯法”，有人就说“那意思是抢一般的车

就不犯法吗？”那三个官员简直是有恃无恐。尤其依照党内干部的标准，这不是一般的坏。可是，这个女的杀了人，是不是就可以没罪呢？我就觉得司法在这个里面是跟民愤有关的，背后还是有“维稳”的政绩考量。殊不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石。司法判决，不应成为获得政绩的手段。同样的道理，东北那些工人把经理打死，后来这个新闻再没了。原因是现在上面有指示，每个地方，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所以当地就会很快地调停，很快宣布这个钢厂就不卖了。谁杀了他，那些工人有谁，按法律应该怎么办，全部没有报道。你们以为在网上看到的都是 free 资讯啊？拜托，很多东西都会 disappear 的。大家一度非常关心的很多校园的倒塌，现在还有吗？大家很多时间捐了很多钱，知道这些钱怎么用吗？没有的。你们就看范冰冰的衣服吧，看章子怡趴在海滩上吧。

更复杂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刚才举手的几位朋友现在应该得到我的支持。真的，好坏，跟穷富，跟多少，跟是否为官，没有直接关系。我在今天这样的大众讲坛这么说，我知道其实不太讨好，有点“反潮流”。实际上，这个社会现实，我们的常识是，不做点坏事怎么做得了官，不做点坏事怎么拿得到钱哪？但是这个常识不能成为法庭依据。“情”成立，“理”不通。今天在网上，由于媒体、司法很多地方不到位，网民出于公民责任和朴素道德义愤，形成舆论，甚至人肉搜索。如果这种网上群众运动不仅只是关心八卦，而是跟进与公权力有关的社会事件，可以说这种网络群众运动，是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的体现。对于目前越来越资本化、官僚化的执政集团，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监督。但是，有两点，是网络群众运动潜在的危险：一是网络上的民众如果在搜索、抗议不正当使用公权力的社会腐败现象时，自己也不正当地使用了手上的公权力，比如空姐爆乘客的料，医院、学校、银行职员也参与“人肉搜索”的人民战争，以恶抗恶只会造成恶的循环。你反的就是公权力的滥用，民众不应犯同样的错误。第二，要反省网民的道德义愤中，在公民责任公民权利之中，也有多

少是 60 年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无形影响，即假定富人、官员和少数必然不是好人——这也是今天这个讲座的初衷。想再用昔日阶级斗争的革命逻辑左派方法来解决目前中国执政集团资本化的问题以及贫富悬殊等社会矛盾，作为学术理论或可讨论，作为政治策略相当危险。我跟那些富人没关系，我也拿不到任何好处，可是我还是想，站在法律意义上，我们不能先天假定保时捷跟拖拉机撞就一定是保时捷不好。这是我们的一种情绪。中国人“依法治国”是错的，应该变成“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就是工具，治国就是目的。那治国要防止群体事件，一看网民这么多人反对，赶快判她无罪。依法治国是什么？依照法律，规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防卫过当你少罚她几年，怎么能什么都不罚她呢？所以我对“法治”是这样理解，千万不能是以法治国，而我们的以法治国太多了。

穷富、官民对比问题好解决。我现在最难说服你们的就是多数比少数好。这个还用怀疑吗？难道少数比多数好吗？民主选举，古代希腊，今天美国不也是多数赢少数的吗？可是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少数”已经是一个贬义词了。发言人有几个常用词：“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几句话永远反复出现。这里边最妙的讲“别有用心”，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用心，什么叫“别有用心”？我跟你不一样我就叫“别有用心”？还有最重要是“极少数”。在长期“运动文化”的思维惯性之下，常常个别、少数，本身就是罪名。

有四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成为多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多数，都不想做极少数。第一，你根据阶级、种族去分。什么人多？穷人多，工人多，弱势集团多。尤其在网，明明自己开着部好车，我们还是要装得很可怜。总之，我只要认同了一个社会阶层，依附了一个政治群体，我就成了多数。第二，通过选举。具体统计出来的多。这在中国缺乏操作机会，此法暂时搁置。第三，代表性。我们有一些人，一些好人，一些重要的团体，他天然代表多数。你就跟着他，你只要认可他个人、少数的代表

性,你就变成多数,你就变成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最大多数的人。虽然你人不多。第四,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争取局部的多数。我们在座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是在公司里,碰到一件事情要表决的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下,谁会占多数。通常在中国,任何的开会,如果有七个人,很少会出现三比四的。或者说,总之,如果有十五个人,很少会出现最后是八比七的。通常是刚开始大家都吃不准,但最后的表决结果多数是十五比零,十四比一,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一点都不怕他才说他是反对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多少的游戏的博弈当中,我们很自然地察言观色,别让自己变成少数。因为我们有一个担心,我变成少数,将来这个多数的会惩罚我,对我不利。所以一旦看到他赢了,我不如也投过去。所以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各层的选举当中,极少有比数非常接近的。因为我们的“少数”是一个罪名。其结果就是哪里都缺少坚持原则的反对派。本来以为网络上的政治论坛应该有所弥补,反正化名,也不怕报复,对吧?可是我注意到,网络是现实的镜子。在网上,一个事情发生争论了,我们一看,哎呀反对的人多啊,我也跟着踩啊踩啊,踩死它。很少是看到很多人都说蓝,我偏上去说一个红。偶然有的话,估计是日常太压抑了,所以到网上去发泄一下。粗话连篇,把市民广场当公共洗手间,不是讨论问题,也失去了意义。

我有一次在节目里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党,主持人被我吓了一跳。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处理任何一个事情,我们的思维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革命党。执政党要求有法律,从好的方面来讲,要法治,从坏的方面来讲,他一定照顾自己的利益。革命党,就是我刚才讲的,理论上他总要站在多数穷人和弱势群体里边,反对有钱的人跟官员的勾结。任何一件事情,这两个思路是相冲突的。比方说东北工人打死经理,你站在革命党原则上,就要同情工人,咱们工人有力量,反映咱们群众的一种要求,对于资本家侵犯我们国企,是一种警告;但你站在执政党立场上,只要这个合并收买是合法的,你就不能去反对它,而且有人犯了法,打死人了,你

必须做法律的处理,否则的话,你的法律颜面无存,丧失基本威信。怎么处理?作为一个执政集团就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每天都在发生。回到我们个人,我刚才讲过,在网上我们担任革命党,我们同情穷人,批判富人,批判官员,同情老百姓,我们站在多数的立场上,我们有鲜明的好人坏人的判断。可是我们生活中的肉身,为了买一辆好车,为了买一个好房子,我们在单位里对领导点头哈腰,对自己的老板明明不喜欢还说他“靓仔”或“福相”或“有威严”。我们发奋努力,含辛茹苦,为了不被老婆骂,我们忍气吞声地赚钱,我们跟我们在网上扮演的英雄的角色完全是两个人。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今天讨论的是 1949 和现在网络上的意识形态,其实在这两者之间变化曲折过程更值得关注。历史如不梳理,以为可以断裂或忘却,其实不知不觉,历史正在或将会重复。谢谢大家!

(南海图书馆常航录音整理)

房价问题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房价问题,已远远不只是房子问题,而是财富分配的杠杆、阶级分化的标志。

中国百姓的财富分配 1949 年后有两次大的变化。一次从 50 年代开始,各个社会阶层经济上的差别尽量消除——与此同时,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身份的差别则尽量维持甚至扩大。在农村,到 70 年代,几乎每个村民都是贫下中农,例牌被批斗的残存的地富家属,生活比一般农民更穷。城里大部分就业者,工资都在 36—100 多元之间。美女若要找条件好的,只能找高干子弟,钱也不多,但有特权,房子较大。偶尔有资本家被“落实政策”发还私房,或有点海外关系,已是当时最大经济差别。第二次变化,则以上述革命成果平均贫困为起点,经济差别因两个原因而迅速拉大。一是职业分工,下海经商、官员寻租、外企甚至民企国企的高薪阶层等。二同在工薪阶层,收入、地位接近,却仅仅因为十几年内买卖房子的机遇、运气、策略不同,导致了范围更为普遍影响更为深远的财富分化。所以,房价问题,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比如我有三个大学同学,真人真事,典型故事。十年前工资均 3000—5000,都住单位分房,用几万元买下(现在市价约几十万)。A 买了 100 万的房子,升到 300 万时卖了,又借钱买了两套,过两年又卖,又

买。总之，现在自住出租共四五套，账面上至少有 1500 万。B 当年也买了 100 万的房，一直自住分期还钱，现在名义上房价也 500 万。C 当初也想买楼，几次没看中，转头又见涨价，心里不服，再观望，结果见到原先想买的 100 万房子，10 年翻了几倍。只好望楼兴叹，仍住原单位房凑合。于是，三个同学今天工资仍差不多，10 年时间，现在却分别属于城市中的既得利益者、小康之家和弱势群体三个阶层。

以上买房分类，其实也是目前中国城市各阶级分析。A 是“炒房阶级”，其中商人、干部、高级白领和党员比例高，开好车，多有子女或亲戚出国。他们一般不赞成政府人为干预市场的做法。C 是“公房阶级”，既属于 70% 城市有房户，又属于网上 70% 抱怨房价太高的民众。他们和年轻大学生、进城农民工等“无房阶级”（租房阶级），合起来便是对房价最不满意的人群，原则上赞成政府各种压制房价的政策。不过他们抱怨的理由其实不同。“无房阶级”是新市民、大学生，弱势群体，贡献大，收入少，底子薄。而 C 类人群，以前能分到公房，说明曾在体制主流，很多还是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但在近十年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由于必然原因（身份、职业）或偶然原因（时机、性格），才被相对挤到了社会边缘。相对“炒房阶级”又庆幸又害怕，“公房阶级”叹气沮丧，“无房阶级”气愤郁闷，而 B 类“有房阶级”，其实也是纠结的一群。一套自住，不能进入市场，房价涨，徒有“中产阶级”的心理意义。子女要结婚，又盼房价跌。但听说所有住房都要征房产税，每月供楼已经辛苦，怎么可能再额外交钱，来给政府在卖完地后再辟 GDP 财源？

以上四个阶层，再加上本文暂不讨论的“盖房阶级”（地产商、高干和其他过亿的人们）及“农房阶级”（农民的收入其实也越来越少靠土地，越来越进城打工），这就是从房价角度看今天中国社会各阶级概况。简而言之，大的差异由身份背景定，中等分化因房价买卖定，小的区别由股票工资定。

承认阶级不等于必然斗争。法制社会没有哪个阶级天生有罪。但

社会主义(不管是中国的或北欧的)都希望减少阶级分化。房价一直涨下去,既有损经济竞争力(如香港,高房价几乎赶走了所有工业),也导致民怨沸腾也可能影响“维稳”。于是政府近年来频频出招。概括起来,不外乎四招:一是多盖房,二是少借钱,三是限买房,四是房产税。

任志强等判断“刚性需求”是房价高企的主因(之前几十年没盖房子了),但近年来各地房子盖得很多,何以供求关系仍不见缓和。我以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侧重营造公共住房系统(此法在香港行之有效,政府以卖地的收入建造公屋,还有对低收入阶层的多种住房资助)。现在内地政府卖地收入据说仅 5% 用于建租屋,何以不扩大至 80% 甚至 100%? 让暂时无法进入私房市场的年轻人、农民工或工薪阶层能够租用优质的公共房屋呢? 是政府花销(包括门面工程)太倚靠卖地收入,还是官员有系统寻租影响对弱势群体的公平分房? 总之,这个方向不可回避,买房不是“天赋人权”,住房却是公民权利。

第二个方法是从银行入手。叶檀等研究人员认为民众炒楼导致房价攀升,何以种种限制贷款(第二套只贷 60%, 不贷第三套, 等等)目前仍然效果不佳? 是银行出于自身利益没有彻底贯彻断粮措施(银行小职员现在也像小公务员一样是社会公认的肥缺)? 或者“家庭”概念及第一第二套等技术上难以界定? 还是措施规定朝令夕改使得商家敢于同政策博弈? 抑或炒家弃产业入楼市, 只持现金? ……

第三个方法最严厉, 也最搞笑, 就是各个城市现在纷纷推出的行政(法律?) 限制, 居民每户只许多买一套; 或不准外地人买房, 等等。我认为这种政策“一石三鸟”。第一, 暂时平息民愤, 显示政绩, 房价或者短暂下降; 第二, 长远保障富人的利益, 因为凡“限量版”, 价值将来一定上升(记得从前凭票供应, 家里很多红枣、木耳等, 坏了也要买, 因不肯放弃“权利”。以后买不起房的人, 大概可以议价出售“购房权”); 第三, 还把目前的穷富分化固定下来了。

第四个方法即房产税问题最为吊诡, 不知是法宝还是陷阱。有人

说,房产税上海做试点,如果不出台,中国经济就完了。只要还有一点脑子就应该出台。

果然,见新浪网消息,“上海近日将出台房产税征收实施细则”,说“这个税种的开征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一个稳定的主体税种”。房产税率约为 0.4%,即房价 220 万,一年交 8800 元,又云考虑“要由原值征收改按评估值征税”,最重要的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部门负责人认为:“对个人所有的住房恢复征收房产税是必要的。”

在加州如自住百万美金的房子,每年仅物业税就要交美金近二万。物业税使得持有第二套房子成本太高。而近年中国房产成了最有成效的储蓄与增值途径。于是一度我也认为,物业税是个压抑炒楼的好方法。在电视节目里,我也谈过这个观点。

其实这里既有法律问题,也有技术困难。

因为中国所谓“买房”,只是约定俗成说法,其实是私人通过发展商为中介,向政府长期(70 年)租用房屋地产的使用权。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普遍征物业税,先要在法律上,承认民众拥有土地、房屋所有权。在没有对房屋、土地拥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上交房产税缺乏法理依据——等于说我们租十年房子,一笔过交了钱,难道每月还要再向同一房东交租房税?

从劫富济贫角度,有人说,“房产税是照妖镜,基本上手上有两套以上房子的都反对,只要是现在大学生,没买房子的都支持,或者是全国人都支持”。

房价已成阶级斗争的符号,一抓就灵。房产税,要查炒房有房阶级。“大学生,没买房子的都支持”,可能。但说“全国人都支持”,似乎缺乏投票机制和田野调查。尤其是人们渐渐发现:房产税的设想,从保护庶民利益的初衷,现在正向“为地方政府带来一个稳定的主体税种”的扩大官方经济权力的方向悄悄转化。

是什么原因,房产税政策会从第二套起征税,变成所有百姓的私房

均要征税？因为难以统计首套住房？依据国际经验？还是和政府卖地收入有关？或者网民的议论有道理：土地快卖完了，GDP 政绩要找新的财源。

当然，房产税能否导致市场降温也是未知数。负担重的可能是勉力供自住楼的百姓（交税占工资的比例，比美国香港要高很多倍），持多套的投机者未必受损，因为租金收入远高于房产税。所以尽管房价太高民意不满，但最近房产税消息透露后网上调查却大都反对和疑问。

按原价值或市场价征税则是技术难题。若按购买价征税，同样住房楼上 8 年前 100 万买来，楼下去年 400 万买进，以后楼上交税每月 500，楼下交税 2000 元？吃亏者更亏，便宜者更便宜——再次分配财富加重不公平？

若按评估值征税，B 只有一套房，100 万买来用尽储备且分期付款，现在每月还贷款 3000 元。若市场价升为 400 万，B 每月还要交税 2000？房是自住，涨价与业主有何关系？卖了还能再买同样的楼吗？

如果一定要有房产税，我有两条外行的公民建议：第一，每人或每户一定面积免税，第二套起递进征税，住房不足或无房者获房屋补贴。房产税款，政府须还房于民。第二，从法理上讲，凡交房产税一年，70 年使用期便延长一年。虽然活着看不到共产主义，至少初级阶段须公平合法。

总之，房价要调控，贫富要调节，但问题是，应该依法治国，还是以法（为工具）治国？

2010 年 10 月 10 日。载《南都周刊》2010 年第 41 期

（10 月 26 日），并收入《南都周刊精品文丛》

补记：当此书出版之际，所谓房产税的设想争议，可能已经被人忘却抛弃，也可能已经变成家家户户的负担。无论如何，我仍想记

录下这些外行的公民身份的思考。反正在中国,外行谈论甚至干预内行,也是现代传统之一。

2010年12月21日补记

三 种 道 德

央视《新闻 30 分》，有两次报道国内某强大搜索引擎，查关键词的排序有人为操控嫌疑。比如说你搜索一个关键词“SUV”，可能出来几十万条，那几十万条我们首先看的都是头几页，后面常常就看不过来了。这个搜索排序，虽然不能用来做学术研究的依据，但在显示大众兴趣、舆论导向尤其是在商业宣传上，还是很有用的。所以大家就要想办法挤进头两三百页，那么怎么挤进头两三百页呢？最公平的方法就是点击率越高，越受注意的，就应该排在前头。一条新闻，或某个网页，被人点击的次数越多，它的排名位置就可能与书的销量、政策的大众关注程度、商品的外在名声或节目的票房收视率有关。

但现在发现，比如说医药信息，排在第一名的，人家一查，不是声称的这个机构或那个机构的，甚至还提供了虚假的医药信息。再查下去，原来点击率可以买卖。既然搜索引擎上排名的高低，可以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那这个排名，不也有了商业价值了吗？

眼球率曾是网站的生命，点击率越高，广告价值就越大。开始是土法，雇人手工操作。后来发现点过一个不合理的次数，会自动屏蔽。现在的问题是不用医药公司雇人去点，而是它直接给钱给搜索引擎公司。文艺批判贪腐，级别要低，最高不过省；现实疏通办事，级别要高，最好直达北京。然后某个药就轰动，点击率非常高。公司其实也投资了，算

是公关或广告支出。

《西游记》里玉皇大帝及天上的一切其实都是人间皇权的投影。现在这个网络，人们误以为是一个虚拟世界，在商业和政治的现实秩序以外，开出另外一个新的空间。可是现实人间的力量很快就体现。其实这个点击率本来也非常不靠谱，别的我不敢说，试着输入自己的名字，就发现我花费多年心血的研究著作可能被忽略或排在很后面，某个言论片段被醒目摘录甚至误解后就有很多人点击，某次和明星夜宵的消息会重复很多次……字典或期刊弄错我还可以去纠正，网上的资料找谁负责？有一段时间我的所有的“学术成就”都被那个“叉腰肌”给覆盖了，在文道骂了一声以后。（大概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了在我想做什么事与社会看到我做什么事之间，有些尴尬的不平衡关系吧。）

和网络有关的高科技作假还有所谓“记者专访网页”。也是软件，假设我现在访问一个人，其实没有访问他，只是把他的几项资料输入那个网页。然后一两分钟，一个专访稿子就出来了。还可以有对话，有表情。谁谁谁，在一个微雨的下午，走进咖啡馆……

不开玩笑，神舟几号就是这么提早很多时间就升空的，稿子很早就写出来了，连细节神情都有，不知有没有使用这个网页。另一个例子是金正日有张照片，官方公布，他出来跟一批将军站在一起，结果人家一分析，所有将军的影子，太阳照的影子都是斜的，只有他的影子是直的。正日。

近年来怀疑“作假”最成功、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当然是正龙，周正龙（曹操墓尚在庐山云雾中，暂且不论）。

二审，缓刑三年，替人扛着，有关人士也会有所关照。网民很健忘，大约过两年，人们就不再记得这个有表演天赋和摄影才能的普通农民了。但社会学研究不应忽视这个事件。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周正龙这个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注意，我们对于土地流转都没有花那么多心思去研究。后来我有点想明白了，不是摄

影技术,而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形象再加上诚恳的发誓。几十年来,城里人,干部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朴实工农形象的崇拜(到现在还不明白,陈永贵也会有问题)。而国人要别人相信,发誓赌咒,通常靠几个因素担保:一个是靠权威,以政治或学术权力,以地位名声担保。第二个是钱,假如我错了,要赔多少多少。也就是保险制度。但老百姓没权没势没钱的时候,还有最后一招,比如小孩玩牌,你怀疑我偷牌?怎么办?我发誓,我要偷了你一张牌,我什么家里什么什么,对不对?我会变成什么什么什么。这招很管用,就像在美国法庭,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是最神圣的担保,是诚信的最后一环。

周正龙的事情,最高潮的时候就是有两个人发誓:一个质疑者说:如果说它是真的,我就死掉;周正龙就说:如果它不是真的,提我的脑袋。(大意,不是原话)当时全国人民不仅看老虎,更是看一个信用决斗。

发誓虽是诚信的底线,但广东话也有“发誓当吃这个生菜”的说法。一方面,全国人民聚精会神观看这场道德擂台,太严肃了。另一方面,两人中间总有一个在“吃生菜”。

两者其实不矛盾,关键是以什么名义发誓,诚信背后的道德基础是什么?

道德至少可分三种。一、政治道德:忠于党,爱国家、社会正义等。二、伦理道德:孝敬父母,爱护子女,家庭责任等。三、职业道德:专业精神,行规牌理,职业操守等。

二十年前,其实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朱厚泽,当时的宣传部长,到上海来开座谈会。我和王沪宁、宗福先等都参加了。好像还有郑必坚。当时就讨论这三种道德的关系。“文革”中政治道德压倒一切,甚至在政治道德中,要求普通民众也要先忠于党,然后国家,然后社会……先是神圣信仰,后来是普遍虚伪。“文革”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政治道德压制家庭伦理。“文革”以后,大家就倒过来以伦理道德来取代政治道德,开后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开后门,贪腐是怎么回事?就是

为了我家庭的利益,可以不顾国家、社会的利益。帮我儿子开后门,替我爱人的表弟的公司盖个章,我奶妈住院要打个招呼……很多官员贪腐都自觉有家庭伦理道德支撑,违反的却是现在谁也不大相信的政治道德。在政治、伦理道德几十年此消彼长中,唯独职业道德,“文革”前后至今,在中国人的道德观中,一直被轻视,甚至缺席。中国没有新教伦理那样把职业精神与宗教观念相联系的态度。职业很多时候只是饭碗。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至少近几十年,职业道德远不如政治道德、伦理道德那样受重视被强调。

什么叫职业道德呢?比如说好像警察得干警察该干的事。老板得负老板该负的责任。医生不能把刀开错了(不管有没有红包),这比他婚外情要严重得多……

再回到周正龙的个案。质疑者态度坚定,基于动物学和摄影知识(职业道德)以及社会正义感,比较好理解。那周正龙发誓,三种道德支柱,怎么支撑?

周正龙有没有违反他所相信的政治和伦理道德?他可能觉得没有。

1. 此照最终目的为家人为地方增收获益,造福乡亲社会;
2. 当地领导或明或暗都支持,对农民来说,领导不就是政治吗?
3. 出了事也是一个人顶着,不仅有“忠”与“孝”,还算得上“节”与“义”;
4. 老实形象深入人心,也是因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工农崇拜惯性(如三鹿奶粉牵涉奶农,看众也有恻隐原谅之心,假使华南虎照出自城市照相馆老板之手,一早就没这么多人信了)。

所以,周正龙,一如奶粉、地沟油、飞行员文凭等等其他作假且发誓的人一样,有其心理道德支持。在市场政界“打假”是法治问题,讨论作假的道德原因是文化问题。

不过发誓也有奥妙。咒自己死,咒狂风暴雨,咒自己变虫变鬼都行(担保越沉重越无法兑现),宋明小说里,穷人小厮贪钱扯谎,分分钟拍胸脯表情可怜:小的若有半句瞎话,天打五雷轰。但周正龙等,却不会以自

己的父母性命来担保，也不会天打五雷轰他的儿子……因为，政治、天地可以不理，家庭伦理道德的底线隐隐还在。

我们大概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制造华南虎、三鹿奶粉、豆腐渣校舍的种种专业半专业或业余的作假者，都会从心底里觉得他们没错。为什么没错，就是因为多年来，我们的对错标准，主要就是政治（革命者）和家庭道德（“好人”）两条。而职业操守，很少上升到道德层面上思考。某人虐待老母，是“坏人”；某人卖了多少吨地沟油，替老母看病，你会说他是“坏人”吗？在政治道德因概念虚伪而基本失守（只有善良的政治辅导员水平的官员还在希望教育人民如何荣辱怎样雅俗）、家庭伦理因缺乏制约而常常成为贪腐动力的今天，职业道德的缺席就使社会人性的三角关系趋向不稳。对个人来说如此，就国家来说亦然。

中国人其实向来讲有关“饭碗”的道德。虽然民以食为天，要给家人及百姓有饭吃从来是最大的道德，但怎么找饭吃，也有规矩，也有原则。以前中国人是讲商誉讲信誉的。今天那么多品牌不可信，后面就是职业道德的欠缺。问题是职业道德的基础在哪里呢？要从哪里找回来这个资源？

讲职业道德，前提是要珍惜这份职业。换句话说，要觉得这份职业能保障你的生活，这是不作假的基础。现在全中国相当部分百分比的人，从农民、民工到教授、局长，都觉得他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因此他必须靠额外，而这额外，就是不本分，就常常会违反职业道德。奶农掺水，地沟捞油，基本都是觉得自己穷，捞一笔是一笔。食品药物检验部门、飞行员资历管理机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这可是高科技专业，但觉得这份工作本身收入不够，却是相通的感觉和动力。社会变化太快，消费要求日增，大部分人从高官到下面的保安员都觉得我手上干的这份工作是没有给我足够的钱的（社会是欠我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对得起家人（利用工作权力多赚外快），还要入党做官，以政治道德保障伦理道德。假如这份工作非常值得他珍惜，比如一个警察在香港很珍惜

他的这份工，他哪敢收一点小钱。也有国家，比如菲律宾，人们也想当警察，因为可以收钱。区分不在政治观念或家庭伦理，而在职业道德。

所以搜索引擎收钱提高点击率跟周正龙拍照性质相通，都是缺乏职业道德。而周正龙这个农民没有职业道德还比较容易理解，现在他被当作替罪羊。上面负责科学审查的人，那些帮他冲片子、帮他辩护的乡镇县省官员，还有地方公安为何不早点调查……职业道德在这里才是问题关键，且不谈爱党爱国或忠孝节义。

周正龙的职业是种地(打猎?)，现在有机会开发“动物副业”(勘探自然保护区?)，经济转型，说这个农民“不本分”，是否有点苛求？反正照片出问题，周正龙的专业也非摄影师。倒是从表演艺术看，颇有专业水准，也许可以成为“百花奖”候选人。

2010年9月9日

严法宽行

凤凰网会给每天的三人行起一个标题，谈话节目即兴展话题跑马，想想有时我们自己也很难概括出要点，不仅要醒目，而且又不能犯禁犯忌（和我们的节目一样），颇不容易。但有时标题太吸引人眼球，和我们的原意，或谈话的上下文又会有出入。如 2010 年 9 月 11 日标题是“许子东：中国富豪政治参与度小 捐款时机未到”。“政治参与度小”，是我说的。“捐款时机未到”，却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又如 2010 年 9 月 15 日标题：“许子东：女人在家里应是黛玉 在单位上班应是宝钗”，这两个“应”字如何敢用？其实那天是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讲起，要点是男人除了做宝玉，还能做什么？《宝玉 VS 曹操》，我其实写了篇文章。当然，语言在传递过程中，总会流失或被添加，也完全可能是在电视上辞不达意，引起观众创造性误解。这也是我在论文、评论之外，另编这本《讲稿》的原因之一。

2010 年 9 月 14 日的节目，同样节目内容不同网页却有不同标题。一是“许子东：美女飞行员是选飞行员还是在选美？”虽只截取谈话中的一个分岔，却正是我本意。另一题目：“严法宽刑与权力寻租空间”（稍后似乎被删），更是对这期节目的精辟概括——只是“宽刑”应为“宽行”。不是说法律严量刑宽，而是说法律严苛但执行得很有弹性。意思有点差别。

是日马斌代班,说伊春空难后,国家民航总局要查关于飞行员资质,结果有二三百位飞行员资历造假,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位都是深航的。假文凭假学历假官衔等听得多了,飞行员假资历却吓我一跳——我常坐深航,以后还坐不坐?当然,我也知道,学历高不一定学问好,飞得多未必就不出事。但至少,这是专业资格的审核标准。这种地方可假,谁知航空运输中其他东西,机器、天气、时间、安全,会不会也不可靠?

更令人惊讶的是发现飞行员资历作假后的处理方法,不是停职、记过、受罚或司法起诉,而是补习,再培训,重新考核,然后再上岗。

这使我想以前在内地坐火车,无票上车很普遍,还占人家位子。查到也只是补票,没查到就白坐。不坐白不坐。(香港火车头等厢查到无票,即使无意入错车厢,也罚五百。)

马家辉很气愤地说,“正是因为犯规成本太低,导致形形色色造假泛滥”。想想昨有华南虎,今有曹操墓,真假难辨。连考古学界的话人们现在也不信。发毒誓也没用。人心变坏,制度有责。造假这事,我们过去讲,现在讲,将来年年月月都要讲。千万不要忘记有人造假。

共识是,打假也应有层次级别之分。马斌认为学历假文章假倒可以理解,假服装无所谓,但是假药、假食品、假酱油、假辣椒面,包括假奶粉,是否应该罪加若干等?(不过近期打击名牌A货,力度似乎更大。不知是因为有碍国际观瞻,还是名牌大财团有实力在推动。)

在首尔旅行时听一韩国人说过,我们假包假袋做得一流,泡菜人参等吃的东西绝不造假。语气挺自豪的。

那飞行员呢,应该属于泡菜人参级了吧,性命交关。为什么对作假的飞行员这么宽容呢?有关方面解释说因为航空公司航空产业扩展得太快,人不够,所以现在要培训。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缺口大概还有一万多。(是为了省钱吧。其他亚洲国家地区航空运输扩展,会请欧美飞行员。)

我真是没想到飞行员人数不够,我以为中国的飞行员是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看过有个国庆节目出来很多美女飞行员，容貌身材不比主持节目的总政海政的演员差，放在亚视无线绝对可以选美。我当时心想伟大祖国人杰地灵，这么多漂亮的女飞行员，她们要在多大的基数上才能选出来。由此又联想到选拔机制是否正确：假如另外一个女的飞得也非常好，心理素质、对机器的感悟及飞行资历一流，可是她的鼻子长得不够高，那就没法飞越天安门上空了？这个到底是不是公平呢？我当时这样联想，没想到原来飞行员还有缺口。

没想到的事情真多。这批可爱的女飞行员们的飞行资历和她们的相貌一样，应该都是真的。从如何处理飞行员资历造假的问题，来自央视的马斌一下子就把思考的角度提升了：如果把这个问题归结到制度，我就觉得可能会陷入一个很魔术的逻辑关系当中。你把它归结到制度，那么制度一定是人定的。可能我们都参与工作，也许你是受害者，你想这个制度更严格，但是可能我们还在想留着点，万一哪天要是咱们犯事了，所以这个制度刚性的本身从结构上来说，不是特别成熟。

下面一段是我当时即兴的原话：“关键是这样，制度如果定得越死板，越严格，执行者，就是官员的权力就越小。制度越松，法纪那个宽度越大，执行者的权力就越大。所以有的人说要宪法严行，有的人说严法宽行。中国现在是严法宽行，法很严，你洗个头都可以犯罪，但是执行得很宽，连飞行员资历差错还可以补考。这个严法宽行，执行者手里就有很大的权力，很大的权力可以化为很大的利益。假如说规矩定得都那么死，那我执行的人，你看任何事情，你找个条文，你像香港公务员，没油水呀。经济学原理，政治后面是有经济的。”

我平时常在节目里说些废话、客套话，但这一段不是。

宽行不一定就是宽大、宽容、宽松，宽行是有弹性，酌情处理的权力大。有时完全可能比平时更严厉更苛刻。比如“严打”，执法意义的“刮台风”。某些城市里某些地段明打标示“严管区”——大概在这个牌子下面违章停车罚单更贵？应该还有“不严管区”吧？

中国犯法的人都知道，不管罪行重不重，最好不要撞“台风”。同样抢一辆车，这个月大概判一年，下个月可能判五年。同样强奸一女子，春天也许判三年，秋天或者被枪毙。怎么判决都依据同一严厉的法律，关键是执法者手下是否宽行。

或曰，今天有权力者靠执法“酌情”空间寻租获利可以理解。处理飞行员假资历，如是省长侄子就补考，红包沉重者停职半年，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长得也不怎么样且不懂风情者开除，情节恶劣者还移交司法机关……但是这些“严法宽行”由来已久，如“文革”期间，红歌打黑“台风”更多，当时又没有多少经济利益，怎么解释？

是有这么一个时期，唱错样板戏或与邻居偷情，碰上“台风”也可以死缓。那是“依法治国”（这个概念今天仍有人在用）——以法律为手段，目的是控制一时一地政治局势。今日扫黄要出政绩，故三陪要重判；明天仇富是民意，同是车祸撞人，保时捷罪大于拖拉机。有次《一虎一席谈》争论汽车司机醉酒撞死人，是否属有意谋杀该判死刑。有一《中国不高兴》作者激动主张司法判决就应顾及教育作用、民众情绪：“我不开车我不喝酒，我们中国 13 亿的老百姓，现在看到这样的事情都很愤怒。”六七十年代公检法的判决书贴在街上示众，也总有一句“不杀（或不严判）不足以平民愤”——民愤、舆论、政治气氛、社会影响，都可以是调节司法运作的理由。非今日始，非今日终。

名人明星犯事，更是新闻焦点。像美国办迈克·杰克逊的案子，还有辛普森谋杀案更是民意一面倒。办案人员都是又兴奋、又光荣，责任大，压力也大。在这么巨大的舆论关注下，是会重判还是会轻判？严判还是轻处，均有社会理由。如酒井法子涉毒，可以借机警示教育青少年，为了社会健康明天美好，故不可轻处。也可能因为名人影响大（关系多），同情求情者力量大，为了大局、维稳、安定，故不宜严判……在执法者与执政官常常“两位一体”的情况下，即便执行权力者没有寻租私利动机，考虑个人或地方政绩名声不也是“依法治国”吗？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一字之差，声音上差之毫厘，于国于民失之千里。

所以，像我这样发音不准，“严法宽行”被人听作“严法宽刑”，清谈误国啊。

2010年9月17日

严法宽行以后……

如果法律十分严厉,执行又比较灵活宽松,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人人可能都觉得自己犯了法?

你肯定自己没犯法吗?查查经济问题,有没有没有交税?工资扣了,开会收的红包呢?动手术病人给的心意呢?好心帮人办事,人家谢谢你,这样也要交税?还有,就算什么税都交了,有没有买了电视发票写了文具?有没有餐饮请客报销成酒店住宿?不用电脑单据而另写发票,隐含了无数公款私用公私不分的经济事实,严格查查,是否也犯法?

你真没犯法吗?查查男女问题,还没有结婚?为什么不结婚?谈过几次恋爱了?过去据说同时(一年之内?)有六个异性朋友即犯流氓罪,现在则有“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就是要流氓”的说法。流氓罪,现在还有人在服刑呢!已婚的,有没有和别的异性来往?花钱是包,不花钱是骗。上床是肉体伤害,不上床是精神腐蚀。什么,不搞男女?那更有可能犯法。同性恋?双性恋?……还有,有没有讲黄色笑话?有没有看日本AV?还有,最近听说深圳有潮男潮女集体组团来港包场看《3D肉蒲团》,这样的艺术爱好,算不算“聚众淫乱”?……

还可以查查职业道德问题,学生老师,有没有抄袭?医生护士,有没有缝错地方?厨师伙计,有没有用地沟油?官员领导,有没有像汇报GDP那样申报财产?

还可以查查交通问题,在美国开高速公路,限速 70 英里,大家都开 80、90 英里,你怎么办? 开 80,随时可以吃罚单(人人都犯规,抓谁都合理)。不随大流只开 70,则会妨碍交通,也会受罚。文化界的人对此“22 条军规”最有体会:对“主旋律”,有时跟着错,不跟也是错。不灵活是错,太灵活也是错。

还可以查查假证件、假文凭、假年龄、各种假“波”假奶……

还可以查查政治问题……不必了,以上几项已经够了。

严法宽行,执行者就有很大的酌情权力。以前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现在刑上不上大夫另说,礼却早已下了庶人,个个学雷锋,六亿神州尽舜尧。倘若这些“礼”同步变成“刑”,结果就是人人都犯法。

怎么办呢? 1. 法不责众,法无威信;2. 遵循古例:大犯算功,小犯是罪;3. 和谐团结,暂且不究;4. 杀鸡儆猴,抓个典型;5. ……

原载《羊城晚报》2011 年 4 月 17 日

“人民内部矛盾”

应是数年前的事，后来 CCTV 节目中播了一段视频，是当年 DV 拍的。影像的力量远非文字可比拟。一个上海女子叫做潘蓉，拿个燃烧瓶与拆迁队铲车对抗。暴力抵抗强行拆迁，画面震撼，引起广泛关注。

原来这对上海夫妻，潘蓉和她丈夫去新西兰留学过一段时间，不知有没有取得新西兰国籍，总之有点西方生活背景，于是也就多些捍卫自由、捍卫产权的意识。之前重庆的最牛钉子户一路死守和平抗争，潘蓉是进了一步，动用了“武器”自卫。比起后来多宗死亡或未遂的自焚抗拆案，这个上海女子的“以暴抗暴”似乎更有成效，值得一议。

他们家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机场附近，有一栋四层小楼，480 平米。机场扩建工程要占用他们家的楼，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潘蓉获得每平方米 761 块钱的房屋重置补贴，还有一些土地补偿，计算下来拆迁补偿是 67 万。可是类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已达每平方米 15000。虽然这楼不是商品房，但是仅靠出租每月就能得 4000 块。故业主不愿意。一般说来，现在上海 4000 元月租的房子大概值 200 万。

于是，两边都拿出法律。潘蓉拿出来《物权法》，闵行区政府是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9 条的规定。政府方面说已履行了规定里面的种种法律程序，还是不行，于是按照条例强制拆迁。某日早上，潘蓉在家里先是听到巨响，以为地震，或坦克震动，到阳台一看，底下大铲

车就要铲他们家，还扔石头。潘蓉喊，你们要是法院判决书，拿出来，我就走，让你们拆。要是没有法院判决书，你们是违法的。我要保卫我的财产……

底下拆迁队继续推进。地面上铲车推了一楼的防盗门，潘蓉爬到三楼阳台上拿出燃烧瓶就这么扔——如视频所见。开始她没敢扔铲车，后来直接就砸到车上。拆迁队人员用高压水龙和石块与业主潘蓉对抗。水火之战，网民说这是“文革”以来上海最新一次“武斗”。

战斗僵持之中，据说潘蓉听见小儿子在屋里哭起来。儿子害怕了，母亲心软了，撤。房子被推为平地，她老公被控妨碍公务。

就事论事，政府犯法在前，市民犯法在后。大人小孩都在房里，铲车去铲，你完全可能造成生命危险，所以是拆迁队及市政当局先动武。但使用燃烧弹是暴力升级，热兵器对付石器？在事件背后，则是《物权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间打了起来。

就法而论，“拆迁条例”早订，《物权法》后拟。这中间，上海整个城市那么高速地发展，其中有很多个人付出沉痛的代价。很多人都被迫迁离了市中心，却只获得很低的赔偿。当初号召搬迁，一听是城市建设规划，很多市民或出于政治觉悟，或由于听话惯性，自觉就搬去了郊区。但问题在于有些钉子户留下来不走，后来都获得很高而且越来越高的赔偿，所以老百姓心里也怨。比如邻居两千元一平方就走了，有人熬到三千元也走了，也有到最后拿到八千、一万甚至更高的赔偿。那些已搬到很远地方的市民，回到市中心，看到城中绿地繁华大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面对少数钉子户，政府的困境是：一味提高赔偿，对已搬走市民不公平，弄不好酿成群体事件。不提高赔偿，钉子户不动，新项目无法上马，违约要赔款，还影响政绩。第三条路就是依据条例，强拆。

或许水火之战，并非善恶之争？各有各的难处，用毛泽东时代的术语（现在又在使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解释正好领会了 50 年代

毛主席使用“人民”一词的微妙功效：“民”这个概念本与“官”相对（现代语言学认为任何词汇均由其对立面界定所指，如上与下、冷与热、好与坏、穷与富、多与少及民与官），但“人民”（不是无阶级内容的“国民”、“公民”）的对立面却是“敌人”，由阶级而非法律决定的敌人。“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立面是“敌我矛盾”，而非民众与政府的矛盾——今天强行拆迁与暴力反抗却给这个理论模式提出了尴尬的难题。大铲车代表抽象的人民，政府的利益；燃烧弹来自具体的人民，个人的利益。

唉，早几十年这种问题就好处理了：查查那个上海女人的出身，经济背景，房子怎么来的，出国表现如何，属于哪个阶级？警惕矛盾性质的转化……

现在，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9 条的规定，还要法律的判决？看多了美国电影，警察不能入一个屋，要有搜查令。

其实拆迁队也并不是直接隶属于政府单位，可能就是拆迁办外聘一家商业机构，拿了钱专业拆房子，力气活，管你三七二十一。在宁波出过一个乌龙，拆迁办通知拆 103，结果拆迁队把 102 给拆了。也有的地方就地方黑恶势力在办事，全部拆光，你要不搬，打得你吐血，骨折。而在黑恶势力背后，地方政绩与跨国资本握手言欢。

或许矛盾性质真的在转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主义。都说用社会主义方式发展资本主义建设，速度最快。相比之下，香港如铜锣湾的时代广场，这么繁华的地方，对面那些破楼你能动它吗？无数的官司，都是漫天要价。洛杉矶修一条 105 公路通机场，绝大部分的钱不是修路，而是一路打官司。香港最近要建高铁，经过两个村庄，村民及社会舆论频频抗议，学习《阿凡达》，政府要赔很多钱。同时也已经在担心说政府你这样赔，以后将来动任何地方很难了。

若都有高价赔，如台北也要做建设修一些高架道路，百姓有时抢着欢迎。还动用很多立法委员市议员，麻烦能不能绕个路把那个路修到这里来。像台北著名的 101 信义计划区，为什么蓬勃发展？那个地方以前

全是农业用地，现在附近豪宅动辄几亿，里面很多业主全都是当时的地主，我来买这块地，这栋楼我盖起来 100 户，分你 18 户，你干不干？当然干。上海拟建迪斯尼，消息公布前夕，附近农地连夜起了很多简易房——等待赔偿。

但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该给的钱没给够”。至少还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时间的因素，二是多数和少数的关系。

按市价赔够钱，不错。但市价在变化。尤其中国在 90 年代实行房产市场化以后，GDP 翻了几倍，房价也一路上升。今年拆迁与去年拆迁已是不同，这月搬走和下月才搬也可能差很多钱，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到既发展又公平（是拆迁的关键也是国家的课题），尤其考验执政执法力量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与私利。现在普遍存在的按时间划线的权宜之计（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区老规则，新区新章程等），虽有妥协维稳临时“和谐”功效，长远来说，却会留下很多法律隐患。君不见新世纪《物权法》燃烧瓶不是已和 90 年代拆迁条例的大铲车冲突起来了吗？

第二就是钉子户扔汽油瓶一个人的战斗对社会公用道德形成挑战。逼迫中国人思考：个人和集体，谁更重要？国家不是空的，国家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在国营商店或政府机构没人理睬，问办事人员墙上标语“为人民服务”，回答说，“你又不是人民，你只是一个人”！无语。

国家的确不是保卫一个人的权利，而是必须保卫个人的权利。没有个人，哪有人民。但是多少年有一个思维惯性，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暴力抗拆这件事在 50 年代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大跃进，大干快上，国家建设，这点个人利益算得了什么呢？个人愿意这样想，是境界好。但每个人都必须这样想，把个人的权利放弃掉，也就把国家的本给放弃掉了。

个人作出牺牲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但逼迫个人作出牺牲的集体、社群却是不光荣也不伟大的。

2010 年 9 月

信 与 服

——对话王蒙(1)

许子东：王蒙在少先队的年龄就参加了共产党。

王 蒙：是，我是 14 岁，还差 5 天不满 14 岁。11 岁的时候，我自个儿和地下党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当时在平民中学，现在的四十一中，因为参加演讲比赛获得了名次，变成了全校很多人认识的一个小孩。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个垒球明星，叫何平。他就过来：“小王蒙，最近干什么呢？读什么书呢？”我说我读什么什么书，然后给自个儿来了一句——这可真叫玩悬了——我说我现在思想“左倾”。

许子东：那时候“左倾”时髦。

王 蒙：不是，是危险。他一听两眼忽闪、忽闪就着了火了，上我家来。你思想“左倾”，我家里可就是“党校”了。

许子东：地下党，少共。后来李子云有总结，王蒙几十年风雨人生，少共情结仍在。大致上这也是李子云的自白。但反讽的是“左倾”少年后来怎么成了“右派”青年，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王 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那个时候是个社会话题，被认为是很出格的，很有挑战性的作品。有很多喜欢我的领导说，你怎么能写党委的组织部门呢？你能随便写这个吗？你这不是找事吗？这不是变成王实味了吗？是不是？

许子东：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小说好像在预言你的一生：组织部是一个党的机构，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进去了以后非常崇拜这个机构的最高理想，可发现机构里边有些事情不太如意，然后又要适应里面的规则。组织部里边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官僚主义者，叫刘世吾。他很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只是他经验多了，学会做人了。后来甚至有些批评，说王蒙自己，就从林震慢慢变到了刘世吾，早期的小说无意中成了一生的隐喻？

王 蒙：这个我倒没那么想过，因为那个作品也是因为阴差阳错的一些原因，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他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而且毛主席还保护了这个作品。

许子东：他原话怎么说？

王 蒙：他说，这个作品写的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是不是有人写文章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没有官僚主义？中央还有王明嘛。

许子东：借题发挥。

王 蒙：借题发挥，然后说，王蒙有文采，年轻，又有文才，有希望。这个话我现在提起来，我仍然感谢毛主席。因为他这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以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你，这是毛主席的话，他不是说才华呀，才能呀，咱们这些酸文人爱说的话，他叫有文才。

许子东：没过多久你就在伟大的反右运动中变成右派了。

王 蒙：在这个之前没有任何一篇重要的文章，或者是一个正式的讲话，提到王蒙有文才，那么第一个发现王蒙有文才的是谁？是毛泽东。这个我也不敢说知遇，是吧？因为紧接着我就划成右派，划成右派了人家问说这个划成右派不是毛主席划的。

许子东：是周扬划的？

王 蒙：我把自己检举成了右派。

许子东：是你检讨得太起劲了？把自己脑子里没人知道的东西全讲出来了。

王 蒙：疯狂检讨啊，这种疯狂检讨那就是。

许子东：那个时候，年纪大一点的右派，是不是也觉得是自己不对？

王 蒙：他已经不考虑对不对的问题了，说实在的，我也并不完全考虑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在逆境下活下去。你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去争论说我没有什​​么不对呀，你就是两个字，找死。当时，我想我没有感觉到怎么被洗脑。

许子东：洗得好的效果，就是感觉不到被洗。

王 蒙：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对于组织生活等等，已经习以为常，人应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人应该克服自己身上一些私心杂念、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我写过。那时候在组织生活上，朗诵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朗诵得大家感动得哭了，这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感情的形态。

许子东：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就像你刚才说的，等到反右的时候，他还要考虑怎么活下去，所以说它是一个信仰系统跟权力系统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时期。

王 蒙：对，他讲得非常对。

许子东：在欧洲很早就讲政教分离，要教皇跟国王分权。在中国你道统与政统也一直并存。中央集权最厉害的时候，康乾也有宣讲团，但读书还是读孔子，不能只读康熙思想、乾隆理论。

也就是说，信的东西，跟管你的东西，始终有点不一样。只有到了50年代最光辉的时候，就是他做右派之前那段时期，两者结合已经分不出有什么区别了。就是你“信服”了，“信任”、“信念”、“信仰”和“服从”变成一个词了。

王 蒙：信就是服，服就是信。

许子东：政教合一的人文奇观。

王 蒙：比我年龄大一些的，起码显然在当时比我有头脑一些的，就整天用个什么词呢？反右的时候说，“认下这壶酒钱吧”。认下这壶酒钱

吧,而且我都认为他这是很正确的态度,就是这壶酒钱你得认下,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人说得就更过分,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些人思想还想不通,就是大家已经认定你是夜壶了,但是你老是觉得自己是茶壶,你认不下自己是夜壶,你反党的这个根儿就永远去不掉,你认定自己是夜壶了,没事儿了。

许子东: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能指”跟“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总之你是一个壶。

(**窦文涛:**王老师说许老师讲的好。)

许子东:我父亲有一个同乡朋友,作家许杰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家父跟我讲过他当年的心理克服过程。虽然他觉得许杰不应该是右派,因为许杰很“左倾”,很革命。但是反过来想,右派毕竟在社会上是少数,而且社会真的是在发展,比起解放前好很多。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少数人就算是冤的,就算是不合适的,但社会主流还在发展。所以,经过大跃进,整个社会竟吞下了这几十万右派的果子,大家就继续往前走。这其实是以一个不正当方法牺牲少数,这个方法如果被接受了,以后大多数人都会在不同时期成为“少数”。人们很晚才发现,不行,不能这样。要是可以牺牲少数的话,其实人人可以被牺牲的。到“文革”的时候,人家才知道,打右派那些官员在“文革”时候,自己被受到同样方法的对待。

(**窦文涛:**你到什么时候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了?)

王 蒙:是,我觉得那已经到了文化革命当中了。我就觉得,原来那些反右的人物,他们的下场比那些所谓右派还厉害。

许子东:在这之前,没有怀疑?

王 蒙:工人、农民,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吃不饱,穿不暖,娶不上媳妇,文盲不识字,你一知识分子,你起码是有钱上学,家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是不是?你现在会写几篇狗屁小说,你就忘记了广大的农民、贫下中农、工人、无产者,他们怜悯你了嘛,无产者受的罪比你们少,现在让你也尝尝另一种境遇,另一种经验,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教育。我当时就用一个东西鼓舞自己，说革命等革不到自己身上来，这个革命不彻底，最后都革到自个儿脑袋上来了，革自个儿了，这个是真革命。

许子东：可是你觉得这种知识分子的原罪感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来的？

王 蒙：这里面有这种非常合理的东西。合理就是什么呢，从十二月党人看来，整个社会有那么大批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而你相对来说，比他们要好得多。现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想收拾你两下儿，你怎么着，你冤，你上哪儿冤去，你活该，你自己借这个机会好好改造去吧。真的心甘情愿，在这点想起来非常神圣。

许子东：那为什么那时候天赋人权，个人基本权利，这些概念完全没有呢？

王 蒙：除了自我批判以外，也很有经验主义的那一面。我就说这个事现在正强调批判。反正过几年情况会放松，过几年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是不是？

许子东：党内斗争有一套规律。没想到“反右”跟以前“三反五反”不一样。所以，回到那个时代，还真分不清哪些是出于“信仰”的思想改造，哪些是基于“服从”的生存策略。这种时代现象，的确值得后人研究。

2010年10月3日修改（参考2008年7月10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给“形而下”磕头

——对话王蒙（2）

许子东：被划为“右派”以后，去新疆16年，自己要求去的？

王 蒙：是，在北京我已经恢复了工作，参加中国文联的一个活动，新疆的有几个地方的作协的领导一说新疆怎么好，当时还有点天真，我就说那我去新疆吧。

许子东：所以不后悔去新疆。

王 蒙：当然。

许子东：不是去务农吧，去了那边还是写散文？

王 蒙：第一我刚到那儿，乌鲁木齐应该说它还是不错的一个城市，而且当时是1963年，那时困难时期刚过去，乌鲁木齐那食品的供应比北京还好。然后等到了1965年我到伊犁的时候，赶上半年在外边吃东西不要粮票，当时1965年能做到不要粮票的，连乌鲁木齐都做不到，但是伊犁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生活苦的问题，有些不太习惯就是冬天，冰天雪地，在街上走路都动不动摔跟头，但是我觉得从另一面来说这个挺好玩儿的。

许子东：您的“幽默”跟新疆经历有关吗？

王 蒙：当然也有关系啦。

许子东：我觉得《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怎么幽默，但是后来就有

了，什么道理？

王 蒙：是，我想是不是这个人他倒两回霉以后他会更幽默呀？这您得研究研究。

许子东：泪尽则喜？

王 蒙：泪尽则喜，就是因为你没得可哭了，你光剩笑了。对我来说，最倒霉就是 1958 年。1957 年反右高潮已经过去了，1958 年把我给“补”进去了。

许子东：好像老舍也批判您，是吧？

王 蒙：没有，老舍批判过刘绍棠，茅盾批判过刘绍棠，他们没有批判过我，而且关于我的划右派没见过报，因为这个就跟毛泽东当年的保护有关。

许子东：最后是周扬拍板的，这个确实？

王 蒙：是。

许子东：和我老师钱谷融情况正相反。钱先生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在 1957 年初已被批，还专门出版了批判文集第一集，里面大都是知名文人的批判文章，现在念出名字来还挺不好意思的。结果反右时却因周扬保护没划进去。据说是周扬觉得早早把钱谷融当靶子丢出去了，有点歉意？可见周扬是个挺复杂的人。《王蒙自传》里边对周扬的评价非常引人注目，读者读了都会觉得周扬后期力不从心，做了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代人看了，觉得周扬一生虽然做了很多错事，晚年他却比较清醒反省。

王 蒙：其实我觉得对周扬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其实都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譬如说有的年轻人写周扬，说周扬仕途上如何如何，我们看着都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在周扬那个时候，他不会考虑到，他无法接受“仕途”这个词。

许子东：不说“仕途”，说“投身革命事业中的个人前途”吧。是否当时觉得一参加革命，个人前途就是不重要的了？他在左联的时候也是

理想主义者？

王 蒙：一个革命家，人性的弱点当然也有，譬如说他也希望自己能一呼百应。另外，他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儿，不是我能够判断的。

许子东：您觉得周扬无法接受“仕途”这样的概念，这使我想起有次访问劳改了25年刚获平反的陈企霞，原来在延安和丁玲一起编《解放日报》文艺版的陈企霞，他也很反感我们使用“当局”这个词。我由此想到30年代知识分子建立革命信仰，还真是从词汇、“话语”的革命开始的。不过，讲回周扬，他后来提倡人道主义我始终觉得很重要，您这本自传里边好像不无保留。前几天王元化先生去世了，《新文学大系》最近的一卷是您跟王元化一起主编。周扬那篇重要的文章其实有很多是王元化的想法。我觉得您的书里边好像不太同意？

王 蒙：我写过另外的文章，叫《悲情的思想者》，是一篇专文，在《读书》上发表的，专门谈周扬后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周扬他后期想从理论上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许子东：结论好像是“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

王 蒙：“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中国不能离开世界”。他也非常希望保护这些中青年的作家，使他们能够在文学的思潮上更开阔一些，这些我都是肯定的。但是他总是想用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许子东：是否因为很多问题本来就是由意识形态所造成的？

王 蒙：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问题，确实革命党和在野党可以拿着意识形态当作根本问题。对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因为要保持连续性，要保持正当性，所以要强调意识形态。可同时，更多的应该强调的是为人民谋福利。周扬那个时候老是想提出几个关键来以后，就把中国整个纲举目张了，这一点来说实际上不见得是对。

许子东：知难行易是在野党革命党的想法，一旦执政，知难，行也

不易。

王 蒙：执政的时候有许多东西属于一种行政管理。不管什么党执政，社会得有秩序，得改善老百姓生活。得关怀民生，不能让小偷横行等等。周扬的悲剧在哪呢？他有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许子东：使命感，而且弥补他以前多年的很多失误之处？

王 蒙：对，他有这个。他做了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情，有一点他把自己想得过高，我只能这么说，周扬对我是非常好的。我说这话啊，有点内心惭愧，我不应该说他不字，但是他是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许子东：周扬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线索。早期的策略、权谋与成功，与晚年的使命、感性与失败，都令人感慨。

（窦文涛：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做木匠，当农民种地，您有过这个经历？现在想起来是感谢，还是觉得怨呢？）

王 蒙：我觉得这事都不是一句话能说的。我现在快 74 岁了，还算基本健康。我得感谢这些年的体力劳动；再一个就是说您了解点农村的情况，这是必要的。我认为毛泽东动辄把知识分子干部往乡下轰，他有他的思考，不完全是为了惩罚，也不完全是为了羞辱。

我们所说的什么了解中国国情，不是让你了解王府井的情，了解淮海路的情，并不是了解香港的情，他让你了解就是这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农村的情。所以我现在也感觉到，就是你思想再伟大，你脱离开了中国这块土地，这块实际，你只能，就是让自个儿也难受，让人家各方面都难受。

要了解中国，就要知道农民的世界观，他对生活的要求，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活着？这样一个如何才能活着的问题，一下子把其他的许多问题都冲淡了。

许子东：再回过头听左派的时髦理论，同情工农大众、支持弱势群体，但是实际上又把世俗生活的重要性放得很低，我就会有一个经验上的反感：你根本不是也不懂穷人……

王 蒙：一些中产以上或者一些知识分子，他如何活着已经不成为

问题,所以他要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活着。对农民来说你甭管什么意义,你没意义也行,没意义他就饿呀,是不是?

许子东:饿就是意义。

王 蒙: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能充饥呀,这个意义多大呀。

许子东:食色性也。

王 蒙:冬天他冷,冷可以盖房子,怎么会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中国有一部分,就刚才像说批判通俗文化,这个形而下当做一个贬词,形而下的东西。对于形而上我愿意给他三鞠躬,对于形而下,我想跪下给他磕一个头。为什么? 因为形而下完了您才能形而上,是不是?

如果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您许多这个最基本的生活,我常常说这话,我说中华民族才吃饱了几年呢,是不是? 咱们整个民族是饥饿史呀,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我想减肥、想控制食量,我不能完全很有效地做到,就因为我这个细胞里头饥饿基因,几千年传下来的,一见到好吃的,有时候就没出息。

许子东:生活的意义,其实是我们两代的共同点。我们是知青,他们“右派”比我年纪大,但是都下乡,在乡下读书可以知道人生的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不是一个负面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不是造反有理,而是“屁股决定脑袋”(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

这很简单的,也很复杂。不能轻视工农,就是说,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轻视。

王 蒙:不能轻视那些最基本的需要。我们看一看,很多伟大人物,他所谓犯错误,他不是在高深的理论问题,数学问题,自然、科学、物理、化学问题上,而是最简单的问题上、常识。

许子东:1958年就是常识错误,连钱学森也算出亩产可以过万的公式。

王 蒙:当年毛泽东批王明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王明有什么错呀,

他不知道打仗要死人吗？不知道人饿了要吃饭吗？不知道行军要走路啊？他说就是这三条错误。在“文革”当中，他自己也太超前了，超前到提什么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我真是服了，琢磨到这儿来了。

（**窦文涛**：但是事实和感情好像是两回事，您比如说我在这个书里，我觉得像您对于共产党，对于毛主席，好像到今天这种感情成分还是很重的。）

王 蒙：那当然了，我从 1946 年一直是这样过来的。

（**窦文涛**：但是不怨吗？您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想我蹉跎半生，就是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原因。）

王 蒙：我没蹉跎呀。我就算不错了，人家问我，说您在新疆，外国人经常问，说您在新疆 16 年您都干什么呀？我那是玩笑话，我说我是什么维吾尔语研究生呀，我说三年预科。

许子东：阿 Q。

王 蒙：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四年博士，你说阿 Q 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阿 Q”使我能够走过这一段路，而且使自己并非只在那儿蹉跎。如果我那会儿只叹息、只埋怨、只喝酒那不早就完蛋了，那你就自杀算了，那也算有种，选择自杀，是不是？咱不是没选择自杀，没选择自杀，咱们就要好好地活下来，而且这就是我的回答。

不是有人对我居心不良吗？不是有人老想把我灭掉吗？你越想灭我我活得越好，我有成绩，我有作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许子东：这也不单是他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所以说是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一个国家的个人日记，他经历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国家很多人都这么经历这种事，就别人没像他那么敏锐把它写出来而已。

王 蒙：关于这个逆境生存的问题，这个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各种的论述，是不是？中国人他是有逆境生存的经验。包括鲁迅所说的韧的战斗，你不能是非常的脆弱。我的总结，逆境下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习。因为别的事儿干不了，您就踏踏实实地学习。

还不是我一个人，比如说薛暮桥，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经济学家，关到秦城了，就是说最后放他出来的时候，他提出来说我还有一个月我那个什么读书笔记就完成了，我能不能再延长一个月？这也可能在传言当中的有这个夸张，但是绝对有这么一说。

许子东：劳动，底层经验，还有在这种环境下读书，如果说我们算两代的话，我们其实是一样。但是有一点不同，他们老坚持那个革命理想，我们这一代的人认同感比较少。

李子云经常写文章称赞他“少共”，八千里风云怎么样走，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他是一辈子不忘。这到底是一种心理暗示，有现实利益的自我催眠，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无可奈何，或者说真的是一个信仰系统呢？

王 蒙：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和年轻时代，他那个时候的一些东西，铸就了他的一生。我们在谈话以前，你说过，你说这人 18 岁的时候什么样，他 80 岁的时候还是那样。这是基本的，比如说我们经历了旧社会、新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所谓 50 年代的青年，那种光明的心，那种信任的心，北岛一首很有名的诗，我告诉你，“我不相信”，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要写诗呢，就是“我告诉你，我们相信。”

许子东：下一代的人怎么对北岛他们说——不相信就不相信吧，喊什么喊呢？这么激动。对您说的“我们相信”，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是“我们”呢？谁是“我们”？“我”又在哪里呢？

王 蒙：但是我也有一点补充，毕竟我 70 多岁和 17 岁的时候不可能一样，是不是？我又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说这个事并不理想，但是比原来是好了，是差了？

许子东：或者这样想：否则怎么办呢？

王 蒙：对，否则，你怎么办呢？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乐观？我就反问他我不乐观我怎么办，你让我干吗？你是想让我自杀，还想让我发疯？你给我一个建议。我说我只有一个选择，乐观，在这块土地上，期待

着,也尽我所能尽到的,每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的,使这块土地上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好。

2010年12月7日修改(参考2008年7月12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官场潜规则

——对话王跃文

窦文涛(主持人):今天咱们跟“黑道大亨”王跃文老师聊天。

王跃文(作家):您是老大。

许子东:“您是老大”,可以做下一本书的书名。

窦文涛:关键你得知道谁是大哥,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我听过很多在中国江湖混的人,包括你们作家认为饱经沧桑的人,他往往都会跟你讲他的一种功能,说我一进一个屋,不管是一个包房,还是一个饭局,是吧。十几秒钟之内,我就能知道这大哥是谁,谁是最大的。

许子东:社会学也研究一个现象,说人在本能上都会尽量跟他所能接触到的地位最高的人保持好关系。每个人都可以反省一下,谁是你所认识的地位最高的人,你和他关系怎么样?

窦文涛:趋炎附势看来是人性。这就带出一个问题,都觉得有点不正常,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官场小说那么热,那么盛行呢?

王跃文:我个人觉得,在比较正常、规范的社会里面,人们就不会太去关注官场。现在确实你写官场的人们就关注,我觉得不正常,但是为什么恰恰人们又关注呢?可能是大家眼里的官场不正常东西太多。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关注官场,其实就是关注自己,为什么呢?我们这是一个官场主导的社会,官场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我的幸福,对不对?

许子东：官场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带贬义的？你讲的官场小说，是不是多数又有点黑暗，有点情色？

王跃文：那也未必。

许子东：那写焦裕禄的算不算官场小说。以前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不也都是写……

王跃文：官这个概念其实过去很多年没用，我们只用干部。

许子东：这不只是一个称呼的问题，这个名词从1949年以来的变化十分重要。

王跃文：后来慢慢开始说官员啦，说官员的时候就开始说官场了，官场这个场其实是客观存在的。

窦文涛：你怎么定义？你为什么叫官场？你说客观存在，你指的什么样的一个气场叫官场呢？

王跃文：首先它是这么一个区间，这么一种场合。所谓场合就像气场一样，它要形成场，肯定有内在的一些规律，你比方说潜规则。应该是说潜规则是构成官场这个场的一个主要的内容经脉。

窦文涛：他说的官场，我就想起一个公司老板，我曾经问他一个问题，我很不解。我说你为什么老跟人喝酒，他喝的已经是脂肪肝什么的都不行了，我说为什么老要跟当官的喝酒？我私下里问，我说这事我要是当官的你给我行贿就完了嘛，给钱不就行了嘛，他为什么老喝酒呢？为什么老要吃饭呢？

他就给我讲出一番道理，我就发现中国人，他说中国人不是这种直接的，直接的就是行贿犯罪，而且他对你摸不清底细。为什么当官的一次一次的要跟你吃饭，他言谈话语之间，要观察你喝醉了之后你这个人的表现。他其实也有一种识别了解。

王跃文：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不顾廉耻的那种直接就要的官员，有，但是少。我就说我作为官员，我想你是老板，我要是收你的好处，我自己在心理上也还要想让我自己好接受一点，我们经常喝酒嘛，咱们哥

们嘛，我们是好朋友。

许子东：朋友，朋友之间送礼跟行贿受贿是两回事嘛。

王跃文：自己在道德上这么安慰自己。

许子东：而且这个很重要。

窦文涛：就是说潜规则，潜规则就不是白纸黑字，不是签合约，这玩意也有某种程度的信义在那里。

王跃文：对。

许子东：你得认识，你变成朋友了嘛，你饭都不吃，你就怎么样，这不太好嘛。中国餐饮业发达与官场文化有关系。

王跃文：你平时跟那些老板们一起混熟了，你跟他说，只要你提到某某长或者某某某书记，你只要提出名字，他接下来的话绝对是这是我哥们，窦局长，窦局长我认识，我们一起吃过饭。都会这样。

窦文涛：没错，没错。我怎么觉得周围的不少人，都有这个口头禅，他们好像以此为自豪，还是什么，反正你跟他说谁，我说老说这个有什么意思，但是他就喜欢说，谁谁谁，你说他许子东，我们吃过饭，我们很熟。

许子东：还有，你们有没有体会过，你们偶尔会莫名其妙接到你过去认识的人的一个电话，他没事就打一个电话来给你说：“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好吗？”然后就挂掉了。开始不懂这什么道理，人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后来你才明白，打电话那个人在饭桌上在讲，王跃文，我跟他挺熟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看他在哪混啊。“生”和“熟”的界线，一个没事的电话就可跨越。打一个电话打给你了，跃文，你在哪里，是啊——你不知道，这个电话对他有多重要。

窦文涛：那我接到的电话，原来都是这么来的。

许子东：你明白啦，那么多女生的电话别以为人家都爱你。

窦文涛：我在这开会要求跟旁边的一个先生或者小姐说两句，我也不知道说两句干什么，说什么呢又不认识，我说你是谁啊，他好像又把电话拿过去了。

许子东：这叫毫不利己，专门为人。

王跃文：对，我也经常这样，你是这种待遇，我也是经常的。有时候他在饭局上接过一个电话，这里很多很多你的崇拜者，这是李局长你跟他会说会儿话。对我来说，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我还没来得及拒绝的时候，他把电话就递过去了。我就说“谢谢”，“好”，“不好意思”，听完那边说“你的作品我很喜欢啦”，“对不起不好意思”，“然后我老看你小说啦，谢谢”。一弄就不好意思，谢谢过去可能有时候说了 10 分钟。

许子东：一个人都不认识的？

王跃文：一个人都不认识。

许子东：但是你千万记住，给你打电话这个人，你可帮了他的大忙了。他建立了一个人情人际社会关系了。

窦文涛：但是，这是虚的啊。

许子东：很重要。人家就相信这个人啦，相信这个人认识王跃文。我们刚才讲的，尤其在官本位人治社会中，你所能认识、所能个人联系到的最高最有名的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是王跃文，要是王洪文，要是王沪宁或者什么人，你能打通这电话，这下面这单子就谈成了，你明白没有，你若能跟薄熙来打个电话，他要能应你的话，只讲天气，情况也就不一样啦。

窦文涛：我有时候看人写博客，讲一个朋友打电话，他本来在西直门，给他打电话“哎，在哪呢？”，他说“我在西直门呢”，他就听电话那头说“曼哈顿，好嘛，最近电影怎么样？你准备投资吗？我给你推荐一个女演员什么什么的”，他就只能啊，啊。后来他说是怎么回事？哦，一定是这哥们在三里屯跟一个小女孩吃饭，跟这小女孩说要介绍他拍电影，然后认识哪个导演在纽约曼哈顿，哎我的天，这噱头大了。

许子东：王跃文你写官场小说，有亲身体会？

王跃文：我在县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省级政府一共工作了 17 年。做文秘。

许子东：秘书党最厉害了。

王跃文：专门给首长们写“各位代表、同志们”写工作报告。

许子东：我们当代中国文化的精华都在这些报告里。

窦文涛：《国画》讲的是省级干部的生态，《苍黄》说是写的县级。

王跃文：从县级开始是一个很完备的官场，县以下的还不行，这个官场就是说，中国官场应该具有的功能，它所有的特点，包括它的职能完全具备了。

许子东：五脏俱全。四套班子。

王跃文：有四套班子，除了没有立法权之外，其他的功能都有。还有一个就是说，上一级官场没有的特别，他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如果，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中国社会的现状，从县一级的了解起，应该是最真实的。说起来改革开放就是利益的调整，那么，调整以后我们应该承认就是说总体趋势就是一个取得巨大成功，对不对？但是就是在利益调整的过程当中，也有的人的利益没能够得到保护，或者受到了侵害。最近几年县一级，县城的群体性事件也经常看到，其实也就是说某种利益冲突的矛盾已经到了爆发时期了。

窦文涛：戾气太重了，往往是某些地方基层积压的社会矛盾，我最近在《新周刊》上看到，经济学家陈志武说了这么一句很惊人的话，他说就在中国 91% 的亿万富豪是权力阶层，那么你说。

王跃文：肯定的，刚刚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最早发财的是哪些人呢？在城里面就是那种很多的返城知青没有靠山找不到单位，然后就开始摆摊。就是自己自谋职业，开始做小生意的，最初发财的是那些人。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完全靠那种所谓的勤劳致富，似乎有一点难了，所以，要么就是那些黑恶势力，通过官场勾结，然后就垄断霸占市场，发财致富。还有一种就是说直接利用权力发财。

窦文涛：怎么利用权力发财的？

王跃文：比方说，我是一个地方大员，你是我的老弟，我跟你出去以

后有这么一个身份在这里根本不需要打电话，根本不需要我批条子，你的生意绝对做得很大。

窦文涛：就说是谁就行了。

王跃文：是谁就行了。

窦文涛：我的天。

许子东：老子说，大音希声。巴金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王跃文说，最高水平的官商勾结，是不用勾结。

王跃文：我曾经写过一个具体的例子。其实是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婿给我说的，他考我，但是当时真把我考住了。他说，王老师有那么一个地方要修房子，领导的儿子想把工程包给一个老板，中间要搞一笔钱，但他又不要跟他的爸爸打招呼，他爸爸也不会发话下来，你说他该怎么办？我说没办法了，公开招标的话，是谁就是谁啦，这个钱他就拿不到了。

他后来出了一招。这样，比方说 5000 万的工程发包公开招标，现在来投标的人有 8 个人，每个人送我 100 万我都收了，我全部收。收了以后我给你讲，哥们，我这个人讲义气的，这个话我一定跟我爸说。但我爸人很正派，他不一定办得到。假如办不到钱我肯定退你。好像这个人很厚道，但最后总有一家中标，那么我把其他的退了就是了。

窦文涛：就赚了 100 万。

王跃文：哪怕是公平的，我也赚 100 万。

窦文涛：这你就让我想起上次潘石屹坐在这，我说买地块这个东西有没有舞弊，潘石屹就说公开招标做不了假。但是你听了他这故事，这里头的潜规则一样可以。

王跃文：有很多招标看上去是公平的，其实，首先有资格审查，审查以后我觉得这个人不跟我打招呼，不具备资格踢掉。好，再就说我是一个大老板，我首先把你贿赂了，然后我就找了很多很多家资质差的公司，要不就是有的我就开了很多家公司，结果到这里投标的人全是我控制的人，谁中了标都是我的。

许子东:这些技巧都要操作,你刚才讲的才真正精彩,无为而贪。想起以前人家讲晚上睡觉吃安眠药,有时是真有时是假,可是假的安眠药他吃了也睡。所有那些 8 家公司来中标,他都觉得他给了领导儿子 100 万,每个人都壮了胆,充满信心。

王跃文:对。

窦文涛:没错。

许子东:领导的儿子给大家都有个安慰。这个潜规则非常精彩。太有才了。

王跃文:很有可能碰到那种特别豪爽的老板,算了,以后还有生意,不要退了。

许子东:而且,还担心要真收了退款,会不会得罪他了?他说退是不是真的?我有这个关系,也不容易,能送得进钱,也是一种成功。特别是,假使这是该商人所认识的最高的关系。

王跃文:做长线。

窦文涛:虚拟经济,完全在实际的投标之外,他虚拟出来一块。

许子东:以前一个电影叫《百万英镑》,据说有钱,不用兑现,也是资本。我认识一个朋友,传说是中央以前某高层的侄子,他也不否认,香港内地生意都做得很好。后来才知不是,生意已做成了。连锁饭店,钱像自来水般流出,他自己说的。

窦文涛:我说口头上的道德,不能跟事实相差太远,要不然道德和法规都没有信用。过去在宣传当中,我们得到的官员的形象,老实讲给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那是公检法的人政府的人,他们就不是凡人,他是特别的、特殊使命的人,道德境界各方面跟我不一样,可是现在种种的事情,其实应该让我们发现……

许子东:官员也是人。

窦文涛:他也是人,其实跟我们一样自私或者会受诱惑,其实你先承认这样一种之后,也许你才好说去监督,设计一个好的方法。

王跃文：对，要承认一些人性最合理的东西，那些不合理的东西，你也要承认它是存在的，然后我们再采取什么措施。否则……我在我的小说里面还写过，一个县里面县委书记太过分了，人大主任和县长还有政协主席、县外办主任也是县委常委一起联名举报，实名举报把书记就弄下去了。好，但是后来新派来一个书记，过了没多久，就把原来一起举报前任县委书记的那几个人通过种种方法都瓦解了，调的调走，有的就地免职，有的提前退二线，有的让你到外面去挂职。

许子东：谁都找得到问题。

王跃文：一个内参专门做过调查。说这 10 来年被媒体报道过的那种检举揭发贪官的有功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许子东：保护不了检举者，怎么来保护制度的自我监督。

王跃文：对，尽管各地政府都要反腐败，欢迎检举揭发，很多纪委有公开的检举信箱，检举电话……

2010 年 12 月 18 日修改（参考 2009 年 8 月 18 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阅 兵

某日和《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宋晓军很高兴地谈论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阅兵。我的问题是，中国阅兵从建国到1959年，然后突然就停了，直到1984年才恢复。当然，很多资料上有解释，因为自然灾害国家困难，“文革”则变成了检阅红卫兵，1969年有中苏边界冲突，等等。可为什么会从每年阅兵，改成五年一小阅，十年一大阅。

现在世界上的阅兵大致有几种。一种现在较少阅兵的国家，比方说英国、加拿大、丹麦等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制的。军队在宪法上是属于国王，如英国皇家海军。所以它要阅兵的话，应该女王阅兵。日本如果阅兵，原则上也要天皇出来。在我印象里，这类国家很少大规模阅兵。但也可以说天天小阅兵——皇宫前天天有换岗仪式，军队鼓乐演奏，如伦敦白金汉宫、哥本哈根丹麦皇宫前，几乎成了观光热点。斯德哥尔摩皇宫前的军乐队，还会演奏百老汇音乐剧主题曲……也算一种“异化”的生活化的阅兵。

第二种情况，军队属于国家，这时阅兵的应该是三军最高统帅，即总统。最典型是法国，马队、坦克走过香榭丽舍大道。法国革命影响了很多近代国家，巴黎的城市布局，尤其是政治性建筑的格局，也影响了华盛顿，影响了北京。俄罗斯的红场，气势更大，现在也是总统阅兵。

第三种情况如中国，军队理论上是属于一个政党。或曰党政军不

分，党指挥枪。理论上应该由谁阅兵呢？我原想，1964年取消五年一阅兵的惯例，是否因为当时国家主席是刘少奇，党主席是毛泽东。当时国庆节《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第一版会同时登两张照片一样大，毛泽东跟刘少奇。所以如果1964年阅兵，会有一点技术上的困难？

凡事不能想当然，查资料方知毛泽东其实只有一次阅兵，就是1949年入城在西苑机场。稍后毛泽东才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总司令阅兵。1954年8月宪法诞生，改由国防部长彭德怀阅兵。很多人没想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阅兵最多的人，就是彭德怀元帅。1959年的国庆阅兵也是彭德怀部署的，但在9月30日，他搬出中南海到京郊挂甲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任阅兵司令，检阅陆海空三军。林彪在阅兵式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彭德怀虽然也收到了邀请到天安门城楼观礼，但他没有去广场，而是在电视中收看了这次阅兵式。再下一次阅兵，就是25年后，1984年。

1984年阅兵邓小平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但他是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不仅恢复了五年、十年国庆阅兵的传统（但1989年暂停一次），而且也继续了西苑机场由第一把手阅兵的传统。更由于之后领导人有了正常退休制度，十年一次的安排，客观上很可能成为一代领袖一次阅兵。

仅仅阅兵一条线索，六十年来游戏规则之变与不变，管中窥豹。

我所知道的阅兵，最有历史意义的应该是1941年11月7日在红场。在德军围城之下，参加阅兵的苏军坦克是在飞机轰炸的弹坑上开过去的，离开红场就直接开上战场。直到今天，俄罗斯的阅兵，也是把家底都掏出来。还有老兵奏苏联国歌，举苏联的国旗。据说有面旗子，普京阅兵也有人举，是1945年插在德国柏林议会大厦上面的旗子。攻克柏林。也是缅怀对于前苏联的大帝国的辉煌梦想。

法国也喜欢阅兵，每年法国的国庆节奏《马赛曲》，经过凯旋门，绕过

方尖碑广场，坦克隆隆开过香榭丽舍大道，旁边 LV 总店玻璃窗发抖。那是最浪漫的一条街，奢侈豪华，女的穿着短裙子，拿着香槟，旁边坦克过来了。阅兵台上像个公众人物的 party，名人齐聚，萨科齐说不定还跟谁打电话。

印度阅兵，是个万国兵器博览会，“美洲豹”直升机，“米格”战斗机。据说气氛也不一样，基本上也不讲究走路步伐整齐划一，就像街头散步，士兵还可以走出队列跟旁边的群众握手聊天。还卖几十卢比门票。像是宣扬甘地精神、非暴力、不抵抗的阅兵。

小国阅兵很多，有些国家阅兵非常重要，如斯里兰卡、缅甸，最著名的是朝鲜，规模巨大，整齐得不得了。

这里有些规律可循。法国阅兵，前苏联和现在俄罗斯阅兵，中国也重视阅兵——这些都是以法国模式通过暴力革命方式进入现代的国家。凡循英国模式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较少大规模阅兵。另外，第三世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阅兵，这些国家都曾被人侵略过的，后来取得胜利。或面对巨大国际压力，要凝聚民心，宣示主权和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展示军事力量。

战败国如日本、德国现在就不阅兵，每年纪念战败日、原爆日，在亡灵面前鞠躬，不展示军力，也凝聚民心。

其实仅从巴黎街头看，法国军队在二战中远没有像在阅兵中那么英勇显眼。为了美丽城市不遭破坏，巴黎当初宣布不设防。哥本哈根也一样。有意思的是，二战中真正顽强抵抗的伦敦，现在很少阅兵。除了前面所说君主立宪外，另一个原因，可能跟城市格局有关。伦敦没一条大道，也没太大的广场。总不能在泰晤士河上船游，或全在 soho 小街转悠。白金汉宫前面路也不宽。

美国也很少在独立日阅兵。其实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无处不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多少老兵开着几万辆摩托车，雷霆万“军”。很多老百姓家门口草地旁星期天会挂国旗。但为什么很少阅兵？

一是对于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有警惕,认为如果军队声威太高了,军方势力将影响国家政策。二、讲究实力,更愿意通过实战体现实力。美国立国以来,200 多次海外用兵,仅冷战之后它海外用兵 30 多回,比冷战时期还多。两艘航空母舰,把人家一个国家政权给搞掉,全程电视转播。先定下时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人以为它瞎说,哪儿有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开始,是世界杯吗?半个月前就下通牒,然后真到那个时间,就发导弹了。

这也是一种阅兵,也是电视直播。跟别的国家全城戒备全民关注的大阅兵一样,现场的效果震撼人心,事后的麻烦慢慢处理。

2010 年 9 月 26 日

棋 牌 规 则

这是某日(2008年10月25日)和文涛、茅于軾老师讨论经济问题时一个即兴的联想,顺手记下。

当时因次贷问题引发西方市场经济危机,甚至也可能连累中国(也有人在这时重新发现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茅于軾引韩愈千里马典故,说明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人们想找一个智者来解决,纠正市场的盲目性,这个想法虽好却不可行。经济危机不能靠“智者”或接近“上帝”的人来解决。其实,何止是经济形势,政治潮流、文化倾向,又怎能只靠“内圣外王”者扳着手指,指点方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对三俗,五讲四美……八荣八耻……九……十……

还是和乡村干部在田头扳手指有关,超过五就记不住。

我于是突然想到下棋——

“这就牵涉到一个人类社会的规则,我一个朋友他喜欢打牌、下棋,结果他发现我们人类社会有几条规律,讲的蛮有意思的。他讲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打牌里边的比如‘斗地主’,或者是‘争上游’,它的每一张牌都是有自己的大小地位权力,因此每一张都有比它大的,最后有一个大王,这是最大的权力。他说这是第一种游戏规则,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人都活在绝对的权力秩序中,对上只能服从、依靠,对下必须帮助、压制。猴年贺岁有个段子,既写实又象征,颇能形容从古至今各种集权社会的个

别成员的处境：很多猴在一棵树上，向下看都是笑脸，向上看都是屁股，向旁看都是耳目。祝你新年更上一层楼，多看些笑脸，少看些屁股）。

“另外一种游戏，就是斗兽棋，也是有权力等级，就是狗能够吃猫，狼能够吃狗，老虎，最后是大象。但是在这丛林规则中，人们加了一个修订，最小的老鼠倒可以吃大象。也就是说否定了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智者。陆军棋也类似，排长大于工兵，团长大于连、排长，师长大于团长，军长司令大于师长。可是谁撞到地雷都死，只有最小的工兵可掘地雷。另外，还有炸弹，任何级别任何权力，碰到炸弹，同归于尽（古代中国农民起义，有历史炸弹功能；当今世界，躲在最荒凉原始的阿富汗山区的盖达，是斗兽棋中的老鼠）。

“第三种游戏，就是比较高级的棋牌，如象棋、围棋，每一个棋子，就个体来说它是一样的，兵也可以吃车，围棋里边任何一个子都和其他子一样，那它的地位就取决于它行动的方式和它所在的位置。所以这个棋牌里边就牵涉到我们对人类秩序制度几种最基本的假设规定。”（比如春运，挤无证山寨大巴或碰到大雪堵塞徒步回乡的是“兵”，火车黄牛票、坐超载船是“马”“炮”，飞机或自己开车回家是“车”。行程、代价不同，出了事故却都是一样的人命。将帅有士保护着，尊贵但活动范围受限——年初一还得去煤矿表演慰问）。

以上说的朋友，是虚构的（这是谈话节目常用手法，既为安全，也是谦虚）。括号内是我现在的补充。

结果茅于軾说：“这个例子非常好的，所以这个规则总结下来就是围棋每个子都是平等的，所以平等的人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形成我们这个现状，所以我们不要希望有一个智者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有问题就要政府出来干预。股民说政府得救市，不管我们不行。楼市也要出招调控，越调越高……

我说：就是因为中国人，“斗地主”多，下围棋少。

不过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与棋牌及政治有关的事。

在江西插队时，我们玩尽了扑克的各种打法，某日一个同学说可以教我们打桥牌。我们早就听说过桥牌是最高级最有品位甚至有国际比赛的扑克游戏，当然努力学习并操练。后来几年也一直照这位仁兄所教规则打。后来回城看了书，才知我们在乡下所学的桥牌打法，基本正确，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一个创造性的修正——就是定约方可以决定是否“倒打”。本来，在一般桥牌规则里，通过叫牌争夺定约，无论哪个花色被选为王牌，或打“无将”（没有王牌），A、K、Q、J 等大牌总代表你的实力，叫牌争夺定约也必须根据自己的实力。这位天才高中生的创造是：当你和你的朋友获得定约后，你可以突然宣布“倒打”：A 还是 A、2 等于 K、3 等于 Q……也就是说，本来很有实力的牌，可能因为定约方（执政方）转变而突然失势。本来地位卑微的牌，可立刻赋予地位权力。国际通行的桥牌规则里，完全没有这条规则，不知是什么人在哪里的发明，我们却在一个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使用这个规则打桥牌好几年之久。“倒打”亦使得叫牌过程充满戏剧性，有时这方叫 5 方块（总共 13 张牌要赢 11 张），那边却也争 5 黑桃。这种情况本不会发生（世界总有一定秩序，某些实力是任何政治力量执政都要依靠的实力，例如医生、教授、军官、明星……）。现在可以“倒打”，基本上什么角色都可瞬间被替换，城头变幻大王旗，鞋匠、清道夫、小贩等马上可取代医生、教授、军官……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学桥牌的那些年，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人类社会游戏规则的一次充满创意的“倒打”吗？

2010 年 9 月 18 日初稿，2010 年 12 月 22 日补记

对 面 堵 车

世上凡事皆有苦有乐——高速公路驾车也不例外。

“乐”是快速到达目的地，增加了选择生活空间的可能性。而且一边听音乐一边欣赏田野景色，或晴或雨，皆有快感（肉身借他力快速移动引起大脑虚幻的“快”的感觉）。“苦”除了危险意外分分钟紧张，第二就是堵车（或曰“塞车”）之苦。我在美国前后四年，有人问起最苦之事，回忆之中，就是下午五六点精疲力尽离开洛杉矶加大开车回家（在东洛杉矶南帕萨迪那）必然要经过 Down town（市中心），也必然会在 10 号公路“堵车”——不是堵死，而是一寸寸往前移。穷学生破车又没冷气，常常一个人大喊大叫又唱歌又骂人不让自己睡着。万一其间又有三急，进退两难，活受现代机械文明煎熬……

还有一事，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说是又苦又乐，或者说是见人家苦自己偷乐：那就是自己这边道路顺畅，轻车快马，眼见反方向对面车道严重堵车，黑压压一长条停滞车龙，延绵数里……

如果是前面堵车，作为受害者我们在后面常常“不明真相”（不知前面为什么堵车，堵到什么程度，还得堵多久……）。但对面堵车，我这边可就是旁观者清了。先看见肇事现场，出意外的车辆怎么撞飞在路中央或撞栏杆，有时还有人受伤流血满地，警车、医务车如何抢救，然而清晰可见在后面的车辆及人群大致堵成三种状态：比较接近事故现场的一

群，等待时间久了，有时都站出车外观望，有的干脆熄了火和邻车的人聊天抱怨讲股票甚至调情（在丹麦一座跨海大桥上还见过严重堵车后有人在车顶打牌）。那你说否则怎么办？进不成，退也无路啊！第二种状态是稍远一些，数里以外，也许堵得不够久，车队比较沉默，大家只是静静忍受，甚至还有点一寸一寸往前移的“希望”和“努力”。最惨的是第三种，即在堵车长龙之后，还有很多车，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还拼命高速往前赶，也不会从就近出路“逃亡”，反而还闪灯、抢道、超速、争先恐后地急急向被堵道的“未来”前进……

唉，在自以为是的人生路上，人不都是这样吗？

反省我的偷乐，部分是合理的。如果堵车属常态（如郊区往市区上班时堵；市区往近郊下班时堵），我就会庆幸自己选择了光荣伟大正确的高校教书职业，不必坐班，经常可避开社会（车辆）的“主流”（王洪文时期主席有教导，叫“反潮流”。但“反潮流而动”的缩写是什么呢？当时没人敢问）。这“偷乐”也有部分是不道德的，以他人不幸联想自己的幸运，“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小学老师早就警告过，居然现在还犯，特别是，有时，旁观“反方向堵车”前因后果，嘴里“啧啧”感慨，心里暗暗地（下意识地）还期待对面的堵车长些，再长些……

于是，想起来历史事件及其后果和反省。

如果车祸意外发生地即历史事件现场，第一批被堵的车是历史事件参与者旁观者，因为靠历史事件距离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激愤难平痛苦难忘。那后面的第二批默默等待的，就是历史事件后果影响的无声无力的承受者，比较麻木或无奈。第三批急急赶去“被堵”的则是“忘了”（或是根本不知道）这历史的真相，于是常常既受这事件后果深远影响，又“前赴后继”重蹈覆辙，重复悲剧而不自觉。

关键是，历史长河中，后面的人常常看不到（不想看，不让看）前面。而所谓政治意义的“历史反省”、学术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就是在我这条车道上，逆向观察梳理事件的起因、现场，然后是效应、后果、变化、

影响……

比如说东北有钢厂工人因反民企控股而打死了一位年薪 300 万的总经理,事后网上反应强烈,大都赞扬“咱们工人有力量”。有条留言很令我注意,说:“共产党应该立法,打死贪官不犯法,天下就太平了。”跟帖的一片叫好,但没人关心由谁、如何确立贪官及怎么打死等问题。似乎多数好人有权打少数坏人。这使我想起当初江青提倡“文攻武卫”,红卫兵当中曾流传据说是林彪的话: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反动,好人打坏人活该。结果这种“好人打坏人活该”论对六七年全国性的武斗有不少影响……四十年过去了,“工人打死贪官”,和“好人打坏人”有没有语法上的同构关系?

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件,看不到这些事件的后果、影响和灾难,还在急急地兴奋地,充满青春朝气地或者说也别无选择地往“前”赶……

正当我冷眼旁观高速公路对面反向堵车长龙的前因后果并感慨匆忙“后来者”时,突然我想到,很可能,几分钟后,我这边的路也会堵上……

2009 年 6 月 3 日

拉登之死

99%真实的拉登被美军打死,据凤凰网的一项调查,55%的国民的回答是“令人伤心,失去了一位反美战士”。虽然网民测验因问题设置、取样对象、统计方法等问题,从来不一定“靠谱”,但同样的问题,如在香港、日本、欧洲,大概都不会有这么高的“伤心”率。这背后可以折射些什么心态呢?

一是出于反美惯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9·11当日,我刚好在同地一公众场合,现场反应周围气氛的确看热闹多余愤怒或同情。我的实时联想也是“中国可以暂时松口气”——因为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正有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趋势,海南撞机案就是信号。拉登的出现客观上缓和了中美矛盾,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时机。这种坏事反有好效果的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如西安事变、珍珠港事件……

二是拉登的战士形象、浪漫情怀、英雄情结、理想主义,虽有数十亿财富,却不贪图安乐,中国人向来崇拜山沟里的文化土匪(《让子弹飞》演员模仿伟人的自恋,便是最近一例)。

三是反美习惯与战士崇拜后面,更有对以恶抗恶道德逻辑的无意识的认同。国人理性上当然知道拉登恐怖主义不对,但除了非直接受害缺乏“普世同情”外(国人恨东条英机恐怕多过恨希特勒),更重要原因是相信目标如果高尚,任何手段都合理。其实拉登之罪不在反美,而是不择

手段反美。如果以为目的正当便可以不择手段,那么某些正当的反对各种黑暗势力的情绪,也很容易转化为反社会的行动。所以,百姓反贪腐专制,不能不择手段。当局打黑维稳,也不宜不择方式。因为谁想做拉登,大概最后自己也会碰到拉登。

原载《羊城晚报》2011年5月8日

关于红歌的传闻

近一二年来，祖国大地处处唱起了“红歌”。先是某个城市，后来则渐渐红遍大江南北。据说（据有关部门人士说），中央并没有文件明令全国人民必须唱红歌。所以，这是广大群众的汹涌热情，是革命精神的自觉延续，是中国模式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不仅唱出了红色传统，对激情演唱的男女老少（尤其是经历过革命时代的人们），也都是一种很好的心理、生理医疗和宣泄。

不过，这几天我也听到一些关于唱红歌的传闻。所谓“传闻”者，当然不一定属实，可能是造谣，所以要带着怀疑、批判的精神来对待这些传闻。

传闻之一是有些地方的党员甚至群众，每次唱红歌都拿“红包”（各种名义的津贴），每天 200 元、300 元，多至上千元，因此参加者踊跃。我很怀疑这个传闻的真实性。因为谁都知道，红歌与红包，虽然都“红”，却不可同日而语。难道我们人民群众歌唱毛主席是为了印着主席像的人民币？这简直是对红歌运动的极大侮辱。我不大相信这个传闻。而且如果此传闻属实，那么现在全国几千万人在唱红歌，要唱掉多少个亿？这数字如何统计？

传闻之二是某地监狱里亦组织犯人唱红歌。犯人要改造思想，当然在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唱红歌鼓舞自己重新做人，也不失为一

种好方法。只是也许并不是所有红歌都适合他们唱。有人说，一群强奸、杀人、放火犯排在一起唱“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还唱“接过雷锋的枪……”，这样的画面有点难以想象……

传闻之三是据说某地有些宗教人士，包括牧师、住持、尼姑、阿訇等排在一起，激情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更不相信这个传闻。宗教人士当然都有爱国和革命热情，但是，但是……友人说网上还能看到视频，我认为这可能是伪造的。

我说不出什么道理，也没有太多证据，只觉得这几个传闻，都不是真的，或者只是极个别的局部现象。

补记：有些事情，起初只是权宜之计，是某种策略。但因为有了失忆的土壤，所以渐渐入戏了，日后或酿成不可收拾的结果，届时后悔莫及。

原载《羊城晚报》2011年7月3日

第二辑：社会风景

方言与政治^①

我近年在学术与电视之间“越界”，参与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说些废话，挣些碎钱。常常有人问起节目内幕，如何准备，有没有主题，是否直播，事后如何编辑？有没有稿子？有没有审查或自我审查？是否畅所欲言？乃至有多少真话等等。我平时都不知如何回答，正好2009年2月有一集讲方言与政治，我想给那天的谈话作点注解，也许可以回答上述问题，也给所谓电视言论作一个实例分析。以下仿体是节目在凤凰网上的录音文字，应该是网站工作人员根据节目录像整理的，多谢他们。节目版权应该也属于凤凰。我只作少数文字修改。宋体部分则是我后来的注释。

人家是关心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我是百无聊赖自己注自己。当然，这样的“自注”在本书中只有一次。下不为例。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文道兄，子东兄。咱们三个人就是个地域分别对吧？最突出的许老师是上海人，是吧？

许子东：有人给我们分析过，我们为什么三个人老在一起做，其实跟地方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是北方的，我是江浙的，他是广东的吗？你看这是不同地方的人，虽然都戴眼镜。

① 本文是2009年2月5日“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及注解。

是日话题从上海《新民晚报》一篇文章引起网上风波说起，窦文涛上来就拿上海人说事儿，这是最易吊起一般观众趣味的“叙事策略”。我平时看网上留言，早知上海人是“原罪”。夸你者说虽然某某是上海人，但节目做得好，思路敏捷有责任感云云；贬你者说虽然某某节目做得好，思路敏捷有责任感，但是一个上海人。其实，凤凰很多上海人，何亮亮、曹景行、邱震海，（大半个评论部）还有闫丘露薇、吕宁思、李辉，还有鲁豫也说上海话，刘长乐也是上海出生（长乐路在锦江路旁边）……所以总括来说，“虽然凤凰很多上海人，但节目做得好……”

我可不能让文涛“煽风点火”，所以马上说为什么三个人老在一起做，其实是北方人、江浙人和广东人的不经意组合。

这也是实话，曾试过跟上海人一起做“三人行”，何亮亮、邱震海、吕丘、马伊琍、严歌苓……但都是偶一为之。谈话太有“共同语言”，效果不一定好。

文涛反应极快，我说“眼镜”是废话，他就拿“有色眼镜”切入正题，这不能排练，全是即兴，“有色眼镜”就是指语言问题上的地域歧视。

窦文涛：对，所以都戴的是有色眼镜，不同地方的人看不同地方的人，包括你们上海人自己看自己。最近上海人下了一个赌，什么赌呢，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老像是个神秘的国度，但是它不是个国。

梁文道：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窦文涛：不一样。但是上海网友原来也能把艺人搞下台，最近你听说了吗？许老师，《新民晚报》出来道歉了，道歉就为个什么事，说发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设户籍个个精英》。这个文章里有一段话，我仔细看了，上下文说的是浦东，现在浦东都是新上海人云集吗？说那地方都讲普通话，没什么人讲上海话了，那大概是脚跟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在新上海人聚集区讲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就这一句话，好家伙上海网友就不干了，就板

砖拍着，啐的，就是一定不能饶他。这个署名作者叫做李大伟。李大伟遭到人肉搜索，你知道现在都一遍一遍地搜索他，最后搞到《新民晚报》为此道歉，特别是编这个稿子的编辑听说为此停职。

这一段好像是叙述事情，其实口气中对那个文章作者略有偏帮，“家伙上海网友就不干了，就板砖拍着，啐的，就是一定不能饶他”，为什么呢？这就见出文涛的敏感：毕竟“三人行”的观众大部分在内地，考虑他们的情绪感受是主持人的本能。

梁文道：那篇文章我也看到，那句话不能抽离出来。

窦文涛：上下文。

梁文道：它的意思是说在浦东那个说普通话的圈子里头，那个圈子认为说上海话不文明。就有那种气氛，他不是抽离出来说整个上海，或者在全国说上海话就没文化，不是这个意思。

窦文涛：你知道有时候写杂文吗？他有时候逞一时之快，就说出来这么一句话，我跟你说，世界上的事，认真较劲，什么话我都能给你找出毛病来。那么这个话当然上海人它大概刺激到痛处了，许老师你也是上海人。

文涛又把问题扔给我，逼我就“上海人”这个身份表态。下面一段话我其实是有点准备的。

许子东：我想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从政治正确的层面，你讲任何一个方言比普通话低级，都是政治不正确。这是二战以后反殖民主义以后出现的现代概念。就好像你不能说广东话没有文化，说英文有文化。但实际上有人的确有这样的感受。永远都有的，就算英文里边你讲英国口音，就比新西兰澳大利亚口音在美国人看来更有文化，你讲法文好像总比你讲英文有文化一点。什么叫有文化？我们中文里面的一个常识或者说误解，说一种方言比较有文化，就是比较文字化。你一种方言越容易文字化，越能够写成书面语就被

认为是越有“文化”。历来,这是中国跟世界很大不同的地方。现在我们讲的语言概念是欧洲出来的,欧洲的语言是以声音为中心的。以前是拉丁文,全部欧洲都用,像我们的文言。后来意大利开始,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就是一种声音中心的语言,创造一种文化,形成一个民族。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是不管你说什么方言口音,只要你都能写成一样的文字,就能来考状元,就是有文化。所以这个实际上、客观上,在上海大家心目中你开会,你讲普通话跟讲上海话效果当然不一样,对不对?你讲上海话就显得“没文化”,这种事情也不能去硬抠,你要去硬抠的话,政治不正确,但是常识大家都这么认为。

在这一段话里有两点常识和两个学术观点。常识一:假定主流语言比方言有文化是“政治不正确”,就像不能说大国比小国更重要(这也是二战以后才有的后殖民观念);常识二:虽然政治不正确,但觉得某种语言更有文化又是人之常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由帝国文化传统与殖民主义形成的偏见)。两个学界看法是:现代语言概念是“声音中心主义”,源于近代欧洲;但中国历来以文字统一天下,书面文字从来都比声音重要。所以我戏称,语言的文化性与语言的文字化程度有关。

作为学术观点,这样三言两语当然并不严谨。但电视语境中也不宜长篇大论。把西方“声音中心主义”理论和汉语文字方言关系放在一起考察其实是很好的题目。

窦文涛:所以为什么最愉快的聊天是朋友私下里的聊天。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这句话。你没法跟全世界人民一块聊天,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能做朋友的人,真不能在一块。但是你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就涉及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都有。你私下里聊天为什么不怕,在私下里的这个场合,你即便开个什么玩笑,也没有人真的会认为你是歧视了谁,就是为了一个娱乐吗,对吧?

可是一上到公共平台，那你就需要对所有人心里的感受负责。比如说你骂我石家庄人，我确实就觉着你不是东西，对吗？那你是为我服务的，主持人，为什么我爱道歉。其实有个别情况，不见得是我真的认为这个话有多错，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个本分吧，就是说是衣食父母，人家是观众，你服务员没有说得罪人家你不道歉的，所以，甭管对错，先道歉，《新民晚报》也是这个，为了给你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

许子东：他们在一个脱口秀节目里面开玩笑说刘欢歌是唱得好，脖子看不见。他说你看人家珊拉·布莱特曼穿的那么正式，这个刘欢就穿个圆领老头衫。可他又不能穿衬衫吗？那么衬衫领子不就到下巴了吗？这段话如果私下里聊天，我相信刘欢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一上正式的传媒，人家马上可以指责你，你看你这个不仅是地域歧视而且还人身歧视呢。你讲人家生理上的某些问题，这不正确。

有关“文”与“言”的关系的讨论没有进行下去，文涛的本领是总能将文化学术观点拉回日常生活趣味，政治正确不正确的界限被解释成朋友聊天或公众话语的区别，浅显贴切。以自己石家庄人举例，讲方言的敏感，诚实可信。我接下去关于刘欢的一段笑话，其实是引自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相声”，有点搞笑的意图（其实我深知自己不善搞笑，说笑话自己先笑，有朋友说，是我笑的样子好笑，我很佩服阿城等人的“冷幽默”，自己怎么也学不会）。放在上下语境里，其实不那么有意思，亏得文道托了一下，话题才得以继续伸展。

梁文道：正确不正确，这种笑话的前提，歧视笑话有个前提，就是看大家在不在意。在不在意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怎么看彼此的关系。有个很经典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南斯拉夫不是四分五裂了吗，在前南斯拉夫这块地方，你今天在这个索尔维

亚地区,说一个科索沃人嘲笑他们的话,马上完蛋。但是,我就听说了,在铁托在的时代,这种玩笑是天天开,甚至开到电视上,从公开讲大家不觉得有问题。其实你回想一下,以前,我们中国各地的这种表演节目、脱口秀、相声就爱玩儿这个,然后玩的时候我们广东人总是被人笑,说我们广东人说的话不知道是什么话。老笑,但是我听我不觉得有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有问题呢?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这就表示说我们开始不宽容了,或者我们开始敏感这种地域的分别,各种东西都放大了。

许子东:文道说得很好,以前侯宝林讲,上海人理发先洗头。“不是新社会不兴打人吗?”用方言开玩笑,谁也没有觉得什么。

窦文涛:上海人听了没事吧?

许子东:没事。

文道在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方言之间的误解玩笑如果引起大家的不愉快,其实说明了省籍地域族群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三人行通常有上中下三重效果和境界。最勉强的情况因为谈话对象气氛或话题的缘故,来不及说自己的意思,话题已转,节目完了还没有把自己的话题说清楚。常常离开摄影棚还在后悔刚才应该怎么说。中间的效果是自己的看法都说了,但争论对话交锋不多,节目结束与开始时,自己的看法没什么变化。最好的状况是谈话出乎自己的预想,节目不是谈话的完成,而是谈话的发展,不是想好了说什么,而是在没想到中即时反应,因此话题是有所发展的。以今天的例子来说,语言高于方言,政治不正确,我早知道。人们还是在各种方言语言中互相看不起,我也知道,但这种语言上的自尊心可以联系到地域族群乃至国家关系的紧张,却是一个我事先没想到的讨论切入口。

这也正是文道的重要性所在。

许子东:其实问题还不只是一般的方言、文化的问题,还就是特

别和上海有关。关键就是上海怎么就被全国的人讨厌，而我个人觉得可能有点“报应”。因为上海人历来就有点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记得小时候弄堂里小孩绕口令，说“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就是有一种……总觉得现代化程度比别人高，而且特别看不起苏北人，跑来做澡堂理发，这歧视其实是有阶级性的。

窦文涛：就是乡下的。

许子东：不单是乡下的，同样乡下来的，宁波来的就好。然后你要注意这方言歧视背后还有很深层的一个原因，就是上海话跟所有的方言都不一样。上海的话，它不是一个方言。比如说香港话来自广州话，它是根据一个地方的语言。上海话却不是根据某一个方言，它是人造的。因为原来上海本土人讲的话，被认为是很土的。你今天在上海讲本地话，那个是浦东或青浦的农民的话。现在所谓的上海话，在20世纪初上海发展初级阶段胡适他们刚来的时候，人为形成的，它是由宁波话、无锡话、苏州话，再加上英语造词。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原来说这种方言。比如说回到三百年前，没有上海话这回事，它是纯粹的城市语言。所以说你不会讲这种语言，就会被人看出来你刚刚从乡下来。这种语言歧视其实背后有阶级歧视。所以上海人养成了这个不好的习惯，1949年也没有好好检讨，就是说歧视外地人。所以现在人家也政治不正确，今天被人歧视某种程度也是“报应”。我当然也不能讲话该，就是说它有因可寻。这个世界上凡是看不起别人的人，通常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人。

窦文涛：这话讲得地道，往往是这样。

既然方言问题背后有地域歧视，那就不可避免要讲到“上海问题”。其实我早就想讲讲上海人的“原罪”问题，一直没有合适机会。说报应其实也有点政治不正确，上海人多少年来觉得自己大城市文明程度高，有意无意看不起乡下人，这是一个我离开上海二十年才逐渐意识到的事实，至少也是现在内地不少人对上海人有偏见的部分原因。（男人们对

“上海女人”的“嗲”看法可能更复杂一些，恐惧中夹着喜爱，对上海男人则视为精明、怯懦、提篮买菜……）更复杂的原因还包括南京路上好八连对资产阶级香风的仇视，前些年对政治领导层“上海帮”的看法等等。结论“看不起别人的人往往也被人看不起”有两层意思。既讲后果（上海人或看不起上海人的其他人）：你看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起你。也讲原因（中国人或弱国国民）：因为被人看不起，所以看不起别人。

窦文涛：而且人家不是有人说了吗，最近敏感的人多了，像最近的春晚，广东有个政协委员提出来。当然我觉得广东这个政协委员他提的是比较正面的，他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广东人有这个胸怀，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反思，为什么广东人老在春节晚会上，被当作是取笑的题材。比如说小品老是说的广东人傻乎乎的，好好漂亮啊等等。反正，为什么你这个春晚上你搞笑，说起广东人，老是这么一个傻呵呵的形象。然后他说我们广东人不是挺精明强干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不符合事实。这一点我很感兴趣，就是说这次《新民晚报》道歉，我就发现方言在消失。因为这次很多痛心疾首的人，认为上海80后的讲上海话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甚至90后的上海的孩子，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因此感到一种在消亡的趋势。我最近去了趟广州，我原来在广州住过七年，我已经大概有十年没有去过。我这次一去，语言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明显广州跟我印象中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出了电台大院，一出大院我就是广东话，怎么现在我到哪儿都已经是普通话得天下了。

梁文道：对。

窦文涛：好像是有这么个趋势。

许子东：所以就是还是文道讲，方言引起争论是因为现在实际上地域族群之间有许多矛盾。

悄悄的，不知不觉的，无预谋的，自然而然的，闲聊切入了更深一层

的正题。

《上海文论》主编吴亮有次和我说，你们三人行话题，宜俗不宜雅。“雅”话题（莫奈、贝多芬、海德格尔）闲聊下去就显得“俗”。“俗”话题（艳照、绯闻、热帖、奇特案件）谈下去可能会升到“雅”的层面。

真是同行知音啊。

但“方言”进入“政治”不能只限于讲上海。文道这时提了个很重要的比较角度：

梁文道：没错。但是我觉得广东还是会比上海好一点，你说的那个情况是广州啊，广州这块地方，现在是外来人口多了，那么大家都就说普通话了。可是你一离开广州，你过去佛山、番禺就马上回到广东话的天下。为什么广东话在这方面比上海话还是有优势呢？就因为广东它一直有香港这个地方。

许子东：香港有一个传媒强势。

梁文道：我们现在说语言这个东西，想想看各地的方言。这个方言都变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上不了台面，进不了公共空间。但是因为有香港在，再加上广东向来有自己说广东话的电台、电视台。所以有人唱粤语流行曲，有人拍粤语电影，有人演粤语的电视剧。有这些东西在的时候，这个语言还不断推陈出新，还不断的新造一些词出来。

窦文涛：甚至于香港人可以讽刺我这个北佬讲广东话，说我讲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你讲这个广州话，我想起了珠三角一个领导，曾经信誓旦旦的对人大的考察团就说，我们一定坚决地“拒绝”接受人大的监督。这话错在哪儿了呢？大家听了哗然。他这个“自觉”，广州话在珠江三角洲那边我们一定坚决地“拒绝”人大监督。

吴语粤语，都有在国家公众空间被北方语言边缘化的问题。张爱玲将《海上花列传》翻成国语，四十年代南来作家在香港提倡方言的革命文

学,都是文学史上争取方言地位的重要努力。但时势发展至今,是粤语的处境大大优于吴语。文化界这方面讨论不多。仔细想想,与香港经济法律优势有关,更和传媒机器强势有关。

许子东:英文学术界有一句话,讲什么叫 Langune,什么叫做语言。他说语言就是带有警察的方言。就是说你拥有国家机器以后,你这个民间方言,就变成了官方语言了。现在广东话跟北方话,你看一个是带着政治的力量,所以说北方的方言“忽悠”、“不差钱”,可以畅行无阻,因为带着政治的力量。但是广州话就像带着金钱和流行文化的力量。其实北方有点反感,知识分子私下对广州话不无反感,因为你是跟着钱来的,生猛海鲜、埋单、打的这些东西都是跟着经济因素北上的,但力量也很强。那上海夹在两者中间,也没有国民党时期的经济政治优势,所以说上海现在方言节目“不上台面”。有些很受欢迎的方言节目,如上海纪实频道的节目《往事》,很受欢迎,观众喜欢这么纯正的上海话。可是这些节目在电视台就留不住,被停播了。

最近有一个反弹现象,有一个人叫周立波,跟作家同名,他在上海兰星剧场,一个人讲两个多小时,连中场休息都没有,几百块钱一张票,连续十几天全部爆满,很多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去看了,电视广播完全不转播露面的,红到这么一个程度……

窦文涛:他讲的是上海话?

许子东:他讲的大部分是上海话。其实我看路子跟小沈阳差不多。

窦文涛:小上海。

许子东:有点女性化,但是多一点政治的嘲讽,还有一点模仿领导。有些笑话是中性的,比如说:“我小学三年级抽烟,我爸问我为什么,我说台湾不回归,我心里闷得慌。”诸如此类。但是也有些有点政治内涵的,比如说他认识一个有钱人,发了,怎么发了呢?卖酱

油,卖酱油怎么会发了呢?掺水。他说酱油这个东西你掺了水它还是黑的,不过回家煮红烧肉,煮三个小时还是白的。接着他说,四川地震了我捐了40万,为什么捐40万?这以前做了亏心事,现在平衡平衡,接下来就一句,我不是说捐款的人都做了亏心事,大家鼓掌。再来一句,不过不做亏心事怎么会有钱呢?弄了剧场效果非常好,这就是有点政治的角度,有很多完全是中性的幽默。

在台下,我就跟他聊,他是周柏春的学生,周柏春是个著名的滑稽演员。滑稽这个艺术跟相声来比,它就是一直打不过相声,这跟语言也有关系。我说周立波你能不能用普通话来表演,他说也行。不过我就是有些怀疑。你们刚才讲的我同意,方言,大趋势是在萎缩,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它仍有生命力。

那时全国范围传媒上还较少有人谈论周立波。后来他上了戈辉、鲁豫的节目,在网上也“火”了。不过真正看他节目笑出眼泪的大概还是吴语地域的观众。

周立波学领导人的段子是他早期的“招牌”,“招安”后就不见了,其实是个有意思的尝试。西方媒体娱乐谈话节目永恒主题,一是性,二是政治,包括拿政治领袖开玩笑。分寸很重要。

相比文涛,周立波、小沈阳及相声演员们大都是每天重复写好的段子,每天为同样理由笑,不知多少属于情绪,多少归功于技术。

题外话。

窦文涛:方言是有着特殊魅力,讲老实话,它的魅力覆盖地区,这里边还有讲究。跟文道讲的权利很有关系。你比如说春晚,到底是给谁看的?说是给全国人民上的这么一道菜。可是实际上,现在调查公司讲,以长江为界,在辽宁东北那边,收视率可以达到80%几,你就以长江你往南为界,最高的安徽安徽也就是24%。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20%以下,到了海南1.3%,到了广东百分之二点

几。就是说你这些东北话的这几个小品，广东人看了之后，即便能听懂了，可是其中的味道他接受不了。

梁文道：接受不了。

许子东：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梁文道：很简单，这个原因并不是广东、海南、广西我们这些真正最南方的地方的人，接受不了这些东西，而是我们也从来不被接受。从我的角度去看，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个角度上，广东跟上海是一样的，虽然广东好像是有自己一个地盘，一过梅岭，就是广东话天下了，广东歌都来了，但其实在全国的媒体上面，广东人的形象加上粤语，在春晚要是出现的话，你就是被笑话的。

窦文涛：小丑的形象。

梁文道：对。

许子东：就是精明、贪钱但是有点好笑。

梁文道：虽然赵本山有很多自我调侃，他那个形象。

许子东：他憨厚、朴素。

梁文道：但是他是代表整个国家的主流，他占据主流，就是我们国家的主流还是以北方为主。

窦文涛：北方的，普通话跟东北话是太接近的。

梁文道：所以从南方人的角度看，是我们被挤出去了，不是我们不接受。

一般来说，在凤凰讲央视是不合适的，赞扬等于帮同行，批评也不允许且不利友好竞争。不过春晚已是“国家大事”，有机会还是要议。春晚体现方言待遇与政治谋略的微妙关系，现象容易看到，原因难以追寻。也不完全因为省籍乡音，领导人多南方人，照样在京城维护北方语言权势。

许子东：文化研究方面对这个现象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技术性

的,就是因为按鲁迅说法,中国划分五大语系,北方划成一大系,然后江浙、两湖川贵,然后福建,然后广州。所以在江浙这一带,真的隔一个县的话都不一样。你要讲一个笑话,隔一个省理解很难,而北方这一大片都可以,这是技术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认为就是中国政府历代的统治阶层,最要安抚的是北方的民众。

窦文涛:我倒看是广东人爱造反,辛亥革命,北伐。

许子东:只有最近这一百年。之前你翻翻历史,南方主要农业生产,北方较多游牧讨伐……

梁文道: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回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很好玩,以前中国人的统一,就像刚才许老师讲的,是靠文字,而文言文不是用来说话的东西,它是一个书写系统,它不是一个语言。

许子东:成为官僚系统的基础。

梁文道:对,以前的人,彼此沟通,主要是靠书面,远距离沟通是书面,不可能有电话,所以也不需要统一一个国家语言。但是问题是,现在白话文兴起,然后讲“我手写我口”,想想看,写哪个口呢?你写谁的口?

窦文涛:写广东口还是东北口?

许子东:北伐军那个时候,建议就不一样了。

梁文道:对,就不一样,所以看当时搞国语,民国年代,他们要开始建立国语,开始谈国语问题的时候,因为当时国民党,主要的势力在广东,是往上打的,乃至那个时候国民大会开会,居然有人提出用广东话当国语,而且是差3票通过。

窦文涛:辛亥革命在南方广州干的。

这一段,触及到了非常重的话题,但与其泛论史上“北方入侵”,不如列出北伐时表决选择国语这一简单史实。紧要关头,材料总比议论更有力量,电视学术很多不同,这一点却一样。不知不觉,我们从上海话(与人)的歧视被歧视,讲到粤语沪语等方言与中原文化及政治权力之关

系。知识是权力，当然语言后面也是权力。

梁文道：所以你看这个完全跟政治有关的。而且我常常在想一个事情，我就是平常开广东人玩笑，开上海人玩笑，我觉得都无所谓，只不过这种东西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制度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前几年不是说，电视节目主持人，说话不要有港台腔嘛，我们对这种东西，我真的很本能的反感。

许子东：为什么不规定不能有京腔？

梁文道：为什么有东北腔，为什么有陕北腔？

窦文涛：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过，北京人干吗要有港台腔呢？就模仿不好。

许子东：广州的人就不能说话有京腔吗？

窦文涛：你试试。

为什么……？为什么……？再问下去就不好说了。于是文涛巧妙化重为轻，题目最后落到主持人可不可以有地方腔的实处。广州人说话带京腔？你试试？不是不允许，而是能力问题。这既是话题转移，又就事论事。来不及回答，音乐渐起……

又一天的“三人行”结束了。

2010年9月10日注释

房地产符号与公众想象方式

某天有个中文系学生问我,说我们现在所学的什么中文最有价值?我开始听不懂,就说谁谁的文字好,哪些作品最经典等。我学生说,如果价值就是值多少现钱呢?我想想就说,最值钱的可能就是名牌产品的品牌名称,例如像“可口可乐”中文译名和广告词等。湖南凤凰城和某地打官司,说抄袭了他们的宣传词:为了你,这座古城等了1000年。据说涉及赔偿额三亿。连标点每字两千万,价值高。声明一下,我接下来就提到一些商品或楼盘的名字,我无意为他们做任何的广告。所以提到的也不必高兴,说不定是骂你们的,没提到也不必生气。

有朋友到香港去,看到一个地方叫钻石山,以为有豪宅。跑去一看,其实是香港最穷困的地方之一。另有一个地方叫渣甸山,其实那是个传统的富人住宅区。尖沙咀、陆家嘴,本来都是颇“乡土”的地名,现在都是“黄金商业区”。可见现实与名字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为了做这个演讲,我请我的助手随意在网上找了600个楼盘的名称。为什么要找助手,不是我偷懒。因为做研究的话,需要全部找,每一个城市上万的楼盘,我说的城市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等大城市。那样工作量太大,对一篇文章来说,无法操作。如果自己选择一些名称做分析,材料本身会带有我个人的主观性。所以最好是别人提供资料我做分析,可以避免为了观点找证据的研究方法。600个楼盘名称,香港、上海、北京、深圳,

每个城市 150 个,我做了分类。先看看香港楼盘的名字有什么特点?

第一,香港的楼盘名称突出山水,重视自然。楼盘名称从语词结构上看一般有两个部分,后面一部分是名词(也有一些可以有意省略):楼、庭、亭、公馆、苑、山庄、别墅等等。在我们随机抽样的香港 150 个楼盘中,以“园”为名的 16 个,以“轩”和“居”为名的 28 个,以“湾”或“山”为名的是 35 个。香港这些名字以自然为依托的最多。以海景、山景为名字的楼盘大部分是三字组合,下面我们会讨论,内地的楼盘四字居多,华丽家族、盛大金盘、世贸滨江之类。香港却很多三字结构,比如浅水湾、雅典居、滌涛山等。这个差别很重要,三个字,说明名词不用词,用字,或者说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用得是比较文言的方法。比如说“漾日居”,如果内地,这个楼盘可能就叫“阳光水岸”、“在水一方”。所以,简言之香港的楼盘符号重山水,同时较多文言的痕迹。

香港楼盘名称第二个特点是帝皇符号泛滥:皇廷帝峰、皇府山、乘龙居、帝景园、御龙居、天玺、君临天下……为什么香港人那么想做皇帝呢?这帝王情结也是中英文化结合。英国是世界上为数很少保留皇权的国家,1997 年以前,香港赌马、军队等到处是皇家标记,电视节目每晚结束的标志就是播放“吾皇万岁”。离北京又这么远,天高皇帝远,中式帝皇情结可自由发泄。香港租给英国后,中文发展停滞了,或者也可以说中文在香港没有被 20 世纪“内忧外患”(白先勇语,指汉字简化与翻译腔影响)“污染”,至今仍用清代概念:政务司、差饷等,但是皇权价值观没有被革命,所以楼盘名称都是皇、帝、龙之类。而且香港很多再辛苦的老百姓,讲到帝王生活也被这些商业大众符号(及连续剧)误导,好像皇帝生活就是一龙几凤等等。其实,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皇权文化的影响,但是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起这样的名字。在北京,皇城根下,有皇帝含义的楼盘名字却最少。我以为,北京人心中推翻帝制这么多年,可是,真正让你买一个房子,就叫皇宫、玉庭、龙居,住在里面恐怕心中都有点慌。

香港除了皇帝情结之外,还有一个情结就是富贵梦。有一个字大家

最熟悉的，在香港随处可见，在楼盘符号中出现率最高，那就是“豪”，豪庭、豪苑、豪园之类。在上海，我统计一下，用“豪”字楼盘3%。在北京更少。据说在京沪等地的“豪”字盘，大都是港产开发商。在香港，有接近20%。例如“将军澳豪庭”、“港湾豪庭”、“加州豪园”等等。这个“豪”字代表什么，我查了一下字典，原来，这个“豪”定义有好几个。

第一就是豪猪身上的刺，我想，香港的开发商不想让你做豪猪的刺，第二，就是形容豪猪身上的刺又长又刚，用来比喻有才德威望权力的人；第三个就是气魄大，不拘束。这定义出现在《史记》里。直到唐代，“豪”还是“大”的意思。今天香港的楼盘，沿用的应该也是第三层意思。在上海，面对市图书馆，在美国领事馆附近一片旧式公寓别墅当中，突然也冒出一个“豪苑”，文化上颇不协调。为什么内地的人不喜欢“豪”，是不喜欢夸富吗？上海人喜欢夸洋，北京夸大，台湾人喜欢夸美，就是不用这个“豪”，为什么不用？应该不是想到这个豪猪，而是嫌这个字太露太俗。另外，革命年代，此字也受连累，“打倒土豪分田地”之类。现在上海也有了黄金豪苑，大概人们都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打土豪分田地。

有一次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文学研讨会，我在发言中简单讲了一下有关房产符号和集体想象及城市性格的一点想法，在座杨照、郑愁予、刘再复、郑培凯诸位均很感兴趣。张大春引用了老子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忍不住想开玩笑：香港“人法地”，首先追求地产楼房（幸与不幸，现在中国其他城市亦然）。“地法天”，难怪楼盘文化里这么多帝王符号。“天法道”，“道”就是中环价值观——“搵钱”，所以要“豪”。“道法自然”，“自然”就是大自然山水，深湾半山无敌海景等等……香港地产文化以皇室想象、富豪梦和山水为核心概念，竟与老子不无相通，纯属偶然？

香港的楼盘文化，和香港的饮食、娱乐工业一样，现在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很大。香港有很多“中心”，好像刻意要名不符实，大都建在边远的地方，沙田、屯门、大埔都有“中心”。湾仔有一个叫“中环中心”，也不在

中环的旁边。“广场”则大都很高很小，再次证明名与实关系的任意性。香港有个房子叫“富贵居”，上海人也夸富，有一个地方叫做“小富人家”。香港很多几百尺（几十平方米）的房子就称为帝峰皇居，上海前些年最贵的几乎引起全国民愤的大楼叫“汤诚一品”——可见上海人“小市民眼界”，不敢做皇帝，最高想象也就是个“一品”官员。难怪余秋雨的散文说上海人天生白领打工，很少老板。楼盘符号有时也是缺什么想什么。上海也有山水楼盘，就是不宽的黄浦江、窄窄苏州河，广告宣传还净拿来与塞纳河、莱茵河做比较。上海的突出特点就是“崇洋”：“东方巴黎”、“东方伦敦”、“东方剑桥”、“伦敦广场”、“罗马广场”、“白金汉宫”、“新加坡美术馆”、“东方曼哈顿”等等。这些都是市中心很贵的楼盘。仅从符号看，香港比较中国化，上海才是殖民地。香港也有一个楼盘用西方的名字，叫“雅典居”，最初的意思可能也是觉得雅、典这两个字好听。

有一个现象十分有意思：上海人从 30 年代起，称一些当时较现代化钢窗蜡地大小卫生（即不仅有抽水马桶还有大浴缸）的新式里弄住房或大楼为新村、别墅、公寓，如重华新村（虞洽卿 1940 年建）、静安别墅（张静江 1912 年建）、常德公寓（张爱玲故居）等。1949 年后，上海有很多东西都南来香港，包括印刷工业中心、纺织造船海运工业的资金、洋场海派娱乐文化等等，但房产符号，尤其是基本名词，却没有在香港出现。香港中高档住宅，不会叫新村、别墅、公寓、公馆等。为什么香港没有公寓之类的住宅，因为香港公寓别墅这些名字常常被色情场所使用了，九龙塘、油麻地一大堆“公馆”、“别墅”在破旧的楼房里。因此，在香港来说，特别是女孩子，千万不要说家住在别墅，人家会产生误解。什么新村、什么楼等词，又被公共廉租屋使用了，所以香港后来私人“豪宅”都用“轩”、“苑”、“庭”、“居”等等有更深的“文化底蕴”的字来形容。“轩”在古文的意思是很高的有顶的车，或者有很好的风景的长廊，地方小，看得远，香港楼盘名称中名实最相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得最好的，就是这个“轩”字了。

上海新盘多用“苑”，其实也是转化富贵梦：“苑”的原意是皇帝打猎游玩的地方。法国旧皇家城堡，外边有很大的打猎的地方，就是“苑”。当然，上海的“苑”很小很高。上海的楼名还特别强调地段，如有个楼叫“太原邸”，山西矿主炒房团说，我们的太原怎么跑到上海来了。其实因为太原路靠近衡山路康平路徐汇高档住宅区，“自然而然的上层建筑”（借用深圳一块空地围栏上的广告），故不再需要借助帝、豪、龙、凤来宣传了。香港的地段概念也很强，很多真正的豪宅名字很低调，如“溱乔”，名称源自诗经，位置环抱私人半岛，迎海大屋。又如“白建时道 79 号”、“香岛道 33 号”、“农圃道 18 号”、“尚堤”、“岫云”、“晓庐”……

北京楼盘也有很多的自然山水：云水观邸、花涧溪、渡外云居、顶秀青溪、缘溪堂、东岸、银海兴涛……显然是风沙大，缺水，所以特别向往有水的名字。北京楼盘名称调用文化资源比较曲折，比如要宣传房子大，却称为月亮湾小镇、嘉禾小镇、青蓝小镇。其实也是要显得豪，但欲显故藏，不直接用“豪”字，只用“小镇”、“小城”。一个楼盘成为一座城了、一个镇了，表面上看上去是抑，其实是扬。北京的楼盘还有一个特点，北京楼盘名陌生化程度比较高。文学里最讲究陌生化，作家创作写别人没有写过的，自是高手，可楼盘不一样。要猜测迎合目标客户或称中产阶级大众的公共趣味、时尚梦想和传统愿望。因为楼盘需要卖，太陌生比较冒险。北京的楼盘，一个叫“北京北”，另一个叫做“立方庭”，还有“苹果派”，另外一个就是“无双”。还有“质城”，还有一个“沸城”，不是美国的费城，是沸腾的沸。沸腾的城市，住在那里不知还能不能睡得着觉。还有一个叫做“格调”，如果看完电影跟女朋友说上“格调”吗？不知有什么感觉。较讲究独特格调的符号可以出现在地产市场上，反过来也说明北京的发展商认为，确有这么一批读过书追求另类的白领大学生年轻人是潜在的买家。同时也说明这个城市的文化取向相对比较多元。依据香港经验，有一个楼盘我比较为它担心，叫做“一瓶”。名字很秀气，但这个楼盘放在广东恐不好卖，因为谐音就是“一贫如洗”。

香港的总督府原来准备改名“紫庐”。紫荆花的紫，草庐则有反富豪之意，谦逊犹如自称寒舍。雅则雅之，但陶杰撰文说当时特首和国家领导人都讲上海话，“紫庐”在沪语中的谐音是“猪猡”。此名因此被废，现称礼宾府。所以符号还要考虑发音。但谐音也可以被巧妙利用。上海卢湾区香山路有个楼盘名字叫“香山丽舍”，使人想起香榭丽舍，而广告就说该地段有徐志摩、丰子恺住过。

深圳的房产符号充分反映了这个新兴城市受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支配、影响的文化背景。不过在北京的政治影响和香港的庶民风俗以外，深圳也有自己的若干特点。新崛起的富人“崇洋”最彻底，“观澜高尔夫大宅阿德雷敦别墅”，这样的名字也不嫌长。另外，很热销的。

有一个楼盘叫做“波托菲诺”。听上去像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实际上，是在一个小湖（水塘）旁的一个楼盘。小湖对面就是民工聚居的一个城中村。“波特菲诺”的人们看不见。住进去，人们也假装相信，这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的钟声里得到实际上是因房价高涨而来的快感（佯信，假装相信，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审美的精髓）。其实，买楼盘不仅买一个楼，还买一个生活的方式，在背后是做白日梦，是一种无意识。如果把把这个楼盘改称沙河塘，会卖什么样的价钱？

还有一个楼盘叫做“瑞河耶娜”，也是生造的假音译。深圳新兴城市无传统地段概念，国人又有对现代汉语翻译腔的习惯性崇拜。据说没建楼先想好这个名字，一宣传就有很多白领来做VIP预订。大家都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自哪里。是完全不同文化的符号带来一种想象力。后来该楼果然涨价。

深圳虽无传统地段概念（不像香港半山、跑马地或上海徐汇、静安区等，同样房子也比别处更贵），但近十几年国人因楼房交易市场炒作已构成新的财富分配和阶级分化。因此深圳也在短时间内因广告操作人为造成某些地段的符号昂贵。比如香蜜湖一带多“豪宅”，以至于现在什么楼盘都要在名称上带一“香”字，香域中央、香岛道一号、香山香城香……

此“香”与香港全无关系。地产营销术语叫“核心概念炒作”。

深圳受北京影响,大约国企项目较多,因此到处出现这样的符号:“四海为家”、“阳光名居”、“阳光花园”、“东方明珠城”、“新时代广场”、“世纪广场”……这种名字,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用。完全没有城市特点。表面是体现时代的精神,实际上,这个时代的某种特点也就是高速城市化:“水泥地上种草——没有根”。

简而言之,香港是“豪”,上海是“洋”,北京是“大”,深圳是“杂”。除楼盘外,广告各个地方也不一样。香港的楼盘广告,不管名字可以起得如何传统帝王金银富贵,广告却都是西洋靓女。找一个世界小姐,露着美腿,举着酒杯。买楼的人也都知道,住进去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女人的。或者还有花园草地英国绅士骑着白马跟着一群名犬等等,宣传的是上水粉岭某新盘。还是“佯信”。

北京有的地产广告很儒雅,路边见过一宣传牌,叫做“西山一景,百年世家”,给人很大想象空间。但有时看到什么古风庭院说全球仅12席,使人怀疑何必在四环高架上竖这么大的广告牌。上海机场外有一个广告像论文题目,“后现代风格极简约主义”,在香港一定滞销。另外一个广告,画面上只有年轻女人浓妆媚笑,广告词是“老公谢谢你”。这个是典型男性主义文化的观点:为什么买楼一定是男的?什么时候女的说老公谢谢你?背景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人们不难想象一下。深圳则有地产广告:“男人可不可以失败?——先生也不知道”,定期换,连续创意。

如果将香港、上海、北京及深圳各种楼盘名字连成一个符号网,我发现一个缺失,就是没有直接的政治术语,也没有道德词汇。中国报纸电视每天定时出现最多的政治概念,例如领袖人名、“主旋律”、“和谐”、“三个代表”,还有“发展”,包括以前的“斗争”、“革命”、“团结”、“精神文明”等等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名词,全部都不进入楼盘。

当然,可能的解释是,人们觉得一个楼至少几十年,政治的东西变得

太快,没有一个城市会用政治术语命名楼盘,或者,经过几十年革命,政治术语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真实的生活理想和家庭愿景?但是台北的情况就不一样,“忠诚庭院”、“明德圆”、“仁爱花园”、“中华男儿”、“中正锦秀”……在一个岛上,用这么多的国字。也许是当初国民党政体合法性延续的需要。有些楼名,也和台北等地政治化的地名街名有关。而且,强调“国”字之外,还突出“忠义”、“仁爱”、“德”等道德名词。相比之下,饱经政治风雨的中国内地,人们在建设购买他们的新家园时,政治性的文化符号几乎完全消失,耐人寻味。

“80后”与“90后”的英雄

文道有次感慨,说越来越有个很怪的感觉:“去过不少大学,接触到很多精英的大学生,有时候私下聊天,他们常批评我一个东西,他不是批评我,他是批评我们一整代人。批评我们什么呢?批评我们太多不切实际的理想跟幻想。……这种话以前从来是年轻人骂老人的,就年轻人会骂老人没有理想了,失去了你的理想了,没有热情了,太现实了。现在反过来是年轻人批评上一代人……”^①

我其实也有完全同样的感受。记得以前读研究生时,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一方面会批评我,说许子东有些事情不够成熟。但他有时又会讲年轻人,少年不狂何时狂,意思是说年轻人总有点狂。可是现在我上课时,无论在香港还是北大,下面的学生会觉得我太理想了。他们很早就知道关系的重要性,怎么找工作,怎么选择老师(老板),怎么与时俱进在社会中调整自己的姿态乃至心态。你讲一堆书生理论,他们年轻又成熟的眼睛清醒地看着你:唉,你们这一代啊……

老年人怀疑很多坏东西,青年人相信很多好东西,这是过去的理解了。

但这是不是另一种误解呢?

^① 参见 2009 年 11 月 12 日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

2009年初冬湖北荆州长江大学三个见义勇为牺牲的大学生的故事,使人们一下子又对“80后”、“90后”这些标签重新思考。

两个小孩子落水,学生手拉手组成人链去救,孩子救上来了,却有三名大学生死了。之后附近船家要钱才肯打捞英雄尸体,旁边公安站在岸上还帮着“职业捞尸队”协调……一张捞尸讲价的照片轰动全国,后来还有宣传部人士质疑照片造假,引来记者拿出更多证据。这故事的后半段,太不符合我对生活在长江边上的人民的一贯印象了,还真希望是假的。但故事的前半段,三个年轻人救人身亡,很不幸,却肯定是真的。人们于是在想,他们也是“80后”、“90后”,这“80后”、“90后”到底是不是伪概念?任何人都年轻过。这“80后”或“90后”集体性的时代特征是什么?

八九年出生的人最反感,不巧归在“80后”,听上去“老”很多。文化消费市场(尤其是亚洲的市场)的价值观是越新越好,从上世纪初的“新青年”到上世纪末的“新新人类”(乃至新世纪的各种靓模),青春总是令人骄傲的价值(价格)标签。但论及社会责任、时代使命、集体形象,“90后”甚至“80后”就会被人以幼稚为理由而宽容,以关心的姿态而轻视。

这“十年一代”的说法其实颇可疑。真有所谓共同的背景?市场经济?社会富裕?城市化?后革命时代?有几个从内蒙古监狱越狱的,也是“80后”或“90后”,被人嘲笑缺乏革命历史小说的教育:你不知道逃出去以后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吗?这当然是笑话。哪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捞尸船头老汉算起来应该和雷锋差不多年纪吧?

英雄起源本是人性之善,见他人受苦,你会流眼泪,生出恻隐之心。“80后”、“90后”当然也不例外。跳江救人一瞬间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命危险,这既是人性本能,也是被教育出来的本能。另一些人的本能,就站在岸上。这些成熟的人,以前都接受过欧阳海、王杰式的思想训练。如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的木头。现在不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这三个大

学生英雄。普通人其实不一定要等到这样的关键时刻才来显示你人性的光辉。等也不一定能等到。但“见义勇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天天分分钟都会碰到。“50后”、“60后”要碰到，“80后”、“90后”也逃不开。常常会有义跟利的选择。开会，说话，选择，待人处事，都会碰到一些情况：你是应该做的，但是它对你没好处，甚至有危险。街上见人打架，劝架作评判者多，有人拿出刀来，大家就闪开了。比在街上主持正义更难的，是和自己有关的场合。某件事情大家私下都不满，真的上级什么人来了，开会了全都鸦雀无声，一个“见义勇为”的也没有了。为什么？我在“狠斗私字一闪念”，自我分析过：一、说了领导也不会听，不管用。二、领导对你印象可能变坏，好处不知道，坏处很直接。三、别人都不傻，人家为什么不说不说？就这三条，如果人人都这么想，很多众所周知的荒唐事就这么发生了。所以，哪个时代，英雄都不易，见义勇为都不易。范跑跑的行为如果不出来炫耀，也是普通人性。另有些老师俯身下来，用背去挡着压下来的房瓦，护着那些学生，也是瞬间反应。叫英雄太沉重，宣传没有用。现在网络媒体把很多事情放大，比如说“当街强奸，群众围观”类的新闻，上海警方为抓私车“钓鱼”执法，还有江苏一老太，大概“30后”吧，自己摔倒，却说做好事送她入院的年轻人撞了她。旁人也信这个“常识”：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呢？……看到这类事情多了，难怪“80后”、“90后”成熟、世故。

“80后”、“90后”这类令人或骄傲或宽容或贬低的概念，其实是20世纪中国革命积压下来的文化惯性。相信新比旧好，年轻优胜于年老，是“少年中国”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炮火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中国人的时间观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观念，转向相信未来必然更好的进化论。从前最好的模式是古圣贤，先人前人，我们在时间轴上是向后看的。现在讲先进、前卫，我们的目光是向前看的。新必然会比旧更好，明天必然比今天好，所以上个世纪，仅以文学论，30年代左翼批判“五四”，40年代延安否认30年代文艺，50年代是

新社会,60—70年代“文革”反对一切“封资修”,80年代批判“文革”,现在又反思80年代……每十年,中国人,及其文化躯体,都要打倒自己清算自己否定自己至少一次。所以“80后”、“90后”有天然优越感,当然也有危机感。现在掌握“话语权”(曾经打倒上一代)的人对80后、90后也不放心,以忧虑姿态、关心语气、理解心情和宽容手段来表示他们的不放心。

久而久之,“80后”、“90后”也接受了这些忧虑、关心、理解、宽容,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特点”、“特权”。无形之中被“儿童化”了。

我在2010年6月参加复旦、哈佛等校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会上特别邀请张悦然等一批“80后”作家,以示文学后继有人。虽然其实韩寒等早已风头盖过主流。

我突然想到,“80后”、“90后”,也就是二三十年岁吧。茅盾主编《小说月报》、胡适倡导白话文、施蛰存办《现代》、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不也都是二三十岁吗?

有人将今日中国“新媒体与旧文化”众生喧哗现代性的现象,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报业文化崛起相比较。的确,回到百年前,再过几年,1917年就有了《新青年》,接着是划时代的“五四”。而在那时,只有鲁迅是“80后”,毛泽东、胡适、周恩来,哪个不是“90后”?

大概二三十岁不做大事,不领导潮流,以后一生也不会做什么事了。

百年之后的现在的“90后”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革命前的“90后”,一个是“后革命”的“90后”。

2010年9月9日

人才与“奴才”

北京的凤凰会馆就在人大北门附近(以后要搬去朝阳公园的后现代建筑)。某日,又和文涛、张鸣谈大学腐败。张鸣是人大教授,辞了官拍板砖,快人快语。说起学风问题,教育部长 2009 年 3 月刚说对学术不端实行零容忍,很快,文涛母校武汉大学一个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出事了。倒不是论文的问题,是学校建公寓,收了承包商的钱,受贿。想想道理一样嘛,既然学报发表论文可以收钱,学校铺马路为什么不能收钱?

张鸣说,作为大学校长,宁可 he 建筑收钱,也不要抄袭。后者更恶劣,败坏职业道德。(言之下意,难道受贿不违反属于党性或官员职业道德吗?)殊不知,建房受贿,如果来地震,那校舍可能就先塌。事后遮盖还不让说,“国家机密”?

武汉大学当年校长刘道玉是教育家。更早是成仿吾,留日学兵器的创造社作家,大概是唯一随红军长征全程的五四文人。想起武大很有传统,校园樱花也美。

令人感慨的是,现在骂大学很流行,很容易。文涛说网上风传耶鲁校长也撰文批评中国大学(事实待考),说中国的大学以为出类拔萃就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跟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

必须在退休前利用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中国知名大学要打造世界百强排行榜,是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

大学的事,我是庐山中人,有感受,但也不一定看得清。为什么这种普遍虚假、腐败能够长期存在?个人以为关键之一,是选拔机制有问题。比方一个教研室有十个老师,现在有一个升职的位子,四五个人可能往上升。其实大家心里不是不明白,五个人里边谁比较好,或者最多在两三个人之间有一点争议,但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各人的学术分量。但这时,因为某种原因,升了一个众人都认为比较差的,甚至不在前五名之列。不要以为上级只是在使用你个别权利,干涉或误判了个别人事,它的后果可以是误了全局。

虽然只有一人升迁,旁人仍可做自己的事(唱高调的领导还可以对大家说,你们做学问不是为了职称吧)。但带给老师以及学生的信息是,学术并不重要,学术标准可以随时让位于政治或人事或经济标准。大学遵从官场的游戏规则。

学生觉得做积极分子入党比读书重要,给教授的奖赏则是官位,所以张鸣激奋感叹“整个的学校实际就是一个衙门……就是新四化: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校园衙门化、学者奴才化”。

在举国上下官本位的现实中,期待学界有别于官场,本来就有些天真。问题是,“衙门化”,官场,也应该遵循一套对自己有长远利益且有效率可操作的游戏规则。同样道理,我们现在缺一个局长了,有五个副局长,应该找最能干事的人做局长。如果这时上面因为个人关系,找一个最听话的但不大能干事的做了局长(或者就是部长的媳妇、侄子),这其实也坏了“衙门”的规矩了,从管仲、张居正到李鸿章都会反对。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人的事。其实它给余下来的四个副局长,以及下面所有的科长,下面的民众,也都提供了一个政治信号:你苦苦干是没有用的,你干得再好是没有用的。你只有像他那样干,送酒送楼送钱(许宗衡分寸没掌握好,太大捆了),甚至送人等等,你这样才能上。小小信息,内部家人流

传，流递速度效果超过社论文件报告，用心的人自然领会且发挥。

学界规矩与官场规则从来有矛盾但也相互制约影响，早稻田、哈佛等这么多人从政，中国的科举制度，都是贯通两种游戏规则种种例证。如果这种影响和制约只是单向的（一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情况就麻烦了。大清国后期的情况大家记得。

有意思的是，民国的官场也腐败，但大学不一样。也许是选择性记忆美化历史，研究五四的张鸣教授说那时大学自治，教授根本就不看校长。“我女儿最近在查他们清华教授委员会的记录，大事他们全议，所有大事都由他们来决定，包括处罚教授。教授如果不轨了处罚，比如提升，副教授提升教授，全都是他们教授委员会定的”。

是啊，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师大，他反对校长，反对章士钊教育总长。鲁迅是大学讲师，他哪有把章士钊放在眼里。鲁迅在教育部还拿高的薪水。

换言之，在民国的时候，政治是一条线，教育、学术是另外一条线。这一方面是五四以后的西化影响，学术独立，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老传统，我们从来有政统跟教统之分。皇帝再大，如康熙也有宣讲团，叫人宣讲他的治国理念，可是教育系统，包括皇帝自己读的书还是孔子，不读康熙的书。直到1950年代两条线才空前合并，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有最伟大的思想、学问甚至文学，于是后一条线完全依附到前一条线。于是“衙门”的事就是学校的事了。

我去过几家几百年前最早的大学，老索邦、苏黎世大学、剑桥三一学院，建筑、气氛令人肃然起敬。为什么欧洲传统从来就给大学教授很高待遇（在香港至今如此），就是为了让大学能够抵抗来自教会和政权的压力。

近功利一些讲，科技创意人才不够，知识产权全在人家手上，文化软实力打不出去，想象力缺乏，后面还是一个独立精神的问题。简单一句话，学校跟社会贴得太紧，没有办法拉出来保持自己的原则。

“关键是学者在衙门里头都变成奴才了，你都是衙役，你听说奴才去搞创新的吗？”

张鸣的牢骚使我想起马家辉有次说起李登辉跟蒋经国用人的区别，他说蒋经国把人才当奴才用，李登辉是把奴才当人才用，这两句话非常精彩。仔细想想，“奴才”一词本是中性词（清代官员对上都自称“奴才”，并非侮辱自己或刻意自贬，而是表达忠诚和全心全意服务的决心）。如果说50年代也有点所谓“把人才当奴才”用的意思，就是说非常尊重专家名人，但要改造你的世界观，希望你由衷地听话、信服。那时毛泽东愿意与梁漱溟、章士钊为友，北大校长是马寅初，教育部副部长是叶圣陶，文化部长有沈雁冰，复旦有陈望道，郭沫若还特意要请实际有“不同政见”的陈寅恪上京……

现在不同了，学界有名的校长越来越少，文化部、教育部越来越多非文科系统的技术官僚。作协在巴金之后，也不再一定要找最有名、最有威望的作家做主席（哪怕是挂名主席）了。新思路是，最重要的不是你能干什么事情，而是你听话，配合，不添乱，有维稳经验。而不一定非要这个领域学科中的最有名的权威大家。以前是要“专”者“红”，改造几十年，几乎成功（看曹禺如何改旧作，老舍50年代的日记，沈从文也想入党，又如冯友兰、刘大杰的晚期著作），但最后依然不可靠。这个方法太累，改造方被改造方大家都累。不如让“红”者自然“专”。放到位子上，其他成就自然就来。（管文化的官员，自然就是摄影家，画有人买，作品有人赞扬。成就不都是别人评的吗？没有艺术才能，能管艺术领域吗？）实践证明，上了高位的人感觉自然良好，以前那些管理的人对专家还有点尊重，现在也不必了，我就是专家。……

而且，先红后专用人，行之有效。我听说某协会（名义上是民间社团）新任负责人是个圈外人，是为了解决他的级别问题而从不相关的其他部门调过来的。原以为该协会里这么多名家专家会不满。专家名家意见我没听到，没想到该协会的工作人员和部分会员却对新的圈外负责

人反应不错。询问原因,说:一是专家做官,同行相轻,总有不服,必然内耗。二是新官能带来资源,帮协会工作人员及专家在市区解决住房问题,因而获得好评。可见所谓人才与“奴才”的,也可从不同角度去解读。

节目结束前,我由衷地把话说回来:“行政压制学术的现象,香港、海外也有,官本位政治体制也并非唯一原因。而且,虽然有这么多负面现象,可学术这个东西还是不会中断的。因为归根结底,学生也好,教授也好,他们除了跟学校里外的官员打交道,除了和工资奖金外快打交道以外,他们最重要的还是在跟书打交道,在书里,他们和各个时代的‘人才’生活在一起。”

可张鸣说:子东你太乐观了。

补记:修改本文时,见当天(2010年9月10日)《南方都市报》A28版报道: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江潭瑜昨日接受采访时说,该校人事制度改革已经启动,处级以下的“官员”不存在了——以前的行政级别变成岗位级别……

新学期开始,深圳大学正式推行全员聘任制,并计划在本月底召开教职工的聘任大会。江潭瑜说,今后深大所有教职员工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国家干部身份。即全员聘任、以需设岗,并实行校本工资、能进能退。学校老教师要接受考核,达不到要求的降级使用。新聘任的员工在一定期限内得不到晋升的,则必须“走人”。

深大人事制度改革启动后,学校原来具有行政级别的处级以上干部,他们的行政级别将变为岗位级别。也就是说,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已经在深大初步推动。

人为什么下跪？

窦文涛：我给你们看一张照片，最近大家又口诛笔伐了，反正是引起争议。三千学生下跪。给老师跪。李阳疯狂英语知道吧？到处做演讲，教人英语。张元拍过一个纪录片。他最近去内蒙一个学校，几千学生请他去。他这种演讲，先讲想想我们的父母，我们心里有愧吗？据报道有些学生留下了热泪。然后他说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要向老师感谢教育之恩。李阳让大家向老师跪下。后来引起争议。因为李阳把这个照片放在他博客上了。

许子东：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照片引以为骄傲？

窦文涛：反正是引起争议之后，他博客上又出来了一个声明，就说不是向李阳老师下跪，是李阳老师让学生们向他们的老师，开始说是鞠躬，但是因为当时大家好像都是席地坐在操场上，几千人要站起来鞠躬不方便，所以就临时改为跪拜礼。

许子东：可是跪得很整齐。不大像自然的，全部一样的动作，一定有一些口令在指挥的，对不对？

窦文涛：大家聊天都在聊什么，就是说要不要通过跪这种方式向老师感恩？

李文：我在国外听到跪是很隆重的，对神会下跪。

许子东：对神要跪，求婚的时候要跪。

窦文涛：我受到的教育是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当然后来又加了，可以跪老婆。跪算盘。跪搓板。

许子东：几千个一起那就难了，在这个项目上或许可申请吉尼斯纪录？我想起《黄土地》里那个镜头。80年代陈凯歌拍的电影，中国人求雨，一大片的民众就跪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土地的画面，然后就是这个大片民众跪下的画面。这个画面又真实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只是为了学外文，说重一点是我们的耻辱，整个民族的耻辱。这不是“中国特色”礼节，这是群众运动。中国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跪呢？我们知道曾经有人跪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还有台湾红衫军施明德，居然也跪。我在想，两岸真是一样。这有什么好跪的？你在那抗议，跪什么跪？

窦文涛：我想起来李敖曾经骂过一个台湾的年轻人，向陈水扁抗议，为什么要跪下陈情？跪下去干吗？我爸爸跟我说过，他小时候，是要跪先生的，比如说到私塾，到学堂，父母领着，父母都跪。但是这种东西到今天……

许子东：到今天，生活当中的人什么时候跪？父母去世了，追悼会上最后遗体要走了，不管你是教授、艺术家、做官的，跪下送别自己的老人，我理解，我同意。除此以外不接受，尤其这种群众场面，耻辱！我一点不怪这个煽动的人，我怪的是这些跪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就跪下？

窦文涛：学生啊，孩子。很容易。

许子东：怎么能被教成这个样子呢？

窦文涛：许老师，刚才他说父母什么的时候，我看你都声音哽咽啊？为什么？

许子东：不，我觉得群众运动非常可怕，我自己也参加过群众运动。你听他怎么讲，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如果不好好奋斗，是不是对不起父母？学生说，是。然后问，你们这样是不是人渣？他们就说，是。你听听看，你不好好奋斗对不起父母，是很对。第二句说，这样你们是不是人

渣？什么叫人渣？这是非常重的词啊。

这就是群众运动可怕的地方。当周围的声音强了以后，人容易产生幻觉，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声音。我听过陈水扁演讲，音乐伴奏，吕秀莲演讲，也是这样，前面一句是有道理的，说我们台湾人现在高科技发展很振奋人心，大家说是。然后下一句就是我们就要征服世界，大家也说是。弄出来像群众运动一样。我所关心的是群众的反应，而不是李阳，我完全没有怪李阳的意思。群众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向中了魔一样，就承认自己是人渣。这么多群众会呼应着，你想想这是什么道理？

我也参加过这类游行，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间隔了20年，口号目的不同，却有相通之处。开始进入游行队伍的时候，我根本不明白或不同意他们喊的口号，而且后一次我觉得他们这样做达不到什么效果，就是因为朋友去了，我也就去了。可是几个小时以后，周围有很多眼光期待你，周围都喊口号，几个小时你就觉得你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我所关心的是这个过程。个人怎么被群众运动吞没且快乐激动。

窦文涛：我给你提供一个注解。张元让王朔给写的序，王朔说：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通过李阳的方法精通了英语，看那架式，来的男女老少更像是开誓师大会。李阳的兴趣也更多的在唤起民众，或者毋宁说煽动乌合之众。我见过这煽动，那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把一大群人集中，用嘴让他们激动起来，就能在现场产生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可怜的人也会顿时觉得自己不可战胜。中国的很多事都是这么办的，做一场梦，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而且王朔说：我同样不知道李阳是处于无知还是刻意追求戏剧效果，还是他就是那么认识的。他那些频频使用的、上来就能得个满堂喝彩的热场词，可说是赤裸裸的种族至上叫嚣，这不幽默。我不相信我们国家强大，是为了你那个不靠谱的种族主义目的。

许子东：我看过一段录像，我不讲它名字。一个男人，在一个大礼堂，上千个女人等他去碰她们的乳房。他每一次碰了以后，就用方言喊

“下去”。这些女人都是乳腺癌。据说被他碰到多次以后有的人真的好了,所以就有这么多女人在那个礼堂里排队。我亲眼看到的录像。然后她们走的时候就买茶叶,叫信息茶,很贵,说是这个男人把他的信息放在这个茶叶里了。还有一种信息磁带,回家她们就放那些磁带,相信的人最后还得到很好的结果,因为她们锻炼身体。其中有我的亲戚,一点都没法说服她们。中国的宗教常常要实用,最好直接对肉体有好处。我忘不了这个场面,几千个女的排队等着他说“下去”……

窦文涛:这个毕竟跟李阳这个不能等量齐观。

许子东:李阳水平更高,还没直接 touch(触摸)

窦文涛:群众性场合是有气场的。他们说德国女的听希特勒演讲就高潮。所以人类是有这么一种境界的,很多人也追求这样,只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再这样。

许子东:我对李阳其实没有成见,我只是觉得中国的群众的情绪和有些行为很容易被运动带过去。现在为什么炒楼、炒股票那么厉害?就是因为银行的利息不高,没办法投资,所以热钱滚进楼市股市。信仰也一样,宗教或者原来教的共产主义理念,很多人现在觉得进不去,所以很容易转移。学英语是官方认可的,学英语是全球化,是个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个下跪、剃头,群众运动,说明中国一直有所谓“运动文化”的土壤。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2010年12月27日修改(参考2007年9月19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北京奥运之后

“锵锵三人行”的特别节目“锵锵奥运行”做了差不多一个月，到2008年8月27日奥运已经闭幕，话题是盘点，计算一下奖金、奖牌、代价与收获。

文涛说很多人因为奥运生活停摆了，有奥运综合征。连续16天夜夜半夜直播，昨天突然没了，夜不成眠。奥运主题歌本不觉得多好听，但是昨夜发现不可遏制地响起。

我也有同感，想是陈其钢音乐做得好，第一遍听没感觉，但后来老发奖，老重复，“油和米”，竟喜欢了。

据说中国大陆股市奥运之间跌六成。所以张艺谋说中国人是浪漫的，中国人可以浪漫到一种不顾个人安危的程度。香港股票在奥运开幕那天所有的都跌，8，8，发，发，只有李宁涨。传闻李宁要成立一个退役运动员的基金，如果属实乃大好事。运动员辛苦很多年，假如什么牌都拿不到，学习也耽误掉了，青春也消失了，工作机会也不如人，这些人怎么办？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基金，一个运动员保险机制。

但人们现在只注目金牌晃眼，香港报纸算账，中国51块金牌，这次国家给35万。雅典奥运会一块金牌是20万（死难矿工也赔20万）。回想洛杉矶奥运时奖金6000，朱建华奖台彩电，没赢还让人退彩电——这二十几年社会变化有多大（但愿刘翔不要步上海同乡朱建华的后尘）。

现在加上赞助商,还有各省奖金也不会低于100万。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一块金牌大概有200万。像郭晶晶、林丹这样的明星,还有巨额广告价值。当然,到目前为止,刘翔还是排第一,说是数年间因广告进账四亿六千一百万人民币,排在后面的郭美人二亿三千三百万人民币。应该不比霍英东孙子差吧。只是不知受伤后广告商如何处理刘翔。

(民众对金牌收入的反应也值得研究。后来冬奥会周洋夺金且含泪欲为父母扶贫,引起大众广泛同情。不料几个月后省领导接见问她有何困难,她说她爸爸的工作还没解决。结果网民又替她算账,说各类奖金住房等已有400多万,是否太贪心?其实都是举国体制的后遗症。有趣的是省委领导也和年轻单纯的周洋一样分不清运动员获得奖金与政府安排运动员家属工作之间的制度区别,而是环顾左右:今天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在,大家协调协调,解决一下……)①

再讲回金牌。看统计表,有意思,中国的金牌是倒金字塔:金牌多于银牌,银牌多于铜牌。大约战略是总奖牌超不过美国,先超金牌。仔细核算,中国从上届的32块金牌到这届51块,多了19块。那谁少了呢?你赢了总有人输吧,本来以为美国输了,结果美国没有。原来美国多年来没什么区别,金牌最近三届,39、35、36。它的总奖牌是97、103、110。所以美国没有变化。更有意思的现象是,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任意抽三个国家都超过美国。换言之,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是什么体育强国,不是的。欧洲国家,只要有同样的人口基数,更加强大。如这届德国15、英国19,加起来就差不多等于美国了。

那么这届中国的奖牌哪里来的呢?谁失掉了呢?第一个是俄罗斯,俄罗斯金牌上次27,这次23,少掉4块。但是总牌数少了很多,从92变成72,真的可以说是俄罗斯军团的一个倒退。第二个少掉的国家,没有想到,是古巴。古巴的金牌,最近三届奥运,从11块、9块,到这届两块。

① 括弧中的文字系2010年改稿时补记。下同。

卡斯特罗伤风,运动员也感冒。这又回到国家体制的问题了。中国赢的很多金牌如举重、拳击,全是古巴的传统强项。两个国家还都是老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社会主义阵营帮了我们。也可以说其实没有抢到多少西方的牌,抢的是自己兄弟阵营的牌。

还有就是抢亚洲阵营。日本一下子少掉了7块,亚洲的强项本来是体操,很多时候中日并进,这次都是中国拿。所以这次中国的胜利建立在俄国、古巴和日本的相对失败之上。

在一个国家里,体育应是金字塔:国内参与民众越多,在世界上成绩也越好。巴西、欧洲的足球,美国的篮球,中国的乒乓球均如此。但如果“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从“增强人民体质”到“增强国家形象”,便会出现不是从下而上(从业余到专业)而是从上而下(为金牌而选拔)的体育政策。便会出现像冰壶这样全中国只有几百人“玩”却也能和数百万冰壶人口的加拿大比赛的现象。这种从金牌出发为国家发展重点项目的模式,其实是向前苏联及兄弟阵营学来的。但这个兄弟阵营的体育事业现在退步,中国在方法和成果上都有些继承“遗产”。可能与社会制度有关,中国学这个模式比学西方俱乐部制度(如足球)要有成效,至少到目前为止。

想当年,东德可是奥运历史上金牌大户,有两届奥运会苏联第一,东德第二,美国第三,就是说东德有两届金牌超过美国。

当然,中国的情况和东德不同。东德人口少,比同一民族的西德国力较弱,故集中全国资源,在极少数天才精英苗子身上试验,快速崛起。后来揭露有上万名运动员吃禁药,甚至有政府行为,“爱国主义”超越体育道德。东、西德合并后说有100多个运动员终身残废,然后女运动员变成男的,长胡子,生不出孩子。运动员还起诉当年东德的体育部长兼医学专家。

现在体育又已成为德国群众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奥运会上总体来说德国一直还是很强大。除了东德这一段,基本上在世界上也在第四、第

五,很稳定。这几年快速进步多和东道国有关,澳大利亚以前都是十几名的,就因为悉尼办奥运升到第四,这几年也在第五第六。英国前些年跌到三十几位了,金牌上届是9块,今年是19块,翻倍,四年以后它会更厉害。这说明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东道国这个因素会起作用,全民都会重视。

从历史上看,体育可以有三种意义。英国人强调的是康乐、游戏。现代很多球类游戏规则都起源于英国,核心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永远在争夺,体育要象征性地“公平竞争”,重在游戏与规则之关系。技术诚可贵,乐趣更重要,若为规则故,输赢皆可抛。但原来希腊体育最早其实是打仗训练,恢复现代奥运会也是强调健身。而德国人创建现代体操当年其实是因为拿破仑侵略,德国要把体育用于强国强身强人心。所以现在的体育同时兼有这三层意义:你可以拿来康乐,你可以用来强国,你也可以为了健身。

看中国的情况,从金字塔上看,健身的人是最多的,可以说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哪怕广播操甩手都在健身,因为这是金字塔的最下面。然后有一部分人就康乐了,就打球了,且在当中寻找快乐,那就是金字塔上来一层。再一少部分发展为尖子,为国家争取荣誉,他们的体育就连着强国梦。这也是一般国家的体育运动的金字塔。

可是你现在问一个中国运动员或老百姓,体育在健身、康乐、富强国家这三者之间哪一个最重要?可能大家都说富强国家最重要。这是国人的奥运梦想,也确实是百年来扬眉吐气的一刻。强国的意义既然最大,康乐和健身的功能就相对变小,这就是所谓倒金字塔。中国为什么参加的人越多的项目越拿不到金牌?我们人人游泳,我们人人都学跑步,自行车数量最多,为什么没拿金牌?

文涛:有件事挺郁闷的,整个鸟巢只奏响过两次国歌,一个是开幕式,一个是闭幕式。再一想,鸟巢全是田径。

文道:原来英文 sport,或者别的语言它讲是一种运动,中国人把它

翻译成体育,是很有趣的。加了一个“育”,就是有教育性质。当年在英国,贵族学校首先一定教体育,那是为什么呢?其实那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贵族,学比赛学两样事:第一要敢跟别人竞争,要有竞争精神;第二要遵守游戏规则,竞争输了就认输,要有绅士风度,大家客客气气。他们认为这是奠定整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透过运动让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精神。

在古希腊,不是讲“德智体”,而是倒过来“体智德”,体是第一位的。英国贵族家里割草不割,但打仗他要去。中国以前也有士,士也还是要打仗的。是英国人到18世纪提出来“德智体”。我们今天叫体育馆,那个字在希腊文其实就是个学校。不过英国人 game 这个概念,中文很难翻译。把它译成游戏,但游戏在中文里的意义不够严肃。如那天退场前刘翔回答记者,记者问是否紧张,回答说只是一场 game 嘛。英文讲也不错。只是当天鸟巢十万人严重失望,就看你玩“游戏”?

显然,奥运之后该盘点的,也不只是奖牌。

2010年10月1日(参考2008年8月27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世博排队有感

很多人不理解在世博排队四五个小时甚至 7 个小时去看某一个馆，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所以自己去的时候，仔细观察了一下排队的队伍，（已持有中国馆预约券，还排了两小时）。据说是中国跟世博会主办机构有一个协定，观众人数要破历史纪录，要超过 7000 万。如果不超过 7000 万，门票收入要赔钱。破纪录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的，到 6 月票已经卖出去 6000 万了。

但也因为要赶超纪录，使得看世博会变成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很多展馆的确是非常值得看。可是我问周围的朋友，北京、上海、香港，知识分子甚至商界官场的朋友（当然不会太高，太高的圈子我们够不着，大部分也就是教授、文人、处长、资产不过亿的商人），比方说文涛、查建英，还有专门做了一年世博节目的梁文道，居然都还没有去看过世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听说要排几个小时，很多人觉得你就是天堂，我都受不了。但是恰恰在这里，我看到中国的一个新气象。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2010 的世博是“中国的世博”：与世界关系小，外国观众比例较低。对中国影响大，在某种意义上，是百姓第一次全体参与“外交事件”。

中国的社会现在被金钱和官阶所划分，其实非常阶级化。简单地

说，一个局长跟他单位的保安，除了进出大楼时，他们是不大有机会分享社会公共资源的。或者说一个公司的经理跟这个公司里的厨师，除了帮他做饭以外，他们出去坐不同的车，住不同的房子，看不同的电视机，坐不同的交通工具等等。又比如一个演员和她的普通观众、一个商人妇与她或她邻居的女佣，通常是不会一起为了同一件事而排队的……

然而这一次就不同了。因为每一个馆都有外国人在管理，有点像管领馆区这样，你要来走 VIP，就得部长或者省市一级的证明，走后门的难度和成本都提高了。也不太容易以钱换位（取代排队）。真的高干外宾当然没问题。但中层干部、一般的富人既走不了绿色通道，也不大愿意来排这个队了。排队的大部分人，从农村乡镇来，致富了，全家来上海住几天，他们有耐心，有时间，拿个小板凳，拿个扇子，扶老携幼，在金属栏杆阵里静静享受人工消暑水雾和手持“护照”的权利……我在排队时，见到一个认识的局长太太，和前后左右的江浙农民排在一条铁栏杆里，表情郁闷。

这种场面在某些国家或者香港，其实也普通。比方到加州迪斯尼，你就会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全部排在一起。经理、老板、师奶、教授、打工仔，假日都穿着 casual，牵着家人的手或让小孩骑在肩上……但在中国，淡化阶级差别的排队突然成了一个新的风景。

经济学家茅于軾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权社会。前几年乘船到阳朔，上岸发现停车场还有两个，一个给外宾，一个给国人。深港海关出入境，专门有一个通道，给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空空的，旁边很多被代表的人民在排长龙。

久而久之，百姓也惯了。来外宾了临时封路，再堵塞也无怨言。奥运开幕闭幕，国际大师访华演出，票难弄或太贵，常人也觉于己无关。许纪霖曾概括访问学者出国体会：在国内是个“人物”，出国才做一个“人”。凡自觉是个“人物”的都会有意无意地等“机会”去看世博，而不甘心只

是去排队。世博是面镜子,从这个意想不到的侧面也照出了我们的现实——在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阶级分化其实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当然,话说回来,国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到底是世博影响上海和中国,还是中国和上海影响世博,也很难说。很快,中国馆预约券(应该清晨开馆排队领取)就有了“议价”。高价可租电瓶车。有的馆老人、伤健人士和孕妇可以优待。结果我在中国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前看到两三辆给伤健人士的手推车都空在那里。仔细观察了一下,结果发现又一辆被推了进来,车上老人一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光彩,马上激动得站起来了,健步如飞……

后来我去打听这个现象,他们说老人可能是出租的。国人的智慧。90岁的老人,你推着她进去,就有两个其他的人可以跟他一起进去。

乡亲百姓集体“模拟出国”,管理与被管理者都有些不习惯处。比如天气太热,有一小伙子就拿了矿泉水往身上一泼,几个安保人员把他摁倒在地,“你这是要自焚哪!”在绿草地上休息要占地方,结果他们的方法也是挺奇特的,脱下鞋子放在四个角,把袜子连起来,“圈地运动”,这块地方是我家的。说好各馆展品都要固定,不想某馆水池中有不少鹅卵石,于是就逐日减少,为促进该国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作纪念。某日工作人员想劝,一看捡石者愤怒激动的表情,就知再说下去,自己就要走得很远了……

过去这是“涉外场合”,现在全民开放,不分级别。打通内外有别制度,是个进步。一时难免不习惯。最典型说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对世界的热情,就是“护照”。世博护照,印的很像一般的护照,到每个馆理论上都可以盖一个Visa。结果有的人进来什么都不看就要盖章,排队很长。嫌外国职员盖的速度不够快,就上去扳住他的手盖,说你太慢了。有一个新闻,说有人带了500本护照进去,手都盖酸了。我想是村镇上乡亲们来不了,盖500本,回去让大家也过过瘾,多感人的故事。后来听说原

来护照盖多了章,就可以卖钱的。要是有一本护照把 100 多个馆全盖遍,值好几千块呢。

我还是愿意相信我的感人故事。

2010 年 9 月 4 日

第二次抢劫

“关于巴黎兽首拍卖,我有两点困惑。第一点,这个两亿的估价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讲了一句话,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表态,不管主观动机怎么样,客观效果大大抬高了这两件文物的价格。价格一高,谁吃亏呢?就是想要得到它的人吃亏,想文物回归的爱国民众吃亏。谁占便宜?就是拥有它的 YSL 占便宜。这些拥有它的法国人就坐地要价,甚至提出说,还给中国没问题,但要让达赖回西藏……另一方面,更微妙的是,已经买了同类文物的,财产不也增值了吗?群众的爱国热情弄不好就被利用,所以再推下去,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几件文物成为咱们国宝的象征了呢?”

“这些都是法国传教士设计的水龙头,放在郎世宁为乾隆修的西式花园里,他在中国文物史上的地位到底如何呢?中国在海外的文物几十万件,比它有价值的不知道有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几件东西变成了全国网民乃至全国人民最关注的焦点?有人说过一句话,‘很多事情看上去是政治,其实下面都是经济’。所以有眼光的外国盗窃犯,现在应该去偷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是能随便让你们外国人偷走的吗?”

以上是某天我在“锵锵三人行”中的谈话片段。事后觉得意犹未尽,再跟上几句。“看上去是政治,其实是经济”,其实是马克思的理论。

鲁迅的《药》讲过一个“第二次抢劫”的故事。乡绅官府杀掉为民众谋权利的革命党人夏瑜，是对百姓利益的第一次“掠夺”；杀人以后的血又被刽子手（也是奴才）康大叔卖给民众赚钱，是“第二次抢劫”。第一次百姓被动弱势，第二次却是好心自愿（为救儿子）。

法国人火烧圆明园，战火中财物被盗转卖，这侵略后果，是“第一次抢劫”。外国人设计的“水龙头”80年代卖四千多港币，现在升至上亿，如果真的要国人出钱“赎回”，此乃“第二次抢劫”。两亿多元，可以买到很多设备改善山西煤矿的安全。

对抢盗者来说，第一次靠暴力，第二次靠计谋。对受害方而言，第一次被动麻木，第二次主动“配合”。华老栓救子的父爱和网民想救文物的热情都是无比真诚的。但新旧康大叔们的作用就比较可疑了。

写成以上文字后情况又有新发展，真是越来越精彩。

有网民说范跑跑跑了就跑了，何必大讲自由主义。蔡跑跑跑了就跑了，何必说“每个中国人都会这样做”？

至少，“爱国流氓”获得免费（或廉价高效）广告。西人欲问何以赖账，还得怪有关法令（拍卖中标事后拒付款的厦门商人说是因为中国法律禁止文物入境）。看来“第二次抢劫”的后果还包括国家名誉受损。时代真是进步了，50年代公私合营时政府摆布很多商人，现在个别商人就能捉弄政府。

政府发言人说对华人拍卖逃跑一事并不知情，应该是真的不知情。

2009年9月1日

分 类

想想什么都和分类有关。

广东番禺一度要建垃圾焚化厂，周边居民抗议，闹出群体事件，结果上面重视了。广州市政府说一定要经过环境评估，还要搞番禺全民大讨论。意思是不会盲目冒失上马。但也指出焚烧确是一个垃圾处理的方向，说国外发达国家，垃圾焚烧也是“先进生产力”。居民抗议的焦点是焚烧要产生二恶英，说比砒霜都毒数百倍。听上去就很恐怖。也有些学者说，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只是非常小的。炼钢、炼铁也产生二恶英，汽车尾气都会有二恶英。玩的是常人不熟的科学名词，背后其实都是官商合作经济利益。反焚烧是因为损害当地房产利益。建焚烧厂则是政府与商家的巨额不透明交易。

但垃圾没地方放了是事实。中国这些年，城市化进度极快，多少农村人口进城，城市人口翻了好几倍。可是进城以后，楼盖了很多，垃圾没想好。什么叫城市？古印度、古罗马的城市就是有下水道的村镇。你修好下水道才算个城市。众多人能住在一起的最大基础条件就是能把废物处理掉。我去看过曾被维苏威火山埋没一千多年的庞贝，就有石头的下水道系统。现在在象征意义上，我们的城市只重视门面，下半身没好好安顿。人也是如此。

香港在这方面也有争论。绿色团体认为分类是最好的绝对的方法，

这个分类其实要靠民间。但政府要起焚烧炉，以及扩大堆填场。而香港没地方堆填，要买其他的便宜地方。北京堆填场也不够，快要围城。

两个相反方向其实有联系。焚化炉可以燃烧掉很多掩埋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什么产生二恶英？因为没有做到垃圾分类。据说单纯的燃烧纸跟厨余，不会产生很多二恶英。燃烧塑料、化学品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以为了世界，从我做起。先树立一个概念：买东西要成本，丢东西也要成本。欧洲有的城市分类很细，不同颜色的箱子，人们也不厌其烦。我试过在家里简单分三类，就是厨房里垃圾筒只放厨余。其他的都是可以丢纸之类的，因为用得最多其实是纸。另外，专门有一个是丢塑料等化学品的，凡是跟塑料有关的，就丢在那个垃圾桶。可我自己都觉得有时没好好实行。这类分类要最初这一刹那开始做，说到容易做到难。饮料喝完了，这个塑料罐，在看电视球赛紧张之际，你叫我跑去那么远的地方丢，我连站都不想站起来。我垃圾桶口很大，啪一下，大都投篮命中。

自己做不到是一回事，自己做到了，拿出去有没有三大分类的大桶接收呢？有朋友见过北京一个垃圾筒，上面三个颜色三类，可回收、不可回收等。仔细一看，下边却是通的。不知是坏了还是本来如此“门面工程”——好像“文革”时的公、检、法，三个门一个店！太有中国特色了。所以说“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搞了底下还相通。

又或者，箱子有三个，来的垃圾车只有一辆呢？（据说分类运输，成本很高——扔东西是要成本的。）

在象征意义上，这个底部相连的分类箱可以给我们很多联想。很多事，我们发现自己坚守原则、洁身自好，其成果却轻易被社会破坏。比如，我招收研究生事先拒绝私人关系联络，但后来不仅发现别的系很多教授有很多私情考虑，更重要全香港大学研究生学额分配制度也不合理……这时，我还应坚持吗？

所以，仅以垃圾分类为例，既是人们生活方式自觉意识的问题，也是政府责任和利益的问题。

各国政府也有不同的引导人民的方法。日本纸制品的回收,一个小箱子特别写“新闻”,就是报纸的意思。为什么报纸要另外回收?因为报纸上面的油墨是属于有污染型的那种纸制品,所以你还不能够放进那些平常无菌包装的纸制品一块做回收的。巴西则发展支持拾荒大军,巨大的垃圾山好多人在里边拣,说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拣走很多有用的东西。

政府要在外部创造很多条件、很多政策。虚一点讲人生,要让在家里循礼的人在社会上容易成功;实一点讲垃圾,要让老百姓自己家里分了类,外面有地方可丢,减少整个社会的环境压力。如此,家里才能从小孩开始做起。他在学校里受教育,见到你做爸爸的一扔,小孩就在旁边批评你。家里也变成一个公共道德空间。据说台北也管得很紧,有些人丢到郊区去,被人家在郊区打开寄回来寄罚单。

在中国,只有一项回收特别有效率。CCTV 报道过,广东某地的厨余,非常严格地被分类。分类下来拿来加工馊水油。有巨大的市场。很多打工仔、民工,便宜饭店吃的盒饭里面用的油,就是精心回收的。假油技术,土法上马。

“地沟油”的例子,说明国人“分类”能力有时可以很强。

广州、苏州、北京的垃圾焚化的问题,酿成了一系列公共危机、群体事件。看材料说原来其中利润非常大。准备在番禺那里盖焚烧厂的公司有一部分日资。他们投资 1.5 亿,另外一个公司也投 1.5 亿。因为这是特许,原来在中国处理垃圾是肥水,政府一吨垃圾补贴最低是 60 元,广州是 140 元,上海是 120 元。每天 12000 吨,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厂在烧的话,光补贴每天都能拿到 100 多万,但是因为再生能源,它发的电,政府包买。所以说它全部投运的成本,卖电费就可以平衡了。政府补贴 25 年可以得到 150 个亿。投资现在只有 3 亿。可想这个投资的动力有多大。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去抗议,最后市政府仍说只要查清楚了没问题,还是可以盖。这个调查又说,拿到政府特许的是一家,但是它去找了另外一家,为什么呢?记者提问,这不是等于把自己锅里的肉

分一半给别人吗？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怕出名，一闹出了名，记者就狂追，分析那两家公司的关系，看其间有没有官商利益转让，看审批部门与建厂集团有没有利益输送。结论自然不用我在这里多说。友人潘洁在香港做一个环境局副局长，月薪 20 万。或曰大陆官员也应如此高薪养廉。是否太天真？若有上百亿利润的项目过手，厅局长谁满足 20 万月薪？

还有选址也有玄机，从 2004 年就开始选择选到现在，选的那个地方周围的楼盘都已经全盖好了，而且都卖了。就是雅仕居、祈福新村，香港都很出名，都卖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厂影响到附近的楼价的话，吃亏的就只是居民，不影响地产商。地产商没损失，政府也一点损失都没有，因为地价问题早不存在了。如果选在另外更偏僻的地方，也许还没开发，就会影响将来潜在的地价，政府收入就会下降。

我觉得千算万算，就差名字没弄好，不应该叫“垃圾焚烧炉”，应叫“再生发电厂”。

有专家说，垃圾焚烧工业在西方已是夕阳产业，日本、美国在 90 年代以后，还生产这个设备，但是自己都不用，现在是卖给中国。当年日本是焚化炉大国，最高的时候 6000 座，但是，日本现在已经减到 1800 座左右。

但在中国，如做不到分类，只有焚化。且商家获利，政府亦有好处。总之是“利”字当头。现在有很多事物和问题，就是不肯分类。

世上本无绝对无用之物，垃圾原是被错置的资源。懂得分类，其实没有垃圾这一回事。

2010 年 10 月 3 日

历时最短的“运动”

一件小事，一个演员与邻居及物业的个人纠纷，居然在短时间内发展为与国家文化形势有关的政治风波——而且发生在最近，2010年。

郭德纲家后院据说占了公用绿地，如果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可能违法。“钢丝”或记者如果越界偷窥私宅，也可能涉嫌侵犯隐私有错。郭的徒弟和记者“推搡”（今年热门词候选），也可能触犯治安条例，已有司法介入。后来郭德纲在节目中批评电视台尤其是责骂“穷人”，更引起众怒。记住中国的游戏规则：现实生活中人人想致富近官，网络舆论里个个支持穷人百姓。但众人愤怒的是郭的言论，骂穷人，真正的错误却无人关注：那就是相声演员在售票的公共演出中谈论牵涉法律的私人纠纷——这是典型的运用公共权力获得私人利益。请问冯小刚可以在电影中谈孙海英吗？或者赵忠祥在《动物世界》里讲他的官司，哪个部长在人大会议上讲他与亲戚邻居的金钱纠纷……

可是忽然媒体都批评郭某“三俗”，其作品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匆忙在北京各书店下架，网上更有人揭发郭某人十几年前曾勾引女观众……

一时间，好像又要搞运动，抓典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好熟悉的景象。

我一向讨厌庸俗低俗媚俗还有恶俗。但以运动方式反对，是另一

回事。

“庸俗”，即平庸的通俗。但通俗不是错，错在平庸。通俗文化至少有民间俗文化与现代文化工业两个层面。俗文学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风雅颂，“风”比“雅”“颂”文学价值都高。《红楼梦》写作时也属当时的俗文学。文化工业消费之俗则是近代一人一票制政治衍生出的平等选择权，于是今天勃拉姆斯与 LADY GAGA 也就成了可以各人所爱的青菜萝卜。尤其在缺乏政治选择的地方，人们就加倍珍惜超女等“文化民主”。于是买包买车以稀以贵为荣，看戏读书则不以从众平庸为耻。

“低俗”，是低级的通俗还是低层的通俗？这又不仅牵涉审美，也关系“政治正确”。从阶级论上讲，底层，无产阶级文化需求再“低”也不应被否定。从格调趣味讲，“贵族”的高端文化则要有政治上社会上的“高层”支持或至少明白。简单说，莫扎特、达·芬奇、李白都和当时皇帝有交往。有人说，毛泽东如果在，某些“国学大师”今天也不这么容易混。

“媚俗”的关键是“媚”，错仍不在“俗”。即使是“媚雅”、“媚上”、“媚钱”，也是“媚”的问题，不完全是“雅”、“上”、“钱”的错。“媚”的反义词是独立、傲骨。敢于追求自己的风格，也敢于挑战各种禁区。鲁迅、张爱玲、齐白石、聂耳、赵丹、陈寅恪等，当年都没有被领袖“新生活运动”的道德号召所压倒。如果今天也还有上面这么一系列名字在，再多相亲无极三枪含泪，又有什么关系呢？

用道德口号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教训很多。

一旦展开大批判，形势马上逆转。至少 70 年代以后，此规律屡试不爽。这次郭德纲也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从网民批评的“文化流氓”形象变为大众同情的“弱势群体”的代表。说是“文化流氓”，当然言过其实。称为“民族英雄”，更加离谱夸张。

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记得多年前就有幅漫画，画了一个作家请一些有官方背景的评论家吃饭还送礼，但不是要评论家夸他，而是脱下裤子请他们打屁股。

那是不是说对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就没法批评了?不是。关键是:其一,程序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操控或封杀的背景。其二,批判的内容,“罪名”是否符合事实。“罪名”与错误不对号,会造成更大的错。远的不说,最近便有例子。如“缝肛门”(此“门”非那“门”),各级领导传媒和网上大众都在争论助产士有没有缝肛门、缝到什么程度、是否痔疮手术拆线等等,对这件事的起因,100元红包太少助产士“脸都绿了”却无大争议,甚至助产士事后还特别委屈地声明“红包已退”,其实真正的大错是大家熟视无睹的医生护士收红包“制度”,其性质也是运用公权力收私人利益。“罪名”与错误不对号。

同样道理,有关湖北警察:错在“打人”,而非“打错人”。如确认只是“打错人”,岂不察公职人员“打错人”的报道,也是传媒(及警方上司)用“错”,意味对民众平时打得没错?在这里,报道、解释比事件更值得反省。

也有聪明人告诉我:郭某人错不在后院占花园、徒弟打记者或相声骂穷人,而是错在“时间不巧”,偏偏碰上反“三俗”运动。

大抵用运动方式解决思想文化问题,效果不好,且有反作用。反三俗运动雷声大雨点小,始于郭德纲,止于郭德纲。大概也是几十年来为期最短的“运动”。之所以如此,窃以为是和90年代后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改变有关。(可参见《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第三节)

原载《羊城晚报》2010年8月15日、22日。

2010年10月2日修改

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①

新世纪十年文学,其基本处境,简而言之就是: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

一、“新媒体”首先新在 80 后、90 后新人。但仔细一想,二三十岁,也就是茅盾编《小说月报》,胡适到北大教书,施蛰存办《现代》杂志的年龄。现在一方面是青年人被宠爱,也是被宽容、被幼稚化。二三十岁的人理应领导社会文化主流,不必自觉年轻就骄傲或期待被照顾。五四时代,只有鲁迅是 80 后,毛泽东、胡适等都是 90 后。年轻时不做大事,以后就做不了什么了。

“新媒体”其次新在科技。网络,犹如百年前兴起的文化产业如报纸和电影。但为什么网络博客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我们这里产生这样大的文学效应。不仅像“盛大文学”般让穷学生升斗小民每天省下几毛菜钱读网上连载小说,是世界各国皆少有之文学/科技/商业现象。而且网上自发创造、流行的文体术语概念名词,也变成在别国难以比拟难以想象的文化现象?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其他途径非网系统都不那么流通,还是证明了我们文学大国的悠久传统:任何新媒体,

^① 本文是在 2010 年 6 月哈佛大学、复旦大学“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摘要。

都能宣泄文学激情？

二、在新世纪网页上出现的却像上世纪初的报业“旧文化”，政论与绯闻并置，黑幕与广告共舞，思想光芒和明星走光争辉，鸳鸯蝴蝶和《呐喊》、《彷徨》夺艳。令我们新文学感到心跳不安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是清末民初的“礼拜六”，是“封资修”。新媒体装了旧文化，反使得我们的“人民文学”感到很困惑：难道要我们写“人民币文学”（声音倒接近——别误会，不是接近那个“下半身”粗口，而是接近“被人民逼的文学”）？这是否也倒过来提醒我们，应该反思五四及以后的主流文化当初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压抑旧文化。我们建设新文学的道义合法性本身是不是从上世纪初就有缺陷？

三、90年代以来文学体制有很大变化。以前是假定弄文学的人个个都应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队伍里的战士，那跟不上形势，就要改造思想。文章出了“问题”，就要批判——既是帮助灵魂失足的作家，也是教育大众擦亮眼睛，提高觉悟。这种文学的批判兼批判的文学，30年代起，80年代终，五六十年代效果最好，“新时期”以来便常常批谁谁红，不臭反香。有本在内地遭禁的“宝贝”，竟在海外卖出上千万版税。于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逐渐改变调控方法，逐渐把文学看做是一个可能有利益冲突，既要团结又要管理的社会力量，这样政府的文化管理就会由管心灵，转为管行为。以前对于文学，试图管理心灵统一思想。作品有问题就要批判，从50年代到80年代，批判尺度方法效果不同，但批判是一贯的。90年代以后，较少批判作品作家的世界观，更注意调控刊物、出版社等文学生产传播程序。为什么《白鹿原》、《兄弟》、《生死疲劳》不能像《青春之歌》、《芙蓉镇》那样拍成大片呢？文学被边缘化只是市场的结果？文学体制管理要创新，一是保护作协，二是注意网络，三是边缘文学，四是控制影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家规”和“国法”，都说明文学体制的管理策略的与时俱进。

四、人民逼。谐音，但不只是“人民币文学”。我们做电视、文学，要

符合二老的需要，老百姓和老干部。销量是人民，网络点击率是人民，杂志卖的也靠人民。我不觉得的由网络逼出来的文学会偏离人民文学的方向。看《独唱团》，文学味挺浓，字画并置，鲁迅精神仍在。问题是文学是不是必须要影响大多数人影响社会秩序？这些“政府车辆”，现在已是“社会车辆”，可某些从业人员心里仍觉得自己是“WJ 车辆”。

简言之，新世纪文学的背景，就是“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

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军队有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学术界也有自己的三大纪律。第一，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欧洲大学有高薪传统，就是要让教授摆脱政权和教会的控制。无论宗教、皇权、或党派或警察，学术研究都不应听从他们的支配和指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的基础。风骨乃文人的生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读书人以不服从命令为天职。能否做到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则是另一回事。

第二，多拿他人“一针一线”。“针线”即研究成果、学术资料、辞章经典。学术的目的是要说出和他人不同的真理（传递、重复真理，只是宣传、教育、礼拜……），要与他人不同，须先知道他人至今为止就这个题目，已说了什么。故引经据典，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讨论问题的平台。

多拿他人学术成果，但必须紧跟第三条纪律：一切引文要注出处。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注释就是“学问”，“忘了”注释就是“抄袭”。此理至明，不必多言。只是引文规则，中西传统有些不同。记得 90 年代初在 UCLA，我的论文是讨论张爱玲与上海“小市民”社会。宣读初稿后被李欧梵“狠批”：“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文章写得好，注解却总是做不好呢？”后面一位要读论文的新加坡同学结果在课上昏厥送院。当时做访问学者

的汪晖坐在旁边也很惊讶李教授之严厉。后来我们议论,是否中国文人过去觉得文章乃天下公器,有人引用是光荣。多加注释岂非看不起读者?虽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无一字无出处”,但并不特别注明出处。而西方现代文明,处处强调个人权利。现在这么讲究注释,是否也和“知识产权”有关:拿了人家的“针线”,没有付费,至少也打个招呼吧?

原载《羊城晚报》2011年3月13日

再说“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拙文“学术界的三大纪律”两周前刊出后见宁源声先生有文回应(《羊城晚报》3月20日),大致赞同,但也有点补充。就是提议在第一条纪律(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后面加上一句:“但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对此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不太同意宁先生的这条补充。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如果成功,自有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袁隆平种水稻,钱锺书写《管锥篇》等等。但有时,明明成功伟大的研究,却被认为没有尽到“社会责任”,甚至还“罪责难逃”(如哥白尼的学说,如马寅初50年代的人口论,等等),这种时候,如果研究者放弃他的学术良心去听“社会责任”的指挥,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更有一种情况,研究本身是成功的,但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却没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如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这时要研究者听指挥也来不及了。

所以,尤其是人文科学,尤其在中国,学术只能听从学术使命的指挥,其他“天地君亲师”,一概多谢。

老师的指挥?对不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亲友家人的干预、劝说要“小心”、要“配合”等,诚然都是好心,但也不能听。

政权的命令、集团利益、“党性原则”,或可指挥郭沫若,但无法指挥陈寅恪。

大地、母亲、祖国，当然是神圣的召唤。但鲁迅《藤野先生》中有一段话：“小而言之，为了国家，大而言之，为了学术。”

做学术之人，为了学术而献身，这便是“道”，便是大写的自然，便是天理，也是最大最根本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十分同意宁源声先生的建议了。

还是上次的一句话：能不能够是一回事，应不应该是另一回事。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做一些事，就认为本来就不该做这些事。

原载《羊城晚报》2011年3月27日

特殊的爱马仕包

1. 当今少女物质炫富,浅薄虚荣,可以理解,不必多议。

2. 网上民众普遍仇富的情绪,既有贫富悬殊现实印证,也有1949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传承。不无道德优势,也隐含法制危机。(是否能在法律意义上认为凡穷人皆比富人善良?)此话题目说来话长,以后再论。

3. 网络群众运动的合理与合法性,第一取决于所谓“人肉搜索”内容、对象究竟是否和公权力的滥用有关。第二取决于民众“人肉搜索”的方法有没有动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比如航空公司或医院甚至银行职工出于义愤擅自泄露客户个人资料等,即使“合理”也不“合法”。这也可以是今天网络群众运动与“文革”群众运动的重要区别所在:你反的就是有人滥用公权力,你反的方法不能犯同样性质的错。

4. 红十字会(及其他公权力、非营利机构)可以和商业机构合作,但如果合作双方是父女、夫妻、兄弟或者其他什么关系,第一要申报,第二要尽量回避。即使一时做不到,道理也要明白确立。否则丧失公信力,结果恐比募不到钱更加严重。

5. 如果说事件中所有人都受损害(受损最大的不是红十字会,或贪官奸商,而是进一步丧失善良信心的民众),唯一得益的只有马萨拉蒂或爱马仕。这种广告策划,太懂中国特色了,可以获奖。

6. 看着吧,此事今后会有上中下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中等结果是:红十字会因此而反省与商业红十字会的法律关系,并认真遵循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些基本理念和规则(比如不仅公开捐款来源,也在网上透明捐款去处,等等),而商业红十字会等相关团体今后依法切割与商家关系,最后人大催生一部“慈善法”。上等结果是红十字会如能建立一种“依法涉商”的规则经验,可以自然影响其他非盈利的半公权力机构(如妇联、工会)乃至公权力机构,进而推动促进实实在在的建设性的体制改革。而下等结果,则是将体制问题迅速归为作风问题。听说相关部门内部开会有人总结:今后都不准有“二奶”,特别不能这么“二”的“二奶”!

7. 不过另一方面,郭美美也给其他同道少女们很大挑战:几个月就赢得上千万汽车皮包,令很多美女们相形见绌、自愧不如(这也是她炫富的最初纯洁动机)。至于后来微博否认车主是男友,更说明她的成功:不交友也能有靓车,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赢得潜伏特工之美名。

8. 而且,仔细想想,这是多么有特殊意义的皮包啊,恐怕爱马仕历史上都从未出现过:它可能是由成百上千深圳普通民工,省下自己买书包、打酱油、付学费的钱,几十元,上百元,丢进一个神圣的箱子,拼贴组合而成……

这么沉重的皮包,谁背得起?!

原载《羊城晚报》2011年7月10日

哥本哈根的自行车

2009年夏我去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度假三周，回来后三人行要我讲讲观感，照例带上几张照片。我选了一堆哥本哈根街头的自行车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文涛有点奇怪。

从小就知道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人类社会发展有四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奴隶社会咱谁都没见过（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套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结果发现奴隶制度很短，只到西周。“封建社会”很长。周谷城则认为西汉仍是奴隶社会。其实欧洲的“封建”概念能否用来概括中国传统，也有很大问题）。余下来的三个社会、三个主义，咱们纠结斗争了很多年。而在北欧，这三个社会居然并存。它有皇室，每个国家都有皇室、城堡、御林军、贵族，属于“封建”社会。它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IKEA、诺基亚等等，全球大企业。但它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真是社会主义。

比如在丹麦，失业的人，如果你是工会成员，每月15000克朗，约等于人民币两万块。而工作的人也只有两万。教授月入6万，税后也只有3万。但是什么都不做，也有救济一万五。

为什么拍哥本哈根街上自行车的情况？当然，很多靓女，身材好，时髦衣服随风飘起。后来我们院长（他太太是丹麦人）告诉我真的有个专

门网站……但我关心的是另一回事。我印象最深最深的是有一天很早，去了一个皇宫，还没开门。外面石路没人，看见来了一老头，骑了一个旧自行车，总有 70 多岁了，颤颤巍巍，到了十字路口拐弯处，他有点艰难地伸出一只左手。我一愣，突然明白拐弯的时候，伸手就像汽车打拐弯灯一样。我们小时候其实也这样，后来忘了（甚至有时开车变线都懒打转弯灯）。我对他们的自行车那么感兴趣，就是从那个画面开始的。

老人抖抖索索伸出一只手，可是那是皇宫外的清晨，一个人也没有。70 多岁的老头，他这一辈子守秩序惯了。一只手这么伸着，自行车拐过去了。印象很深。我当时来不及拍，但这个画面我已深深印刻在记忆中。

之后我就发现哥本哈根整个城市里边的自行车道自成系统，大家都守秩序。中国是自行车大国，现已向汽车王国迈进，北京像个停车场，自行车被汽车洪流挤得无路可走，小机动车被迫在汽车、行人缝中乱窜，成为交通隐患。曾有建议要小机动车上牌登记，好像因为牵涉太多利益链且法不责众，不了了之。毕竟，城里人今天，也是穷了没法，才开改装的自行车（真的自行了）。

相比之下，在哥本哈根的街头，骑自行车的青年男女是最时尚的一群。他们穿的衣服适合骑车，又是名牌摩登。自行车可能也很贵，好几万。最重要的，他们骑自行车，不像美国和香港那样当做运动健身。他们是每日代步上班，又是新潮。我从小就骑自行车，永久 13 型，车把特窄，轴是方钢，有不少美好回忆。再看中国现在骑自行车，怎么变成弱势群体的标志？

谁在北京上海约女朋友吃晚饭，说骑自行车去？“飒妹”咱这边都要开路虎宝马去接吧。

文化当然要有背景硬件。如果街上是停车场，废气多，骑自行车每天回来鼻孔都可能是黑的。下雨天虽有雨披，雨打在脸上，也会又冷又湿。丹麦回来后，我注意观察上海，发现上海现在街上骑车人已经不多，

大都装了个小机器,脚悬着,那个蹬脚板还转动。土法机械化部队。也有美女骑车,草帽,肩上披布,脸上蒙纱,巫女似的。在台北也是,摩托车口罩队。基本上都在被汽车欺负。

可是在哥本哈根,汽车道和人行道之间必有专门自行车道。三道权利平等。有硬件原因:路好,空气清新,汽车贵(重税),城市也不是太大。但也有文化习惯,毕竟夏天也热冬天更长,据说下雪天照样很多男女骑车上班。

巴黎、北京,现在也有街头出租自行车。毕竟和哥本哈根不同。后来上海世博,丹麦馆除美人鱼(与人共浴)外,最突出的就是自行车道。不过,在哥本哈根讨论全球低碳协议,依然没有成功。

在北欧的另一个印象是,经济很发达,政治颇稳定,但自我宣传的中心是文化,是文学。整个丹麦,街上、船中、电视、建筑,游客旅人听得最多的,就是安徒生,整个国家都在宣传一百年前的这么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皇帝也没有这么重要。我想起美国,最重要的人物是林肯、马丁·路德金,或者乔丹、比尔·盖茨。中国也学美国,最显眼的地方都是文学词汇艺术手段宣传领袖、地产或世界几百强。在奥斯陆的皇宫旁边,就是易卜生博物馆。丹麦的“魂”就是安徒生。到布拉格,卖给游客的T恤上是卡夫卡……

关于北欧,值得讨论的话题还有很多,守规矩,廉洁,性开放……

2010年9月30日

网 摘 语 录

某日偶然在新浪博客搜索中看到一篇“锵锵三人行语录”，作者将他那天记得的三人行诸位嘉宾的只言片语摘录下来。于是我也将其中许子东的言论转抄如下，尽量加一点简单说明。

1.这是我对社会认识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对人生信仰的一大退步。

我还记得说这句话的上下文。那天讨论袁伟民有书批评何振梁过去做事不配合，不听招呼，好像在国际奥委会选举中没有按中国设计好的策略投罗格的票，差点坏了我们北京奥运的大事。这事详情我们根据袁伟民的一面之词很难下判断，但我知道在理论上，何振梁不是中国派驻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派到中国的代表。理论上（我知道，这只是理论上），他应该首先代表国际奥委会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所以我以为袁伟民的批评应是台下的真实的批评，但摆在台面上讲不太合适。不过因为这个话题，却使我想起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情。80年代中，我在华东师大教书，我有个同学要升副研究员，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但据说有人投反对票。我当时是副教授，也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和系学术委员会委员。有老师问我怎么投票，我当时的反应比较书生气，说投票不是无记名的吗？其实我投的是赞成票，且记得那时投票几

近于半公开,讨论中大家已有共识,我也不明白怎么会有反对票。但我当时天真的回答却引起了误解。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就有了我们年轻评论家不合的传闻,颇满足了一些旁人的好奇。有个师弟后来出国还专门写文章议论此事。多年后跟那位同学谈及这个误会,他是否心存芥蒂我也不清楚。现在回想此事,我仍然不确定自己当时的话是否说错?从结果看,如果当时直言投票情况(中国有谁那么在意表面规则),大概省却很多人事纠纷,甚至更赢得师友信任。而且,也许,我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我能在这个委员会投票,还不是有老师在后面提拔支持?“无记名”?幼稚!盲目相信西方民主!……但是,我真的错了吗?为什么到今天,为什么我还会记得这件事,且认为是“我对社会认识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对人生信仰的一大退步”?

这种进步和退步并行的过程,从那时开始,一直都有。

2.观察历史就像逆向车道上发生的车祸一样,离真相越近的人越关注越焦躁,离真相越远的人越麻木越茫然。

我讲的就是公路上的风景,你们要联想到什么别的历史事件,那是你们的“天赋人权”。

3.能屈能伸固然是令人欣赏的品质,但是有些人是真的无法忍受哪怕半点侮辱的,所以他们选择死亡。

我有次在岭南大学讲老舍之死,后来学生说我有点激动,几乎流泪。我自己竟不觉得。

4.鲁迅讲过一句话,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错本来是有的,犯的人多了,渐渐就不觉得是错了。

只是写实,毫不夸张。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5.引用胡适,历史就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可以随意打扮,但人们不一定相信。可以骗所有人于一时,可以骗部分人于永久,但不能骗所有人于永久。

6.现在的家庭结构是倒三角。

不记得怎么说的了,指独生子女政策后果?

7.以前是晚上集中学毛思,现在是晚上去脚底按摩。

很难说哪一个更好?

8.大雪就像革命,一夜之间改天换地,雪化了之后发现可能更加丑陋……

这么深刻的话,是我说的吗?为此,要找一张下雪的照片放在我的书前面。

9.所以他们现在歌唱得很凄惨,春节他们唱“常回家看看……”,就是说年轻人能回家看看就已经是老人最大的安慰了,这是一个完全倒置的老人社会,最穷的是老人。

另一个说法是:少年怕病,中年怕闲,老年怕穷。

“时间就是金钱”,意思是说,老年人少了时间(已用掉了时间),所以穷了。

10.现在全国人民只在做两样事情:一个是炒股,一个是偷菜。

与时俱进,2011 新发展,炒股变成炒楼,偷菜变成微博。

11. 每个人都是两个人:一个人是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自己有利,另外一个人是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对,相信做什么样的事情对。……80 年代那会儿,这两个人合成一个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同时对你又是有利的,给你带来好名声,给你带来了艺术上的成功,从 90 年代开始,这两个人清清楚楚变成了两个人……变成两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何苦呢?我还是迁就着第一个吧。变成

两个人还算比较好的,最坏的情况是后面的那个不见了,到了后来就什么是有利的,就是最好的。

虽然美化了 80 年代,但大致上确实如此。

12.只有爱这个东西才能克服所有一切,那些地位、名声、钱其实真的都是表面的,人在世界上,就活几十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建立的各种各样的细节,足以克服那些地位、名声、钱,最后到你人生快走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只有细节是最重要的。

我在电视里讲了很多关于性别、婚姻和爱情的“直面惨淡人生”的话,却只有这一段流传甚广。

2011 年 1 月 5 日

第三辑：看电影

人戏太深

最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UNKNOWN》港译《无名杀机》,内地好像翻成“不明身份”。

影片开始男主角是个教授,和太太坐飞机到柏林参加一个科学会议。很快男主角出车祸被撞晕了,昏迷四天后才抢救回来,有些失忆,好不容易找到他太太住的旅馆,不想他太太表示不认识他,且旁边另有一个男人,说是她的丈夫,名字和男主角一样。查查网上及其他资料,这个名字这个教授身份确实不属于他。那么他是谁呢?男主角晕了,一下子陷入了寻找自己、证明自己的危机中。

这样的桥段现在谍战片常用,巧妙之处在于随着剧情发展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男主角是一个职业特工,和他“太太”(其实是战友)一起被派来执行特殊任务。没想到车子一撞把脑子撞坏了,自以为真是“教授”了——于是变成了这个任务的捣乱破坏者,以至于后来要被人追杀……

这部电影突然使我明白了我在“锵锵三人行”里的工作……我原来也是应该在节目里表演忧国忧民、风花雪月,表演指点江山、激情慷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进戏了,脑子坏了,居然自以为真的可以忧国忧民、风花雪月,自以为真的应该指点江山、慷慨激昂。股票、楼价、航空母舰、两会、高铁、红十字、利比亚、艳照门、恐怖主义、“文革”、同性恋……这么复杂这么广泛这么深刻的话题,居然自以为都能讨论,还煞有介事。本

来是表演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事都有义愤情绪,不是真的什么都懂一点,不是真的什么都有兴趣,不是真的可以有义愤情绪……

又没撞车,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入戏太深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的演老干部演得很好,后来好像在传媒微博上发言也真像老干部了。有的用真车假包人工术装扮成美人,也会相信自己真能倾国倾城。也有人或善意或调侃地被称为大师或某派代表,渐渐也自觉真是大师和学派代表了。有的因工作需要显得清明严正或关爱平民,久而久之自己也感动。从表演忧国忧民,到真以为自己忧国忧民,恐怕各行各业都有。人们的真实心情和真实处境哪个真实呢? Unknown.

原载《羊城晚报》2011年7月17日

建国大业

电影《建国大业》中有段台词：腐败，反，要亡党，不反，要亡国。

这段台词，表面上是讲国民党，实际上，当然，也是讲国民党。

话是蒋介石对蒋经国说的，应该是编导安排的家人之间传递政治底线的肺腑之言，非官样客套文章。何亮亮说他看的所有蒋介石传记里面，从来没有见过蒋讲过这句话。在电影中，这句话剧场效果强烈。从历史背景看，当时蒋经国到大上海打虎受挫，蒋介石也深知利害，反腐反到后来，都是皇亲国戚。最后也应验。真的是亡“国”（“中华民国”失去大陆），而没有亡党。国民党人一直自称“党国”，字面上的次序是，党比国更优先，党比国更重要。

《建国大业》在政治内容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少讲军事战场，虚写三大战役，主线侧重政协会议、统战过程。的确在历史上，有了第一届政协会议，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代会、宪法都是后来的事。二是考虑香港台湾海外市场的政治承受度，影片既有跟马英九的国民党制造和谐关系的政治考量，如中性化处理蒋介石，蒋经国几乎是正面形象等，当然也有两岸三地明星汇聚以后的市场策略。此片至少在香港，票房不错。

通观整部电影，观众不难看出 1949 年国民党之所以败，共产党之所以胜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执政党腐败，而且他自己不肯反腐。也有党内人士看到腐败于公（党国命运）的危险，但更多党内人士（甚至

有时也包括改革者)无法失去腐败于私(自己、家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后者不是看不到危险或不想避免,只是想侥幸赌一把,因为放弃“私”是眼前,是贴肉;损坏“公”是长久,非一人之责。与其说是党内多数少数政治斗争,不如说更像一个党在天理人欲之间矛盾,在超我本我之间纠结。如果没有外力制约,只是一个凡人,占上风的大多是人欲、本我。1949年的事就是最后由外力来解决国民党自身的病。

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党不肯团结知识分子。电影中大量篇幅,描写共产党在四十年代真心实意跟政协的各种知识分子合作,里边出现了张澜、罗隆基、章伯钧、郭沫若、闻一多、梁漱溟等历史人物。执政党对知识分子不尊重,闻一多则被中统还是军统暗杀。基本上“80后”青年在电影院得到的印象,哪个党和这些知识分子好,革命就会成功,反之就有问题。

第三个原因就是国民党里边内斗,共产党那边一片团结。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蒋经国与孔祥熙家族,嫡系杂牌,总之是党内充满政治斗争。而在延安西柏坡,毛周朱刘整天一片和气,抽烟,欢笑,甚至还有醉酒放歌场面,连林彪也是冷峻神勇形象,江青也像个清纯女子。相形对比明显。

所以,反腐,知识分子政策,内斗,成了两党胜败的关键——当然,这是电影。

看一条网上影评,却是我没想到的角度。网友说胜负关键时刻,是共产党会开会,国民党不会开会:“会议开不好,后果很严重,一部电影说出这样的道理不难,难就难在要说得有道理,韩三平做到了,他说的甚至不是道理,而是哲理。为什么蓝营实力强大,最后却惨败在红营手上?影片通过一系列细节对比,非常雄辩地告诉我们,对会议的态度不同,决定了成败。你看蓝营他不是不开会,他们也开会,但都是坏会议,采用投票制,大家发言不踊跃,场面冷冷清清。红营,共产党这边就不同了,他们采取举手制,热热闹闹,争先发言,这是好会议。张国立性格不好,整

天沉默寡言，愁眉苦脸，喜欢谈心散步，而不是开会，儿子陈坤也是这样，爱搞私访，开家庭小会。但是反观红营这边，他们形式搞得非常活泼，会前专门有人抓拍，会后一定合影留念，有时候开完会还会唱K，几个大男人喝完酒抱在一起大唱《国际歌》，场面十分感人。跟张国立相比，唐国强的性格真是太开朗了，完全是开会型的，谈笑风生，嘻嘻哈哈，他真是开会迷。毫不夸张地讲，从来没一部电影能把会议这个主题，拍得如此深入，就是完全肯定，没有人比韩三平更胜任此片的导演。因为在官场里，他最艺术，在艺术里，他最会议。但要特别指出的是，演这个会议，港台明星要逊色一些，演技有待提高，这跟他们平常缺少会议训练有关，但我们内地演员非常出色，每一次大会小会上需要的表情、动作和语气，他们全都演出来了。”

网友是匿名的，可惜无法转递引文稿费。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现在英雄多在网上。

当年英雄也不在“白宫”式办公楼，而在窑洞里，一起坐在炕上，抽烟聊天。这种在领导住所客厅竹椅而不是在大会堂里决定国策政令的传统可能一直延续至今。在南京国民大会会场，电影展现了选举的结果违背了领袖的意志的场面。可见不光是个形式问题，形式可以决定内容。

会议前并不知道会后的结果。会议期间失控，这种事情，蒋介石那是一次。中共后来当然也有，在两次庐山会议上。最后还靠小会谈心等改变大会结果。影片中的政协，开得这么和谐。其实史料告诉我们，当时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当时政协里有些党员身份不公开，有很多叫民主党派、进步人士。

尽管为了海外市场、年轻观众民意，《建国大业》打了不少擦边球（如把不反腐亡国的段子塞到蒋介石嘴里，刘德华扮演的国军将领善心大发不炸北平等），用心良苦，但基调还是主旋律。影片中有关战争的思考，与同期热销的龙应台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形成对照。

一般一个民族书写战争，有三个不同阶段。战争刚完的时候，就是歌颂胜者，谴责败者。因为胜负虽然战场定，人心尚未定，所以还要不断地来强调成者王，败者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战争影响稍微平息，就不会过于贬低失败者。因为你要把败者写得很蠢，很弱，并不突出胜者的光荣。一个败者如果很蠢的话，他整天在嚎叫的话，那说明你胜的人没有什么厉害。有人说，国民党当年太腐败，所以共产党一开始的法制就不那么精密。英国人的政治传统非常厉害，所以美国开始反英的宪法也很严密。胜利者的政治成熟度有时取决于对手敌人的水平。

但到第三个阶段，甚至不是总结胜负原因，而是站在悲天悯人的立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硫磺岛的两部电影，一部写美军胜利，英雄插旗的照片，后面很多美国战胜国的内幕。第二部写一个杀了不少美国人的日本将军的内心过程，等于有点歌颂敌人。美国人会不会批评，你把我们美国人烈士的鲜血放到什么地方呢？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照样得了大奖。

所以对战争的处理，有一个拉开距离的过程。《建国大业》比之前同类革命历史文学有突破，在商业上在宣传上也非常成功。可是从歌颂血腥到回避血腥再到正视血腥，影片处在第二阶段。不过，影片的重点不在战争，而在建国，朝代更替，胜败规律。

当然，谁都看到，官方导演召集，明星空前汇聚，是电影叫座的最重要原因。这是红色题材娱乐化的一个样板，在电影工业官商合作方面提供了新的经验。

明星 170 多个。几乎你能想到的大腕或新星或戏骨或花瓶，都时刻听从韩三平召唤，友情出演，不要片酬——从一个实例证明六十年后党的威望。

这个工作模式在江青和春晚以后是空前的。以后还会有模仿，但天才以后只是其他才了。

看看演员各有各精彩。冯小刚适合演一些特型人物，虽然实际的杜

月笙很书生气。许晴饰宋庆龄，神形皆似。唐国强在《长征》中演落拓毛泽东，在《延安》中演整张闻天的毛泽东，神情中颇有些复杂的内涵。这部电影，中规中矩，惯性认同。陈凯歌演冯玉祥，不错的客串。张国立的蒋介石，争议较大。张的形象比较机智、善良，有点喜剧，因此缺了蒋的威严部分。何亮亮最欣赏以前孙飞虎演的蒋，形神都似，也因为他是宁波人，蒋介石说的蓝青官话，当然就是。陈道明演蒋介石也符合我们理解的脸谱。陈坤，比蒋经国漂亮多了。蒋经国身上那种在苏联待了十几年，在大清洗环境里出来的，就是同样跟他老子很像的阴险的那一面，表现得不够。

但不管怎样，观众在同一个晚上，还能看到葛优、黎明、章子怡、成龙、赵薇……广东话说，就是一个字：“抵。”票房前三天就过了一亿。

革命与娱乐和金钱三结合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乐观起来。2009年上半年，国内累计电影票房23个亿，一说是十拿九稳的全年55个亿。然后韩三平就开始预言，说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可以达到每年300个亿。（2010年，已突破100亿。）

这个票房目标可能实现，但并不必然代表中国电影的繁荣。因为票房高不等于观众多，更不代表艺术成就高。中国电影的“好日子”是80年代，那时我们中国电影的票房有将近200亿，而票价都非常便宜，只有10块5块。那个时候看电影的人数，比现在多很多。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电影变质了，变成了一个奢侈的东西。外资拥有院线，官方调控映期，按本雅明的说法，艺术生产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于是现代音响数码技术便要求有“视觉盛宴”，为保证票房要请明星，要保障收回投资，大片在政治上首先要“保险”，不能有历史、文学、政治层面的挑战性，怎么“无极”都没关系，最重要票价要贵，80元，100元。可进电影院的人数呢？就算一年100个亿，以最便宜50元计，全国每10个人半年看一场电影。你和你的朋友看完《建国大业》走出影院，记住，另外20个中国人，包括你们自己，今年不能再看电影了！

官办商业化的持续,主旋律娱乐化会付出两个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明星商业成功和文学倒退。现在大片是一流的导演、演员,二流的技术设备,三流的文学本子。这个现象还会持续。第二个现象是,电影产业在中国的经济结构里,变成了一个奢侈品。中国的房价,是香港、美国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中国人的收入是人家的五分之一,中国只有什么东西比外国贵呢?一是LV、GUCCI那些进口货或进口车,第二就是电影票。中国电影票比美国还贵。最大众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却不怎么为人民服务。

当然,中国的电影资源是很丰富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眼前的例子,整部《建国大业》令我最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最后,当历史纪录片里边的毛泽东出现,下车走上天安门。这神采,这风度,这发型,令所有明星失色。于是突发奇想,盼望的是看到唐国强继续演下去。他现在五十六岁,要是他能够再演毛主席,再后面这些年的那些事情,那真是史诗,在庐山散步,在武昌游泳,那真是值得展现,惊心动魄……

(我最后的建议被采纳了一半,又有很多明星拍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不过不是往后拍大跃进、七千人大会,而是往前拍《建党大业》。)

2010年9月初稿,12月21日修改

谁没听到“集结号”

《集结号》这部电影，不但写了革命牺牲的伟大，还写了革命牺牲使人怀疑。就是说，看电影过程中人们都会问，这样的牺牲，值不值得？但是最后，影片又坚持说是值得的。于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冲击力。胡军那场戏，我觉得演得非常好。后来主人公要撞已故首长的碑，是和前面布置任务那场戏形成对照呼应。谷子地不单只是忠于组织上的命令，这里还有一个哥们儿的信任：既是“忠”，又是“义”。他们两个人是英雄团的幸存者，全团战死了，就剩他们两个人。所以当胡军扮演的领导许诺说，你们顶住，我们大队一撤，就吹集结号。这许诺是什么，就是一条烟，又是一个人心啊。所以主人公后来在墓地上哭的时候，哭什么——哭那个人心的不可信。这倒与同期故事新编剧《投名状》在主题上有一点儿相通。《投名状》的编剧之一须兰，在香港岭南大学读硕士时，论文写胡金铨和张彻的武侠电影。我也还算是她的指导老师之一。《投名状》里改头换面的太平天国背景倒没多少人注意，更令人感慨的还是，中国的兄弟人情的信的东西，在大的政治变动当中，显得多么地孤单无力。我看此片，无端地竟想起彭德怀大将军。

《集结号》其实有真实人事依据。有个纪录片《牺牲》走访了很多老兵，其中采访了山西太原的王艾甫，一个老兵。复员以后喜欢收藏，老逛旧货摊，在一个旧书摊上花钱买到了 70 多份淮海战役的烈士的阵亡通

知书。当年就没送到这些烈士家属的手里，从部队的档案馆里流失了。现在有人拿出来卖。王艾甫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到有关部门查证，说是真的。淮海战役、太原战役、什么战役、某某牺牲，多少岁。属实。于是他就踏上了这么一条路，把这些阵亡通知书送到家属手里。没有人管他，他自发的，自愿的。到目前为止，据说送出去 31 份。

这是“忠”，对革命尽职（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尽职呢？），但更是“义”，是对即便是不相识的战友的“信”与“义”。甚至在敌方，也有这种“义”。日本横滨大学教授铃木正夫多年寻找 1945 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暗杀郁达夫的日本宪兵，后来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遗族援户会会员名册》，即大战当中日本宪兵死亡以后（很多是战败投降时剖腹），他们的家属有一个联谊会。其中有个叫 Y 的宪兵，当年不愿自杀又怕暴露身份便下令杀死郁达夫。后来逃回日本后经商，或良心发现或逃避忏悔，便通过这“遗族援户会”帮助其他死亡宪兵的家人（没想到因此被揭发战争罪行）。

当然，纪录片《牺牲》中的解放军老兵传送迟到几十年的阵亡通知书，与日本宪兵战后帮助战友遗族，政治上毫无疑问不可同日而语。前者高尚情操，后者“罪行煎熬”，若有相通之处，只是都有对自己阵营的“忠”，不仅忠于组织，而且忠于同伴，不能忘却自己的同伴，于是也就近乎“义”。战争中，是非善恶真假都会扭曲变形，但仍有些精神原则交战双方可能都认同，比如狼牙山五壮士跳崖以后，据说日军将遗体找上来，列队致敬。

王艾甫送出了 30 多份阵亡通知，有一份送到烈士的女儿的手里，女儿已经 50 多岁。当年他爸爸走的时候，她才两三岁。其实早知道他是烈士，有记录的都是烈士。阵亡通知书更多只有感情价值。但问题是失踪的人是没有名，也找不到地方送。偏偏这些送不出的阵亡通知有实际意义——他们的家人可能永远不知道，或没法证明他们的亲人是烈士。

据说王艾甫送到内蒙古去的时候，当地民政部门觉得麻烦，不太愿

意管这事,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找什么麻烦。老头坚持说这是革命烈士,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对待,你们是不是能够帮忙解决一下。结果争执起来,还被人踢了两脚。老人很气愤,引起媒体呼吁。

想想真是,普通农夫战乱中被拉丁,上了前线可能在不同旗下出生入死,最后是国军,家属几十年倒霉,还不如不知道,算“失踪人口”。最后是解放军,阵亡收到通知是烈士,家属光荣,分地优先,老婆不能被欺负但也不大好改嫁。阵亡没收到通知,失踪人口,家属还怕找出来在敌营。在我方阵营中如志愿军被捕做过战俘,回乡后也有阴影。

张涵予来“锵锵三人行”说,刘恒编剧的原结尾,就停格在谷子地苦苦在荒野寻找战友遗体,某日村里孩童发现这疯老汉已冻死。华谊的投资人出于政治考虑才改成现在的光明尾巴,电影最后给牺牲了的这一队“失踪人员”举行了悲壮的葬礼。这部电影能上下叫好,同时取悦二老(老百姓、老干部),除了冯小刚拍战争场面震撼逼真等技术因素外,可能老百姓和老干部也可在影片中一起流眼泪各取所需。老干部们是为牺牲的壮烈,历经曲折伸张正义而感动,老百姓们,还有很多基层干部特别揪心的是“集结号”为什么始终没吹响。不仅仅是战争,从50、60或70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曾有肝胆相照、热血沸腾把一切献给党的青春时代,问题是,什么时候社会转型了?什么时候执政集团经商了?什么时候“辛辛苦苦干革命,一觉回到几十年前”了?转变没关系,与时俱进如能创造幸福是好事,只是转变时撤退时要用“集结号”叫我一声啊!否则你们倒顺利转型华丽变身了,我们这些坚守阵地的人一直没听到“集结号”啊,今天连个保障房都买不起啊!

一直没听到“集结号”,直到看这个电影,怎能叫人不流泪。

2010年10月5日

谢晋时代

谢晋导演去世，万人送别，很多是自发的群众。之前王元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也去了，那天正好在上海。王元化虽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但仪式不是官方举办的，没有人组织，没有人致悼词。群众都可以进去，只要依次排队，一排一排进去鞠躬，也有家人站在那里。花圈排列也不那么完全官本位。记得余英时的题辞挂在大厅入口显眼处。在人们心目中，王元化是个学者。同样道理，谢晋是个导演。

当然，国情制约，中国也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民间。悼念的群众很多是自己来的，但花圈摆放还是显示规格，党政最高领导都送了花圈。好多人很有感触，似乎谢晋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从最初《女篮5号》起，从谢晋身上能看出中国导演的某种命运。这一代艺术家必须跟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有合作、妥协、矛盾、周旋等种种关系。其实电影受过批判，要去参加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国际影片展，却被批鼓吹“锦标主义”，不够“友谊第一”。到了《红色娘子军》，上边审片的又说你要删掉一个眼神，吴琼花看着洪常清不可以含情脉脉。

样板戏后来全改成阶级感情战斗友谊了，电影《红色娘子军》里边其实有男女之间的感情戏。祝希娟和王心刚。谢晋的电影，拍一部戏就红一个女角。《女篮5号》是秦怡，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演员。后来还有陈冲、刘晓庆、丛珊等。

大约 1988 年，谢晋到香港宣传《芙蓉镇》，我跟他正好在广州至香港的直通车上同车厢，旁边还有姜文、刘晓庆。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主要是因为他的“谢晋模式”当时受批判。上海几个青年评论家，李劫，朱大可等，写文章讲“谢晋模式”，大概意思是谢晋电影用好莱坞的手法，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煽情赚人眼泪，形成了一个模式。评论家当时表示不满。在这些批评之后，出现了《黄土地》、《红高粱》这一批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反叛“谢晋模式”。时间上也对应贾平凹、阿城、韩少功等寻根文学对王蒙、张贤亮、刘宾雁一代“五七”作家的挑战。

当然，其实写文章的这些年轻人，当时也没怎么研究好莱坞模式的复杂性。甚至也没机会看多少好莱坞电影。多少也有点想跟有名的人挑战，以引起注意。记得当时刘晓波写文章跟李泽厚挑战，批评李泽厚是当代的“孔子”。我记得李泽厚跟我说这简直是最高的称赞。

但那天车上的谈话令我印象非常深，我完全没想到这个争论对谢晋刺激之大、反应之大。我本以为几个研究生的挑战，他完全可以淡然处之。那时候他如日中天，《高山下的花环》、《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全是主流，纷纷得奖，名符其实是大片，观众上座率也高，后来回想起来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可是他对那几个年轻人写的文章，非常激愤。跟我说他们懂什么好莱坞模式，讲了很多。我当时不大能够明白，几个年轻人在借你的名气，何必那么在乎？可是事后，不可思议，从那以后，谢晋就没拍出好片子。谢晋之前一部一部都是好片子。

从《女篮 5 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到后来《青春》，以及《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拍一部火一部。他在电影界的位子就像文学界的王蒙这样。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领风骚的作品，但也都被青年人挑战、挑剔、苛求、批评。批评在中国有时（尤其现场、短期效应）是与关注度成正比的。对这些批评，王蒙大致上比较宽容（不过从他后来三卷自传看，他也

不肯原谅对手,尤其是同年龄段的对手),谢晋却很激愤。我最近在想这是什么道理?在《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以后,谢晋晚期的几部,如《鸦片战争》,还有他想拍的没拍成的,总之都不理想。

当年朱大可他们对他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谢晋是80年代最典型的主流导演,比今天的张艺谋还主流。那时候由他来拍一部反思“文革”的电影,他觉得已经走到一个极限了。但对年轻人来说——每一个时代的年轻评论家都很激进,从他们角度来看,你这个算什么反省,你这个反省到了最后就是一个温情包装,这不彻底,这不叫批判。谢晋特别受不了这个刺激,因为他觉得已经走到最大限度。但他又很在乎年轻人的看法。

梁文道说在谢晋出殡前一天晚上,他跟贾樟柯聊天。贾樟柯说老爷子很有意思,前两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占满了票房,《三峡好人》上不了。谢晋自己到戏院买票去看《三峡好人》,说很喜欢。说着说着,谢晋居然开始骂起张艺谋,说张艺谋是我好朋友,说关系多好多好。然后说张以前电影很好,接着才是话锋一转,那现在怎么拍这个呢?这太不像话了。

其实当年谢晋电影,也是占满票房,还获得民众投票的“百花奖”。《芙蓉镇》曾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小说原作是古华,但是改编是阿城。谢晋特别选择跟年轻人合作,大概因钟惦斐的关系阿城和电影圈较熟,也由于当时寻根文学热,阿城也很红。两个人改编当中有很多精彩的细节,比方说男女主角爱情突破一场戏,小说里古华描写两个人夜里扫街遇狂风暴雨,俩人全淋湿了,逃到一个房间。湿衣服要脱掉,脱了衣服以后才想起对方都没穿衣服,然后就拥抱在一起,但是黑蒙蒙的,这怎么拍电影呢?而且也不符合国情。后来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是什么情况?刘晓庆生病了,姜文进来探望,刘晓庆给他一碗米豆腐,姜文低头吃米豆腐的时候刘晓庆深情望着他,这时候音乐声起,姜文手“啪”就拉过刘晓庆的手。所以就改成了老百姓比较能够接受的行为方式。中国人都得先有“吃”,才有“性”。

可是这个片子,当时一直通不过,直到胡耀邦总书记来拍板。

所以说谢晋也不容易,他代表中国某种主流导演。想表达一点东西,可必须考虑国情和政治。如果像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独立知识分子,自我清白,就无法合作,也不必妥协。或者,只跟欧洲电影节的评委们合作。

但是谢晋不是,他是尽量想办法。《芙蓉镇》试映后,领导人也看哭了,说太苦了,太惨了。争论最厉害的就是最后那个疯子那句话,“七、八年再来一次哦”就发疯了。这是毛泽东的话,“文革”七、八年还要来一次,他发疯的时候最后像念咒一样的这句,“七、八年再来一次”,作为电影的一个尾声,给大家一个警告,“文革”的幽灵始终在盘旋。就是这么一个尾巴引起很大的争议。

谢晋说过,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一个人去了,甚至是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百年之后,或许人们会记得,这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人物,每一部作品都是刻着那个时代。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说将来在电影史上,他的作品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不会多,因为他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只尽力去实现某种中庸,实现某种妥协。

这是一个选择。文道说在中国写时事评论,锋利透彻,没法跟同期国外一流的时事评论相比。因为我们要花掉差不多一半的精力、时间、心思去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条件,很多话得说得有技巧,得拐个弯讲,你怎么去表达?一门心思都耗在这儿。这是不是一个悲剧呢?电影导演、艺术家也是这样。有的人可能就只拿出去参加影展。

我过去也觉得花费心力应对特殊时代条件,是浪费或损害了艺术。现在看法有点变化。曲里拐弯处理政治,也是艺术。从前以为鲁迅后期杂文浪费了天才,现在觉得这些杂文很有价值。同样道理,与谢晋同车谈话时也有些不满他的电影煽情,现在回想才意识到 80 年代“谢晋模式”的重要意义。

《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这样的电影,是受时代制约,可是也印刻了

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很多大片，这些大片也受时代制约，却根本不印刻今天的时代。

谢晋电影刻下什么时代印记？《人民日报》的评论说谢晋继承发扬了一种传统，一种将伦理喻示、人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的政治伦理情节剧。这种政治伦理情节剧，我们当时很不满。《牧马人》有句台词，朱时茂跟丛珊，睡在那张床上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历史上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的比附是何时开始的，值得讨论。据说是刘向在《汉书》里写《苏武传》，才说“臣侍君有如子侍父，虽死无恨”。孔子和孟子都不是这样说的。孔子虽然要你君君臣臣，可是还有一个说法，你君要是不听我，我臣可以走，你还得欢送我。从没说君就是你爹。孟子更厉害了，说你君要是把我臣当“草鸡”，我就把你当“寇”，是可以革命的。

把父子比作君臣，这个语法象征关系延续了数千年。可谢晋了不起，他这个戏把父子关系悄悄改成母子关系。“子不嫌母丑”——从忠君变成忠国家，混淆国和家。而且创造性地把忠孝对立的观念在新时期演化成忠孝合一。这的确反映了“文革”以后官方与老百姓之间的情理契合点：官方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要寻找新的感情支柱和理想支柱。所以，有时代的制约，也有它时代的特点，非常值得总结。

谢晋矛盾的地方就在这儿，他虽然会被官方批判，有时候会有争议，但事后看来，他绝大部分的作品其实都是主旋律。

由此可见，真正的主旋律，不是规划指点出来的，而是斗争与妥协出来的。

2010年10月6日

大话《赤壁》

2008年7月16日,和文涛、查建英聊吴宇森电影《赤壁》,据说首日票房2700多万,破纪录。问到好不好看,我的意见是比《无极》好。说实在,我喜欢陈凯歌的很多电影,《黄土地》、《霸王别姬》,甚至《梅兰芳》。只是这《无极》,我当时的一句话曾在网上流传:看了张柏芝,才知章子怡是个演员(此事很早,和艳照门没有关系。照片一事我倒同情张)。同理,《无极》之后,什么电影都好看了。

《赤壁》也是电脑版的“三国”。第一直觉感受,电脑处理很叫人倒胃口,那些船拍得很假。《特洛伊》拍海上的船,从一只,几只,拉开镜头到无数只。后来人家说对该片的差评,也像电脑船阵一样,一篇,几篇,然后无数篇……如果说《特洛伊》是将假的拍得真的一样,那《满城尽带黄金甲》就是将真的拍得像假的一样。张艺谋玩广场动兵人海战术,出动很多军人,当时还以为有什么政治影射,后来才知是争取奥运开幕式导演的样片。《赤壁》不仅画面非常电脑化,音乐也比较电脑化。(记得吗?鸽子飞过长江,进入曹营水军上空……)现在动漫效果已经深深影响了下一代的视觉习惯乃至心理。有次碰到导演张建亚,讲他小孩儿作文,那个造句是“军号一响,战士们像什么什么冲了出去”。像什么,他小孩儿答,“战士们像蚂蚁一样冲了出去”。老师恼了。据说最差答案是“战士们像苍蝇一样冲了出去”,标准答案是,“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当

导演的老爸倒理解这比喻：“这是从空中看下去的航拍效果。”

《赤壁》剧本当然是有意改变《三国演义》的模式。尤其是借东风，非常颠覆。颠覆的原因和香港文学的“故事新编”传统有关。在导演吴宇森以外，《赤壁》主要编剧叫陈汗，写小说的，比较年轻。最近一次香港的文学双年奖，我是评委，莫言也是评委，他的小说集得了奖，写男女情欲，构思反叛，文字也流丽。

什么是“故事新编”的传统？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等人古为今用的历史剧、历史小说不同。后者有个模仿历史的外貌，让普通读者观众相信是过去的事，然后渗入当代人的看法（常常是领袖的看法，有时也可能成为领袖不喜欢的看法）。《李自成》、《蔡文姬》、《海瑞罢官》、《雍正王朝》皆如此。而鲁迅写《铸剑》等，却根本无意伪造重建历史外貌，而是布莱希特式的故意抽离，如在古神话里讽刺顾颉刚等。李碧华写《白蛇传》，沿用此“新编”法。法海是同性恋，小青爱上了许仙。刘以鬯的《寺内》，写张生爱上红娘。更不必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陈汗后来回答质疑的影评，说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赤壁之战也没法考证。香港在中国文化的边缘，所以对于名著的改编没有那么多的历史负担，目的就是要让当代青年感到新鲜。

《赤壁》开始是大陆的编剧，但吴宇森不满意，他很晚才请了陈汗。内地编剧的想法，历史演义要拍一个正剧。主要人物造型，牵涉国人集体想象甚至文化积淀，不宜“大话”。而吴宇森想的是大制作，全球票房，他在好莱坞这么多年。英文字幕，刘备叫“反叛者”，他的对手被称作“帝国”。这像“星球大战”，海外市场趣味。最后周瑜、关公、曹操等主角居然刀枪直接相对，且有女人（林志玲）在旁，这又是007或其他西方武打片最后决战的必备模式——正角一号和反派一号，再混战也会相遇。二号则找到反派配角。且主角决战必有女人旁观。西方人大概觉得男人再英雄，没有性感美丽女人现场看着便不算英雄。结果，周、关、曹、刘还有小乔面对面打斗，中国人“晕”，美联社评价很好。

《三国演义》里面，曹操是个奸雄，可张丰毅长这么正。金城武，靓仔，从头到尾没觉得是诸葛亮。查建英说，梁朝伟我就没法分析，他眼睛一发光你还想别的？

以前传统京剧，角儿决定一切，大牌上来演谁，这个戏就跟着他转。本来由周润发演周瑜，梁朝伟扮诸葛亮。周润发不演了，梁朝伟重新回来演周瑜，周瑜就盖过诸葛亮了。三国经过演义和各种折子戏，瑜亮情结始终是中心矛盾之一。又要共同作战，又有才能嫉妒。现在梁朝伟金城武这么一站，瑜亮没矛盾了，非常兄弟情，而且还互相凝视脉脉含情……

吴宇森看《三国志》，认为周瑜是好人，也不嫉妒诸葛亮。中国人“少不看‘西游’，老不看‘三国’”，导演要把勾心斗角改成“英雄本色”。

有些细节改得也有依据。比方说我们从小看戏，赵子龙是英俊小生，诸葛亮很长的胡子。后来看史书才知道，赵子龙那个时候 40 多岁，诸葛亮 20 多岁。现在电影里诸葛亮年轻了，赵子龙中年，孙权也年轻了。曹操奸雄，是《三国演义》赋予他的，变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三国演义》是明代的小说，距离《三国志》一千多年。所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常常靠文学多于靠历史。

文戏虽弱，武戏倒有很多创造。盔甲、战马、八卦阵、乌龟壳，有的很动漫。但更多笑场还是场面与对话。如马驹那一段，林志玲基本上是广告形象。等到赵薇出现，才发现编导原来是意在“搞笑”（“搞笑”是近年成功“北伐”的粤语流行语之一，颇能概括《赤壁》特色）。网民总结了 8 个笑点。现在笑场是大片悲剧的必备效果。

这个片子在中国影院放映，基本上所有其它戏都让路，都没的竞争。这种大片文化的生产机制，是中国目前官商合作京港勾结的一个缩影。主要的大片，主旋律或商业片甚至文艺片韩三平都是监制，应该不是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是中国电影公司的董事长，官方代表。一流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纷纷下海，两岸三地来来去去十几个明星歌星丑星推

在前台轮流上阵，媒体忽悠大众自己也被忽悠，百姓要付比美国香港更贵的票价入影院，看了骂骂了还看边看边骂，其实大片的制作人，是北京官方和香港资本（杨受成、江志强、成龙等）的一国两制合作典范：香港商人大都拥有大陆的电影院线，中国电影公司则操控上画映期。

大片现象，《赤壁》只是其中并不算太差的一例。

关公念《论语》，对孩子说“好好读书，将来有饭吃”。战场上在喊：冲啊，冲啊，给我顶住——这是八路军啊。曹操对林志玲一甩手：“别闹！”我想林应该扭扭捏捏回一句：“讨厌——”

2010年11月1日修改

关于《色,戒》:从小说到电影

一、小资,是对张爱玲的误读

说起张爱玲,很多人都会将她视作上海小资女人的标志。她笔下的不少人物也成为小资做派的典型。

这说明在今天,我们对“小资”这个词充满了误读,忘了“小资”本是五星红旗中的一颗星。国旗上的四颗小星,原意是工人、农民、军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按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贫下中农属于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初也是主张文艺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毛泽东补充一句“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以后,渐渐地除了“首先”,就没有其他了。张爱玲对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多有辩护。其实,写山河风云也可以是小作家,写小资身体也可以是大作家。大作家分两种:一种走在大众前面,表达时代声音,比如鲁迅、巴金;还有一种往往反潮流而行,终其一生都被大众误解,比如张爱玲、沈从文。把张爱玲作为小资的符号是商业化潮流炒作的结果。尤其在上海,市场上捧她的人或“学界”贬她的人,往往都只见其华丽不识其苍凉。

《色,戒》的小说原作里写的是一批“小资”学生,谋划刺杀汉奸的故事。很多人认为,《色,戒》是写一个年轻女人爱上一个坏男人,拍成电

影,里面有帅哥美女,有情欲镜头,应该是很好看的。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解读《色,戒》,无疑是肤浅的。张爱玲的伟大,体现在这个小说里,就是她对女性灵肉的解剖,与对集体主义革命行动的解构同步互置。张爱玲将革命的浪漫主义表现得既合理,又荒唐——年轻的学生用行动模仿话剧,出于爱国热情,想暗杀汉奸,于是设下美人计。作为诱饵的王佳芝,还是处女,所以先要请男同学教她性经验。这些情节细细品来,既荒唐,又庄严。(该男同学穿的岭南大学的背心,我现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电影放映时令我们大学的同学又骄傲又羞愧。历史背景是抗战期间岭南大学确实从广州转到港大。)而最后,王佳芝竟然爱上了那个汉奸,更写出组织、运动、英勇、纪律后面的真正的残酷。对现代文学中已有的男女情爱格式和革命叙述模式都是一种颠覆。

就算王佳芝最后没有成为“叛徒”暗杀成功也没有牺牲,今后几十年各种运动她又怎么说得清楚这段“床戏”?看看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也是一部可改编电影的佳作,很奇怪至今仍无导演发现),或可理解这两位女作家对女性身体在男性中心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功能命运的不同又相通的深刻观察。

张爱玲笔下的《色,戒》,在李安的镜头里表达得非常充分。上影集团大胆投资,没有充分估计此片政治主题的挑战性。比起周润发主演的《倾城之恋》、关锦鹏十分文字化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许鞍华把电影改得比小说还好的《半生缘》,《色,戒》是迄今为止张爱玲小说改编最成功的一次。把一群“小资”的革命生活拍得如此轰轰烈烈、温柔暴力,是李安为中国的中年导演们上了一课,比《卧虎藏龙》更有意义的一课。我在另一个地方也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李安把中国很多导演“带坏了”。因为《卧虎藏龙》重组中国文化符号与好莱坞技术口味,既得奥斯卡奖又有商业成功,从此不少中国艺术导演得到启发(就像作家受到《百年孤独》获奖的启发一样),也都不再寻根反思批判探讨,而走与京官港商合作搞豪华卡司视听盛宴道路。下面片名要连读:《英雄》力量《无极》,却

遭《十面埋伏》，赴《夜宴》只见烟花璀璨《满城尽带黄金甲》……结果因为不如李安的好莱坞经验，出口夺奖均很不利，内销笑场却都成功。但这一次《色，戒》，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应该不希望李安的文学深度、床戏和政治挑战程度又被不断模仿。所以，我们看到，汤唯的广告被停了（同样裸体，梁朝伟没事。令我想起阿 Q 哪个男的都打不过，唯有捏小尼姑的脸）。奥运闭幕式也没让李安参与（据说李安有投标），有点可惜。

原载《新民晚报》2007 年 10 月 27 日

二、从《色，戒》到“戒色”

《色，戒》作为电影，挺成功。有一度大家见面，不说你吃了吗？都说你《色，戒》了吗？你戒色了吗？在香港，每个星期话题都不一样。第一个礼拜，他们是不是真干；第二个礼拜，看梁朝伟的蛋蛋；第三个礼拜，老翁少妻，少妻要求模仿《色，戒》，结果把老翁腰也给闪了，自尊心也摧残了，老翁第二天来自卑了。……然后，心理学家、医生说《色，戒》里面的姿势，那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普通家庭观众不要模仿。

但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而且挺猛：“中国依然站着，中国依然跪”。有文章骂《色，戒》汉奸，甚至有些大学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于幼军先生联名上书，要求严打《色，戒》汉奸文艺。

有人觉得这是“文革”语言的讨伐，把对方当作异类严打，而且借用体制的权力。本来尊严这么强，怎么又这么脆弱？我们文化有这么脆弱吗？既然说，已经崛起了，这么强大了，难道一个电影就给瓦解了？

不过我倒很理解这些批判的声音。我看这个电影，直到最后他们在刑场要被枪毙那个时候，借用了小说里的一句话，我心中轰然一响：这不是叛徒嘛！前面我已经被李安带着进戏了，认同了，我觉得女主角做那些事情合情合理。张爱玲常常能够做到让你合情合理地进到一个荒谬的境地，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每一步，进姑妈大宅，试很多衣服，男

人送首饰……你都觉得是合理的，怎么突然变成最后要为姑妈找男人为男人找钱？所以到电影最后，当王佳芝临死跪在那里时，面对王力宏，面对旁边的同志——你可真的是出卖了同志，你背叛了革命！李安冷静地坚持了张爱玲的冷酷，写叛变，也写叛变的可怕后果。这使我想起威尼斯奖有个评委是拍《本能》的导演，前两年又导了部片子《BLACK-BOOK》，《黑名单》，讲一个犹太女人目睹全家被德国人杀掉，然后她就做间谍，色诱一个德国军官。她到了房间，德国军官睡在床上，没穿衣服，只盖着被子。然后，她不断地脱衣服。就像《本能》里一样，不停地慢慢地脱衣服，一件，一件……只见军官被子上，一个东西跷了起来。那个女的温柔地扑过去，没想到是一把枪！原来德国军官已经识破，然后要惩罚。女人说，你可以打死我，但先做一次吧。结果德国军官做完后就心软了。

这是顺从观众心愿，主角色诱成功。这位导演后来看到李安冷酷的结尾，他恐怕得佩服。这也是张爱玲的原意，色诱因钻石及性而动摇，革命因爱情与欲而失败……最后大家都看到：现在中国跑得最快的不是刘翔，而是梁朝伟。

李安这个戏其实是拍他自己，有人说是拍他对自己父亲的理解。张爱玲更冷，李安拍得比较暖。刻划男主角易先生，第一，没有拍他刑讯、拷问别人的任何镜头——只要有这种镜头出来，人们就不会同情他了。影片里他气喘吁吁地回来，说他今天审了几个人。只要把他审别人的镜头拿出来，汤唯就没法爱上他了。第二，找的是梁朝伟，而不是葛优。原文说易先生是有点鼠相。找梁朝伟就改变了这个戏。

有人八卦说张爱玲忌妒那个女特务或者说是女英雄郑萍如，长得漂亮，上过良友杂志封面。同一部电影，也是什么人有什么联想：据美风评《色，戒》，说李安想上汤唯，不好意思，借梁朝伟来的。

很多正宗“张迷”却不满李安的改编。最关键一场，女人动摇了，头上轰然一响，就在她以为男人真的爱她（其实是她爱上男人）的那个瞬

间，张爱玲小说同时冷冷交待男人的心理：给欢场女子买东西，是正常的事情，但不能买得太早，买得太早还看不起人家……换言之，这个男人他根本没有，从来都没有爱上过女主角。

可是在李安那里，一首《天涯歌女》，听得梁朝伟感动，我们也感动。片尾还坐在女人床上眼含泪水。在张爱玲那里，是继续打牌接着谈论窗帘颜色。当然虽是暖化，暖中还是冷。情色热火后面是历史的残酷。想不通汤唯为了行刺，还要跟那岭大男生先睡一晚。到上海执行起任务来，心里觉得有了目标，要不然当时初夜，岂不白睡。也就是说，她的身体已经献给革命了，这个身体就不是私人的了。后来执行任务时突然发现，这身体怎么变成私人姓了——那些床戏，动摇了她。为革命牺牲，牺牲女人的身体。所以电影中三次不同的性爱场面，从受虐到角力到享受，都不可删节。如果没有这些情欲戏，女主角最后的动摇就好像只是为了“钻石”。这样电影名称就不应是《色，戒》，而是《钻，戒》了。

2010年9月9日修改

电影中的政治学

美国电影是娱乐工业，奥斯卡提名却颇讲政治，第 81 界竞逐“最佳影片”的五部片子：《米尔克》讲同性恋的政治运动，《对话尼克松》描写电视干预政治和领袖忏悔，除《返老还童》讲爱情以外，《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也写贫富悬殊。

《生死朗读》一大堆床戏，香港译成《读爱》（与“做爱”对应），颇传神。但其实是写奥斯维辛——一个欧美人写不厌、看不厌的题目。最后，犹太人的子孙不接受德国女人的捐款，却留下捐款盒子，很微妙的处理。

表面上没有电影直接反映民主党奥巴马的胜利，其实对比以前《阿甘正传》等保守意识形态，这一次集中反省历史是和自由的意识形态风气有关。几部电影连着看，一连串都是喇叭裤，长头发大鬓角，恍惚回到那个时代。

在北京和朋友聊天，男人三四十岁以后最多话题就是政治。但《梅兰芳》、《叶问》里的政治，公式为爱国主义。

我说我曾设想一部电影，写一个厨师在庐山上某宾馆工作，1959 年二十多岁刚学掌厨，1971 年四十多岁负责餐饮部。中间还有恋爱故事。在一次和作家聚餐时，我说这个构思能拍吗？王安忆、陈丹燕等几个知名作家马上嚷着说不行。

要拍就只能拍《庐山恋》。她们说。

1959 年和 1971 年的事，党史已有定论，为什么还这么敏感？写彭德怀饮酒林彪吃夜宵也不行？为什么文学界也不问怎么写，大家就本能地躲开？

中国电影在“娱乐”功能方面似乎已超过好莱坞。

我只是对那一瞬间作家们的反应感兴趣。这些都是我所尊敬的出色的作家。

数月后和王蒙闲谈起这事，他说你写呀。无言以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原载《南方周末》2009 年 4 月 1 日

我看《赵氏孤儿》

12月4日公映当日就看了《赵氏孤儿》，进影院之前也没有看过评论。

电影不闷，在陈凯歌那里属中上水平，虽没达到《霸王别姬》的成就，却已走出《无极》的阴影。

葛优表演中规中矩，后半段化妆太老。想当年京戏里是马连良唱的程婴，就可知道这个角色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范冰冰在一线女星中并不以演技见长，但绝艳古装扮相使人不太计较她的表演。相比之下，海清太“现代”，不太适合传统戏。两代曹操均甘做配角。戏最好的还是屠岸贾，只是演员太出色，有点美化(或复杂化)了这个反派。

戏中骑兵打仗一段，场面精彩，却是失误。学术界关于西汉有没有马鞍和马镫一直有争议，最早的出土实证是东汉末年雷台汉墓的骑俑。从文献看汉代骑兵已很重要。但秦以前，兵马俑没有可供实战的“高靳马鞍”，孙臆描述骑兵，只是辅助任务，侦察传令骚扰等。常常骑马到战地，再步行而战。换言之，在《赵氏孤儿》故事背景的晋国，应无骑兵大规模作战的可能。（后来罗马人看到匈奴的马鞍马镫，完全当作“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故有人说马镫创造了骑士，改变了欧洲的中世纪。）

现在电影这样拍骑兵在春秋打仗，好看是好看，却无历史感。若一般商业片也罢，既是凯歌的片子，所以提出来讨论。

从《史记·赵世家》到纪君祥元剧《冤报冤赵氏孤儿》，最大改编是把山中藏孤改为仇人面前养大小孩，核心都是忠奸恩仇报应。人们还记得《海瑞罢官》当年怎样被批判，今天《赵氏孤儿》这样也可能有影射联想的古装戏能重演，说明时代真是开明、进步了。

原载《羊城晚报》2010年12月12日

后现代情色暴力版唱红打黑

《让子弹飞》结尾时，周润发和姜文并排坐在两把椅子上，两个角色有一段看似平静的对话，周围是民众在攻占碉堡，抢夺浮财，枪炮硝烟欢呼声混成一片。

黄四郎：真服了你，这种文艺腔的荒诞政治寓言戏，在海外玩得最好如塔伦天奴，也只是小众热闹，在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票房？

张麻子：关键是弗洛伊德说的，白日梦就是众人潜意识欲望，骗过安检机制。另外再有你们几张脸……

黄四郎：《无耻混蛋》里的军官表演虽夸张，但纳粹杀犹的戏剧张力是实在的。不像我们，动作恶搞，情绪也夸张……

张麻子：可收租交税提前了几十年之类，人们可以想到房产权等，这种怨官仇富又盼清官救星的情绪也是实在的。

黄四郎：周星驰的夸张是无处不在，连自己也讽刺。可你的子弹乱飞，众人恶搞，主角却英雄浪漫，你不觉得“霸气外露”，有些自恋吗？

张麻子：观众就服“霸气”。要观众入场，要么让他们感动、流泪，这是求他们入场；要么让他们崇拜，被吓着了也行。群众嘛，“谁赢就帮谁”，谁牛 B 就买谁的票……瞧，老百姓这不又来抢椅子（戏票）了。

黄四郎：他们不管细节吗？二爷不是喜欢那妓女吗？怎么又说自己是同性恋？你现在把有一粒子弹的枪交给我，不怕我打你吗？

张麻子：观众和群众一样，被气势压倒，不在乎细节，还有那么多涂了粉的打鼓宣传。再说，你是周润发，“英雄本色”嘛。

黄四郎：你我皆匪气，为什么你在山里就为民救民，我说几句洋文就害民坑民？这样的历史二分法是否太简单？

张麻子：香港同胞，不懂国情。这才是我们革命的秘诀，实践证明，大家喜欢后现代情色暴力版的唱红打黑。

黄四郎：噢，难怪电影结尾的音乐，又是“太阳照样升起……”

原载《羊城晚报》2011年1月2日

分红,买楼,做梦

刚看完新版《红楼梦》，竟是喜欢。

很久没看连续剧了。曾看了几集新“三国”，以为不错。后一想，全部看完等于看三周世界杯。于是看世界杯。

但“红楼”不同，喜欢的理由如下：

一、二百年前的白话出现于今日电视画面，陌生化：才刚、再回、习学、大好……借用顾城的话，当今汉语，犹如用脏了的人民币，我要将它洗一洗。

二、务必看高清方好，虽然靓仔靓妹青春痘隐约可见。在卧室书房梳“铜钱头”有些夸张，但效果悦目。衣服据说贵了些，至少钱花得看得见。不像某些捐款基金……

三、音乐很现代，钢琴加笙箫及咏叹调和敲打乐与昆曲多层次，颇费苦心。唯不合越剧红迷追黛迷钗的传统戏剧口味。

不喜欢的地方也有：

一、电脑外景太假，何必要将大观园画得超过中南海？技术要做到看不见，方好。

二、快进画面受不了。

三、后面的宝玉缺灵气。真正考究的做法，是等小宝玉长大，过几

年再拍下半部。小宝钗印象深刻。周采芹、许还山好戏之人。黛玉临终“马拉之死”太花俏，难进入。反而是最后归亚蕾（王夫人）突然跪倒在刘姥姥面前，令我几乎流泪…

女人活在那时，主要工作就是对付其他女人。男人何尝不是。能花心意在异性身上，就是另类。小时候看“红楼”，不喜欢贾母、袭人，这次印象不同了。不知是改编效果，抑或自己变混浊了。

现在的批评，雅者嫌其俗，文人挑剔不满；俗者嫌其雅，百姓恶搞成风。见有博客选在新浪首页，洋洋洒洒几千字批评，却说只看过半集。

以昔日《红楼梦》要求，诚然不够；用今时中国电视作背景，浊世清流。

我等皆为“浊世”之人，每天忙碌也为了：分红，买楼，还做梦。

重回电影院

在2005年2月22日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我曾和北京电影学院的苏牧教授一起议论中国的电影票房,引起网上强烈反响。当时我大致说,在报上见到中国电影2004年票房达14亿,我也不禁跟着友人一起庆祝“辉煌”。但扳指细算,发现13亿人人均才1元几分。你我要是去年看过一场50元的电影,另外100个人就和影院无缘了。难道百分之九十八(保守一点:百分之九十五)的国人去年就一次也没进过电影院?

有个解释是电视发展导致电影低迷,我以为不通。比如人称“文化沙漠”的特区香港,七百万人口,电视也发达,大气频道四个,有线台上百,但大小影厅仍有二三百家,总的票房前些年还高过整个中国大陆。其它发达地区和国家也是电视频道众多但人们依然经常入影院,原来除了看片环境、新片选择和社交氛围以外,更重要的是电影票的单价普通人可以承受。香港一般50—70港币,美加欧洲7—10美元,特定日子和时段均有减价。而中国内地城市现在新影院的票价也在50—70元人民币左右。在工农商科各个领域,中国的电影票价率先与国际接轨甚至超越国际水平。其结果是香港欧美一张电影票大概是普通百姓月薪的0.5%;在北京上海一张电影票等于百姓平均月薪的3%—5%!

另一个解释是国情不同不宜横向比较,纵向看才能看出变化与成

就。但我记得儿时看《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票价也是2—3毛钱,也只占当时很低工资的0.5%。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在操场看的免费电影。读了很多凤凰网论坛上网友来信,知道这也不仅是我的个人记忆。

在80年代以前,中国是电影大国,观众几十亿,票房上百亿,为什么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空前繁荣,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却反而一直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呢?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

从电影产业角度看,高票价少观众等于“釜底抽薪”。中国有很多出色的努力的导演、演员,但不能只靠政府出资拍戏探索。没有大众票房保证谁愿投资?有人建议设立基金会(不一定是国家设基金)每年资助100位年轻导演拍戏,构思很好,若实施几年中国电影一定柳暗花明。但如果这每年百部新片大部分都无法通过影院平台与大众见面,成功与否只靠评奖甚至领导判断,是否合理?事实上,现在很多金鸡奖获奖片或名导演佳作在影院也不易看到。弄到国产片都要外国资金才能开工,电影工作者心里并不好受。

从法律角度看,普通人没有能力入影院,盗版便成为“合情合理”的违法行为。比侵犯知识产权更深层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可以公开违法而很少机会受罚,隐含的法治及社会心理危机不言而喻。票价立刻“接轨”同时意味法制层面更加“脱轨”。

从政治正确的角度看,电影是最应该“以民为本”的文化事业。高票价将大多数民众排斥在电影院之外,只会加剧文化生活中的贫富不均现象,不利于社会和谐。

总之,我以为在电影人、影院和观众这三个电影产业的主要环节上,影院现在是比较弱比较有问题的一环。

但如何才能让大众重回电影院呢?当然我想:第一,老百姓不应回到旧的礼堂、操场,要建大量一院多厅的空调立体声现代影院;第二,影

院内国产片、进口片甚至探索片都要有适当比例；第三，最重要的是票价按时段、片种可有弹性，最高不应超过当地人均月收入的百分之一。

问题是，这样的“大众影院”谁来建造？除了国家投资外，我在想能否作为“卖地”发展大型房产和商场的附加合约条件，请那些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的或国或民或中或外的地产开发商，在改变城市地貌的赚钱过程中也给大众留一些“精神绿地”。另外，全国的重点大学是否也可自办或合办小型艺术影院？比如北大复旦等名校自设艺术影院，结合校内人文课程，渐渐地，看老片看前卫片会成为大学生“时尚”，而不必只跟着少数几部“新世纪的样板戏”转，也不一定会亏本。在巴黎拉丁区老索邦大学旁边、在洛杉矶 UCLA 附近，我都去过类似小众影院，系列放某国某时期或某导演电影。在一个沙龙上和吴思远导演谈过这个话题（他自己在内地经营票价很贵的院线，他说他也有过艺术影院的构思，问题是审批环节）。

艺术型的“小众影院”和平价“大众影院”大量出现以后，现有影院是否也会调整票价呢？整个中国电影生态是否也会发生些变化呢？

我知道在巨大利益关系前，我的期望有些天真。

但还是要恕我直言：过去 20 年，中国在很多方面变好了，但电影没有。

补记：《重回电影院》是我在 2005 年写的一篇短文，发表在《羊城晚报》上，写作的起因是因为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和北京电影学院的苏牧教授有一番争议。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有关电影的评论文章，只是一直喜欢看电影，普通观众。那天苏教授说当年全国电影票房达 14 亿，值得庆贺。我一听就头晕：全国每年每人花一元钱，平均几十人才看一场电影，这还值得庆祝？于是我在看电影的同时，开始注意中国电影工业和影院商业政治的现状与历史，于是就有了上面这十来篇和电影有关的文章。

转眼 6 年过去了,中国的票房据说每年已有一百多亿,当然更加值得庆贺了。不过比起 80 年代,观众人数还是减少了几十倍。中国的电影票价还是和进口奢侈品一样,全球最贵。

所以,上面这篇《重回电影院》,一字不必修改,可以重读。

第四辑：情色男女

男人的两个梦

近日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听说很多争议，我也有点联想。

男人可能有意无意幻想自己是宝玉。但如果不想做宝玉，又能做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女人可以在黛玉、宝钗之间作选择，两个女人是两个极端。伤感、多情、委屈、孤傲、受人宠爱或被人冷落时可以自觉是黛玉；明理、柔情、智慧、妥协、操控场面以柔克刚时可以设想是宝钗。当代女性纯林纯薛都很难，但闭起眼睛我就能想起认识的女性朋友、同事等，谁是黛玉型，谁是宝钗类。多数是在公司单位学校做知书达理顾全大局善良敦厚的宝钗，回到情人老公家庭面前是清纯高傲多泪善感的黛玉。如果倒转过来，那就在外面一碰就哭，回家充满计谋，掌握权力……

男人就麻烦了。在《红楼梦》里好像只能代入宝玉做白日梦，否则怎么办？像薛蟠般蠢？如贾环般坏？似贾政般迂？同贾琏样轻？更不必提花痴贾瑞、癫汉焦大……

可常识告诉我们，不能人人都做贾宝玉。大观园里只此一位，现实社会上更难模仿。女人千般美丽，百种风情，何以男人只有一个白日梦呢？

屠格涅夫有文《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认为是男人（man，其实泛指人类）的两个性格类型：一沉思一冲动，一细密一豪爽，一多情一侠义，

一忧郁一热忱……“哈姆雷特是分析辩证与为我主义(Egoismus)与信念的狐疑(Unglauben)。”而堂·吉诃德,虽然滑稽可笑,却是“理想的忠仆,是一位大热情家”。“我觉得人性的根本相反的两种特性——人生所依的那枝中轴的两极端——的典型,就存在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我觉得人类大抵是或者属于这一种或者属于那一种典型的,我们中间的差不多无论哪一个,我以为都是或近似于堂·吉诃德或近似于哈姆雷特的。”(屠格涅夫 1860 年 1 月 10 日为援助贫文士和学者协会而作的公开讲演,郁达夫译,载 1928 年 6 月 20 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

难道在中国男人的梦中,在中国文学中,就没有这样两个互相对冲的性格类型吗?

跳出《红楼梦》想想,孙悟空是个重要形象,孙悟空 VS 贾宝玉? 不对,它是猴不说,有乱子专靠后台,勇气有余力量不足,一有事就找观音菩萨帮忙,回到花果山自我感觉良好——悟空原是宝玉一路。武松是个男人,勇武、不近色,不像宝玉。但武松形象相对来说太平面了,没有心理矛盾,可佩服却难代入。有多少男人会弃宝玉梦见武松? 关公? 近于神。可以崇拜,也难模仿。诸葛亮? 根本不知他见女人什么感觉,以及脑子怎么运作。有谁言行自觉是诸葛亮?

现代文学中也有觉新与觉慧两个类型,或妥协委屈但敢于承担,或热血冲动只追求浪漫。很多同学上课会讨论自己大家庭里的处境,觉得自己更像觉新或觉慧。怎么在更广阔背景上,中国男人的偶像只有宝玉?

忽然,想到了曹操。

宝玉或曹操,男人的两极。

或多情、清纯、敏感、忧郁、温柔、万千宠爱在一身,或勇敢、复杂、果断、谋略、冷酷、杀出一条自己的路。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或宁可天下人(尤其是女人)负我,不让我负天下人(女人)。

做宝玉的先决条件是上面有人。在你认识的社会关系网中地位比

较高的人是宠爱、信任你的。宝玉尽可以追求情色唯美为人生目的，其实前提是他早已拥有政治经济条件。

如果一个男人，从小到大，没有或并不觉得上面有人在宠爱、袒护、帮助你，既非高干子弟又不是富二代，而你又自觉才能过人有些野心，你就有意无意要学习曹操的生存技巧奋斗勇气了，你必须要有计谋、有手腕、有涵养。不顺利出了事，也只能靠自己（其实史上的曹操，也有些靠父亲。相对宝玉而言当然是算靠打拼了）。善用其他人而不是爱其他人。这时情色自然不重要，只是战利品。政治才是一切。

一样道理，在外难免做曹操，回家最好是宝玉。倒过来有些可怕：在外面做“女人汤团”，全方位艳福，回家对自己人是个弄权术的奸雄？

宝玉这样纯洁的花心大少，在西方文学中很少成为超级经典、大众偶像。唐璜？于连？拜伦比较勇敢，于连爬女人窗台，有点争夺社会地位的功利心。当代花花公子如早期 007 则必须武艺高强胆识过人英雄本色，不能只吃口红显示浪漫。更理想的文化工业英雄则是超人、蜘蛛侠类，不仅功夫了得，还要爱情专一，近于武松郭靖一路，文学性就弱了。

宝玉和曹操是两种极端因素，其组合关系也千差万别。阿 Q 的材料，出身低贱，却靠自己力量，以曹操手段达至宝玉梦境的，是男人羡慕女人喜欢的韦小宝。现实之中，从青年到老年都喜欢《红楼梦》后来又一想为曹操翻案的，是领导人民改写历史的毛泽东。

宝玉或曹操，男人都在这两个梦想之中彷徨——你是宝玉，还是曹操？

原载《羊城晚报》2010 年 9 月 19 日，题为《男人不做宝玉，能做谁？》。繁体版刊于香港《信报》2010 年 10 月 2 日，题为《男人不做宝玉，能做什么？》

多数、少数与聚众淫乱

南京有位副教授,上了法庭,因涉嫌组织“换妻游戏”,被控“聚众淫乱”罪,审判期间,引起网上民间大讨论。争论激烈,支持指控与质疑判罪的网民人数,居然不相上下,势均力敌。这个情况比案情令我更感兴趣。因为在中国,虽然有多数服从少数的这个制度,但不管是高层决策,还是小单位里的会议,或者网上民意调查,绝大部分的情况,正反意见不会很相持很接近,都是很快形成大多数,不会长时间 50 对 50 或 60 对 40 对峙。通常开始很少人说话,大部分人沉默,然后表决时就是 90 比 10。更常见的情况是几乎全体通过。

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民主”有两个特点。一是字面理解有歧义。Democracy 译成民主,民主一词古文没有,所以很容易解读为两个字:你是民,我是主,民主就是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作主)。当领袖、第一把手“为民作主”时,当然大多数人应该支持(倘若他不“为民作主”,他怎么可能是“民之主”?)。二是程序变成道德。少数与多数,不仅是表决手段,而且也可能变成一个道德政治评判的标准。在 1949 年之前的革命意识形态中,人们普遍相信,在穷人与富人、民众与官府、多数与少数的社会对抗中,道德、真理都必定属于前者——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讨论过,今天中国的网络文化,基本上仍然继续着这个意识形态逻辑。换言之,在中国特色的民主里,“少数”可以是一个罪名。本来多数少数只是投票

程序,有了结果,全体都应服从表决结果。之前你是反对或赞成应该没关系了。但中国的情况,尤其政治争议往往不是这样。一旦政策决定,之前你站在什么立场,将来都可能会有被追究或至少被记得。所以,一旦第一把手表态,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少数。新闻发布会上,报纸社论中,“少数群众”、“极少数人”不再是中性的数量概念,而成了天然的道德罪名。“在这个事件中,有极少数人……”含义不言自明。甚至今天在网上也如此,匿名状态也很难坚持不懈做少数,因为谁都不希望一直被人“啐”。

正因为如此,这次有关“聚众淫乱”罪的争论,这么持久相持不下,值得注意。

“副教授”这个学术名称与“淫乱”罪名并置,也是形成新闻点的原因之一。人们喜欢看到似乎不相关的东西突然有联系,在语言文化心理中有陌生化效果。钱锺书很明白其间奥妙。他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些比喻,都是把“学术”与“性”出奇制胜地拉在一起:比如船上半裸的鲍小姐,是“局部的真理”;比如嫁过的女人,等于开了封的药瓶;比如文人识字又不懂文学,恰似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这个“换妻”副教授据说有过两次失败婚姻。所以他对“换妻活动”有些自己的理论,不承认是“自甘堕落”。网上说这种“次文化群落”,在北京、上海、苏州其实都有,半地下状态。现在法庭援引的条例叫“聚众淫乱罪”,定义是三人以上进行不道德的性行为。李银河博士说这条法律20年都没用过了,建议应该取消。副教授后来对外解释,其实并不“荒淫”。都是自愿,有时也就是“裸聊”。有些人跑来看一看,不愿意就走。这个案子没有受害人。说是换妻,后来发现真实参与的几十个人里,真的夫妻只有两对,所以应叫换偶。公安说这个团伙中,有两对因此以后真成夫妻,“非诚勿扰”了(成功率与江苏卫视热门交友节目相仿),于是就无罪释放。

案件是很特殊,但牵涉到的法律条文却必须有普遍性。这个条文的

前身叫“流氓罪”。有点像清律中的“光棍罪”，适用范围很宽，定义含混。比如“文革”期间如一个男人有多个女朋友，也可以犯“流氓罪”。但几个算“多个”，说法又不同（余秋雨有次吃饭时告诉我说内部掌握尺度是“6个”，这已是90年代，或许标准现已与时俱进也未可知）。流氓罪后来取消了，分成几条罪，强奸、诱奸少女等等，其中就有一条，叫聚众淫乱罪。我没学过法律，专业知识有限，只是有个常识问题——“淫乱”是个形容词，什么叫淫乱？怎么定义？会不会很主观？克林顿对性行为定义就跟我们不一样。看AV片？婚外情？师生恋？拍艳照自己欣赏呢？口头黄色笑话算不算淫乱？文道说：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讲“黄段子”叫不叫“聚众淫乱”呢？

文涛说：“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什么事都会发生。每个人的想法太不同，道德观差异很大，每一群人有每一群人自己的价值观，都同时并存。……许老师有一句话，说中国人很多事儿是只能干，不能说。我原来不同意，我认为能干为什么不能说，但是我现在渐渐同意你的观点。

“咱们中国人有时候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爱从个案推及到全体，比如说允许他抽烟，难道说全国人民都抽烟了吗？……就像李银河博士说的，不说他换妻、换偶是违法，难道说全国人民都会这么干吗？”

《满城尽带黄金甲》拍乱伦，难道说全家人一起看完以后，公公跟媳妇眼对眼都不大自然？

本来，换偶是否犯法，如何才是淫乱，可以从伦理学、法律与公共道德的关系等多方面做学理探讨。即使不算“聚众淫乱”也未必大家都去模仿。新加坡到现在为止，仍然把鸡奸视为一种罪。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也是一样。所谓鸡奸就是肛交而已。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两个成年人肛交是他们的自愿行为，不能视为一种罪。但也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有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喜欢这种性行为。

为什么在中国，很多事，尤其是和“性”有关的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呢？我在多年前一篇分析郁达夫“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的文章（收

入《许子东讲稿·第2卷》)里已有讨论。简而言之,做,是个人行为。说,公开或“被公开”说(如“韩峰日记”),就是一种社会标准。你这样做而没有说,说明这是你个人的对错,别人看不见,不必表态。你可以说你这样做(别人又没有禁止你这样说),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这样做——法律不禁止的,就是普遍道德甚至是光荣潮流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里边有三个不同的标准被混淆了。一个是我们称之为“作风”的东西,党性党纪,先锋队觉悟,三个代表。第二个是一般道德,社会伦理,人之常情。第三个是法律条文,犯罪底线。食色性也,我们以吃东西来比方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大部分人一般吃东西的习惯,如果我们说它是普遍道德的话,那么另外有些人,他吃的比较精选,讲究,每天计算卡路里,或必定大闸蟹鱼翅等,这算是作风的层面高标准。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人吃蝎子,吃蚂蚁,没人禁止。很少人学,但也不犯法。不打野生动物,成人不喝人奶就行。

换言之,三者之中,法律总比道德低,作风要比道德高。在比如“换偶”这个问题上,道德常识上是出位,违背人之常情(在心理学上讲,禁忌又常常针对人人想犯的错误)。党纪作风层面当然更不允许,先锋队觉悟不仅忠于一夫一妻,有时为了革命需要,爱情也要牺牲。但在法律底线,自愿的、私隐的、不伤害别人的成人性活动是否犯罪,却是另一回事。不应该只依据前两个标准,尤其是党性作风的标准来下结论。

有位我认识的女演员与一香港商人“拍拖”,演员的母亲是个干部,某日突然打电话问我那个港商“作风怎么样”,我当时啼笑皆非,不知怎么用“作风”一词来形容一个穿名牌开奔驰看AV但胆小谨慎很喜欢小孩可能也很怕老婆的香港人。我突然明白,中国这多少年来,因为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把法律、道德跟作风混为一谈,因此法律要求的,比道德还要高(比如洗脚唱K,常识上并没有不道德。碰到刮台风却可能“犯法”)。同样犯事,干部可以纪律处分、撤职、开除党

籍，同罪的百姓却无职无籍可除便只好坐牢（犹如“聚众淫乱”玩脱衣扑克游戏，事先穿得多便不容易被剥光）。“刑不上大夫”，至今如是，但“礼”却下了庶人了。人人都要以很高的作风标准（雷锋王杰黄继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反三俗……）要求自己也被人要求。本来是一个政党集团或军队要奉守的作风纪律，后来跟公民法律混淆了，于是把法律放在比普遍道德更高的程度（比如，有多个女友是流氓）。法律一高，人人犯法。人人犯法的情况下，只要不被抓住，我都可以做。一旦说出来，就是挑战法律了。法规于是像街边“严禁停车”牌子一样，与乱七八糟的停车共存共荣，但牌子不能拿掉。法规严了，执法者不仅有很多“酌情”获利的机会，而且也满足自己和大众的兴趣。

其实，对“性”的控制，对人民身体的管理，从来都是中国政治秩序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始皇帝南巡江南，在会稽山拜大禹后立石碑，碑文讲述种种国策政纲，却不忘防止“淫乱”：“凡是丈夫死了有儿子相伴而改嫁他人的，便是背弃死去的丈夫，不是贞节的女人。要以礼义来防禁内外，禁止淫乱的行为，男女必须洁身自爱，信实真诚，男子与别人的妻子通奸，杀死他也没有罪。（罪当作辜，从《考证》说。）男人行为端正，妻子却逃家另嫁，那么做儿子的就可以不认这个母亲。（从沈家本说。）如此一来，老百姓蒙受教化，廉洁清明；伟大的政治措施，使民俗大变，全天下的人，都承受这种风气，蒙被美政，遵守规矩，和祥安泰，互相敦勉，无不顺从政府的命令，个个清廉，人人乐于守法，天下永保太平，后世敬奉典教，恒常不变的法制是可以永久流传的。”^①

遵照始皇帝教导，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最后肯定会判副教授有罪。

① “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诚。夫为寄猥，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淫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脩絮，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著，译文引自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合译本，台静农序，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页82）

客观上在今天中国,法律兼政令及教化,假如说换偶不犯法,还真可能有人以为这是新潮作风与时俱进先进文化。大众习惯,特殊的国情。

2010年9月19日

一夫多妻制的“最后霞光”

是日(2009年8月28日)三人行谈到何鸿燊生病,这是胡锦涛也要特地问候的人物,他的病情于是成了城中话题,尤其几房太太轮流探访。何鸿燊一生据说是温柔豪放,香港娱乐界有人尊称他不光是赌王,还是“情圣”。前四房是公开的,正大光明。现在又传出有第五个。17个子女,大部分都是他70岁之后得的,而且70岁之后得的,大部分都是男孩子。文涛叹气:这个咱们看了只有敬佩。据说是“种”好,英国、波斯、中国、犹太。看年轻时候的照片,要不为什么说吸引人?帅嘛。靓仔。马英九跟他也没得一拼。大太太,澳门第一美女,葡萄牙人。第二位太太,也是珠圆玉润,再看三太太,还有四……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传媒一直有兴趣,生日怎么过四次,第五个原来是看护,已收下八千万。跟财产或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又羡慕,又同情。性情中人,和睦家庭。中国人讲国家,国家,就是国与家同理,家和万事兴。和谐社会。

文道对何家的家史有兴趣。何家在港澳两地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何东跟袁世凯、蒋介石、孙中山全是朋友。当年孙中山在香港,何东还帮过忙。名门望族几代人。但是到何鸿燊父亲那一辈,算是破产,他那一房是不行了。后来崛起于破败之中,家里没钱,出去单干,东山再

起。他们这个家族,有人说是一个买办性格,周旋在英国人、香港人、葡萄牙人、中国人之间。买办一词说来印象很负面。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被定性是最敌对的力量。从今天讲就是国际贸易商人。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所以买办身份也就很微妙。

但是,平常听赌王说话不像一个精明的人,常常有很好笑的言论,貌似很鲁莽。比方政坛上事,大家都忌讳,讲话都很含蓄,只有他会很直截说谁谁傻瓜,谁谁什么什么。还说当特首好,最重要将来澳门这个赌场都给我们中国人做,不要再给老美了。记者最喜欢他,采访不会空手而归,且实话实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版都跟他有关。新闻版面,政治版面,何先生你对这个特首有什么意见?换一个频道,你觉得接下来这个股票怎么样?经济版面。娱乐版也有。他们包小姐,你知道吗?什么版他都通杀。年纪越大可能就放开了,也有人说他老糊涂了。随心所欲不逾矩。也可能老大当惯了,江湖老大。当年争赌牌,调解人,也姓何,叫何贤,就是何厚铨的父亲。

不过我觉得,何成为新闻,并不仅仅因为他富有豪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夫多妻制的一种寄托。男人的梦想。按文道的说法,这是中国一夫多妻制的最后霞光。

“澳门第一美人”是原配,但婚后这个太太好像得病。于是沿用当时香港实行的大清律例,再纳一房。八卦媒体算得清楚,之后的三太四太都是在香港宣布华人男子一人一妻制之后迎入何家的。香港是全世界华人社会最后一个宣布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配制度的地方。也就是说一夫多妻维持得最久。香港的大学里有很多学生,家庭里边到现在为止有多个妈妈。文道家就是,爷爷就有两房太太。他分析这种情况与英国殖民统治的特别手段有关。英国人的殖民跟葡萄牙在澳门完全不同,葡萄牙人想办法渗透整个华人社会,社会混血。英国殖民的地方混血都比较少。看上去是尊重,那个尊重是故意的。就是说我不搞你,你也就不反我,大家各行其是,你乖乖听话。我尊重

你原来的规矩。你们爱纳妾，照英国人的想法，这是一个陋习，不道德。但英国说你们中国人道德那么贱，他说行，随便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文道这个分析很有意思，我于是想到表面上尊重土著文化，其实也是殖民主义的策略。郑树森教授研究过，在所有英国的殖民地，英文都是官方语言，只有在香港例外。英文官方语言外，日常生活，还有文学，让给粤语中文。但把文学，归作“康乐”。跟打麻将是一回事。娱乐遂成文艺主流。今日还由大侠开路“港风北伐”。其实英国人自己，并不在剑桥教哈利·波特。

所以香港就能够保存很多在大陆再也见不到的东西。大清律例是一直到了六七十年代，很多法庭上还能引用的。很多香港人的父母辈是一夫多妻的，现在“齐人”也有后来人，换一种方式。“包二奶”这个词就从这儿发源起来的，如今已收入汉英辞典，译成“keep mistress”。我以为译得不全，“Keep”和“包”都隐含钱的意思，但“包”更直截了当，而且是独占（又暗示如不独占，女的就会 for sale）。过去中文叫情妇，叫姘头。一定加上一个“包”，表明经济责任，其实是一夫多妻制这个中国文化道德悠久传统的某种延续。

世上男权国家居多，贫富悬殊，渗透金钱的不平等男女关系到处都有，不同文化宗教也有不同婚姻价值观，但像“包二奶”这种现象尤其在华人社会特别是经济较发达沿海地区流行（大陆流行语，“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确有些独特的，包括传统的原因。法国人 keep mistress，不一定只靠钱，也不一定独占，且男女都可能有多个性伙伴。其他跨境“二奶”，东欧女子去德国，泰国女人“迎接外宾”，或国内跨阶级性交往，大都合约期短（计月、计日乃至计时），不涉长久感情及子女。部分伊斯兰国度，则一夫四妻，明媒正娶，待遇平等。总之，都和中国男人的传统欲望（传统邪念）不同。

我在罗湖关口见过潮水般的男人（大都是打工仔，香港的弱势群体）

周末涌向龙岗、宝安、东莞，我总觉得这种“包二奶”委实太辛苦，似乎不完全是为了性的快乐。乡下等他们的是另一个家庭，好几个小孩，一大堆责任。满足的，更多的是男人传统的贪心，古老的梦，而非只是性欲。所以在这土壤上，人们羡慕赌王，关心他的幸福与烦恼。蔡澜狂言无忌，甚至说一个男人爱上四五个女人不是错的，而这个女人能够容忍也不是错的，错的是罪恶的野蛮的一夫一妻制度。

所以张爱玲概括过，现在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女人必须在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下面，还要遵循一夫一妻的责任。（你知道这个事情坏，你无法改变，但还必须遵守一夫一妻的责任，她必须装作看不见。）而男人必须在一夫一妻的法律下，寻求一夫多妻的可能性。（分分钟危险，人人在犯规，谁抓住谁倒霉。）

这似乎是一个尴尬的妥协。

何鸿燊的情况也比较微妙，头两房是合法的，可是后来因为他张扬，再婚也不经过法律登记。现在三太、四太虽没有法律地位，大家也就都接受了。领导也握手了。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在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底下寻求一夫多妻制的最后“样板房”。可以参观，不可重复。

三个男人讲到这里，颇有点“政治不正确”的意淫了。梁文道说：“何鸿燊给这种（想续旧梦的）男人的启示就是，最要紧你公开，你自己不当回事，没人能拿你怎么办。”窦文涛说：“最要紧的还不是公开，……最要紧的是能力，这不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是个能力的问题。体力、财力、物力，你得有钱，你养得起。”但梁文道又说：“过去的一夫多妻是怎么样，……我们不要美化这个东西，不要忘记香港过去容许一夫多妻制的时期，其实结下很多很惨的故事，就很多女人真的是疯掉，……孩子也很凄惨。”许子东说：“一夫多妻是有问题，一夫一妻也有问题，那可不可以平等一下，就是说一个男的你有几个女的，你允许不允许女的有可能有几个男的，假如说能力的话，我们从能力的角度来说，女的就没能力吗？……想想萨特夫妻的情况……”

但都摇头：道理上讲可以。也有真的实践，但是愉快结果不多，大多惨败。

所以人类的婚姻它就是个怪问题，无解的一个东西。

2010年8月31日修改

情欲与创作

——对话刘索拉

刘索拉：对音乐学院的学生，或美术学院搞艺术创作的学生来说，因为情欲和创作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创作的过程是情欲发挥的过程。

许子东：创作的过程是情欲发挥的过程？情欲发挥了没创作就浪费了？

刘索拉：你不要创作，你整天泡在情欲里你就得创作。

许子东：这也算创作？

刘索拉：你能创作生活啊。昨天一个小孩给我提出一个话题挺有意思，老师您怎么解释，梵·高说，他宁可呼吸不愿意创作。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说法，那个呼吸本身你怎么呼吸？你会不会呼吸？你懂不懂呼吸？这个就是在创作。这是为什么我们，比如说呼吸和呼吸是不一样，平时说话是一种呼吸，唱歌是一种呼吸，平时没事白浪费说废话是一种呼吸，打坐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呼吸，唱经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呼吸？

许子东：我前两年来北京，碰到王蒙，说刘索拉把他拉去听音乐，是爵士乐，却跟跳大神似的，是不是有这么回事？那怎么呼吸啊？

刘索拉：那种即兴的演唱，我觉得确实跟内在的某种能量，或者我们说的潜意识、无意识有关。而且那个时候我看你的书我就有一个印象，我很同意，就是说艺术创作和表达的东西，跟身体有关。

许子东：原来身体写作 80 年代就开始了。

刘索拉：在国外，一般来说，你看摇滚音乐家在台上特疯，上台的话，是不能吸毒，这是行里的规矩，你下台以后干什么都行，如果你上台以后，有吸毒或者喝醉什么的，你找不到感觉。音乐本身是毒品，音乐本身让你很高了，你不能再加高，加任何东西让你高，拍子就错了，你就找不着感觉。你失控以后别人怎么办？音乐是集体合作。

许子东：我一看他们疯疯癫癫的样子，还以为是药性发作了。

刘索拉：不是，音乐本身，尤其现在贝司特重的声音，本身和毒品的能量一样，这个声一起来，你的汗毛孔打开了。而且这个时候你希望你的声音更大，更大，汗毛孔再张开，再张开，观众都觉得要发疯，跟着发疯，往往这个结果回家以后就瘫了。所以你看好多搞这样的音乐的人在台上特酷，特漂亮，特风光，基本上回家就歇了，经常听老婆抱怨，我怎么找这么一个人。

相反是古典音乐家，因为古典音乐是非常有控制的。古典音乐家集体出来以后，声音要控制，尤其要演奏古典音乐，声音要控制特别好，所以演奏家憋死了，不能随便抒发出来，他要特别控制声音，而且全是小声音，表示这种控制，显示特别美的控制，完了以后古典音乐家就疯了。古典音乐家生活上是最浪漫，最疯的，台上太憋了。这个就是情欲和创作力，能量在艺术品里的发挥，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控制是一种能量，比如说古典音乐控制，还有宗教音乐的呼吸，它又是一种能量。

许子东：能量特别大的是画家，而不是音乐家。男的画家大都生活腐化。

窦文涛：看在别人眼里就是生活腐化。艺术家创作要依赖于什么，我们不是给艺术家生活腐化找理由，而是客观地分析，人心里就是这么一股能量，有的时候比如说喜新厌旧，甚至说爱因斯坦花得厉害，但是人家慢慢讲，有所创造的人就不断地追求新的）。

刘索拉：咱们得反过来说，男的花，女的也得这样。我在音乐学院小

孩也跟我提出来,这不是彻底对女性蔑视吗?好像男的一上,女的就都软了,就是这个意思,男的一攻击,女的就投降?你要平等地看,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一种进攻性,或者有一种选择性,在“性”上。

认为女人在“性”方面必然吃亏,这是错误的观念。你不吃亏,你占便宜了。其实男女的关系,是男的在牺牲。

(**窦文涛**:跟我们站在一个立场了,捐出精华的全是我们啊,力气活啊。刘索拉我估计她得把某些观众吓着,但是咱们能够接受。你的这个思想转变怎么来的?你本来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子,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德环境下,从小的教育,你怎么会有这观念上很多的转变。)

刘索拉:这个要自我反省。我长大的过程跟所有女孩是一样的,刚开始老觉得谁把你背叛了,你怎么吃亏了,你怎么献身了。以前也有这个,但是不好,我不喜欢永远活在埋怨中。有的时候尤其是女孩,觉得自己付出了,有代价的,要有回报,其实不好。哪怕感情也是一样,感情也不需要回报,因为你爱一个人,这是享受,你已经享受这个过程了。你不要想着我爱他,他必须爱我,没有那个事。我也是作为一个女人反省了这么多年,明白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你选择和谁在一块,或者永远和谁在一块,这是你的选择,这不是一个交易。

许子东:但是有一个前提,很多女的,她把感情和生存的需要混合在一起,她自己都不分,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色”是有目的的(比如为了“食”),没达到目的,自然后悔“付出”。如果过程就是一切,那过程就是目的了。男人较强调“性”的过程,女人较重视“性”的结果,大概也不完全是生理天性,而是资源不平衡的男性中心社会条件造成。

刘索拉:其实无论男女,都迷恋性的魅力。这就是人性。

2010年11月11日修改(参考2007年6月8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权力与春药

窦文涛：按照中国贪官的标准，陈水扁应是“五毒俱全”，只有一样我有点好奇，他好像没有养情妇。

吴淡如：其实他没有五毒俱全。酒、色、财、气，他就是财。为什么没有养情妇呢？因为台湾跟大陆养情妇的条件不一样。第一台湾有狗仔队，真的是管你是什么领导人，高兴怎么拍你就怎么拍你。不光拍娱乐圈的明星八卦，政治人物也拍。像刘兆玄，台湾“行政院长”也曾经被拍照跟一位主妇去阳明山，在车里聊天或是做什么，四十分钟没有出来。所有政治人物的八卦，全部都是狗仔队拍到的。

许子东：群众专政。

吴淡如：第二是台湾是全世界极少数还有通奸罪的“国家”，对不起，台湾是全世界极少数还有通奸罪的地区。

许子东：怎么定义通奸罪？

吴淡如：台湾有一句话，台湾话是“抓猴”，就是只要你跟一个女的在宾馆里面，我是老婆的话，我就可以叫警察去捉奸在床。原配可以选择要不要告老公，或者告第三者。那第三者老实说，有史以来没有被判刑过，都是一律罚钱。这就变得很好笑了——谁替这个情妇缴罚金呢？都是老公代缴的。

许子东：还是自家损失财产，所以划不来。

吴淡如：基本上通奸罪是一个蛮落后的法律。你说为什么陈水扁没有？也因为吴淑珍非常厉害。她在1985年被撞成重残，好几次命都应该是要送掉了。她的脊椎断掉，所以医生就把她从头开始吊起来，吊在那个床上，因为脊椎断成很多块。她那时候一直在生跟死之间挣扎，后来她在自传里边曾写到，她说我要一直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因为我的孩子还小，一个6岁，一个9岁，如果我现在死的话，这个阿扁他一定会去娶小老婆。

窦文涛：我的天啊。

吴淡如：怎么可以落到别人手里，她是靠这样活下来的，而且她后来自己在几年前去比如说一些团体演讲的时候，也提到这段故事，她说她自己一定会撑下去，因为她绝对死也不会让陈水扁娶小老婆。陈水扁怕她，他曾经被赶出门去，即使当了领导人，也曾经被太太赶出门。

许子东：所以要研究性跟政治的关系，台湾政坛这么乱，或者和陈水扁内分泌失调有关？为什么他演讲发疯一样，把整个台湾的前途搞得连中美两个大国差一点都有军事危险。

窦文涛：荷尔蒙转移。难道人没有从这种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吗，他一个正常的男人，他这么多年，能量何处去呢？

吴淡如：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他爱权位重于色。吴淑珍她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吴淑珍必须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钱上面去。

许子东：吴淑珍也是转移。所以都是那个“力比多”。他一直说台湾要自卫，台湾要自卫，其实是他自己要“自慰”。找到原因了。

吴淡如：人如果贪就算内分泌协调你也还是贪，你看大陆的贪官有没有，不是做过统计吗？90%的贪官都有情人。

窦文涛：不是，是95%。这不是我说的，最近发现一个郑州纪委书记的讲话，他恐怕想不到在香港报纸上给炒得一塌糊涂。本来人家纪委书记讲的话很有魅力，教育这些干部，他说他研究95%的贪官都有情

人。他是给各个监察机构的负责人上培训课，说贪污情人分成七种类型，保养型、情感型、俘虏型、相互利用型、第四者型、欢迎型和复合型，纪委书记举了原鞍山市国税局女局长刘光明的例子，这个女局长就是以色列相勾引官员。

吴淡如：这个我不懂，国税局的这个肥水应该蛮多的，干吗还勾引别人？

许子东：问题是这个局长怎么来的？

窦文涛：对，说前后花了五百万去什么香港、上海等地整容，光是臀部整形费就达五十万元，据说整出了一个鞍山市最美丽的屁股。

许子东：不过像阿扁这种情况其实有一定的普遍性，比方说你男的很高位的时候，中国不是讲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你这个家不齐，你来治国，你来平天下，问题就大了，就是家齐不了。

窦文涛：许老师你讲的就是纪委书记讲的一个观点，他是认为很多官员出事就是没有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就是说这个齐家没齐好。

许子东：有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在某方面齐不了，或懒得齐了，老婆就折腾，成了怨妇。那怎么办呢？就给她一点权力，让她管一些她本来不该管的事情。政治、军事不能管，就管管文艺吧。这些他觉得不牵涉大局的事，要不然怎么办呢？让她去管管。后来的历史教训，你看看，从小到大，这个女的管了以后会怎么样？

吴淡如：我觉得这是很传统的思想，女人管事就不对。

许子东：不是女人管就不对，男人搞不定这码事情才是关键。

吴淡如：我一直都觉得男人在出事之后，就把事情怪给女人，事实上，他已经本来就知道做这件事是不对。

窦文涛：对，“战士的责任重”都因“妇女的冤仇深”。淡如，男人问题专家，从内分泌的角度研究一下贪腐。

吴淡如：其实我一直觉得权势是最好的春药，所以你一有权势的话，当然常常会有女色跟着来。

窦文涛：这一点我真是要请教女性，我真是很不理解，你知道吗，我认为女性是不是比男性更能耐得“脏”呢？

吴淡如：你是什么意思？

窦文涛：什么意思？我就一直很难理解，比如说他们都说权力是什么最好的春药，你也知道有些有权力的人、有钱的人，那个脑满肠肥的，我觉得在床上……咱们就反过来说，我觉得要是个男人对吧，我碰见那样一个女人，我是很难有反应的，我怎么觉得女的好像可以啊？

吴淡如：不、不，我觉得不管是女的有钱，还是男的有钱，其实都一样的效果。你不能，不代表别人不能去奉承一个肚子很大、肥油油躺在床上的女人，只要是她有这个亿万家财，我觉得她都是有人要的。

许子东：比较有区别，我作为男的，我们将心比心，比比看。我觉得，我不能说好坏，但是我自己觉得男性的审美是比较生理化的，比较动物化的，女性是比较社会化的。

吴淡如：不能从你们俩的角度说。像我，我也不会喜欢那个脑满肠肥躺在床上的那种，因为我不需要那个钱。我觉得这之间都有阶级的差异。

窦文涛：我给你讲，咱们要往下聊，我甚至觉得女性确实是因情生性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说比如一个贪官，他明明不爱她，他跟她上床，你会发现生活中有些女性，就是咱们外人看，叫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对吧？但是我发现一个女人要是真的爱上一个男人了，哪怕他是个大肚子，哪怕他丑得像恐龙一样。

吴淡如：对，有各种理由，其实男性反而你爱一个女人，常常着眼于青春的外表，可是女人欣赏一个男人，或者她想跟着一个男人，她有很多的面向，也许有些人说她喜欢让他发笑的男人，有的人她欣赏男人的性格，有的人她就很欣赏男人虎虎生风，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所以他可以长得非常非常丑陋。

许子东：女的从利益出发，也可能日久生情。反过来男的为钱为权服务老女人，最后怎样也是假的吧？

吴淡如：这些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和他们的情妇之间都有一个阶级的差别。她们仰仗他得到某些东西。可是男人很奇怪，我觉得男人有时候过度有自信，有时候就会觉得，比如他已经六七十岁了，我常常看到很多老萝卜，他们就去乡村娶了个 18 岁回来，然后自己还在自夸，还带到亲朋好友面前展示，你看我老婆多年轻。

许子东：可能因为他觉得老树旁边有鲜花，能够弥补他的生理上的自信心。但是，性别审美重社会因素或重自然条件，哪个好呢？我就有点说不准了。男人是很无耻，只关心人家好看不好看。可是女的这个看重社会前途、能力的审美观，我也有点疑问。我听过一个例子。女孩子到什么酒吧里面去，碰到两个男的，然后要决定跟哪一个男的出去吃夜宵，只是吃夜宵。后来选定一个。出去以后发现那个人要搭出租车，而刚才拒绝的是开大奔的。我就听这个故事有点奇怪，有关系吗？……

吴淡如：男人的差别是在当日的第二天的早上灯亮，或者太阳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她不是 20 岁，她是 40 岁，然后他非常沮丧。所以，男的爱青春貌美，所以有一大堆情妇，那女生她要的是权势、地位，还有她的享受，所以她在追求，刚好两个一拍即合。

许子东：男的比较接近于动物本能，人的原始阶段。说好听是人性自然状况，说不好听是进化得较慢。但作为女性来讲，是进化还是异化，我就知道了。

窦文涛：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DNA，一切都是为了 DNA 繁衍，所有的感情由此生发。比如说一个男的，他尽量撒种，多一些他的机会率高。女的要看的两方面：一方面挑“种好”，到今天就得是有钱有势有才华。但光“种好”就不行，因为什么呢？人类的婴儿，人类的孩子，比其他的动物，需要父母共同抚养的时间最长。所以女人一半看种，一半看你对我忠心不忠心，假如我生出孩子来，你能不能负这个责任。

许子东：文涛这段话精彩，可以再议几句。将男人的花心归结为撒种的动物性，不知是否科学，倒是一个很好借口。美国有同性恋倾向是

先天或后天的争论,大致上认为是先天原因的,即合理自然人性。如后天社会造成,合法性就有较大争议。但说女人一看种,一看忠不忠,有意思。问题是,女人很早就知道,一般说来,“种好”,力量强(有才,有财,有权力)与忠实(可靠、听话)在现实中常常成反比。不仅男人,女人“种好”(漂亮、身材好、年轻)也比较难追。不是“种好”的道德不好,而是选择机会一般说来和忠诚程度成反比。人性普遍弱点,和“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一个道理。

既然“种好”和“可靠”有矛盾关系,只顾一头是比较极端的做法。常规爱情婚姻之道或是先考虑感情契合、忠诚,然后再尽量考虑才、财、权(现在秩序或颠倒,或干脆删去一项)。比如说都是朋友,在大致靠谱的大学同学中,尽量找“有出息”的。但也有不太常规的男女之道,现在越来越多,即先定位“种好”,将车房财权有意无意定为先决条件,比如不过千万不谈,然后再考虑忠不忠。条件相仿,商人或医生,就找医生白领等。要找大款大腕,富商高官,很多美女先找官员。因为比起做商人的二奶,官员第一要顾及政治形象,小秘不能换得太多。第二不仅得到金钱好处,还有很多人脉关系,将来都是社会资源。第三,不仅关在家中,还有社会实习政治锻炼的机会。当然,凡事都有坏处。知道太多,亦是危险。一旦翻脸,弄不好变成恶性事件——济南还是哪里,不是有官员派的土撞死情妇吗?

吴淡如:还是有人不怕危险。看看现实吧,我手头这个博客里把贪官分成几个吉尼斯奖,吉尼斯纪录,有数量奖、品质奖,还有青春奖,比如说是有一个副市长,他包养了情妇好几十个,每个人都规定在16岁以下,这完全是一种恋童贞的表现。还有管理奖,某一个副书记养了七个情妇。因为他学了MBA,所以最大的那个就是CEO,叫她管六个,以防止其他的人有任何反对。

窦文涛:你知道怎么管吗?我研究过,他那个首席情妇叫邹某,邹某就说了咱们MBA怎么管呢?你首先得六个电话号码分开,比如说六个

情妇，六个情妇知道你许老师的电话，是六个不同的电话，这样首先不会打架，这是管理手段之一。

许子东：所以现在的手机有不同的声音，就是用来辨别。

窦文涛：我发现现在手机开发商也够孙子的，那天我看手机，甚至还有一种什么呢？比如说在香港的手机，就说你人不在香港，但是你可以发出一个信息，还是一个电话，就表明你是在香港的。

吴淡如：大部分的奸情都是在手机里呈现的。

许子东：也因为“奸情”的广泛，视像手机硬推广不出去。

吴淡如：另一位贪官，获形象奖，是副省长，他接受审判的时候被揭出来有情妇，他还贪污，还两眼深情地看着远处说，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你看多深情。

窦文涛：我们的纪录是 146 个，你听说过吗？

许子东：那是体委的？

窦文涛：管体操的吧，他怎么能够那么多，我一直纳闷，这忙得过来吗？

吴淡如：所以他得到数量奖。

许子东：对，这是双重异化。本来权力是春药，然后他又把春药当权力了。把那个数量也当做他人生的一个成就了。

吴淡如：克林顿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的权力和性都在一张桌前，……

窦文涛：我当年看克林顿，我就觉得，哎哟，太可怜了，那算个什么啊，那么有才华的一个总统，实际你恰好可以看到他给逼到什么程度了。

许子东：不过我始终怀疑“色”与“食”之关系男女是否有差异。据我在美国的生活经验，美国的女性一般，至少在大学里碰到的女性，就很少把所谓“长期饭票”作为异性审美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没听说专业人士还说什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之类。她们也是比较纯粹的看男性的身体之类，不会认为你开一个大奔，就说明这个男人有什么风度。

吴淡如：那要看女的本身条件。

许子东：她们大都也是申请奖学金，向政府借钱，LV 真假都不用。我始终觉得目前这种权力春药的“女性心理学”，只跟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有关。

（另外一次节目，也是贪官情妇话题，和文道的谈话涉及另一个案。）

许子东：李薇的事，知道吧？我有点儿想不通，也是权力春药？

梁文道：看照片，中间是李薇，这边是原中石化的总经理陈同海。那边是青岛的书记杜世成，这几个人，现在都是触犯法律了。李薇，原本是一个云南人，后来可能是拿了香港身份证。陈同海跟这个李薇，曾经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后来经过陈的介绍，李薇认识了杜世成，跟杜世成也建立了亲密关系。

梁文道：那这两个男人彼此都知道。这里面我也不大能够理解了。中石化，算半官半商吧。

许子东：商人把自己的一个情妇介绍给一个做官的，这个还勉强可以理解。那个做官的，为什么会要呢？这个我不大明白。我听说在沈阳等地，有钱人包漂亮的女生，据说有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哪一个女的，被其中一个包过，如果不要了，没有其他男的会再包她的，你明白吗？

梁文道：明白。觉得不好意思，穿旧鞋嘛这是。

许子东：欧洲骑士会争夺对手的情人，浪漫小说主角敢爬阳台与贵族的太太幽会，人家怎么没有“旧鞋”一说。都是“性”与权力的关系，形态方式很不同。

梁文道：商人、贪官还是把女人当做玩物，觉得我玩儿剩下的，你怎么怎么着。

梁文道：我懂了，这两个男人，其实虽然都贪赃枉法，虽然都包养情妇，但是有一点，还是挺不错的，就是这个精神很节俭，简朴，不要自己包一个了。

许子东：物尽其用。

梁文道：对，没错，跟别人一块儿包。

许子东：男人之间，“争”是光荣的，决斗是英雄。“让”是可耻的。为了经济的原因，这个男人，把自己的情人送过去，不行，这不像一个男人的行为。

窦文涛：怎么就不行了，光许你们男的，一个人找俩女的，不许一个女的，找俩男的吗？

许子东：从李薇的角度我倒很可以理解，我觉得她很成功，两个有权力的男的，同时都在自己的裙下。可是你站在这两个男的角度，换你，你行吗？

梁文道：那又可以帮他们说话了，就是他们除了这个朴素之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都很尊重女权，就是他们没有从一个男尊女卑的想法来理解这个事情。

窦文涛：这个女的呀，也不是那么简单，光是一个漂亮妹妹这么简单，在利益上，有些女的是很能干的。共同的利益链。文道说得也有道理，就是这三人，虽然犯的是别的罪，但是在这个共建节约型社会方面，有成绩。

梁文道：没错，勤俭节约为荣。

许子东：浪费折腾为耻。

窦文涛：女的不够嘛，咱哥俩就共用一个。

许子东：他们虽然贪污，但是，好省则省。

窦文涛：没错，没错，刚才问的问题，我可以跟你讲，中国的男人啊，他确实很难过这一关，甭说两个男的共有一个女友，我跟你讲，就是比如说过去曾经跟我好过的一个女孩子，我的朋友，我很好的朋友，看上她了，我跟你讲，我都要犹豫一番，但是最后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还是给他们搭桥，让他们好，然后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啊，哎哟！还要被自己感动，而且情绪几天都郁郁寡欢，然后正去看那个电影《蜘蛛侠》，然后看见《蜘蛛侠》里有一句台词说，说是的，你总可以做出选择，而你总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呜呜呜呜……我就哭了，我想起我自己。

梁文道：原来是这么哭，我以为你是看《蜘蛛侠》哭。

许子东：然后还说出来，说你看，我们男的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不比爱情差，用这些谎话来安慰自己。

窦文涛：等于说，即便是一个过去跟你好过的女的，你把她送给……

梁文道：背后还是有一个利益网络。我常常想起来，就是法国启蒙运动时代前后，有很多沙龙，沙龙的很多主人是女主人，而有一些沙龙的女主人呢，也是利益网络，但是“艳名远播”。那个沙龙是怎么回事儿？沙龙就是名流的圈子，文化人啊。

许子东：乔治·桑招待肖邦。

梁文道：对，一堆这种人，大伙混在一块儿，这里头大家熟了，有网络了，彼此有些利益输送，就比如说我给你捧捧场，我给你写一个剧本，我给你怎么样。这些女主人，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有些男人呢，就务求能够做到这个女主人的入幕之宾。他明明是知道这个女人，现在是单身，她或许有老公，或许也跟别的男人怎么样。都听过，都知道，但是还是想争取。很奇怪的，透过跟这个女人的关系，加入了那个网络，那个圈子。

许子东：沙龙的情景，还是有点公众空间的雏形。决斗等游戏规则，都假定至少骑士贵族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男人以为女人而同别的男人争斗为荣，这是来自西方的近现代的观念。中国人的传统，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弟弟冷了病了，可不可以穿哥哥的衣服呢？或许更证明官场哥们儿情谊？不是说为领导做九件好事，不如和领导一起做一件坏事吗？或许这是权力春药的另类潜规则，共玩情妇（注意，绝不是真的老婆），和一起去玩“巴蜀烈女”的三个官员一样，本质上还是共做道德坏事促进政治互信的意思。

2010年12月8日修改（参考2008年10月04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关于 AV 次文化

某天“锵锵三人行”(2007 年 11 月 9 日),除文涛、文道、子东外,另有一位“特邀女嘉宾”,通过照片,进入我们的讨论。原来是一个日本 AV 女优,名氏却也记不得了(后来也有别的日本女优在中国网络上走红,饭岛爱、苍井空等等)。原来该女优在中国某地农村取景拍摄 AV 的照片,围观的村民们都在翘首看。在女优旁边还有人抱小孩喂奶。不是奶粉广告。令我想起一个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发挥出去的新民歌:“党是亲娘我是孩,一头扑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喝奶水,谁拉我也不起来。”

中国网友义愤了,说这个照片侮辱我华夏民族。日本女优在中国农村取景,旁边还这么多村民围观,不像话。村民当布景了,是自愿的吗?对当地的道德风俗是什么影响?咱们怎么能允许日本鬼子这么干,谁批准她到我们这儿来拍这个,网上众说纷纭。

报仇方法:要不要派芙蓉姐姐去靖国神社拍照?

也有人说,中国各大门户网站,一点进去,每天你都会看到各种性感照片,比如什么沙滩热女明星走光微博捉奸等等,和十七大新闻并置共存。细查一下,文道认为那些照片里面起码有一半全是这些日本 AV 女优的照片,非法上传,没有版权。

说得不好听,这种“软实力”,是文化侵略;说得好听,日本的这一小

部分女性对亚洲人“文化生活”贡献很大。

可以说是我们彻底征服了日本 AV 女优了，智慧产权免费意淫。也可以说我们被她(们)欺负了，免费背景及群众演员，无衣肉弹且污染贫下中农心灵。

这照片于是引起了我们三个男人的很多联想。

一是分级制。旁边有小孩啊，照理警察应该管。随便一个人跑到东京新宿街头，穿得过分暴露，也会被干涉。小孩不能看大人这个。麻烦在于该女优没有露点，且中国没有明确法规(聚众淫乱?)。电影没有分级制，何况村里。

如果《色，戒》在上海一个私人地方这么拍，公安局是不管的。管的是拷贝(数码)发行。没分级制，个案酌情处理，剪掉七分钟。(我在香港见过四个内地教授挤一辆的士，很远赶去市中心重看一遍《色，戒》，为的就是那七分钟。真难想象其他两小时四个老人在影院中是怎么熬过来的。)

二是衣着与民俗之关系。我注意到女优照片背景是在上海郊区。我小时候去劳动，其实上海郊区至少在 60 年代，40 岁以上女的夏天根本就不穿上衣。姑娘就用一块布，像手绢一样的东西挂在胸前。现在北京“苏丝黄”酒吧这种肚兜成了东方主义性感道具。当时却不是“开放”，是贫下中农劳动需要。下乡的学生少见多怪，但都牢记毛主席教导，接受再教育，谁也不敢往那方面去想。想跟不想是太不一样的。一个农民在那里露出一点身上的东西，当时想都不敢乱想。现在一个日本女人这样拍，民俗变化才几十年，同一块土地，同这些人，摄影机这么一来，就变成了一种示众，多了很多看客，村里，网上。

三是 AV 工业与民族性。成人片怕就怕认真二字，日本人就最讲认真。对此，文道有些“文化研究”角度的观察，他判断照片风格属“巨乳系”。原来 AV 业也分不同系列、流派。达到某个标准，就可归入巨乳系。巨乳系有巨乳系的影像文法。拍法是不一样的。有一种系列叫“人

气系”，就是女人要显示出像个少妇，风韵犹存的少妇，像人家老婆。有“女大生系”，各种各种系列，而且男人也都有系列的。文道的一个朋友做过调查，说男演员里面有一种角色太奇怪了，这种角色听这个名字就厉害，叫“汁男”。汁是果汁的汁，男是男人的男。顾名思义，汁男是干什么的？在他拍片的过程里面，从来不跟女优发生任何性关系。他专门负责在旁边很淫秽的样子，表演自慰，然后就表演“榨汁”。这是最下等淫乱系列的一种，但也是专业。AV 若也算一种亚文化，日本的特色是认真、真实。真听真看真感觉。在另一种文化观点看来，这玩意儿糟践妇女，变态，腐朽，毒化社会风气。我 1988 年初次访日讲学，就和一位较年轻的日本教授在地铁就什么是人性的“变态”争了起来，起因记得就是报刊亭里 SM 杂志的封面……当然，要作批评，也要严肃的研究态度。文道说同样是色情电影，也有“进步色情电影”。其实是颠覆色情电影，有一些色情电影的导演本身是女性主义者。拍一种色情电影，完全颠覆男人把女人当性对象的那种拍法。要拍女人得到快感，以女人为欲望主体。

我不得不同意 AV 工业确实体现日本人高度的工作理性、高度的专业化，甚至某些民族性。专业分派还有“粪便系”（日本文化、文字对“下半身”不像我们这么歧视），有“电玩系”，还有将蜡烛油倒在女优背上手臂上（我在新宿见过，据说不那么痛，惨叫声一半是表演，为了观众的兴奋）……西方三级片，女人通常是作欢乐享受状，Yes、Yes、Yes。日本片的女优均作痛苦状。其实是男人们的不同白日梦需要（不知和日本军人强奸案例较多有没有关系，他们自己觉得女的越痛苦越反抗痛苦，他们越来越劲）。过程非常痛苦，完了以后那个女的却满脸笑容说，谢谢你们，很高兴，请多关照之类。相比之下，华人影圈，拍这种戏就是花哨，都不认真。稍好一点唯美派的《金瓶梅》，其间主角也是日本女优。没办法，人家尽职尽责。中国人，尤其是自以为在做坏事，做低贱事，就特别没有行规。

演艺圈,比如说就有人做替身,当初是拿了钱,签了约,现在看到床戏红了,就跑出来说,谁谁谁,你看那个屁股是我的。这叫坏了行规。好莱坞很多片子用替身,有没有看过替身跑出来说,我是哪个明星的屁股或大腿?一旦出来说,你这一行就别想干了,以后没人用你了。在中国就会有替身跑出来“秀”,因为行规不严。又如娱乐新闻,说南下舞女COCO为香港广播处长表演致使该官失位后反而大红且回到社会主义祖国,说是有人签约请她拍戏。看来是不必对舞女行业太认真太尽职的。

跨行的代价太小,利润太高。学术界也同样道理,功夫一般,就“表演”,就出位。虽然在学界掉份了,却在社会上获得名利。各行各业,都没法做老实人。

回到女优照片,文道说其实学术界也有汁男:“特色就是看到大哥在干着,他在旁边叫唤,哎呀,大哥干得好啊,哎呀哎呀,我兴奋啊……他不真的干,他就一天到晚捧着人。吹鼓手,摇旗呐喊,大师好,在旁边这么去沾一沾威风,然后也自淫一番。”筋疲力尽,最后分点小钱。

千方百计混个学会会员,收礼写评论,贴钱去发表,开会拿红包,给假古董开个证书,跟的是这个老师,却自称那个名家的学生,挤进什么项目,辛苦一番,贡献了“精华”,却没有露脸的机会……

有这个行业,就有汁男。谁的错?

2010年4月1日

女性“丑角”的社会需求

越界客串电视节目,大致有三种情况。最差是自己的话没法说。一般是曲里拐弯表达己见。最好是在谈话过程中突然有新的想法。

前几天谈小月月网上火爆,除怀疑是人为创作外,本无甚意见,亦不觉有趣。但在文道将小月月与以前木子美、芙蓉姐姐、凤姐等一系列所谓“丑女”“不要脸”真人表演走红的现象联系起来讨论时,我才突然联想到了生活与艺术、现实与舞台的供求关系。

原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的主流电视屏幕(春晚小品、连续剧、歌舞晚会上),有很多男性丑角走红,但旁边搭配的多是靓女。即便偶然有,也不易红(试比较同时推出的丫蛋和小沈阳的星运)。久而久之,我们也习惯了,也不去思考为什么舞台上很少女性“丑角”(不仅是相貌普通或特别,还要能出洋相,肯自我调侃、自我“作践”)。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审美需求却是多样公平的。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真人版的“丑女”在网络的次文化圈火爆,模式大都是相貌一般,身材不一般,举动风骚,言论出位,以“性感”吸引眼球……

为什么主流舞台缺乏女性丑角?

一、或是日本、港台“丑男美女”电视文化的影响。

二、即使在“文革”,军队文工团亦是另一种选美机制。说明不论哪个时期,男性视觉需求均占主导地位。非美女不看,连飞行员亦然(直到

最近,招收女兵才取消才艺表演)。

三、若电视台想刻意打造“芙蓉姐”这类形象,演员不肯,连女性观众也不接受。政治不正确。

但实际上,在“性”的意义上嘲笑丑角,是否又是广大观众提高自信心的无意识审美需要?

原载《羊城晚报》2010年10月24日

剩女、爱情与细节

许子东:剩女是个反动词汇,政治不正确。

窦文涛:去年,剩女名列教育部公布的 171 个汉语新词之一。在这个词的背后,其实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群拥有自我意识、独立人格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的优秀女性,她们有事业和故事,有追求和要求,有技能和情趣,有圈子和朋友,只是没有结婚。她们之中绝大多数不拒绝婚姻,只是拒绝不完美的选择。她们也想找到真命天子,但或者是运气还没到,或者是未婚男人跟她们想得不一樣,她们有的选择继续单身,有的被迫进入相亲和猎婚的市场。她们并不孤单,只是偶尔焦虑,社会对她们最小的帮助应该是宽容,男性对她们最大的赞美应该是珍爱,毕竟她们的状态既是自我选择,也是社会造就的结果,她们没有伤害谁。这是广美的宗旨吗?

孟广美:节目做完了,你已经全部讲完了。

许子东:这段话是男的写的吗?

窦文涛:对,我估计是《新周刊》总编封新城写的。广美你可以谈谈,偶尔焦虑吗?

孟广美:我经常焦虑,但是我焦虑的事情,并不因为我是个剩女。你为什么用这个“剩”字,为什么不能用“神圣”的“圣”字?对,今天你们要讲这个话题,我就忽然想到文涛前两天在上海跟我讲的那句话,女人永

远赢不了。

窦文涛：不是我讲的。一位联合国女官员那天跟我聊天，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本人是女人，她说女人赢不了的，不管你要强也好，漂亮也好，你不可一世也好，你野心膨胀也好，最终你赢不了的。我觉得这个话可以做多方面的理解。

孟广美：虽然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但是某程度上我必须接受，为什么？因为无论你是扮演什么角色，你是永远赢不了的。所谓的剩女是什么？在日本，如果事业非常成功的女人没有结婚，叫什么？叫败犬。

窦文涛：我的天，失败的狗。

孟广美：而且你事业很成功，但你没有那个结婚的标签，你叫败犬。那理想状态的女人呢？结婚生子，儿孙满堂，那个时候你成了什么？你成了黄脸婆。不管是结了婚也好，不结婚也好，永远不会有一个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你，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女人永远赢不了的。

许子东：所有这些词汇都是男性的词汇，以前叫大龄青年，好像男女平等，不过我觉得那个词已经是侮辱性的。到了一定时间，大龄青年，大龄男女，团委妇联会组织一些活动，“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以前中国每个人有两个问题：一是组织问题（入党），另一个就是“个人问题”（结婚）。现在索性好了，大龄以后，只说剩女，为什么不说剩男呢？为什么男的到了40岁没有人叫剩男呢，所以这个概念有问题。

窦文涛：这个概念本身反映了至少在中国这个社会，有某种尴尬。很多女性素质很高，三高，自己条件好，收入好，什么都好，眼也高。她们是强者，真强。我不妥协，我要找到真正符合我标准的那个男人。如果没有找到，我这个底线，做好独身的准备，独身的生活也过得很充实，当然不排除有个情人，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满足。

这样的女人，最难是自己能够不寂寞。女人容易觉得寂寞、孤单，一个人，没人陪。我有一个男性的朋友，还跟我说女人很难搞，他说我现在

彻底明白了，女人这个“物种”（有点歧视妇女了），他的感受是女人好难搞。

孟广美：女人真的是很难搞。

窦文涛：不需要女人，其实就乐得清静。男人的矛盾是他又需要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好难搞。难搞什么？他说不管什么样的，到最后一律就是结婚生孩子，离不了这个。她要不对你不满意，不满意她把你蹬了；对你满意呢，接下来暗示、明示、有意、无意，一道一道，你看男女之间……

孟广美：但我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女孩，年纪都还不是太大，那种二十末、三十初的，她们其实都已经抱定了，根本不是以结婚作为最高宗旨。

窦文涛：不是，假的，中国的女孩子，她觉得爱上这个男人了，觉得这个男人符合她的要求，这两个人就处在一种婚前状态。要不怎么着，一直同居吗？同居到了三十，即便女的不说，你这个男的不觉得有点问题吗？实际上，女的即便自己都没问题，她还有个爹娘呢。

许子东：还有周围姐妹。时不时会说今天又去做伴娘了，什么朋友嫁给新西兰一个总裁了，谁谁给她买路虎了。

窦文涛：我很同情妇女，她们被洗脑了，被一种单一的生活选择给洗了脑。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社会文化就是这样，比方说，美国好莱坞电影里就是白日梦工场：我要白色的一个婚礼，然后三个孩子一条狗，一个老公。

许子东：把男性跪下来，递上戒指，看作是女人的一种胜利。商业电影渲染的生活模式，对一般的中产白领的心理，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剩女这个词较有中国特色，但也参与在这个全球化压力里边了。

窦文涛：说这个问题，引起别人的误会，老觉得你们攻击传统婚姻价值观这些，其实不是的。而是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选择是多种多样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性。你愿意维护传统婚姻的，甚至有人说要婚前守贞的，你的个人选择，我们都尊重，只要你高兴，但是你没有理由觉得

别人的选择就不对。

许子东：但是如果说社会上大多数女性，都希望一个正常婚姻生活，如果这个现象确实存在，是否说明现代婚姻制度对女性还是有利的？

窦文涛：那当然了。

许子东：因为男人多变？所以签下契约，以后再怎么浮动，都在这个范围里边了，共同有份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话，说“你以为一夫一妻制是保障女性的？错！婚后上床才知原是保护男性的……”

窦文涛：人类的男女关系，婚姻关系一直在变化当中，随着这个时代，受到很复杂的原因影响。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上次我碰到的联合国的女官员，很有成就的，大概是 50 岁左右，我觉得她讲得挺有意思。她批评中国男人，不大能欣赏成熟女人的魅力，中国男人往往喜欢找幼稚的，找小的。

许子东：跟日本男人一样。

窦文涛：照她的观点，她也挺女性主义的，她说你们男人都错了，女人到四十几岁的时候，性欲最强，有科学研究证明。实际上，女人之所以觉得没有那么强，是很多文化的原因，把她锁住了。40 岁的女人，男人这时的性需求，跟女人没法比的。女人一旦要解放了……当年孔夫子为什么不让女人出门，是很有远见的。因为什么呢？男人出去乱搞，你是很有限的，你能怎么着，你一天二十回？

许子东：你最多“日播”（一个服装品牌，文涛、广美主持过“日播”的天桥表演）。

孟广美：我们可以不断地滚动播出。

窦文涛：所以历来的文化、宗教都倾向于限制妇女。这位女官员说其实 40 岁的女人就该找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一拍即合。

许子东：中国目前的情况，男的从 20 到 60，都在看女的 20 这一段，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不平衡。欧美国家减少这种不平衡有两个方法：一是女性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以后就会减少依附。第二个就是扩展（其实是

在社会文化心理意义上承认、正视)女人的完整的性活跃期。最近的电影《Sex and the City》,里边最性感的女的,偷看邻窗男模洗澡,特别说明她 50 岁。第二集还写她一边性感一边怎么用药应付更年期。我们的电影不会这么拍,我们不会找一个 50 岁的女的在那里性欲旺盛。张爱玲后来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其实应该三十多岁,但她不敢这么写,只写成 28 岁,怕读者不接受。《妈妈咪呀》原来的故事里母亲的角色,大约 37 岁。她女儿 17 岁结婚,三个昔日男朋友来了。可是梅尔·斯特里普跑出来演,梅尔·斯特里普五十来岁。我是中国观念(应该批判),一看梅尔·斯特里普演,我担心她太老了,结果没想到这个片子热销。

孟广美:大卖。

许子东:大卖,说明世界上很多人对于五十来岁的女人这么性感,对性这么奔放,都能够接受。我觉得女性主义批评也会从学院影响到文化工业大众市场,不平衡图景慢慢会改变,不应老是男的活跃几十年,女的只活跃一二十年。这么一个不均衡,才造成了现在的很多社会现象。

窦文涛:“黄脸婆”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说结婚往往成了恋爱的坟墓?中国的模式,往往一结婚,很快就混成老夫妻了。女人也有问题,结了婚,整天蓬头垢面,上个厕所,在家里也开着门。那联合国女官员说性总是需要一些神秘感的,但是中国的夫妻,弄到最后,好像是左手摸右手,于是男人到外面去找新鲜的刺激。女人则守着孩子,保卫家园。所以我觉得她有一个观察很锐利,说很多中国妇女,老公在外边,她把一切全部献给孩子,特别地爱唠叨,这其实是一种性能量的转嫁,你明白吗?她把被压抑的能量,全投资在孩子上,嘴变得特别地碎,爱唠叨,爱埋怨。你知道都是一个能量,那个出口没有,在这个出口。

孟广美: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中国人,对于母亲这个身份很神话。我有一些男性的朋友,老婆生了孩子之后,他们没法再行房了。因为他的妻子有了母亲的身份之后,他就办不到了。

许子东:“文革”当中有一个阿尔巴尼亚电影,一句台词当时国人不

理解。有一个女的做头发，人家就问她，你为什么整天打扮那么漂亮？女的说为了让我丈夫更爱我啊。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奇怪，结了婚了，老婆还要叫丈夫更爱你，还去刻意打扮，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

孟广美：看她是个不守妇道的人。

许子东：已经结婚了，还什么爱不爱，还要特别打扮，让你老公更爱你。阿尔巴尼亚电影的这句台词，让当时忙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的广大中年男女，感到一点震动。

窦文涛：现在打扮也没用，我觉得也没用。

许子东：有个作曲家叫 Andrew Lloyd Webber，做了很多音乐剧，《猫》，《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最近他新出的一部歌剧《Love Never Dies》，里面有一个主题歌，原名是《我的心学得很慢》。其中有一句歌词就说，无所谓输，无所谓赢。就你们刚才讲的输赢，韦柏对爱情的总结就是说，最后男女之间无所谓输无所谓赢。

孟广美：那是没有赢家的。

许子东：所以女的从来不赢，男的也就未见得赢。

（几个月后，同一布景，同一话题。）

窦文涛：广美今天来跟我们谈一个现在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大龄女青年怎么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过去你自己用过的一个词？

孟广美：剩女嘛。

窦文涛：神圣的女性，真的是很多很多问题啊。在网上你看过吗？有些剩女已经开始，怎么说呢，就是广州话讲“晒幸福”。晒幸福炫耀，我的体会什么人一开始炫耀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人就有点内心凄楚了。就是说，她开始说，你看我做个剩女多好啊，我虽然 30 多岁，但是我一年的工资全我自己一人花，我买了一辆小吉普车，然后我怎么怎么样，单身女性我现在过得很充实，男朋友找着了就找着，找不着我也不怕……

孟广美:我觉得那是一种无奈中的幸福感。

许子东:广美现在可以办剩女学习班。收费,传授。

窦文涛:成功经验报告会。

孟广美:这样子讲吧,不管我有没有结婚,我不是单身。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崇拜爱情、相信爱情的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爱情。

窦文涛:对,这个我佩服。

许子东:我插一句,范柳原婚后跟白流苏说,我们以前一直在谈恋爱,但没空恋爱。

孟广美:这20年我一直处在一个恋爱的状态里面,那我希望我订婚之后,甚至于我结婚之后,我要继续谈恋爱。文道有次问我,那你到底想要嫁个什么样的人,我其实没有标准开出来,我就说我需要被我仰视的男人。

许子东:这个我听你说过的。我就推荐她NBA运动员。

孟广美:太坏了。我相信所有的女人寻找的都是一个自己能仰视的男人。

窦文涛:哎,还真是,为什么很多女的都说我要是找一个男人,我必须得崇拜他。

孟广美:必须的。还要看你要崇拜些什么东西。我需要一个不但要我仰视,而且能够驯服我的人。

窦文涛:天啊,你将要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听说过美女驯野兽的,你这是反过来了。

孟广美:所以你说该怎么办,我说就是你不要放弃,你要相信爱情。

窦文涛: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一个女人,恐怕自立是重要的。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这就是愿赌服输,然后相信爱情。

许子东: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社会在急速变化中,短期内贫富悬殊在眼前拉开,经济的压力这么大。很多女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自己身边认识的人,长得并不见得比自己漂亮,也不见得比自己

聪明,但是她们已经在宝马车里笑了,我还骑在自行车上哭。这样的時候,很多女的早早就想好了,也不是说不自立,但是总觉得她也要仰视,需要找到一个人,让她按照她们的说法,可以节约很多奋斗过程。

这些情况都可以理解。这里有两种道德线的划分,关于男女关系。如果认为女性通过男女关系获得经济(政治)好处天经地义,无可非议,那么道德的区分就在获得好处(结算)的周期:以小时现金计算被认为是“失足”(最近有建议改称“性工作者”为“失足女性”,令人啼笑皆非);以天、月、礼物LV计算被认为是“浪漫”、“艳遇”;以年份、契约、房产计算被认为是婚姻和幸福。

另一种划分则以为真正的爱情不应以获益为出发点,追求这种爱情当然要以自立为前提。

中国目前的情况,虽然我们在讨论美好的话题,但也要“直面惨淡的人生”。什么是现实的问题?婚姻也好,同居也好,恋爱也好,男女之间有些普遍性的冲突。说出来我们男人不好意思,中国男人骨子里面,其实是有点“一夫多妻”的“集体无意识”倾向——既有文化的传统,数千年一夫多妻制度,近几十年才废除,又有生理上的本能,动物多撒种确保繁殖成功率。女性是不是呢?生理上是不是很难说,比如多次高潮的生理机制。但是在现实文化制度上女性倾向一夫一妻,有社会经济的理由。中国的现状,男性寻找变相“一夫多妻”,分分钟是犯法、危险、堕落、犯罪,自己都觉得是犯罪的。那女的呢,常常要忍受不合理现实,自己还要遵守一夫一妻的道德。我这里说的“一夫多妻”要打引号,包括三陪、小秘、二奶、援交、性开放、雅痞嬉痞等各种形态。这些现象或许也都有人性依据,但关键是,女的为什么不可以?她必须面对男人的花心,天性也好劣习也好,她为什么不这样做?是不被允许,还是这样做得不到快乐反而更痛苦?和社会资源不平等是否有关?我不是在讲个别人具体事,讲的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性别战争……

窦文涛:许老师把实话说出来了。

孟广美:是,但是他刚抖出来的实话,我要再抖出另外一个实话,就是女性,非常追求纯洁、纯净爱情的女孩子,不能够接受所谓的一夫多妻的游戏规则。而且,如果她面临的这个男人不强,分分钟他害怕这个女孩子就要超越他,他是没有办法去驯服这个女孩子的。现在有很多的姐弟恋,女的经济上强于男人,其实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那男孩儿终究要长大,他终将要面临很多社会对他的眼光、对他的舆论。

许子东:记得毕彼德演一个小老头越长大越变小,这部电影把男女人生的各个阶段用戏剧性地方式铺开。开始是男的幼年老头,女的显得比他小,观众可以接受。男女年龄相仿是最黄金的。最不能承受的是女的渐渐变老,男的则越来越年轻,越变越帅。所以电影是非常戏剧性地展示了现在世界上男女战争的生理因素。

窦文涛:这个就是此起彼伏,你就看出这个男女本身的曲线,人身状态,不同阶段状态的曲线,它就不一致。

许子东:所以,很难期望一个比你小10岁20岁的纯洁的男生,可以跟你相守到老。但眼前的美好也不应放弃。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曾经拥有,它必然会天长地久,在你的心中,所以要把它看得很美好。

窦文涛:就是爱情。

许子东:就是爱情。其实,广美刚才讲这个具体例子,仔细讨论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她前面讲的女性一定要找男性仰视、崇拜,这是女性主义现在要批判的观念。当然你找到你的幸福不假,但是从学术界来讲,这个正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塑造,从古至今要把女的塑造成要崇拜男的。

窦文涛:文化上。

许子东:对,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生理上都是这样,这样形成男权。但是反叛这个男权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讲,是非常非常困难,你刚才讲的朋友的困难,比你的困难更值得讨论。

窦文涛:我觉得其实有两种观察的角度,一种叫从心出发?就是从

你个你的心出发,那么对于你来说,就是我心狂野,或者说是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活着就是跟着感觉走,去找我爱的人,你看这是你的这个故事,这是从心出发。

孟广美:为什么要这样从心出发?因为我觉得你的智力跟你的智慧,你有时候会判断错误,所以有时候你的脑袋想的事情,是 yes or no、yes or no,你会做错误的决定,但是如果你的心是这么想的,这个是永远不会错的。

窦文涛:但是广美,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也曾经被欺骗的。也是从心出发。

孟广美:是啊,所以你听到我怎么着、怎么着了么?那个是我的选择,我曾经做过的选择,所以我绝对不会去怨恨别人,再怎么样错,毕竟那是曾经,没有人架着刀子说,你非得怎么着、怎么着。

许子东:文涛,这就是欧洲浪漫主义的原则,说人的理智会犯错误而感情不会。我想,不是说感情不会犯错误,而是说感情犯的错误没法后悔。

窦文涛:从心出发是一种角度,但是还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出发,从天地不仁的角度出发,从市场、从商业出发,你又会发现,任何一个人的择偶形式,无疑不在规律中。

许子东:讲策略、有技巧。

窦文涛:对,条件好嘛,就拥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自由,条件差的就委屈一点。甚至说夫妻俩,当年男追女的时候,女的条件好,男的需要仰视这么追,好,女的下嫁给他。多年之后,女的年老色衰了,男的混成了个CEO,大把钱,马上这形势,甚至你知道吗?我就听说过男的跟老婆为什么闹到离婚呢,就是冷冷地说,现在不是20年前了,你明白一点吧。你知道多寒心,作为老婆听了。

许子东:但这就是需要所谓的爱,只有爱这个东西才克服这所有一切。那些东西其实真的都是表面的,人在世界上,就活几十年。你跟一

个人在一起建立的各种各样的细节,足以克服你所谓刚才讲的那些地位、名声、钱。最后到你人生快走完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只有细节是最重要的。

孟广美:你的论调跟我老公是一模一样啊。

补记:这集节目中我的最后一段话,后来在很多博客中被引用。

2010年12月18日修改(参考凤凰网“锵锵三人行”

2010年11月3日文字实录)

足球与女人

许子东：女人第一次看足球，最重要看进不进球吗？假如没有进球，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看谁射门多。

竹幼婷：对。

许子东：谁射门多要是还看不清楚的话，就是看谁跑得快，最后就看发型，帅不帅，现在她们有统计，星座之类的，什么都有。

窦文涛：你说女人在这个时候能理解男人吗？

竹幼婷：是很好观察男人的办法。

窦文涛：你观察到什么了？

竹幼婷：你会觉得，在一个球赛里面，如果一个男人忽然因为进球大喊，这个男生够开放，不会很压抑。

窦文涛：够开放？

竹幼婷：他不会很压抑的。

许子东：真性情。

竹幼婷：真性情。所以我很喜欢到兰桂坊，就是猎艳的好机会。你会看到一群男人，多少男人同时在一个酒吧里，我流口水。然后我们可以在旁边这样观赏，有些男生看到输了球，尤其西班牙那一场，太爆冷门了。我看到太多男人输了球，还是说，我给你讲球门不对，我给你讲那一

球真的是越位，他到现在不肯认清事实，你知道吧？所以你可以观察男人，在球赛里是好办法。

许子东：就是说男人太执着不好，不肯正视现实。以前老话说赌场挑女婿，就在这种场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忘情的。

窦文涛：现在她们看世界杯，旁边一个女的说，会不会有些时候有一点表演的成分，因为我看见他们这么摔，我会很心疼，我说这样摔下来，那到争八强、四强的时候怎么办。

许子东：大部分的时候，你不必替他操心，你要想球星大都是千万富翁，甚至都是亿万富翁。在场上那些汗淋淋的，他们的财产都过千万的，所以他们是靠摔出来的千万亿万，所以你放心，别替他们操心。不过幼婷的话有意思，看球，看男人的好机会。我有个同行李陀，有次在美国看美式足球时他说，女人大概最喜欢美式足球运动员的屁股。女生今天告诉我，原来她们不只看场上的男人，更看看球赛的男人。套卞之琳的诗，我在电视机前看男人，女人在旁边看我看别人……

竹幼婷：对，我现在一直在观察你。

许子东：因为男人在看球的时候，精神是裸体的，很容易被女人看到他的精神状态。

竹幼婷：因为是防御力最低的时候。

许子东：但是你只是看球的男人，等于是收了礼物，你只看重了盒子。你还是应该看球，球赛跟爱情还有关系。假如说进球就等于目标和成就，等于是婚姻，或者是成功的同居，也就是你成功的爱情。失球，简单来说就是离婚，或者是这段关系的破败。你要把足球设想成你的全部的人生，那么射门是什么？射门就是谈恋爱，就是 KISS，或者是做爱，或者是以前保守一点，拖手。你看西班牙跟瑞士的比赛，西班牙是浪漫，恋爱谈了二十多次，没结成婚，这是浪漫男人。瑞士呢，很实际，三次射门，就进了一球，就 KISS 三次就结婚了。

窦文涛：也有比这儿糙的，我那天闭上眼睛听他们体育解说，说范比西，推、搂、插、射，一气呵成。这个东西，幼婷，你感受到没有？

竹幼婷：有，对中国女人来说，第一，如果看这次世足杯，不要相信豪门，法国队、英格兰这种传统的豪门，或许富不过三代。

窦文涛：要相信贵族。

许子东：女人的足球联想：不信堕落豪门。

竹幼婷：第二，谈恋爱里面，光是一股拼劲也不行，像是朝鲜，我一股拼劲，但是我的技巧不行。

许子东：也不能嫁给矿工。

竹幼婷：他虽然一辈子努力，但是他努力不到点上，最后还会失败的。

许子东：看出体会来了。真是女性角度的足球人生。我也有体会，我一直觉得，NBA 美职联，现在不准叫 NBA 了，中央有规定。美职联、美式足球的游戏规则，在操作层面更符合电视播广告的需要，在象征层面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有紧张期，有休息期，有关键时刻，比较可以预测和计划。但英式足球更像古典、浪漫人生，因此也更像人们的爱情生活：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生，也许一次射门成功决定一生幸福，也许四五次破门得分仍然没有胜利。每一次抢断争夺，就像每一次深情回眸，每一次拖手晚会、每一次似是而非的艳遇，虽然能直接导致进球破门和胜利的机会或者只有千分之一，但永远不能放弃。也可能就是这一次，这一细微犹豫和选择，决定你的命运？很可能一次放弃，就会导致失足之痛。这也正是足球的魅力——90 分钟，120 分钟，1 分钟都不能走开！

窦文涛：所以幼婷，多看看足球。

竹幼婷：多看看足球。你不知道男生看那种女生和女生之间，而且会觉得特别兴奋，觉得是特别美感的事情。女生看男生和男生滚在一起也是一样的。

窦文涛：兴奋。

许子东：女生看足球，和看《春光乍现》一样兴奋？真没想到。

2010年12月19日修改(参考2010年6月19日

凤凰网“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原始男女的故事

很多年前,某日早上,原始男人甲与原始女人乙在山洞欢好以后,正准备下山去捕猎什么动物。这时他发现另有几个原始男人趴在洞口形迹可疑,女人则躺在铺着干草的石板上又余兴未尽。怎么办呢?

女性在短时期内可以有多次高潮,这点男性人类不行。在没有文明道貌约束的情况下,一个原始女人有能力有时也有权利应对几个原始男人。这个岛上男女人数大概相等。一般说来,男的性活跃期(15—65?)大致长过女人,女人还要减去例假、怀孕期等,所以,如果两性欲望平等,则总体上供求关系总是无法完全平衡。自然的和谐平衡法包括战争(主要减少男性数量)、原始性工业(这是后来文明人的说法),还有就是现在男人甲所要面对的情况:别的男人在看着刚才是他的女人……谁叫他选了大家都喜欢的这一个身材好又年轻的女人乙呢?怎么才能确保女人乙在他不在的时候不和别的男人欢好呢?怎么才能确保以后可以知道哪一个小孩才是自己的种呢?

大致来说,方法有三:

1. 将女人锁在山洞里,限制行动自由。后来数千年,此方法各种文明各个国度皆用。婚后女人只在内室不见异性外人,或者要蒙面披纱之类。中国妇女天足美国妇女选举,才不过近百年的事。锁链慢慢进化为今日象征性的 99 金手链脚链。见过一“师奶”(家庭主妇),她说你看我

整天干家务活，白金圈已经褪色了，只有这个钻石还是那么熠熠闪亮，真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人们看电影《色，戒》，里面的女人把钻石看得是多么的重，看得旁人心里发颤。这是锁链圈套从功能向意义的久远的文明转化。

2. 不锁，有行动自由，但告诉女人，我会带野猪肉或兔子回来，所以，在山洞里等我（别理他人）。女人睁大眼，点点头，咽一下口水，从这一瞬间起，“食”跟“色”就有了诚信逻辑关系了。今天，野猪肉换成LV、奥迪TT或豪宅首期等等，面额变了，饭票没变。子曰食色性也，为什么不说是色食性呢？一般理解是女人较重视饭票，男人更好色。但小说《色，戒》中引用的辜鸿铭的话，说到心灵之路，男的是通过胃，女的是通过阴道。次序好像有点不同。看上去男人甲是用饭票换取自己“色”的满足，其实是要用饭票弥补女人乙对性的未满足。何况，“心灵之路经过阴道”，也可理解成生殖与爱。女人害怕生育，又害怕没有生育，更害怕不能生育。说到底，生存与繁殖，乃人类本能。

3. 饭票已比锁链进步，但更高级的控制则是语言和观念。纯洁，温柔，贤淑，可爱，优雅，忠贞，节烈……各种专给女性的语言化妆品，其核心功能和锁链饭票一样：不要不可不必不许和其他男人有性关系。男人嫉妒是社会训练出来的人性，真正动力是繁殖本能。女人嫉妒则更是生存竞争本能。当然这第三种洗脑方法最无形也最有效，明代女子订婚后丈夫死了，女人守节，宁可自己毁容亦拒再嫁。当代女性艳妆浓抹性感逼人，但嘴里心里皆以泛爱为耻。

直到今天，男人控制女人的基本方法，还是这三种。

2011年5月25日改写

批判“黄段子”

这期想保留谈话“原生态”，全无删改。这样处理谈话稿，本书中只有两次，另一期是2009年2月“方言与政治”，但加了注解。本期讨论“黄段子”（2009年9月7日），事先三人竟无准备，全部即兴发挥，却也好玩。录下给所谓电视言论作一个实例分析。以下是凤凰网上的录音文字，应该是网站工作人员根据节目录像整理的（我有一些文字修订）。特此致谢。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就开始了，广美还在手机上找黄段子呢。

孟广美：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好可怜，你们今天讲黄段子。

窦文涛：谁说我们今天要讲黄段子？我们今天要讲反黄段子行吗？

孟广美：我们要讲反黄段子，然后我就想要共襄盛举一下，结果发现我手机里一个黄段子都没有。

许子东：那说明你的玉女形象扮得成功了。

孟广美：完全不是，我的生活一点乐趣都没有。

窦文涛：不是？

许子东：你是号召人家给你发是吧？

孟广美：麻烦了，麻烦大家了。

窦文涛：许老师，这事儿跟我老家有关系，我们河北，我们河北的一个县最近成了全国的典范，也不知什么典范，反正是上《人民日报》了，我把这条新闻来给你们播报一下，最近跟赵忠祥老师学了点播音，广美你听听，你看我能不能当播音员，咱就改了，播报新闻，听着啊。据8月10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彻底杜绝低俗信息的传播，从7月10日开始，河北深泽县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了“低俗信息危害之我见”专题讨论活动，截至目前，已召开专题讨论会480多个，共青团、妇联等有关社会团体向全县发出自觉抵制黄色手机信息的倡议25个，怎么样？

许子东：听到摄影棚里一片笑声。

孟广美：窦老师，您没事儿吧？

窦文涛：自个儿给自个儿鼓掌。

许子东：摄影棚里一片笑声。

孟广美：我听到了。

窦文涛：一个荤段子用了480多个会去讨论，上吉尼斯了吧？有的网友评价，说这本身就是段子。

许子东：他们开会的时候怎么讨论段子的？把段子拿来解剖啊？

窦文涛：后来这一痛攻击嘛，人家那个纪委书记出来接受采访，就说我首先要申明一点，就是广美刚才说的，说网上都在说我们开了480多个会讨论黄段子，我们不是讨论黄段子，我们是讨论反黄段子，打击黄段子。

许子东：反黄段子反了400多次。

窦文涛：对，这个书记说了嘛，这点我要明确，我们不是在讨论黄段子，我们禁止的是低俗信息，讨论的是危害性。说480多个会，大家是花纳税人的钱嘛，你们这么多党员干部，全县的这么多机关，为了一个反黄段子的事儿，从7月10号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天，有人算平均一天就得开几个会反黄段子。后来这个书记说了，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我们这个反黄段子的会有的开个十分钟，有的开个两三分钟嘛，有的是开正经工

作会的时候。

许子东：有些就是交流一个黄段子嘛。

窦文涛：人家是严格禁止的，就是中间穿插嘛，书记甚至还说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耽误上班时间，我们上班之前，正式上班之前花十几分钟时间说一下这个问题。

许子东：那你说反黄段子，你首先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要是不知道什么叫黄段子，比如说在座旁边有一位女副书记，对不对？她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黄段子，那要举一个例子，你能举一个例子什么叫黄段子吗？

窦文涛：孟书记，什么是能够对你构成妇女身心伤害的黄段子？

许子东：危害的。

窦文涛：孟书记说一个都没有，你来吧。

许子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听过一个，不知道算不算黄段子，我听过这么一个段子，你听一下，你本能的感受，对女性构不构成一种威胁。说有个蚊子进城了，然后看见前面有波涛汹涌，“叭”咬了一口，一吐，硅胶来的。这年头食品安全真成问题，喝口奶都这么难。算不算黄段子啊？

孟广美：不是黄段子吧，但是你也没有很好笑啊？

窦文涛：对，这说明许老师笑话没讲好。

许子东：可是这是预言啊，半年以后就出来三鹿奶粉的事情，这个段子在它之前出现的。

窦文涛：也确实是，人家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他让全县举报，举报党员干部，他说我这个不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因为党员干部，他说，不能搞这个。

许子东：他的老婆可以写。

窦文涛：但是据说没人举报，人家说这玩意儿也确实有个操作性，难道说看了别人的手机去举报？这又涉及侵犯别人个人隐私了。然后再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定位这个黄段子？然后这个书记说这个不言自明嘛，当然我们最后要处理你的时候，我们会开会研究的，这事儿到底算不算黄段子。

许子东：什么叫不言自明？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算不算呢？你作为女的，你听到会不会不高兴？因为这显然是在讲女人身体的某一部分，对不对？虽然讲食品安全的。

窦文涛：不是，许老师，实在说，她没太听懂，她没太听懂。

孟广美：干吗侮辱我？我听懂了。

窦文涛：是吗？

孟广美：当然听懂了呀。

窦文涛：那你觉得是构成性骚扰吗？

孟广美：没有，我没有觉得被骚扰，但我也觉得无聊，不好笑，还拿出来讲。我觉得最害怕的事情，因为通常一般人我想要讲黄段子，是为了好像要跟人家凑近乎，就是好像让两个人之间关系更加温。

许子东：这个好像我们现在不能讲。

孟广美：原来如此。

窦文涛：咱们就说定级别，确实你得拿出证据来，让大家来定一定，我讲的可能也不好笑，但是咱们主要是分级制开会呢，咱们在讨论，我可以讲几个程度不同的。

孟广美：还没讲自己就先笑了。

窦文涛：不好笑，咱们得严肃地谈这个问题。

许子东：我们是反。

孟广美：反黄。

窦文涛：我先给你讲这么一个段子，就是说这个男孩子整天到这个女孩的家里，大半年整天约她出去喝咖啡、看电影。后来这个女孩的爸爸在旁边看见了，不高兴了，就问这个小伙子，说年轻人，你整天带着我女儿就是去喝咖啡、看电影，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这年轻人听了很兴

奋啊，您是说能干点别的了吗？这个算不算黄段子？

许子东：这个不算黄段子。

窦文涛：你看他影射到性。

许子东：他只是暗示，他没有出现器官跟动作的名称。

孟广美：但我觉得如果从程度上来讲的话，他那个段子比你那个段子还更淫秽。

窦文涛：是吗？

孟广美：对。

窦文涛：好，那我再再说一个，这个算不算黄段子？

许子东：因为我是上半身的，他是下半身。

窦文涛：这是外国的一个，说一个神父，说有一个修女搭这个神父的车，然后这个神父和修女坐在车的后座，这个神父就去摸修女雪白的大腿。

许子东：她穿很长的衣服，就摸不到。

窦文涛：他撩起来嘛，他撩起来摸，然后这个修女就跟神父说，说神父，你记得《圣经》第129条吗？神父羞红了脸，把手缩回来了。然后晚上回家，查《圣经》，一看第129条，上面写着“再深入一点，你将获得无穷乐趣”。这个神父仰天长叹，上帝啊，业务不熟，害死人啊。

许子东：对，这个有点好笑。它关键是最后这句，它整个前面的黄的部分是一个隐喻，他引出了后面我们常规的一个道理。

窦文涛：业务不熟害死人。

许子东：就像我们以前讲过那个钱锺书举的例子，说识字的人不懂文学，就像太监，引出一句话就是“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所以它这个虽然讲了一个性的暗示，但是它最后引出一个常理，我觉得这个水平比第一个高。

孟广美：而且这有一个励志，这完全算是一个励志的黄段子。

窦文涛：励志啊？鼓励大家加强业务？

孟广美：对啊，你业务不熟。

许子东：你这个神父真是业务不熟。

孟广美：是啊，绝对是。

窦文涛：所以你发现没有？什么事儿就怕具体，一落实到具体，你会发现会出现很多争议。比如说什么样的段子叫有危害的、低俗的段子？它的危害作用又有多大？

许子东：第二个黄段子还符合一般的娱乐过去三言两拍基本的道理，三言两拍的小说你去看，一上来都是隐的，尼姑、和尚、通奸什么，但到最后就是美色从来藏杀机，都是报应的。所以它这个段子的一个叙述模式，就是一上来很不正经，但最后回到正经。

窦文涛：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东西有的表面上确实是没有脏字，可是我感觉咱要严格审起来，好像是有些黄。你比方说，咱是为了批判，我就说这个，我可不是为了好笑或者海淫海盗，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那天手机收到一个信息，我就谴责了他嘛，我说你太淫秽了。他就说一个老农，赶着一个驴车，路上也是搭车，怎么净爱搭车呢？说路上也是碰见一个少妇，要搭这个驴车，后来经过一片小树林，这个老农就说驴累了，说放这个驴在这儿吃会儿草，咱们俩到那个小树林乘会儿凉去，结果这个少妇就跟老农去了小树林。

那么在小树林里，老农就把她给搞定了，搞完了之后，又出来，然后说咱们要赶着驴车接着走。后来又走到一片小树林，少妇说了，少妇说让这个驴在那边吃会儿草，咱们俩进小树林乘个凉，老农一听窃喜，这是喜欢了。接着乘凉，然后完了之后出来了，出来赶着驴车又走了一段路，这个少妇又说，说放驴在那儿吃会儿草，咱们俩再进树林乘会儿凉去。老农手扶着树说，我去吃草，让驴跟你去。

许子东：我猜到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你会说那个少妇说，您去那儿休息会儿，我跟驴去。

窦文涛：你们严肃一点，我这是反面教材，咱们要定级别的话，这玩

意儿算黄段子吗？

孟广美：非常黄。

窦文涛：可是你看它也没有什么脏字。

许子东：有另外一个段子，我个人觉得要更干净，但是性质有点像，是蔡澜的一个专栏里边，我看过一篇。它说家里的母猪需要下种，他就很努力地非常苦地把这些母猪赶上了车，花了很大的力气赶上了车。到了一个种猪场，结果那天就叫种猪给他们下种，下完了回来了，这一天把他累死了，晚上就睡得很熟。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这些母猪都在车上排队，已经排得很齐了。

窦文涛：这是蔡澜说的啊，蔡澜说的，这在香港也算合法出版物啊。

许子东：合法出版物。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广美还较劲呢，给猪配种都是公猪去母猪家，不是母猪去公猪家。

孟广美：对啊，因为台湾有一种行业，就是牵猪走，牵公猪，牵着公猪去母猪家配种，没有母猪自己送上门的。

窦文涛：你知道为什么要牵着公猪去母猪家配种吗？

孟广美：为什么？

窦文涛：因为它去的不是一家母猪家。

孟广美：对啊，它去很多家。

窦文涛：你像过去辜鸿铭说的那个，就是说男的和女的，只有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就是这个道理嘛，一个公猪它配一堆母猪呢。

许子东：咱把这个故事改一改，就是开始这些母猪都不敢去。

窦文涛：你还别说，这玩意儿它是不是一种母系氏族的形态？

许子东：哪里是母系氏族形态？

窦文涛：就是女的住在母亲家，一辈子住在母家，然后男的要来生孩子，母系氏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你知道吗？男的走过来下种。

许子东：这是公猪。

孟广美：这有点惨了吧？因为大部分的公猪不是每个都有机会去培养下一代，只有那个最好的种猪才能够培养下一代。

窦文涛：没错，我看出来了，动物界是更加的（残酷）。

许子东：竞争更残酷。

孟广美：你一直强调的能力问题。

窦文涛：没错，没错。

许子东：就是你上次讲的“无房二手男”，歇菜了嘛。

窦文涛：我上次跟他讲，就是网上有一个标题，这个女的择偶，发牢骚说你“无房二手男”凭什么嫌我胸不大？我说这个很能反映目前的择偶态势，是吧？

许子东：对，这算不算是黄段子？

窦文涛：不是，这是网络上它的专题标题。

许子东：无房二手男。

窦文涛：这个真是，我就说有的男人，公的，我原来看过养鹿场，到了配种期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只能选出几头最优秀的公鹿来，那几个月把这几头公鹿简直给累死，你知道吗？但是大批的公鹿没这机会就在那儿憋着。

许子东：这不平等。还好，做人每人分配一个。

窦文涛：没错，我说它们怎么也不重复呢，是吧？

孟广美：你们还老反一夫一妻制，多好啊！

窦文涛：好，咱们不说这个了，说正经的。

许子东：批判黄段子。

窦文涛：这个事儿就是说一个县里，为了这么一件事儿，开了 400 多个会，这个是网上的人们聊天的一个热点话题。

许子东：说到黄段子的坏处，我们其实很容易看得到，最明显的坏处就是对女性的不公平，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男的，我们都试过，我们在吃

饭、同事开会，男的觉得可以接受的，当我们讲的时候，女同事就在旁边，她也不好意思来讲你。但是其实是引起她们不高兴的，我觉得这是最明显，而且更多的人故意用来骚扰或者是挑衅，或者是诸如此类，而且女权得不到（尊重），这是某种程度的性骚扰。但是反过来讲，我还发现有些另外的功能，比方说领导跟下面的同事偶然发一个黄段子，不伤大雅的黄段子，会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比平常做指示、发公文甚至喝酒达到更好的效果，下面的同事就会感到，这个领导是当我哥们儿。

窦文涛：这是典型的潜规则。

许子东：还有一条，女的会自己讲黄段子，在有男人的场合讲黄段子，就像喝酒一样，是向男性社会规则妥协，甚至取分的一个手段。

窦文涛：是吗？

许子东：对，你看有很多漂亮的女秘书，她要是不能喝酒，她也要听听你们开玩笑讲段子，假装不在乎，笑嘻嘻……甚至还有女同事，讲得比男人更大胆……

窦文涛：广美说说，这个咱们得听听女性的意见，这主要是以你们来定嘛。

许子东：她太纯粹了。

孟广美：不能讲我太纯粹，而是这样的，我这样讲，我忽然想到今年的端午节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到，就是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一开始是说，我忘了原版怎么说，但是意思是说现在的我就想怎么样把你剥光，把你什么什么东西。

许子东：有很多性暗示。

孟广美：对，它用了很多很多的性暗示，但是最后讲的是他剥光的就是一颗粽子，就是把它的什么皮一层层脱下来，他就形容它的味道、口感、手感，写了一轮之后，其实就是讲了一颗粽子。但是我跟你讲，因为那天我收到好多这样子的，同一个段子很多人发给我，但是我老实跟你讲，可爱的男生，我有好感的男生，他发给我，我就觉得没问题，但是那种

讨人厌的那种，我就觉得受骚扰了。

许子东：还是发的人本身的。

窦文涛：女性看人的。

孟广美：我这样子是不是很那个的？

窦文涛：没有没有，很正常的，很正常，看人的。

许子东：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黄段子跟 Hello 是一个道理，就是跟你打招呼是一个道理。

孟广美：你刚才说，如果领导给我发的话，我恐怕就会觉得是受骚扰了。

窦文涛：对，它是看人的，所以你看我从来不给女的发黄段子。

许子东：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窦文涛：我还真的是，我挺注意这个的。男人们之间他们发给我，有时候好像有交流，但是我发给女人，其实我是过滤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依据我头脑中的女性不适的标准来决定的。

孟广美：请问我是不是？

窦文涛：你？那按照你刚才的逻辑，我在你眼里印象怎么样？恶心的不恶心啊？

孟广美：不恶心，不恶心。

窦文涛：对，有的时候其实女人她恶心你这个人，你再给她搞这些黄的，她就觉得齁齁。

孟广美：更恶心。

许子东：那要是女的给男的发呢？说明什么呢？

孟广美：多半她肯定是对你有一些好感，她才会发。

窦文涛：不会吧？女的对男的有好感，就是想反追这个男的，就通过发黄段子吗？

孟广美：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想追，至少她不恶心你。

许子东：你收到黄段子，就说明她不恶心你？

孟广美：起码她不恶心你，她怎么会对一个她觉得恶心的人发有那种颜色的段子呢？

窦文涛：但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真跟这个女的有好的可能性，我不会在她之间搞这个。因为我发现有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就是哥们儿了，混成哥们儿的那种女的，我们互相之间可以搞这个，你要是跟一个两个人有可能会好的女的，老弄这些个东西，慢慢地感觉就不大可能往一块儿凑了。

许子东：说不定女的给男的发黄段子是那种，就是说她既想跟你保持亲密关系，但又不想过了那条线的。

孟广美：哥们儿多一点，我觉得哥们儿多一点。

窦文涛：有的时候女的给你发黄段子，实际上反而是给你造成一个距离。

许子东：保持一个界线。

孟广美：没把你当男人。

窦文涛：也希望你把她当女人。

孟广美：对。

许子东：这个微妙的社会，人情学啊。

窦文涛：看来男女之间互发黄段子，我总结起来基本不是什么好事儿，对自己的交往不太有利，基本上都是绝望了才给你发一个黄段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这个黄段子讲太多了，咱们还是要维护这个社会的风气。

孟广美：其实我这样讲吧，我觉得段子基本上什么黄不黄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不要伤害别人。现在想起来，我收到很多手机的段子，他们老拿农民开玩笑。

窦文涛：对。

许子东：这个现象很不好。

孟广美：我觉得这个就很糟糕。

许子东：尤其像我这个做过农民的人，对这个特别反感，现在的“农民”简直变成一个骂人的字。

窦文涛：对。

许子东：我开始以为是开玩笑的，后来发现他们不开玩笑。她对这个人不满，有个有钱的人追她，老土的样子，她就简单一句话“农民”。

窦文涛：其实咱们谁不是农民啊？

许子东：我真做过农民啊，不过也有些段子，你不能给它套上黄不黄，它可能有点性暗示，它可以讲得很巧妙。我最近听过一个，我一直觉得它在技巧上是很巧妙的。说一个家里的工人，就是家庭的佣工，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缺点，她说话太大声了，她说什么都是大声，比方说主人叫她泡杯茶，要龙井还是碧螺春啊？我马上就来了，就是她声音很响的那种。那天家里要请客了，主人就关照她了，就说你说话声音小点，你别的都好，你说话声音小点。那天吃完饭以后，大家都在聊天嘛，那个女工就出来了，悄悄地走到他边上说：“先生，我先睡了啊。”

窦文涛：这种我觉得是属于幽默的范围，这种是属于幽默的范围。

许子东：不算黄段子？

窦文涛：没错，还有一个说是保姆，你说这个还让我想起家里的小保姆，气焰嚣张，跟家里的主妇吵架，就说你做饭不如我，这个主妇就很生气，说谁说的？她说先生说的。然后小保姆又说，你长得也不如我，这主妇更生气了，这是谁说的？也是先生说的。到最后小保姆说出一个什么来，你做爱都不如我，这主妇的脸“垮”一下就下来了，说这也是先生说的吗？小保姆说不是，司机小张说的。那你说这个东西又怎么定？

许子东：这个很妙，最后这个很妙。

窦文涛：这个怎么定位呢？

许子东：这有文学性，你看它最后都是转的，它是到尾有一个包袱。

窦文涛：所以你看，我真是深有感触，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讨论低俗信息的危害性这个话题，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我反复强调，但是你看这

个人性,或者说咱们三个的人性,最后聊成了什么?

许子东:说明我们这样的题目要讨论 400 多次。

孟广美:我们今天就是第 481 次会议了,为了这个黄段子。

许子东:所以这个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千万不要忘记反对黄段子。

窦文涛:反对黄段子,对,主要是不要害人,不要伤人。

孟广美:对。

第五辑：读书笔记

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常识

梁文道出书并获奖，给“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加了一个注脚。

梁文道光头，个子不高，年轻但相貌老成，喜欢穿黑衣服，低调名牌，一大堆粉丝，自己信佛。梁文道香港人，台湾读书，父母在加州。中文大学哲学硕士未完即出来卖文(专栏)兼“卖身”(电视)。梁文道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几个报纸专栏，兼民间大学院长，在港台(RTHK)、有线电视和凤凰主持节目，还处处演讲，常参加游行，在各种声明、宣言、公开信上签字，关于环保、民主、城市建设、声援被拆迁原住民和性工作者的权利……梁文道《开卷八分钟》，每周十几本书，不少学院中人也佩服(刘绍铭私下感叹：梁是人才)。梁文道介绍世博居然令不少上海人追看(他走在南京路上其实很陌生)。当然，他最喜欢参与的还是当代中国历史最久的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因此也被人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在学院里并不一定是赞词，时有“不务正业”、“好出风头”之嫌疑；“公共知识分子”在领导看来也是麻烦，“儒以文乱法”比“侠以武犯禁”(韩非子语)更危险；“公共知识分子”在商人看来等于“公共财产”，花点钱就可收买为我所用；“公共知识分子”是否为民众尊重也是疑问，到处露脸或说书或含泪，令人想起德育老师某某某及其传人……

但在梁文道这里，“公共知识分子”终于成了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名词。

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讨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当然不只是到处演讲、常上电视、出版普及读物或参加官方民间公共团体。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于关心和自己无直接关系的公共事务（矿难后续、官员自杀、教育腐败、警察打人、上访者遇车祸……），在于保卫、拓展有形无形的“公共空间”（报纸天窗、房价神话、选举潜规则、新的野心家……），在于尊重、维护你所不认识的个人的“公共权力”——比如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强者，打到了四五个老弱病残的人，你怎么办呢？现在的“知识分子”大致有几个选择：

A. 气愤，但看看自己的胳膊，知道动手无益。也不逃走，静静做自己的事。世上总要有人种树、挖井、考证古砖瓦吧。其实只要坚持独立人格思想自由，再专门的学科，再纯粹的学术，如陈寅恪研究古代歌妓，仍然会有“公共意义”。

B. 先气愤，但几个回合以后，发现强弱形势依旧，渐渐由同情老弱病残转向研究强者心态。老是他强，总有道理吧。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多研究研究，就慢慢从批判转向迷恋。迷恋强人的风度、手段、文体，甚至思想。无意识中，也有点“士为知己者所用”的奢望，并研究强人的“独特模式”。这类知识分子现在人数不多，影响很大。

C. 不气愤，不着急，早知就是这么回事，到死（至少到我死时）都是这样。“三 K”（每个时代都“吃得开”）也好、犬儒也好、后现代也好，正是在强者默许范围，做些安抚老弱病残心灵的诗文，在弱势群体也高兴的过年过节时，再唱唱强者赞歌。总之，一视同仁，都不真正关心。有什么好关心的？关心又有什么用？我是“公共”的，天下公器，谁都可利用！
.....

梁文道显然不是 A、B、C 任何一类，但他还是公共知识分子。

再讲“知识”与“公共”的关系。知识分子是否应该,甚至必须用其专业知识来参与“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有争论,我也有些困惑的问题。余英时认为马克斯·韦柏“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专业人士(牙医、工程师、天文学家等)如不关心公共事务则不是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读书以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传统”更值得传承。这个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学者更容易更必然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更不能推论说学文史哲的必然比普通人更有“人文精神”。近年见到一些同行(如上述B类知识分子),为了更直接有效忧国忧民,有意无意调整修改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乃至价值观,结果专业精神受损,社会效果也很可疑。另一些人,则将专业研究与散文、电视分开,传承学术之外,在“公众空间”主要尽公民义务,兼宣泄情绪。在这方面,梁文道,还有陈丹青、南方朔、龙应台等人的选择值得参考。他们的专业知识与公民责任似乎较少矛盾。香港边缘文化人的背景,使他一方面不那么容易背上使命、救世责任、代言人等光环,另一方面又敢于与读者“共度时艰”,在民族主义、官员道德、政治制度等“禁区”游走。书读得比较“化”,是个人内因。读书游行可以两不误,是社会外因。网络时代,同样条件未见得人人能做同样的事。

第三讲讲“分子”——这个词在当代语境里常带贬义。“坏分子”、“反革命分子”、“恐怖分子”都是坏的,他们的反面词就不叫“分子”,而是“好人”、“革命者”、“不怕牺牲的战士”。这也许是日语汉字翻译的问题,将读书人称为“知识分子”。语义上的“原罪”却也提醒我们,在“公共空间”,你不是领袖,也不是奴才,你是一个独立的分子,一个自由的人。

梁文道这本《常识》,单篇看,大都敏感话题,充满“异见”。整体读下来,却秉持一贯的朴素道德。书名看似谦虚,其实向读者挑战: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也不知道?知识分子在学院,总能得到真诚虚假的尊敬,一旦走向“公共”面向大众,难免被人好心恶意地责骂(据我所知,这也是不少学者害怕进入“公共空间”的部分原因)。而梁文道的书名,又是出击

又是自卫：你骂我吗？可这是常识啊……

关心大家关心的事，不仅从专业知识更从公民责任出发，做一个独立的人——就这样，韩寒在博客榜超过老徐，《常识》也上了新华书店畅销榜。这就是刚刚过去的 2009 年。

2009 年 12 月 30 日写于上海，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0 年 1 月 13 日

“文革”是“兄”，今天是“弟”

以下是饭局上的流言，真实性没有保障，姑且听之——

电影制片人想改编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该书的英文译本在香港书店里摆在显眼的位置上)，有人就劝制片人先去问一下有关部门，免得到时通不过，浪费人力及金钱。

制片人私下找到相关部门的人，说起此事，并大致介绍了《兄弟》的情节：上部写兄弟两人及村民的“文革”故事，下部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这些村民及男女主角们的发迹、致富、争夺、贪婪……有关部门的人一听，就摆手说不能拍：因为上部写“文革”。

电影人又解释了一番，上部虽然写“文革”，细节夸张荒诞，其实价值观上并不出格，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的定论基本一致，写的也都是小人物，普通村民窥厕、打架、手淫、旁观等等“大时代里的小浪花”，“无论如何，您先看看作品再说”。

听到这里我插了一句：如果说《兄弟》上部是1分，下部也是1分，合起来却是10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封面很有象征意义：所有书中的荒诞严肃丑恶认真，“文革”是“兄”，今天是“弟”。

大家都不要听我议论，急着追问有关部门的人看了小说以后的意见。

电影人又去了，得到的回答是，“上部倒可以拍，下部不行”。

原载《羊城晚报》2010年10月17日

王朔语言的背后

王朔来过以后，三人行就很难做了。犹如打过野战以后，再坐下来，吃个蛋糕，喝个咖啡，多没意思。

我喜欢王朔的语言，富有战斗性。也比较喜欢的是他笑的样子，他笑的样子很可爱，他不是讲了一个笑话别人笑，或者他自己忍不住的时候笑。他不是，他其实笑的时候是跟笑话没关系，他一个人笑。能这样笑的人，一般通常都不是坏人。

借用以前的鲁迅讲李大钊，有一句话，“赤者嫌其太白，白者嫌其太赤”。就是说当时左的嫌他太右，右的嫌他太左。现在也有人就用这样的话评论余秋雨，说是雅者嫌其太俗，俗者嫌其太雅。而王朔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王朔是，雅者见其雅，俗者见其俗。

我之所谓俗雅，完全不含褒贬。在网上我留心了一下，支持他的大都是一般的老百姓，不管是反对他讲粗口的，还是欣赏他骂人的，都是从一个角度出发。但是知识圈，关心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知识分子立场，对历史的颠覆性，等等。那是一个“雅”的话题，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一个人能做到，在雅俗之间，能做到雅者见其雅，俗者见其俗，不容易。

知识分子听王朔语言，能听出毛泽东时代的这种战斗性。这个就是“雅者见其雅”。在80年代后期，评论界对王朔小说的最高评价，就

是说他颠覆解构了毛文体,或者用王蒙的话,就是“躲避崇高”,是对主旋律的一个挑战。现在他自己说是毛泽东的婴儿,人们也批评说他身上有“小毛泽东”的影子,其实也不难解释。你跟一个东西较劲打,最后手法风格都会受影响。也是过招之间的能量转换。80年代末我们在芝加哥大学,李陀说研究毛文体,原意是批判,结果越来越佩服。

一方面是时代原因。如两岸三地无论开会还是选美,大陆的语速音调总高一些。都是喝革命“狼奶”长大,都有战斗性。但也有个性天赋。如果说王朔解构毛文体,语言后面又有毛泽东精神,我觉得是青年毛泽东的东西: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你也可以说,这不是学院的,不太遵守规矩。野战军的打法,打赢最重要。比如说儒,称孔老二是小学老师,有人认为这是粗鄙化的讨论问题的方式。但也是一种陌生化的说法,不代表他不尊敬。如李零称孔子为丧家犬,其实很有研究。有些人就只看到“流氓语言”,太表面了。王朔这套语言背后,分明有“指点江山”的一面。有人说“痞子流氓”云云,但王朔也讲志愿军,讲革命的很多问题。

电视语言不允许××,好办,技术处理即可。按香港电检条例。凡有例可循的删节均无问题。问题在于没有明文规定说什么东西能说什么东西不能说,没有。要电视台、出版社自己猜,自己把握。有何后果?会怎么处罚?也不清楚,自己掂量。这种情况下,王朔语言是个麻烦。

据说最近要警惕汉奸言论。有人大代表提案,要惩治汉奸言论。偏偏王朔享受语言快感,说川岛芳子严格说来不能说她是汉奸,她是满奸,她是满族人嘛。但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应叫中奸,或者华奸。玩笑一较真,事情就严重。这个逻辑再往下推演,满族蒙古族几千年是中华文化,那么岳飞和金兀术可是内战,感觉秦桧是讲和。难道吴三桂还代表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王朔的语言快感也呼应今天中国的恶搞文化“能指”的狂欢。真有新闻，秦桧和岳飞的后人在一块研究和谐社会。说要改那个雕像，跪了多少年了，有点累，让他站起来吧。岳飞思想研究会平顶山分会的会长，和什么秦桧宗亲会还是思想研究会的一个后人，大家握手言和，要共建和谐社会。

近因当然是经济动力，远溯则是文化空白。查建英女儿从美国来北京上芳草地小学，这周学董存瑞，下周学黄继光，再下周学欧阳海。回家吃饭时问母亲，说欧阳海，血淋淋壮烈牺牲，怎么死之前，都被火车轧着了，还说要看看周围的群山和脱险的战友，还有那匹马，是公共财产，然后才咽气。这是真的，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我仔细读过，当火车轧过来他顶住那匹马的时候，写了两三页。

又如狼牙山五壮士，是真事。为国捐躯。但壮士死后，被拉上来，日本人为什么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也主张宁死不屈。战后很多日本宪兵剖腹。这些背景，课本不讲。

所以说是这一整套矫情的历史教育背景下，才能看到王朔语言另一种“矫情”的意义。在他的挑战后面，就是因为有这么多董存瑞、黄继光那些主流叙述在，所以他的讲话，老是挑错，老是挑跟主流不一样的支流。延安过来的人听了可能不喜欢，你怎么老找我们的茬？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有这些“茬”，只是为了革命大局要“演”下去。后来的作家，一路从莫言开始都改写革命历史的，《红高粱》里打鬼子的不是国军亦非八路，而是土匪。乔良《灵旗》就写长征中的败仗——湘江之战。王朔是一个恶搞挑战型的，说上甘岭打来打去，为什么多打两三年？就是因为一个俘虏遣送问题，因为美方坚持所有的俘虏都应该自由选择，我们坚持要俘虏回来，不要去台湾。诸如此类问题，在一个大的叙述以后，这些“玩笑”就是挑战。

我儿时对抗美援朝的印象，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后来才知道，彭德怀打到了汉城，补给不够，当时美国人提出的议和条件其实

不错,包括让中国入联合国。但我们不肯。

80年代,挑战严肃。90年代,又恢复红色教育。2000年代,恶搞成风。王朔语言,也经历了三个时期。

2010年9月25日修改(参考凤凰网“锵锵三行人”文字实录)

新白话与简体字

——对话陈丹青(1)

(主持人**窦文涛**:“五四”来了,90周年。“五四”太复杂了,为什么要谈“五四”?现在有的大学生,已经不太清楚当年“五四”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五四”是个“青年节”。但是我自己想想,“五四”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发现我也糊涂了。丹青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实际我们到今天,还都生活在“五四”的后果里。不说别的,就说这语言,咱现在说话,写文章,用的白话文。“五四”那时文言白话文之争,我就觉得很奇怪,请教你们。一种语言,还真可以说是几个文化人,生生地这么给琢磨出来,革新推广出来?周作人、鲁迅、钱玄同,说是在某天晚上,几个人开始聊天,大骂这个文言文,说中国为什么落后?)

陈丹青:不、不,不是他们,最早是胡适。胡适在美国就开始提“文学改良刍议”。这个应该你说来。

许子东: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跟梅光迪等几个人划船。想起来,影响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运动,影响我们今天全部生活,居然是几个留学生,边划船,边聊天。聊什么呢?就是白话文言比较,哪些地方是文言好,哪些用途是白话好。到他们争论时,有几点大家都公认了:做生意,白话好,甚至政治文章,也是白话可以。别的,生活当中都行。但是只有一样,白话永远超不过文言,到今天还在争论,就是文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检讨为什么我们弱。检讨之一就是觉得是我们的文字太难，“手口异国”，不利于教育。王照、劳乃宣等想出一个方法，说办两种学校：一种学校就是培养做生意或农工一般的用途，教白话。还有一种学校，仍教文言，就是写诗的、文学的。按今天的情况，大概没多少人上的。但那个时候“士农工商”，文学被认为是高档的。但这种双轨教育行不通。“将相本无种”，谁愿让他的小孩从小就读一个第二类的学校呢，只能做生意，不能做诗，那个时候人不愿意。用今天的说法，不愿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当时在船上的争论焦点就是：梅光迪说，白话什么都好，写诗不行。胡适说，不对，白话也能写诗，就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胡适文学才能有限，为了白话文运动，不惜自己上阵。

陈丹青：这里面还有很多事儿现在不太说了。其实所谓白话文的推广普及，远远早于胡适。是谁做的呢？其实是洋人做的。传教士，在19世纪末，也就是在光绪年的前面，就已经出了几百种白话刊物。所以实际上在新白话运动之前，差不多有五六十年之长，想想看，半个世纪，就是东南沿海一带，其实已经有很多白话杂志、白话报纸。所以我们通常把账算在“五四”，或者再早一点，《新青年》时代。其实不是这样，这是一。第二，还有一件事情，也不太谈到，学者圈里会谈到的，就是1905年废除科考。废除科考这一下子，写文言没出路了。再过几年，帝制就没有了，皇室就塌了。文言文过去的一个官方地位没有了。所以后来白话文能够这么快出来，是有原因的。不然两三千年一个文字语言系统，你几个人，十几二十年，就能把它扳倒？

许子东：当时他们，我忘了是胡适还是茅盾，在北京街头就收到传教士给的传单，有的是反对裹小脚的，其中也有一个传单，我父亲后来也跟我说过，他小时候也听到过，就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这是以国家富强为理由改革文字。今天或许有人会认为文化传统比民族—国家更重要：“中国可亡，汉字不灭”？

（**窦文涛**：当时林琴南，就是最早用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的那个复古派，他说你们老是把这个“文”跟中国的“弱”联系到一块儿。他说好，科举是中国之大患，现在科举废了。然后又说这个中国之所以不行，全是文言文不好，你们把文言文也给废了。可是都废了之后，怎么中国还是不行呢？他当时发出过这么一个疑问。）

许子东：关于林琴南，近年来王德威的书，在学院里影响很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说现代性的这些东西，浪漫、救亡、启蒙，林琴南都翻出来了。其实他跟梁启超两个人，帮“五四”准备了思想资源。所以学术界现在有一个似乎有点贬低“五四”的说法，就说“五四”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晚清做了准备。

陈丹青：是。

许子东：“五四”只是一个爆破口。但爆破口，也很重要。要放到全世界来看，我觉得就不可思议了。所有的国家，从传统社会，转到现代社会，比方英国有克伦威尔，法国大革命有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德国又有俾斯麦又有康德，美国有杰斐逊，日本有伊藤博文、福田谕吉，总之，都是哲学家、政治家，都是法律或军事起关键作用。只有我们中国这个“现代性”转折点，却是从讨论文字开始，怎么写文章，说的是要不要用典，用不用排比，不避俗字俗语等。你想想看？

接下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来一篇《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的题目，一个叫“改良”，一个叫“革命”——后来100年中国就在这两条路中彷徨。两个标题，预示了100年中国的基本选择。

（**窦文涛**：丹青老师，我不明白，你从你的感觉上讲，变成白话文，好，还是不好？我问得简单。）

陈丹青：这步路，是一定要走的，“五四”做的所有事情，到了那个坎儿上，它一定要走的。我们现在要去检讨的就是，这步路后来怎么会被别的情况劫持了，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情况。（**窦文涛**：劫持？）我觉得是劫持了，它被文化激进主义，它被政治潮流，它被政党意识，包括被国内国

外种种势力劫持了，或者使它走到另外一条道上去了。就当初“五四”几个发起人，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变成这个意思，我们都在这个意思的后果里面，你明白吗？

刚才子东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其实不是一个学者，我没有研究过这些事情。但是最近我看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就叫《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作者是一个年轻人，“70后”，一个女学者，叫李春阳。我非常惊讶，就是她细细地捋一遍整个白话运动的前因后果，大量的资料，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我都不知道。语言学家的、革命家的、文人的、洋人的、古人的都有，就是关于语言问题、文字问题、白话文问题，来支持她这个论点，就是“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她说我们都在做新白话，实际上，有一个庞大的旧白话传统，旧白话传统，差不多是从宋就开始了，到明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那些小说。“三国”、“水浒”，到清的《红楼梦》。她说“五四”一共只有两个文体家。就是说白话文运动，没有什么成绩。所谓文学革命，只有两个人，就是周氏兄弟。而这两个人之所以白话好，是旧白话，根本不是新白话。然后再往后，张爱玲是公认的，小说语言是最出挑的。她的传统也是旧白话，而她受谁的影响？韩邦庆、张恨水，也是旧白话。甚至她文章里提到，很有意思，就是汪曾祺，当时给样板戏写的剧本，我们这代人文化大革命时倒背如流，包括像胡传魁阿庆嫂那个对话，然后像杨子荣和那个座山雕的对话，都是旧白话，不是新白话。

琅琅上口，读得有音节、有快感。所以她说有一个新白话和旧白话之分。第二她说这个“新白话运动”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会被另外一个势力，我是叫做劫持了，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还有一个叫“权力崇拜”。当初胡适提白话文，是为大众的，但大众很快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词语，就是后来再进一步分成你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看你和大众结合不结合。而结合这个标志，你话一出口，文章一写，你用的是白话还是文言？帽子就来了。

李春阳的论文总结说,人们说文言是腐朽的,反动,不能载道,李举了两三个有力的反例。章太炎是研究小学的,是鲁迅他们的老师,可他最革命,非常激进。他用文言来宣布所有的革命理论。还有一个“梁体”,梁启超文体,一直到今天都是政论文章的一个典范。再有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林琴南。所以说文言根本不是不能够承载先进思想,不能够发起革命运动,no,非常有力量。而那种铿锵有力的文章,你用白话去写,根本没那个效果。

这篇论文,厉害在哪里?它是从基本单位开始来算这笔账。所谓基本单位就是我们开口说的话、我们下笔写的文章。最后的结论,经过漫长的一个考证过程,结论就是文言已经被打倒了,可是新白话从来没有成熟过。我同意她这个观点。

许子东:顾彬最近有些话引起很多争论。他用德文写了一本《中国20世纪文学史》,里边有一个观点,也说周氏兄弟的文字,在当代的作家里边是看不到的。

陈丹青:不、不、不,顾彬的论点会引起公愤我相信在中国,他一句话,他说中国当代作家语言太差,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一个国家在一百年里面一个新文学,你可以说他写得不好,境界不高,主题不够深,或者这个那个,你说他语言不好,这什么意思?

许子东:前不久我们这里开会还讨论了,这个也很不公平。这些作家我们都认识,很出色的,有王蒙、余华、莫言、王安忆等,你希望这些人,写出来的东西像张爱玲、像周作人、像鲁迅那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写作,他们是在下放、插队的情况下写作。

陈丹青:但是为什么会有“文革”?和白话文有没有关系?

(窦文涛:我有点恍惚了,你们这意思,今天我们写文章用的这个语言,不大好,是吗?还是说……)

陈丹青:不是不大好,它跟中国汉语传统是中断的、割裂了,它当中

夹杂着大量欧化词,这个没错,日本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它也开始注音,然后是拼音,那现在在电脑上都已经全部普及了,在小学教学里面全都普及,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语言的一个品质,然后语言的一个知识背景,语言和传统的关系从此断掉了,从此断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不是老在讲国学?什么先秦诸子的文章都要读。实际上我们伤是伤在——当我们返回去读那些文本,但是我们的思维习惯,已经完全不是那一套了,完全不是那一套了。

许子东:关键是最早提倡实践白话文的“五四”的这些先锋,他们强调新白话文,但他们自己是有旧学根底的。30年代,包括最激进的新文学家,像茅盾这些被批评为语言很欧化,小时候也读很多传统的东西。问题是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后面的人,没有时间去读以前的东西。他们完全不需要科举了。文言没必要读了,读这个东西是没好处了。刚才讲的这些争论,当时的瞿秋白、茅盾他们都讨论过。当时认为大众化是一条出路,走民间道路,所以后来延安毛泽东提出这个东西,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希望。但我们要正视一个现象:在1949年前中国人口是四万万五千万,四亿人中识字的人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是10%。换句话说,有四五千万人。可是新文学的读者,最多不过几百万人,一般是几十万人,一本书印几千就算是畅销的。就是说新文化,虽然今天我们认为它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经过后来不断的描述,变成了历史发展趋势。可是在当时只是百分之十的人,十个里边只有一个。你看巴金小说就可以知道了,读《新青年》是大逆不道的,只有很少数的人。大部分的人读的还是“鸳鸯蝴蝶派”。而这些东西到了1949年以后,因为政治原因断了以后,它就被普及的革命的东西所取代。这种就是所谓“新白话”,一直没有找到文学的支撑。

(**龚文涛:**哦,我明白了,怪不得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文化叫水泥地上长草嘛,断了这个渊源了嘛。)

陈丹青:对,断了渊源。

许子东：鲁迅他们这一代人，旧学了得。我小时候看到他说的话，青年人应该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我就很开心，因为当时正烦读文言。我父亲把我骂了一顿，说人家读了多少的古书才可以说这句话。

作家是一个民族语言的优秀代表。就算看当代，几个大家现在称赞的作家，还的确是喜欢用比较“旧”的白话，包括阿城、贾平凹。延续着这个传统，汪曾祺，再往上是一张恨水、张爱玲。但是我又想说，当代作家没法像周氏兄弟那样写东西，这也不能怪这些作家，因为这些作家也很愤怒。最近和王蒙讲起，他就引用余华的话，说《荷塘月色》，不就是因为作者死了，才成名篇。我们不死，就没法变成经典。虽是开玩笑，那意思也就是说，你看像张承志的文字，一定生长于自己的语境。

那把这个问题放大来看，就是我就突然产生一个更大的疑惑，到底我们做中文的人，数千年走下来，究竟现在是掉到了一个沟里还是流到了一个海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假如我们原来走平原，假如说把现在的这个白话文看作是整个中文的一个歧途、一个断裂，那我们等于现在掉到沟里，那总有一天我们会重回到平原。或者说我们原来在陆地走，现在到了海上，forget，永远不会回到那个时代的。

陈丹青：我好像觉得是在海里，被放逐了，回不来了，被放逐了。繁体字问题我们回头再谈，我还是想回到李春阳的论文，《白话文运动的危机》。里面提到一个情况，是其他国家罕见的，就是废除文言，铁定要用白话文，在国民政府是用政府行为完成的。

许子东：章士钊教育总长。

陈丹青：用政府行为完成的。而解放以后 1956 年推行简体字，强行推行简体字也是由政府完成的。所以两届政府都是用国家力量，在语言问题上就是像法律那样，就是制订了什么语言可以用，什么语言不可以用。这个非常厉害。

（窦文涛：最近“两会”，说简体字、繁体字，有一个最雷人的提案，一代表提出来，就是像你说的咱们能不能从海上找回来。就是说我们这个

简体字有问题，搞这个简体字，断裂了中华文化。说这个繁体字奥妙无穷，里面含有很多中华民族文明的密码。因此这人就提提案，说我们不能用十年时间，再把繁体字恢复回来。这个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要看下去，因为这个能够在《南方周末》整版讨论关于简、繁体字的问题，它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实际上跟这些年的趋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越来越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现在可能是一个时候整个返回去想，就百年以前，“五四运动”也好，清末的种种，清末的改革开放也好，当时是为了强国，为了强国搭进去的所有代价是否太大了，是否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那这里边根子的根子就是中国的汉字和汉语。比方说繁体字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它每一个繁体字后面就是一组讯息，而每一个词组后面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怎么说？意义链。当你不懂这个繁体字，不会用这个繁体字，你其实丧失的东西比你知道的多得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文本非常贫乏，非常单面，非常表面了，就是文字回旋余地没有了。

许子东：我觉得应该用“双轨制”。因为白话文也好，简体字也好，它背后一个驱动力是“富国强兵”，就是我们得争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个时候检讨，为什么伊藤博文和严复两个人去了英国，严复回来就弄成本书，伊藤博文搞成了“明治维新”。所以中国人当时是把这个文字看作我们国家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海外有教中文的经验，在美国教中文，美国人开始他们都学繁体字，因为他们觉得台湾的制度是他们比较喜欢的。可是学了没多久都转向简体字，因为毕竟比较容易。对一个使用来讲，它确实比较容易。所以我觉得简体字现在要废的话也不太合理。

陈丹青：也不太合理。

许子东：但是你热爱文化吧，刚才讲的都有道理，有很多人的名字，像那个台湾有很多作家，一看到他的名字变成简体字，他就不认识了，他

不敢认。

（窦文涛：我再把这个话题，从上下五千年再拉回到“五四”，拉回这个起点。功也是“五四”，过也是“五四”。好像都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五四”那时开始的，朱学勤甚至说“文革”都跟“五四”有关系。）

陈丹青：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就是一个“权力崇拜”、一个“民粹主义”，还有“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文化激进主义”，种种综合起来，破旧立新，不破不立，这个观点实际上在“五四”起来的，所以，它的逻辑，最后会发生“文革”。

许子东：在各种各样批评“五四”的声音里边最极端的代表人物不是朱学勤而是普林斯顿的余英时。他是一位很出色的学者，他认为“文革”摧毁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民间的伦理次序，而这种摧毁要上溯到“五四”。

陈丹青：上溯到“五四”，对。

许子东：这个问题我也和王元化谈过，他原来是维护“五四”成果的，晚年有次对话，他说海外对“五四”的批评声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另外一个批评声音是林毓生，也是个海外的有名的汉学家。他的批评角度特别有意思。他说“五四”表面上激烈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其实“五四”的代表人物鲁迅也好，胡适也好，陈独秀也好，他们都是希望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用思想文化层面解决社会问题，恰恰是儒家的传统，所以他们表面上激进反传统，其实“五四”恰恰是中国传统的延续，林毓生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有力的。50年代以后中国仍继续想要用意识形态解决社会政治甚至经济问题，教训惨重。直到今天，“运动文化”仍在延续……

陈丹青：所以谈“五四”是要非常同情地去谈。一方面，我非常不信任我被告知的鲁迅。但同时呢，我又非常想回到那个语境里面去。你想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回想当年中国，忽然东北都已经是别人的，忽然说山东也要算别人的。然后忽然广州那边又怎么样，都会着急。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在和平环境当中，根本没有一个丧权辱国这个概念。

那会儿的民族自尊心非常强，“民粹主义”，而且还是世界范围的一个潮流。从德国到斯拉夫地区，然后到亚洲到日本、印度，一路传过来，就是二战以前这是所有这个现在叫做第三世界一个共同焦虑，中国在这个焦虑里面恐怕是最极端的，对自己传统最极端反叛的一个国家。但是照你刚才那个说法，依林毓生的说法，他们还是儒生的人格在内心延续。

许子东：比方鲁迅发现最重要的还是改造国民性，他们希望思想、教育、意识形态可以改变国家。这不是康德的传统。

陈丹青：也不是英国的传统。

许子东：他们提倡德先生、赛先生，目的恰恰是我们儒家一贯的传统。但当时的口号是反儒家的，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叔本华讲过一句话，他说历史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但是它背后总有不变的东西，他说你要是看不到它这个不变的东西，那你对它任何一个变化的形式，都会认识不清。你知道要回到“五四”的现场，我们有个同行前些年做了个努力，北大中文系的教授陈平原，他就带了他的学生，找足了资料从北大的西斋饭厅出发。就是当时5月1号发生什么事，5月2号发生什么事，3号发生什么事，怎么走出校园，怎么去。

陈丹青：实地体验。

许子东：实地一路体验，北京电视台还跟着拍，可是一路拍，学生就有很多问题了，就是说当时陈独秀被抓，是怎么一个态度？现在的老师，说实话上个节目都哆哆嗦嗦，对不对？走着走着，经过广场，正好开“两会”，警察就叫停，说这帮人聚众干什么？然后出示证明，党委证明，说我们是……

陈丹青：怀旧之旅。

许子东：多番解释，总算放行，对不对？警察拦截也使这次模拟的五四之旅更有历史气氛了，真是吊诡。然后又到了这个东交民巷，又到了赵家楼，谁点火的……

陈丹青：谁翻墙的。

许子东：当时的总指挥是傅斯年，那是后来台湾中研院院长，是我们认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啊。他当时是学生总指挥啊。

陈丹青：对，打砸抢。

许子东：但是你知道最叫大家惊讶的时候是这一路考察回来以后，看当天新闻，不是讲“二十一条”，而是讲钓鱼岛——还是跟日本在争自己领土。“五四”90年了，有些东西是没有变过啊！所以，每一代都有“青年”。

陈丹青：“青年崇拜”也是情有可原，我相信大概是从梁启超那个《少年中国》就开始，因为所有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老旧、顽固，就是没希望了，所以希望在年轻人。那么当然这第一炮最响了，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那“五四运动”以后“三一八”、“一二·九学生运动”……不断的学生运动。当一个社会、国家发生大问题，到了一个大的歧路要做一个决定，要有人出来叫的时候，都是学生在那儿，十几二十来岁的小青年。

许子东：这就是“五四”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古代也有知识分子救国，那都是太学生，你就是死谏，你就给皇帝上书，皇帝用了你，你改变国策，不用你就杀头，青史留名，一直到“公车上书”。5月4号那一天是开创了一个例子，那就是跟现在教育制度有关，学生走上街头在广场诉诸公众舆论，接下来是上海罢课、罢市。最后当时的北洋政府真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政府最后做出了妥协。你知道当时局内人清醒到什么程度？5月4号的事情，6月罗家伦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自己给自己命名成“五四运动”，这是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事件发生才一个月。所以后来一批批青年模仿，每一次包括几个青年在卧室里筹办文学杂志，包括红卫兵成立什么战斗组，大家的历史意识都是很清醒的——我们在创造历史。当然没几个人真正做到，但

是这种自觉意识非常清楚。

（窦文涛：青年创造历史，所以历史就总是向青年，好家伙。）

陈丹青：所以有一个百年幼稚病在那儿，一直是幼稚的，一直是未完成的，一直是急躁的、极端的。

（窦文涛：许老师今天也像青年。）

许子东：谈“五四”，我理性上反思，情感上相通。

“青年崇拜”和进化论有关。“五四”讲的民主、科学，其实在中国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扎根。很多人理解的民主，是“为民作主”，对吧？还有人说“以民为本”，主体也不是民。那科学呢，很多时候是把科学当做具体的工具，或者是变成了某种崇拜，而不尊重科学的核心，即怀疑的精神。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从“五四”甚至“五四”前开始的，到今天几乎彻底影响了国人。中国人以前是面向过去的。以“三皇五帝”为最好，先人、前人是最好的。从晚清开始，讲前卫、先锋则面向未来，脸转过来了。以前是三十年河西河东，循环的世界观。现在更相信直线发展的世界观，崇拜什么？现代化、向前进、进步、先进……既然是直线型的，当然就是新的比旧的好，年轻的比老年的好，未来的比今天好。

（窦文涛：不过有人现在反省了，想转过脸去，简体字、繁体字，有人说，就在咱这一代了，要是简体字再这么下去，再过几代可能就彻底没有了。那么能调回来吗？调回繁体字？）

陈丹青：刚才子东说得非常对，就是“双轨制”。“双轨制”那篇论文里头也提到，说旧白话从宋开始，在文人当中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从明开始跟文言相安无事，不同的文体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文本都可以用。就“五四运动”这个新白话，最后它是把文言全部废掉，而且禁忌掉。所以它的后果是到这一代人不会念文言，所以要看注释，而现在注释文言的人，本身文言都很有问题，所以能不能把文言这一课补上来，把繁体字这一课补上来。

许子东:中文系学生应该学繁体字。

陈丹青:然后大家相安无事,我就说英语考试,你废除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文艺术学科,你加强汉语教育,所谓汉语教育你会点段,你会读古文,你会背先秦,你甚至能够写几句,然后你就要全部繁体字会懂。

许子东:现在出书据说是古籍可以,其他不行,要特批。王元化就出过繁体字的书。某种意义上现在也有“双轨制”。比如上海卢浦大桥,上面江总书记题字,那就是繁体字。你下面也不能说,国家主席怎么写了个繁体?而且,电脑的使用,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你可以写简体字,啪,一转变成繁体字了。

只是没有一个按钮,一按,啪,回到“五四”了。一切重新来过,中国人会做哪些不同的选择?

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历史课题。

2010年12月6日修改(参考2009年4月28日、5月2

日凤凰网“锵锵三人行”纪念“五四”九十周年特别节

目文字实录)

走不出的“五四”

——对话陈丹青(2)

陈丹青：回看“五四”，甚至不只是“五四”，应该讲是清末民初那一段，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有意思的一段，就是元气淋漓。出来的人各色各样都有，有烈士型的，然后有风流型的，然后有投机型的。

风流型的，瞿秋白爱上他的学生杨之华，原是沈定一的儿媳妇。而沈定一的儿子，无所谓，就说你走，然后就连着在报纸上一天登三个启示，从此脱离关系。然后瞿秋白和杨之华结为夫妇，特此公告。徐悲鸿那时候要跟蒋碧薇私奔，私奔还做一具棺材，说闺女死了对外可以交代，女儿怎么忽然没了。“五四”前后中国大地上充满私奔事件，最后一直私奔到延安。早年私奔到日本，私奔到英国，好歹也私奔到国内的某个地方，多少革命青年其实为的是逃婚。

许子东：萧红第一次就逃婚，跟男友跑到北京，后来不成。家里人还让她跟订了婚的丈夫在一起。那个丈夫也真够阴的，把她带到哈尔滨的一个公园里，旅馆里欠了很多钱，说晒个太阳，一会儿我就来，就跑掉了，失踪了。然后萧红就大着个肚子回到旅馆。我现在还问女学生们，假如你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学生都想不出来方法。萧红报上登一篇文章，讲自己的处境，一大堆男的要去救她，萧军就来救她。后来张爱玲从父亲处逃出，也写了文章，英文的，写自己的困境。

你知道萧红两次怀着孕跟新的男朋友拍拖。第二次是去延安的路上,怀着萧军的孩子,跟端木蕻良去了,你说在“五四”精神感染下的女性谈恋爱多厉害。

陈丹青:很精彩,“五四”时期就是英雄美女,才子佳人是空前密集。我还在《万象》上看过被枪毙的那个邵飘萍,他一生跟三个女人的缘分,都是在流放当中,或者在刚出狱或者怎么样,都是许诺一生给他。“五四”运动的一大动因,其实跟科学民主没多大关系,跟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有关系。巴金那个《家》、《春》、《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反响,就是多少青年全是这个问题。所以“五四”结束两件事情,一个是科考,还有一个就是媒妁婚姻。除非非常草根,在乡下,我在江西插队的时候,全村的小孩儿打起架来就骂你老婆死,什么你老公死,都9岁10岁早就配好了。“五四”那会儿,所有从乡下走出来的文人,都有一个小太太在那儿。

许子东:今天看看那是最好的时代,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只看到他们风流倜傥的一面,没看到憋得慌的一面。那徐志摩在剑桥甘愿做一棵水草,林徽因照样不理他对不对?知道你文人不靠谱。鲁迅跟许广平,大家知道《两地书》,可是你想想鲁迅跟朱安……你知道那些“五四”作家,他们虽然有向往民主自由的一面,可是他们对传统也要妥协。他们都不满原来家里原配,但为什么都还会回去成亲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早逝。大部分父亲在作家10岁前都去世了,以后妈妈都是启蒙老师,这些作家都听妈妈的话。而妈妈定的媳妇,郁达夫也好,鲁迅也好,茅盾也好,都是妈妈指定的,所以他们一定得回去完婚。

陈丹青:你看那个现在阜成门外鲁迅故居,还有一口箱子在那儿放着,据说就是当年鲁迅跟朱安住一个院子的时候,平常不说话的,但是每天换洗的袜子什么的这些,就往那个箱子一放,朱安打开一看,这有新的脏衣服要洗了。

许子东:他故居后面两棵枣树很有名,睡房出去一个小厅,左边一间是母亲的,右边一间朱安的。鲁迅也是奇人,结婚了,他概念上不接受,

人家问他，他说她不是我太太，是我妈妈的媳妇。然后据说，我不知道，要鲁迅专家去考证，据说他们就真的一直不同房，一直憋到 40 多岁，鲁迅。

其实鲁迅也想过解除婚约，他妈妈说，你把人家休了，人家就死路一条。

陈丹青：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你去看胡兰成《今生今世》，简直有人类学价值。他详细写了他当初跟他第一个太太玉凤，怎么见面带到那个村子里去，然后他从楼下走过，楼上玉凤几个小姑娘都看了，说今儿小孩来就是来说亲的，然后后来怎么娶过来，娶过来以后怎么过第一夜，特别有意思。说其实那会儿少年人根本不懂这些事儿，一天累下来了，大张宴席的弄完，弄完以后呢房门一关，两个人这个睡一头，那个睡一头，很快睡着了。因为我一直想知道细节，就是媒妁婚姻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说的媒妁婚姻悲剧的那一面，可是他说的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就是很朴素，俩小孩就睡着了。

许子东：再有一个细节，郭沫若洞房花烛夜，那个张琼华比他大两岁嘛，洞房花烛夜一揭那个红头盖，惊呼一声母猴。……后来安娜一直守着他，一直到后来郭回国担任国家领导人了，也重新再结婚了。可安娜就一直住在旅顺，这个日本女人。所以郭沫若是厉害的，郁达夫老在日本女人面前受气，郭沫若可是争回面子。

陈丹青：胡兰成他因为玉凤后来很年轻就去世了，去世以后，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一辈子的眼泪都已经给了玉凤，那一段写得真是特别的好，就是他还出去借钱，出去借钱治病，可是在回来路上，说玉凤已经死了，死了以后他不回家，他又返回去借钱，就买棺材。买了棺材以后，回去的路上就在一路亭上，这种我知道的，就在江南很多这个，山里面有个亭子，走累了，休息一下。他说那会儿我还真不懂事，居然丧事临头，在那眉飞色舞跟人说我这棺材选得好啊，什么木头，价钱怎么好，就是人落难时候一个穷青年那种感觉。所以他写“五四”那一段，你去看他的《山

河岁月》里面有一段也是写到“五四”，他是写“五四”的质感，写“五四”的味道，就那种气味。

那会儿被子闻闻都是香的，就是城里的青年出来然后跟乡下的女人告别，然后到城里去念书，后来也就干革命了，杀头了，变成乱党或者怎么样，这里边都有一种清贞，清洁的“清”，坚贞的“贞”。

就是志气清坚，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词，我都能够感觉到。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是有一半亲戚都在浙江，我小时候都能看到浙江的青年，也爱长衫，也爱围巾这么一弄，只是不是“五四”那个时代了，可是讲话非常，怎么说？有礼貌，但是很刚烈，做事敢担当，“五四”的青年说走就走掉的。说干什么事儿他真去干什么事儿，说暗杀就暗杀，阻挡有阻挡，然后造反就造反，然后读书就读书。

许子东：关键是那代人他真信那些东西。

陈丹青：对，对。

许子东：他强烈地信，不管什么民主也好，自由也好，他信，因为他信了这个，所以他就不信原来的，比方说礼教伦理，或者裹小脚、留辫子，他不信。而且他不仅在道理上信，而且他还相信他做的这个事情会成功会实现。今天的人，第一“信”就已经成问题了，第二还有一个问题，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好，可是我做任何事情也都不能帮助它成功，所以很多人就没有这么一个热血去“信”那个东西。

陈丹青：但是今天人为什么不信？为什么再也没有“五四”人那么执著。

许子东：今天北大的教授发现，他不可能像陈独秀那样出去，当着警察和北洋政府的面为学生讲话，并且还入狱，不可能。第一是觉得这样讲话没有用，帮不了学生，改不了大局；第二是不敢，担心反而失去为学生服务的机会；第三久而久之也怀疑这样站出来为学生讲话是否乃教授的使命？效用、利益、信念三者互为因果关系。

陈丹青：这恰恰是我们面临的“五四”的后果，至少是一部分后果。

所以“五四”的所有人不会想到就是在 90 年以后，同样是青年，同样是文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谴责今天的人没有理想，不敢担当或者怎么畏缩，怎么犬儒，怎么世俗，因为我们几代人承受了一个“五四”带给我们的后果。

许子东：可是离开当初的初衷何其远？

陈丹青：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回到“五四”当时的起点，未必回到。你说今天再发动一场“五四”，第一已经没人信了，那个激情没了。第二你讲的还是科学与民主吗？

许子东：现在也有愤青，反日爱国，表面上看很像的，还就是针对日本，还是批评当政者有些软弱，对不对？当然，只是表面上像。

陈丹青：小意思了，不能比啦，跟那会儿那股气不能比了。那会儿有担当啊，那会儿是自发的，现在都是怎么去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烧《诗经》，怎么扔鸡蛋，怎么去游行，游完了又怎么样。跟那会儿不可同日而语了。

许子东：也许就是因为“盛世”，那个时候叫乱世，乱世里出英雄，“盛世”大家就犬儒？……不是不是，是做“幸福”的老百姓，对不对？这话题还真不知怎么往下说。

“五四”时提倡新文化的相信他们提倡的东西，反对派，林琴南或梅光迪也相信他们保卫的东西，文言，桐城派。李大钊、恽代英等更坚信他们为之牺牲的东西。今天保卫某些东西的人其实也不信他们保卫的东西。用后现代话语来爱国维稳的人，其实可能什么都不信。所谓“新左”，有的是将在海外学院的反右派主流学术游戏搬来中国为政治主流反右服务，有的在国内外自觉弱势因而气愤批商（却不批官）。真的出于信念理想怀念北斗星？还是想做“谋士”或哗众取宠将学术当策略？态度可疑。不过现在更多的是聪明人，什么理论都懂一点，都不怎么相信坚持。民主程序也好，革命原理也好，皆因怀疑其功用效果，从而也怀疑理论的价值。没有信念和原则，便只留下利害考量，便只有文化学术名

义的生存游戏。常常听到同行议论一些极荒谬极不公平的学术、政治事件，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便如讲笑话一般。这本身也是时代的笑话。

.....

还是讲“五四”的恋爱吧。你们刚才讲一个太太在乡下，“五四”文人外面再找爱人。一直说胡适是个例外，后来到美国做大使去他都带着小脚的江冬秀。大家很感动。不过现在也有考证出来说胡适他当初也爱上了老婆的伴娘，一个叫曹诚英的。结果江冬秀拿一菜刀威胁，后来就一直跟江冬秀好了。“五四”八卦，直到最近，大学者余英时也来考证胡适跟一个美国女子通信很多。那个美国女子还是他老师杜威的夫人。

但不是胡适勾搭他老师的夫人。他跟那个女士通信在前，杜威娶这位女士在后。所以应该说是杜威娶了学生的女朋友。

陈丹青：胡适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好像是1915年，才26岁。顾颉刚在他的班上，大概20岁还是21岁，傅斯年比顾颉刚大了一两岁。顾颉刚说我们哲学系来了一个年轻的教授，刚从美国来，我们要把他扳倒，因为他们此前有过例子，有个哥们儿讲什么史前史，还是什么的，讲得不好，居然就真扳倒了。当时的师生关系、学问关系是这样，二十几岁的学生会来挑教授，不行就条子递上去，把你问倒。结果傅斯年就去旁听了胡适的一堂课，听完以后回来跟底下这帮哥们儿说，慢一步，这个人有道理，学问未必那么多，但是他有新方法，后来就转到胡适门下了。胡适十多年以后，还专门在北大的一个纪念会上说过，傅斯年当时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才让我在北大站稳了脚跟，是不是这样？

许子东：顾颉刚那天迟到了，他们事先策划好，说用英文写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不是胡闹嘛，对不对？20多岁，蔡元培直接给他聘书。胡适在杜威那里考试没过关，哥伦比亚大学的考试，美国学院的制度到现在也没变。我也是在加州大学准备博士考试时看了胡适这段材料，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美国的考试制度到现在还是一模一样的，可这90年中国的大学、社会和人民经过了多少次史无前例、天翻地覆和与时俱进啊！

一大帮子的洋人，考一个中国的题目，然后其中只有一个人是懂中文的，杜威也不懂，最后就没给胡适过。准备重考期间就接了蔡元培的邀请。学位当时没拿到。后来 1926 年在中国出了大名以后，哥大才给他名誉博士。

陈丹青：1956 年以后，全国展开胡适批判运动，整个文本加起来有 400 多万字，可是真正最重要的估计就只有一条，就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许子东：我到现在还记得，读批判用的《红楼梦辩》，俞平伯的书。第一段话就讲，论高鹗续书之不可能。为什么高鹗续《红楼梦》不可能？他说文学作品是个性的表现，那前 80 回就是曹雪芹的个性。那你后面，你要是学曹雪芹的个性，你就损失了自己的个性，你肯定没有前 80 回好。你要是坚持你自己的个性，那你写出来，就是你高鹗的个性了，那你肯定跟前面 80 回不和谐。

这么浅的一段话，我记得我当时放下书，那个时候，我放下书我记得看着静安公园的那些高大的法国梧桐，风吹着树叶。抵过我当时读的无数的书，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说文学是个性的表现，是要被批判的一个东西。

陈丹青：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强调个性，又自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舍我其谁。

许子东：到赵家璧编“新文学大系”，陈独秀说，假如不是我们当时这样做，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会有其他人这样做。这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论。胡适不同意。胡适说要不是当初我们几个人提出，新文化运动也许会迟二三十年，也许变化发展都不一样。胡适的历史观是跟陈独秀不同，那个时候就已经暴露了分歧。

陈丹青：每个礼拜有一天是开放的，胡适家里面什么人都可以来，就是他生活比较稳定那一段，二几年到三几年这一段。

许子东：但你要看茅盾后来写《我走过的道路》，他在商务印书馆做

小伙计时，见过胡适，说他多高傲。不过茅盾的回忆可能有视角与创作的问题。

陈丹青：胡适还提出来四个目标，其中之一是整理国故，很重要的工作。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在整理国故。我们今天无非也就是想整理国故，现在“五四”都成为国故的一部分了。

许子东：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讲，王国维的后面没有人超越他。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好的。只是对外界所谓亡国灭种的这种危机，他应对不了。

陈丹青：对，他有预感，他知道整个此前的中国传统，可能到这儿是一个终点，所以他的殉道说是有各种解释，就是殉中国文化之道。

许子东：另外一个人也有预感，比如说张爱玲，她不就是说嘛，时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车在往前走，可是我们只能可怜地看着橱窗里我们自己的一个模糊面影，非常可怜自私的，你根本挡不住这更大的破坏。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是极其清醒，那么清醒的人就特别痛苦、特别孤独。另外有些人，你比方说刚才的劫持，是指后面的文学史改变对他们的评论，比方说鲁迅骨头硬，那是毛泽东对他的评论。

陈丹青：那个时候的文人，他们知道自己闯了祸。胡适在很多言论里面就说过，当初我们几个人，在那儿谈论这个文学改良，其实是一个非常斯文的小范围的。但这把火点成这个样子，然后各种党派就出来了，1919年是“五四运动”，1921年是共产党成立。然后到二几年、三几年，返回去想想看，形势变化非常大。

“五四运动”的时候，国民党还是一个在野党，还是要去北伐才能拿到中国，可是到三几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已经开始在剿共了。所以他们非常知道这批文人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房间里面喝喝茶、抽抽烟，把这事儿闹出去，弄几本刊物，结果变成全中国的一个历史抉择。

许子东：从文化使命的角度来讲，胡适是比较早清醒，所以他在激烈反传统的《新青年》上做主帅，很快他就提出整理国故，他是最早……

陈丹青：最早退出白话文运动的人。

许子东：但是另一边就已经挡不住了。我父亲那个时候在上海大学读书，和施蛰存、戴望舒他们是同学，他就回忆，印象最深、最受欢迎的是恽代英和瞿秋白的课，所以那个时候上海大学已经和黄埔军校一样，在培养革命干部了。

文学史发展，也有偶然因素。比方说 20 年代后期，鲁迅是被两边骂，一边是后期创造社，从日本回来的一些年轻人，骂他过时了。另外一边是留美的梁实秋，骂他翻译不好，骂他硬译，很侮辱他。但他们两边骂的时候，这时他有一个朋友瞿秋白，在党内已经退下来了，他看到了鲁迅的重要性，结果就通知在上海的中共的领导，就叫这个创造社后面的那些人停止攻击鲁迅。

陈丹青：李立三出来收拾的，说他是我们的人，从此就停下来了。

许子东：然后不仅停下来，而且夏衍、冯乃超他们去拜访鲁迅，就说我们都错了，您才是我们的指导。

陈丹青：一帮小青年，鲁迅都 50 岁了，他们才二十几岁。

许子东：所以梁实秋是没有组织行动幕后指令的，他还在那里批评鲁迅，还在那里人性争论，所以鲁迅后来 30 年代就成为左翼的一个旗手，虽然他从来没掌握实权，且跟周扬他们不和。

陈丹青：鲁迅完全知道他的处境，他完全知道，他说你们来了以后，我就穿上黄衣服，马路上要街，就这样，或者你们最先要整的就是我。

许子东：鲁迅后来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从俄国来的一些理论。但是到了 1936 年，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要放弃这个左联，要国防文学什么的。鲁迅就不愿意，鲁迅想你们不是革命吗，怎么突然可以放弃？他是真信。不懂党的运作，不肯机会主义。

陈丹青：在他身上的反差，也是“五四”那代人的认真之处。他读到的所谓唯物论，和他见到的左翼作家，不是那么回事。人是这么一群人，人格上有很多问题，他是痛恨他们的，一直到后来矛盾公开化，答徐懋庸

的信函,跟“四条汉子”的事情。可另一方面,他的那种道德观,在当时以为找到所谓马列主义的时候……

许子东:以为是救中国的一条路。

陈丹青:所以他晚年是在这么一个焦虑中。

许子东:他万万没想到,后来接近他的丁玲、冯雪峰都倒霉了。

陈丹青:在这一层上,胡适对整个这些问题看得比较清醒。尤其是他跑到台湾去以后,抗战他也到美国去当大使,他经历过整个“五四”,到底后患是怎样的,他还说出来了:这事儿跟他有关,他也有份,他是点火的人。

所以我很冒昧地说,就是“五四”要定性的话,一方面是光芒万丈,另一方面是后患无穷。照胡适当时的说法,他在搞一场中国文艺复兴,他的意图是这样,如果不是文艺复兴,至少也是个启蒙运动,但是最后被救亡冲走了。所以“五四”回到原点,它是光芒万丈。但我们这几代人,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后患。然后在知道这个后患以后,返回去再去同情地了解“五四”那代人。

许子东:陈平原最近概括说,泥沙俱下、众生喧哗、生气凌厉。泥沙俱下,什么是泥沙?这个大家自己去思考。

陈丹青:现在学界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五四”传到现在的果子,就是科学主义。他们说你看现在至少所有在领导层的,都是技术官僚。全都是理工科出身的。我一想也对,你返回去想 1919 年,清末民初,就是要新学,富国强兵,其实就是要咱们中国得有自己的科学,我想它的顶峰就是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了,然后我们现在最骄傲的,说来说去还是西南联大出去的那几个人得了诺贝尔奖。

许子东:所以西南联大是“五四”的一个良性的延续。

陈丹青:这个好果子是看得见的。“五四”是点火,然后来烧一锅新的汤,就是第一炉馒头出来,就是西南联大这些人。就这一炉,此后一炉别说了,到现在一炉一炉又出来了,咱们也别比了。

许子东:不过后来台静农把这个传统带到台大,后来就延续到夏济安,一直到白先勇他们,香火也还是在延续,还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延续。我刚才讲的那个瞿秋白跟鲁迅的友谊,那就是一个偶然,对不对?当然总的来讲,我还是有点相信必然的,普列汉诺夫的话,偶然性是多种必然的交叉点。现在回过头来,“五四”到现在 90 年,其实是三三分的,到四九是前 30 年,四九到七九是 30 年,前 30 年是启蒙,后 30 年是革命,最近 30 年是建设。

从七九年开始,我们重新反思“五四”的传统,每年都会有人提出来,“五四”的精神我们怎么样继承,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对“五四”有种种的不满、非议、反省,但是就像你说的,走不出的“五四”,我们其实身上都摆脱不了“五四”的精神。

陈丹青:是啊,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2010 年 12 月 7 日修改(参考 2009 年 5 月 1 日、5 月 4

日凤凰网“锵锵三人行”纪念“五四”九十周年特别节

目文字实录)

海上文学百家^①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上海作协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此规模,这般速度,相信香港和其他城市文学界的同行看了会很羡慕和感慨。香港的经济实力应该不在上海之下,讨论如何编文学史和文学大系已经多年,今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政府向文化界拨款资助的专门机构)还在招标组织编《香港新文学大系 1949 以前》,我也被邀参加。我过去也编过香港的短篇小说选,深知这类工程会面临很多技术乃至人事、政治上的困难。所以不得不佩服中国当代文学所拥有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虽然人们有时也有抱怨。

问题是编这套书,怎么定义“海上作家”?编香港小说选时我们考虑四个因素:第一是否在香港写作;第二是否在香港发表,就是说香港有读者;第三你是不是写香港;第四你是不是香港人。

我接手主编“香港小说选”的时候把第三项写香港去掉,《鹿鼎记》不是写香港,当然还是香港文学。所以写不写香港不是必要条件。余下三个条件,香港的情况是,在不在香港也并不是决定因素。因为很多人在加拿大写作,比如说亦舒、戴天,在香港出书,但是人常住加拿大,钟晓阳在澳大利亚。我们知道,《再别康桥》是在印度邮轮上写的,都是中国现

^① 本文是在 2010 年 12 月上海作协“海上文学百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代文学。《沉沦》和巴金老舍的早期小说都在海外写。所以在什么地方写不构成是这个作家的必要条件。在什么地方发表,西西、董启章大部分作品都在台湾出版,仍是香港作家。所以到了后来我发现香港是这样,在哪里写在哪里发表及是否香港人,三个条件里面必须符合两个,可以归纳成香港作家。而这两个不是任意归纳,香港人身份才是必需条件。除非你香港人在加拿大写,又只在海外发表,那个不算。所以香港文学的界定是尽量地“推”。比方说余光中在香港很多年,也在香港发表,但是香港文学界的共识不把他视为香港作家。张爱玲住过香港,一辈子都在写香港,香港文学界好像也不觉得她是香港作家。更不说在香港有写作有发表还死在香港的萧红了。

相对来说,跟香港的尽量“推”,我觉得这套书上海是尽量“拉”,沈从文拉进来,很多很多各个方面的人拉进来。这个反映编书背后的基本动机,因为香港是要确立香港的本土意识,就是确定香港族群的某一些精神特征、身份认同。上海编这个文库是想突出我们是文化大都会,拥有,或至少曾经拥有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半壁河山。这方水土这么好,不管是谁(真正上海籍贯的其实极少),在这里做出来的成绩都是上海这个文学城市的文化成就,这是《海上文学百家》的宗旨和定义。

文库的特点之一是收集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作家。比如叶小凤、许杰、安娥、潘柳黛、予且、施济美等等。一些平日被文学史回避或批判的作家如韩侍桁、章克标、姚蓬子也被列入文库(当然,姚蓬子的儿子是否也是“海上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值得日后考虑)。文库从龚自珍、王韬、章太炎等人开始。不仅有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张爱玲等文学家,还包括朱东润、刘大杰、傅雷、王元化等学者翻译家。作家在世,概不入“库”,和现在政界年龄划线一刀切一样,虽不完美,但不这样做的麻烦更大。对比百年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在上海,年份晚近的名字则有夏征农、杜宣、胡万春等,也不免让人对“海上文学”百年来的走势,尤其是将来如何编“1949以后”各卷,有点感慨和忧虑……

这套书编出来,130卷,纸证如山,1949年以前,在上海文学果然这么辉煌。什么原因呢?香港是上海的一面镜子,也可对比1949年以后的上海。当年在上海写作非常不一样。郁达夫当时要搬到杭州去,鲁迅专门写诗不让他走,因为你离开了上海就是离开中国文学的中心,生活心态都会不同。虽然离这么近,郁达夫到了杭州,盖小楼,官员捧场,王映霞可借杭州市长的车……“诗人憎命达”,值得今天的文人作家学者反省。鲁迅当时搬到某一个省城去,大概也会被尊为大师。所以当时在上海写作和不在上海写作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回过来讲这么辉煌的时期,想回顾清末民国上海这个文学城市有什么特点,我自己简单概括最大的好处有四个:

第一,是租界。上海鱼龙混杂中西皆有,好玩儿,有活力,很重要一条是租界欺负中国人,同时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暂时局部逃避中国政府的管治。跟香港的情况比较,香港是更大的租界,是殖民地。英国人对香港,当然已经跟印度不一样,保留你中文作康乐用途,但是官方语言还是英文,所以香港人很难用中文介入政治,香港新文学很少承担意识形态功能(故通俗文学成为主流)。但在上海的租界所有人都关心中国的事情,用中文写作,换句话说,是借了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作为一个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批判当代政治,批判管治他的统治者的能力,和他的社会成就和文学成就基本上成正比的。所以租界在某种程度上给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在上海批判中国政治的一些权利。

第二,还是租界。上海的租界不是某一个外国的租界,李欧梵《摩登上海》有一个归纳,在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是很不一样的两种文化,英国租界是银行洋行、跑马厅和工部局,法租界是咖啡馆、戏院、舞厅。香港则全部是英国文化,“跑马文化”(金钱、法治、娱乐三合一)。而中国大陆,后来接受文化的概念和革命的概念都是从法国文化概念过来的,我们从来都觉得银行、跑马,甚至巡捕房都是文化的反面。1949以前的上海,两者都有。所以上海既有施蛰存、穆时英的感官之作,遗风一直影响

后来香港的现代主义都市经验，上海也有鲁迅、巴金的文化战斗精神。甚至在周扬、柯灵、夏衍等人身上，洋场西装与左翼身份还可以统一，并不似后来在香港那样视“南来”为老土，或如解放后，以为洋场必出恶少。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也是上海成为文学都会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教育。上海有很多的大学，更重要上海的学生、老师都是移民来的，换句话说，全国各地的精英聚集到上海。香港文化界及大学硬件很好，有一个困难就是生源，只面对 600 万人。因此我一直觉得香港通俗文化占主流和教育程度有关，教育程度和社会文化机构不平衡有关。剑桥和哈佛生源是全世界的，北大和清华至少也是全国的。香港重视本土意识，不盲目认同中原。但是否有碍人才流动，有待反省。上海文化在 30 年代是红红火火，和 1949 年以后的北京一样，其实是汇聚了全国的人才。

第四条很简单，上海当初有几百家的出版社，还有报社。所有这一些作家都是在民间的出版，印刷工业都是民间的，1949 年以后所有这些民间的都变成了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官方，都变成了政府。我们今天看到，编大书，搞文化工程，就有优越性。至于出创作成果，就难说了。这个文库再往下就会比较难编。

看着这套书，我就想起 1949 年以前有一些像社会混乱文学发达的晚明，我们今天有一些像社会繁荣学术发达的清代中叶：今天文字照样获罪，缺乏晚明创作的自由氛围，但学术资助很多，文人埋头编书整理资料。实在话，现在在北京和南方和上海这三个文化中心之中，我们上海的文化地位，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来看，是否在相对下降？我希望这一套书是阻止我们往下走，说好听的，我们在走向复兴。

但是对照《文库》所展示的成绩，我讲一些稍微感性的话。我第一次到作协这个会议厅开会的时候，坐在这里的有高晓声、陆文夫，王元化讲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现在一揭露问题，上面就说 9 个指头和 1 个指头。好比一个病人到医院看病，说我一个指头坏了，医生跟你说

你还有 9 个指头是好的(众笑)。

我还记得王蒙跟茹志鹃说,说安忆的小说要多一点力度,茹志鹃就说,也在这个地方,当初姚文元也说我的小说《百合花》要多一些力度(众大笑)。我也在西厅第一次见到阿城、黄子平、李陀,我们去杭州开会,徐俊西老师也在,也有李子云。真不可思议,刚才我回忆的几次在这个房间里的谈话至今已有 30 年了。30 年是个什么概念:1919 年发表《狂人日记》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也就是 30 年。

我的发言完了。

原载《羊城晚报》2010 年 12 月 19 日、26 日

幸福的“围城”：《我们仨》

方鸿渐在小说里同女人的关系都很失败：和“局部的真理”鲍小姐的邮轮之恋诚然只是一夜情，追求年轻唐晓芙的过程也充满误会并缺乏耐心（在唐家窗外淋雨多等数分钟，命运便可能不同）；面对博学富有的苏小姐的主动方鸿渐又有些害怕，碰到聪明的同事孙柔嘉最后还是糊里糊涂被操控，身不由己又心有不甘。我读《围城》常常疑惑，何以男主角见到女人（尤其是知识女性）如此惊慌恐惧紧张，以致小说标题便构成对婚姻的悲观定义：“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但在现实中，作家钱锺书的婚姻家庭生活却众所皆知一直风平浪静幸福完美（尤其相对其他很多现代文人作家的“浪漫故事”而言）。也许，小说与生活，本不相关；又或者，小说里宣泄了不安，生活反而宁静？

关于钱锺书几十年在“围城”里安居乐业的情况，杨绛刚出版的《我们仨》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记录。我对杨绛的崇拜，实与钱锺书的盛名无关。杨绛研究英国小说的论文，在我读来，其见解（不是资料）不在《管锥篇》若干章节之下。她翻译《堂·吉珂德》，成就斐然。《洗澡》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出色的长篇之一。《我们仨》基本延续了《干校六记》的清和文风，哀而不伤，怒而不怨，大巧之朴，浓后之淡。仅从文字气氛看，记述 30 年代英法“陪读”一段，笔调最活泼明朗。伦敦租房、学煮中菜、异国探险等细节令几十年后重复同样经历的人们读来备感亲切：“原来

大师当年也和我们一样……”此段中杨绛也解释了钱锺书当年为什么不读博士学位,以及她如何在瑞士作为“共产党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记述 40 年代上海生活部分,人物事件线索纷杂琐碎,文字节奏却不慌不忙,一点也不乱。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和蓝田师院任教,杨绛带女儿与父母同住上海任小学校长。这是他们婚后唯一一段两地分居(“文革”干校经历除外)。其间很多亲戚往来人情纠葛细节,颇似《围城》里的一些场面。关于钱锺书与叶公超关系一段,以及后来与乔冠华、袁水拍及江青等人事、讯息交往的详情记载,都颇有史料价值。我注意到后来钱锺书回沪一度“待业”教钟点带私房生,当时就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距离张爱玲的“常德公寓”不过四五个街口。钱杨也常出入傅雷、柯灵的饭局。现代文学史如果只写到 1949 年,《传奇》和《围城》也只是尾段异数。然而放在整个 20 世纪中文文学发展的背景看,影响就复杂深远了。不过想想两位天才还是没有见面的好。见面也“互不相识”。当年还有胡兰成在,钱锺书又是一贯的傲气。据说几十年后他们夫妇对张爱玲仍无好评……

记述 1949 年进京以后的生活,杨绛的文字变得有些跳跃、含蓄和模棱两可。“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一方面是工作稳定地位上升(文研所一级研究员,毛选和毛泽东诗词翻译小组成员),另一方面则是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当然,三反五反“洗干净了”,五七年大鸣大放躲过去了,“文革”时还是要被“揪出来”,还是要下干校倒粪。女儿阿瑗“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限’——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这大概是各种“文革”叙述中最温柔敦厚的造反派形象了。独生女钱瑗的故事,是《我们仨》的一条主线。女儿在伦敦出生,女儿和父亲最“哥们儿”,

女儿是钱家的“读书种”，女儿下乡“火线入党”，女儿竟比父亲早去世……杨绛回首往事，少谈文学，避开政治，突显的只是家居琐事、儿女情长。配上钱锺书手迹也是关于柴米油盐。于是我们不仅读到一本如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那样值得再考证的作家史料，更像打开《傅雷家书》般可以温馨阅读一个著名人文家庭的生活及心灵内景。也许，正因为“圆圆”从始至终的参与，“围城”才变成了幸福的“客栈”。

在记述晚年钱锺书与胡乔木的私人交往一段时，杨绛的回忆文字再次显示了清静平和中的分寸感：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然而说到底，每个人都可能是书，也是绳子。

大概是因为胡乔木的关照，钱锺书“文革”后搬进了三里河较宽敞的寓所，运动中为逃避红卫兵检查而用文言写成的《管锥篇》也得以破格用繁体印出。《我们仨》的尾段气氛渐佳，夕阳无限好，然后结束得异常简洁：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阅读过程中，我多次放下书本，想象杨绛一个人在三个人曾经住过的空旷房子里写作的情景。这是一个坚强的人。

原载香港《明报》2003年8月3日

重读《活动变人形》^①

王蒙过去五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大都描写这半个世纪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在理解和表现当代中国革命的曲折反复过程方面，很少有其他作家能超过王蒙。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却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虽然这部小说的“续篇”也交代了书中各位主要人物在 50 年代以后的生活变化和各自归宿，但全书的主要篇幅，都放在 40 年代日据的旧北京。《活动变人形》1986 年出版以后，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讨论《活动变人形》，对于我们考察王蒙与整个 20 世纪晚期中国小说的关系，有很特殊的意义。我一直觉得王蒙在小说中，努力为当代中国革命的合理性辩护。时隔十七年，最近重读《活动变人形》，又有一些新的想法。抛砖引玉，和各位同行一起讨论。

一

《活动变人形》第九章详细记载了一次家庭暴力事件。事件之前有很多导火的线索。男女主角倪吾诚与姜静宜婚姻长期不和，倪交给太太

^① 本文写于 2003 年 9 月 20 日，曾在 2003 年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召开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假的领钱图章使静宜在外蒙受耻辱，她便和母亲姜赵氏姐姐姜静珍合作布下战局锁起家门。三天游荡在外的丈夫当表买药回家，踢倒房门，逗留一会儿又离家。可就在他上厕所片刻间静宜已搜去其上衣内全部钱物。正当女人们在钱物中发现有介绍女友的信件时，男人恰恰也因不见了钱物愤怒而回，于是便出现了三女战一男的武打场面，其中“先发制人”的道具就是一碗前一章就开始熬的绿豆汤，被守志妇人静珍顺手向倪吾诚泼去……

这个场面我们并不陌生，七巧在识破姜季泽骗钱求爱阴谋后也是一把扇子飞过去，打落男人手中的酸梅汤。之后酸梅汤顺着桌沿滴下，一滴，两滴，一年，一百年。这是《金锁记》中最关键的一个情节转折，女主人公的命运从此改变（或者说从此决定）。

《活动变人形》中的绿豆汤事件也导致类似的情节转折。整个长篇有两个高潮，第一个就是泼绿豆汤全武行导致倪吾诚醉酒肺炎（另一个是第二十二章静宜在宴席上控诉倪吾诚离婚阴谋以及赵尚同的耳光，迫使男主角自杀未遂终于离家）。七巧用扇子酸梅汤打跑男人之后又急忙赶到窗前眺望季泽背影，“季泽正在弄堂里望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里去，哪里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膀”。^①而姜静宜也在绿豆汤事件后又温暖照料病中丈夫。“说下大天来，你也是我的男人”。于是又有了以后十几章的和缓拉锯局面，使得整个家庭战争一波三折迂回发展，共同战线中的大姨岳母又因男女主角短暂之“和”感到不满。在这些章节里，我们看到王蒙似乎用钱锺书式的夸张嘲讽笔法在处理张爱玲的灰色小市民故事，七巧性格的各个矛盾侧面正由三个不同女人的不同悲剧细节而分别演化。然而就在这时，我们熟悉的“王蒙”出现了。

就在这时，在绿豆汤事件刚刚发生之际，叙述焦点马上转到在一旁

① 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164页

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儿子倪藻身上，在全家人的哭闹中，儿子觉得“真烦闷，真烦闷……倪藻八岁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这模糊而又坚决的思想：必须改变这一切，是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①

由于这个少年目击者的参与，小说进入了不同的意义结构，泼绿豆汤事件在整个长篇布局里又具有另一种可能是更重要的转折功能。本来七巧与季泽的情欲角力，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夫妻吵闹，或者更早些子君与涓生关于油鸡阿随的争执，《寒夜》中久病丈夫与“花瓶”太太之间的无休止的烦恼，都是人生的病态，也是人性的常态，都是一些既庸俗又深刻而且无法结束的悲剧。但同样讲述家庭悲剧的《活动变人形》，因为八岁倪藻角度的介入，种种男女夫妻老少间的伦理战争状态，便成为一种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社会及历史病态了。

是相信倪吾诚姜静宜等生活病态所以倪藻才必须相信革命呢，还是倪藻为了坚持自己的“少布”信念才必须证明倪吾诚姜静宜辈生活病态呢？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绿豆汤酸梅汤阿二靛汤之类的事件又在各个地方各种环境各色人等中成为某种值得继续探究的“常病态”，一滴，两滴，一年，一百年……

二

《活动变人形》中至少同时使用三套不同笔法（或曰不同的叙事语言）。第一种是连环铺张的嘲讽笔法，比如那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寡妇梳妆：

她开始梳妆。一天之中，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酝酿，在积累，在催促她，她感到一阵紧迫的心跳，她身上开

^① 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5页。

始发热，有一种强烈的要哭、要发昏、要上吊、要闹个天翻地覆的冲动在催着她，于是用一连串冷笑掩盖住自己。她首先用手心蘸着水把香粉蜜调匀抹到脸上，然后两手轻轻在脸上拍打。她自己觉得并没怎么用力，但脸上发出了细碎的“叭、叭”声，声音越来越大。这声音常常使倪藻觉得心痛，他痛苦地觉得姨姨分明是在自打嘴巴。^①

像最后一句旁观（嘲讽、叙述）者的直接表态，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更多时候叙述主体是隐形的，讽刺效果主要靠细节的夸张铺排而呈现。居高临下的嘲讽姿态使人想到《围城》，但《围城》既借方鸿渐目光嘲讽世人，也嘲讽方鸿渐自己（尤其是小说前半部分）。而《活动变人形》嘲讽倪吾诚，嘲讽静宜静珍及姜赵氏，嘲讽邻居“热乎”，甚至描写女儿倪萍有时也很夸张，惟独对倪藻，似乎绝少嘲讽。

除貌似客观的夸张笔调外，更重要的嘲讽批判效果还来自于王蒙很喜欢用的大段大段“单向对白”。情到急处，人物之间都不直接对话，而是不加引号地连续自白，比如静宜救活丈夫之后的诉衷情：

吾诚，孩子他爸，谈不上谢，你那话说远去啦。此言差矣！你是谁？我是谁？好也罢，赖也罢，哭也罢，笑也罢，美也罢，丑也罢，死也罢，活也罢，你的命就是我的命，我的命就是你的命，你生病就是我生病，你见好了也就是我见好。你病得要死要活，我不伺候谁伺候，我不管谁管？天花乱坠我不会，洋文外国文我不会，可你病了呢？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好时须想赖时，留得退身步。花花绿绿，既不当吃，又不当喝，又不治病。你摸摸良心想一想，除了我这样管你待你，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人吗？^②

这类不加引号的人物口语，常常排山倒海一连几段甚至几页，谈话的具体场景时间地点、说话者的操作表情、听者的对答反应，都留下空白

① 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0页。

② 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81页。

给读者去想象填补。王蒙颇擅长用这种“间接口语”来刻划人物性格和调度气氛。好处是生动,有气势,容易产生反讽效果。但有时也可能将人物语言(及思维)类型化。(别的想用“土法”感化留住男人的女人,是否也会这样说话?别的受过洋化教育而又软弱无能的男人是否也会像倪吾诚那样发牢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倪藻倪萍不大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尤其是倪藻。

以倪萍、倪藻视角支撑的章节(如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等),就会出现第二种笔法,即比较写实的细描。这时家人之间都有正常对话(配上正常操作表情)。不少口语特地注上方言读音,地方色彩更加传神。诸多细节,如父子洗澡,如胡同口游戏等,构成了整部作品最平实沉稳的文本肌理。问题是,这类林海音式的童年回忆和老舍式的京味生活碎片,如何与第一种夸张嘲讽融合起来而且过渡自然甚至不需要过渡呢?关键,大概是不同人物视角在不同章节之间的交错互补。同一家庭,众人看见不同颜色,极大丰富了故事的容量。

比较构成鲜明反差效果的倒是第三种叙述语言,即夹在夸张嘲讽与细节实描之间(有时甚至是之外)的叙述者站在今天(80年代)角度的抒情笔调。如小说开卷首句:

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荫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你说,这弦有多长?

.....

《活动变人形》以倪藻旅欧背景开篇,大概是想给书中旧事一个反省框架一个今天的参照(这种用今日海外镜框来衬托昨日中国故事的结构在80年代一度很流行。铁凝沉重的《玫瑰门》写北京四合院里几个类似静珍静宜旧式女人的“文革”新生活,却以年轻女主角乘飞机出国飘逸结尾。张承志《金牧场》也以访日心情与草原经验及中亚寻根并置,异曲同工)。在这种意识流的结构(而不是意识流的感官)中,《活动变人形》有

好几处,叙述者都会突然跳出 40 年代故事而直接抒情(如第五章首段,第十章后半部分等),其第二人称手法后来在别的更欧化的作家(如高行健)那里有更大规模的实验与发挥。即使不跳跃时空,就在 40 年代灰暗混浊的四合院里,童年倪藻(只有他有这种抒情主体的权利)也会在写实与嘲讽的笔法之间,突然夹入一段“五四文艺腔”,如第十一章绿豆汤大战之后不久,倪藻入睡前,静珍姜赵氏百无聊赖以吟诗消磨时间。“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姨姨和姥姥啊!倪藻想,而云淡风轻该是一派多么好的景象!”^①

两次阅读《活动变人形》,我都觉得这第三种意识流抒情语言不太协调,尤其是访问汉堡的第一章。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后设视角”可能另有结构上的深意。

三

假使没有倪藻这个人物,没有这个后来者的审视角度,绿豆汤事件该怎么演化呢?倪吾诚姜静宜之间的家庭战争会怎么延续呢?整部《活动变人形》又会写成什么呢?

如果由静宜静珍来讲这个故事,从三个女人的心情处境生态去继续开掘,那不是张爱玲的路子吗?倘若从倪吾诚西化空谈愤世嫉俗无用牢骚以及杜公或者赵尚同(不再为了剧情而美化他)的角度去探讨知识分子的无聊无能无力无奈,那不是钱锺书的笔法吗?《活动变人形》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为数不多可以和其他现代文学经典对话的长篇小说。但如果没有倪藻,王蒙怎么安排七巧与方鸿渐在一起打架?

前面说过,《围城》讥讽一切,也讥讽讽刺者。但倪藻在小说中就没有被讥讽,也从来不会不加引号地连环说话。而且对比七巧临终将手镯

^① 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54 页。

套过整条手臂的细节看,姜赵氏“文革”喝洗脚水、静珍死于新疆等细节也被叙说得太过冷酷,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这是“‘文革’后文学”特有的残酷性呢(想想余华、残雪、铁凝的类似叙述),还是作品对倪藻的父亲及其那一代人太严厉。通观整部长篇,谁都有错,谁都可怜,谁都不幸,谁都是悲剧人物——除了倪藻(及叙述主体)之外。

学者倪伟曾在一篇评论“三城记”小说选的文章中这样称赞朱天心的《古都》:“主体的分裂使叙述的推进变得异常凝重而艰难,却也蕴含着自我治愈的契机,在主体的自我凝视下,个体自我向历史敞开,在反思、质疑、探询之中努力重新确立主体的位置。……反观大陆作家的作品,我们却发现其中的叙述主体几乎总是岿然不动的,他们或是高踞于文本之外的冷眼旁观者,或是沉浸在个人哀乐之中的自恋狂,那样的叙述文本自然是封闭的,无力展现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多重复杂性。”^①

倪伟这段议论并不是评说任何具体作品,但可以提醒我们思考:当代文学,或者说 20 世纪晚期的中国小说,是否存在着“叙述主体几乎总是岿然不动的”这样一个现象?

从叙述语言的层面,在《活动变人形》里的确较少对倪藻及叙述主体的明确反省。但在叙述结构上,却又有一些很微妙的反讽布局。在第十章泼绿豆汤打闹引起倪藻产生“必须改变这一切”的思想的时候,突然,“等一等,停一停”,小说抒情,接着跳出一段第二人称的今天角度的寓言抒情,讲述五六十年代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及“文革”等种种革命运动的失败,“所有的痛苦、热情、疯狂和傻气最终都凝聚成石头,凝聚成了山。石无言,山也无言,于是它们守候着永恒。时间自己是不爱说话的。你好,我亲爱的读者。”^②然后,换了一章,三个女人继续谋划如何与无耻的倪吾诚作战,倪吾诚又继续以牢骚忧国忧己一事无成。

① 倪伟:《书写城市》,《读书》,2002 年第 3 期,第 6 页。

② 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42 页。

这段提早预告日后革命失败的抒情,早不插晚不插,偏偏插在全书唯一一个正面抒情主人公倪藻刚刚在残酷烦闷病态家庭社会现实面前产生了要改变旧世界的朦胧的革命信念之际(这种信念后来要支撑全书的“审父”精神)。这是不是在辩护倪藻信仰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又怀疑这种信仰的历史功效?这是“叙述主体巍然不动”呢,还是有点不自觉的摇晃?或者有意的反讽?

小说结尾时,又冒出一个“老王”,和年老的倪藻一起去海边游泳。然后老王目睹倪藻不惧危险毫无理由又义无反顾向大海深处游去……这又是对叙述主体的执着歌颂呢,还是某种形式的怀疑反省?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的“内容介绍”说,“这部作品是作家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形象的思考”。不管作家怎么思考,但读者也会联想:上一代倪吾诚是承受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难道下一代倪藻不是吗?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许子东评论专辑”

见证的危机

费修珊(Shoshana Felman)是一位“专门诠释作品的文评家”,任教耶鲁,“指导大学部及研究所学生面对语言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劳德瑞(Dori Laub)则是“专门诠释人的精神医师”,“解读人类叙述中的心创的痕迹,实际参与治疗心创生还者”。两位作者摩擦对话了六年,写出了《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刘朱迪译,台北麦田,1997)。我对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颇有兴趣。

作者在“前言”中声明他们既反对“回归纯粹学院式的模式,玩小说与人生之间的‘镜影游戏’,也不是重寻传统陈俗的解释,视历史与作品之间为相互的投射或重现”,似乎一句道中当今评论学术游戏中的两大通病。《见证》一书的写法也的确特别,第一章记述一个以“见证”为主题的教学课程,让学生分析一套音译为《咻—啊》(希伯来文:Shoah)的九个半小时的大屠杀生还者自白录像,并同时分析学生们在课堂上的“见证”反应。这套纪录片据说没有任何尸体、伤痕或焚化炉镜头,只有侥幸生还者的片断言谈、德军的自圆其说与波兰人的旁观记忆。第二章是医学临床分析,记述受过职业训练的访问者如何专门借聆听技巧帮助生还者吐露亲身经历以疗治心创,以及这些职业聆听者自身的心理危机。第三章起开始上升为“见证理论”,揭示生还与言说之间的心理对应关系,既讨论灾难中的自我见证,也讨论见证他人的见证,并且见证“见证的过

程”。第四、五、六章分别从加缪、萨特、本雅明等人的作品论及历史的危机如何被转译成文学的危机。全书沉闷得很精彩，语气平淡得让人透不过气。对于语言与暴力、屏障记忆、叙述与故事的疗救功能等话题都有颇深入的探究，所引的一些例子更令人难忘，比如有位七旬老妇激动回忆奥斯维辛有四支烟囱蹿出火焰，但历史照片上只有一支烟囱（真诚的失忆）。老妇曾给别的囚犯带回好一点的衣物，却“忘记”这些衣物是她从死人那里捡来。又比如加缪《堕落》中的男主角，无意间在塞纳河桥头“见证”一个过路女人自杀，日后一直被落水声惊扰（见证的责任）。

说得简单一点，作者认为“见证”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借往事“重演”让人敢于面对记忆，另一方面希望痛苦的叙述能化解心创忘却恐怖。书中很多临床病例都证明，不让受难者当事人言说，“拒绝看见”，是有助于疗救心创的。我们普通人经历不愉快的事，能向别人口述（重演）一遍事件经过，心里也会好过一点。但是为了心里好过一点，口述哪怕是“昨天”的事件，这事件的次序逻辑细节是否可能已经润色？以疗救为功能的叙述是否总会有意无意修改记忆进而出现“见证的危机”呢？即使再真诚地把心交给读者或者“将灵魂碰撞出血来”也仍然可能会出现“有选择的失忆”。译者刘朱迪将“苦难记忆”称为“民族的刺青”，这个意象耐人寻味。当年在手臂肩背刻上再荒唐的花纹，也需要某种激情虔诚。现在非常后悔非常厌恶身上的图案怎么办？假设刺青只是贴上去的，或者穿上衣服使别人“忘却”，还是修改叙述文身的来源令自己“忘却”？……

总之，“见证”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忘却”有关。

“见证的危机”意味什么？弗洛伊德 1938 年逃离奥地利前后写下了《摩西与一神教》，认为“人类种族的历史，就如同个人的心理发展史一样，充满了无法自抑的重复倾向”。我想世界上会有很多民族的人和我一样，不愿相信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正如个人心理史的过程不过是童年时期的主要事件之引申衍覆，群体的生命也是不可扼制地重蹈覆辙。”

《见证》一书多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们虽有全部的答案，

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于是想起我们自己的一些见证文学，我的感受是：我们虽见全部的症状，却不明白病是什么。

第六辑：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自己的故事

这一卷《越界言论》，编辑部要我写一些类似自述或自传文字。虽然在 30 年代，不少作家三四十岁就编“全集”写“自述”，但今天人们普遍谦虚，同样三十岁仍觉得是“80 后”，仍觉得是新人。即使过了天命之年，亦不好意思写“自述”。我的折中办法，就是写一些零星琐碎的“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有意义，也不保证这些故事是否有趣，甚至也不敢说我能写出全部的事实。我只能说，至少下面我所讲的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一 二哥的人团申请书

我知道自己身世，知道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说来颇不可思议，竟是通过我二哥的人团申请书。

当时我大约小学三、四年级，二哥已经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助教（樊映川的全国通用高等数学教材，其习题集就是我二哥参与编写的）。二哥写的字和他的为人处世风格一样，清楚、清秀、认真、一丝不苟。他对我的儿童时代有很大影响。我曾模仿他的日记体很多年。他的日记是表格体的，横线本上的一行就是一日，从左到右即从早到晚划出 24 小时，○表示用餐，△代表卫生，◇表示坐车，斜线代表睡眠，大段时间当然

会注明上什么课、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和什么人聊天等等。每天 24 小时，细到每一刻钟均有记载。我在少年时期写两种日记：一种文字日记，几天或一周才写一篇，文体上模仿“雷锋日记”，随时可能很光荣地被人阅读（不像后来的“韩峰日记”，是被迫公开）。另一种就是表格化的每日记事。形式、内容完全都是从我二哥那里学来的。有好些年，我在年底可找回这一年中每个小时每一刻钟自己在做什么……

什么时候这种“日记”记不下去了？逐渐逐渐自己的有些事，是不适合白纸黑字时时刻刻记载下来——当时不觉得，那应该也是自己人生的某个转折点吧。

很多往事不记得了，那份入团申请书却清晰如在眼前。

也忘了是二哥有意要我看的，还是偶然看到才去问他。申请书至少有四五张纸，其中有不少生词如“继父”、“资产阶级”、“历史问题”、“剥削阶级的本性”、“右派”等等。这些词汇或在报上见过，但这是第一次，要和我的亲人我的家庭联系起来！

小学生看了半天才弄明白，所谓“继父”，就是说二哥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儿子！原来二哥的生父在他两岁时便因病去世（时为上海汇丰银行职员）。据“入团申请书”记载，因为“封建传统礼教的压力”，我母亲带着儿子（即我二哥）不敢离开夫家，孤儿寡母在开酿酒厂的婆家过了十几年，直到解放后因新的《婚姻法》才得以和“继父”（即我父亲）结婚。（后来读《倾城之恋》看见白流苏回娘家艰难度日的故事，便知不是夸张，那个时代确有实事。）更让我头晕的是，我的另外两位兄长则要称我母亲为“继母”，他们的母亲是东京帝大医科学生，也在他们年幼时病故。不知为什么，我父亲也有十几年没有“续弦”（似乎很难怪罪“封建礼教”），直到后来见到我的母亲……

“晕”了好一会儿才看懂，也就是说三个哥哥，与我的关系或是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只有我这个小儿子（在“入团申请书”里几乎没什么地位，极少提及），亲生父母皆健在。

但更触目的还不是这些血缘关系图，而是我二哥向组织交代“继父”有“严重历史问题”。“入团申请书”说，“继父”出身于浙江天台农家，因过继给经商的姑父，故有机会在1924年到上海求学，先就读上海大学（后来我父亲向我“吹嘘”说，当时南有黄埔军校，北有上海大学，他见过的老师有瞿秋白、恽代英，同学则有戴望舒、丁玲、施蛰存等），后转入同德医学院。“继父”大学期间已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热心参加政治活动，声援北伐军。问题是，“入团申请书”提出疑问：为什么1927年“四一二”以后仍然没有退出国民党呢？（关于这个问题，父亲后来向我解释，一是为了不辜负姑父的培养要继续学医，二是天生怕冷，故不能学他的一些同志一样去俄国。我听了甚觉遗憾：你要去了苏俄，我现在岂不是高干子弟？出了什么事，也可以喊一声“我爸是……”父亲的回答是：“几个去莫斯科的同学，后来回来，不是病死就是枪毙。”）三十年代“继父”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医院当医生，很快升为副院长，日据时期辞职，私人开业至1949年，其间曾任上海医师公会秘书长、国大代表等。总之，心里曾同情革命，却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故有“严重历史问题”。

二哥倒不是只对我父亲特别苛刻，在交代母亲身世时“入团申请书”也照样充满批判精神，说母亲在丈夫去世后“没有勇气反抗封建礼教”，曾开小型童装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等。

我二哥这一年成功入团。

二哥绝不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的人。事实上，我的几个兄长之中，他对父母对弟弟最为关心。政治可靠，业务出色，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文革”初，他也随大流参加“同济东方红”——著名的为毛主席所肯定的造反派团体，因此必须和已被抄家生活艰难的父母“划清界限”。平时不敢回来。某日曾打公用电话要我在弄堂口等，他一个大学教师，提着满满一竹篮估计十多元的猪肉、豆制品、鱼和蔬菜等（当时他月薪六十元），悄悄交给我，叮嘱不要让别人看见或知道是他买的。我还是瘦弱的

小学生，只记得这篮菜很重，很重。走了很远了，回头，哥哥还在弄堂口拐角望着我……

二 另外两个兄长

这个时候，另外两个兄长却是真的造反了。

我的大哥和三哥性格和命运都很不相同。大哥开朗、外向、冲动、感情用事。60年代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国家二级运动员，分配到北京某大学任教。他在吊环上摆十字的照片，后来一直是我中学时代的骄傲。小哥则拘谨、孤僻、害羞、忠厚老实。他们不同的造反故事都对我的家庭带来很大影响。

应该是1966年秋某夜，大哥毫无预告，突然回家，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上海怎么一潭死水，陈丕显、曹荻秋还在掌权？上海的工人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原来他是北京那个大学两派造反组织之一的小头头，到上海“煽风点火”，发动革命。父母担忧地望着满面红光的他，说家里出身不硬，你在外边做事要小心。大哥爽朗地笑了，说毛主席有政策，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切。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他也不怎么担心：“爸爸虽在国民党，却一向同情、支持中国革命。1949年，你有朋友是陈诚的私人医生，也有朋友帮你弄了出国护照，你为什么不去台湾和美国呢？说明你对新社会充满信心！”大哥说的倒是事实，这个事情我后来有次去北大和陈平原、王德威一起演讲时也和学生们说起过（见《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为中心》，收入《许子东讲稿第2卷》）。但当时，父母亲看见满街的“史无前例”的景象，对大哥的造反，仍是忧心忡忡。

临走时，大哥又突然压低声音对父母说：“但是，家里那些西装、旗袍的照片，尽量烧了。如有金银首饰之类，尽量处理掉……”然后又恢复了正常的声调，“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我们大家都要有准备，相信毛主席，相信我们的党……”（他似乎不是党员，但理所当然地说“我们的党”。）

大哥走后,家里的煤炉确实烧了很多照片,味道很刺鼻,相信弄堂里都可以闻得到。至于这次夜访的惨痛后果,下文会有交待。

我三哥的读书成绩不及两位兄长那么出色,故中学毕业后要离开上海到外地上大学,去的是东北石油学院,地处大庆,零下三四十度,极其艰苦。撒尿也会结冰。跟在康拜因后面拾麦。但他写信从不抱怨。他是学雷锋的标兵。比标兵更重要的是一些他做的“好事”,同学老师都不知道,偶尔他在给父亲的信里会提及。比如家里每月寄给他30元生活费,他悄悄将其中15元塞在班里一位最困难的同学的枕头底下。那时的同学境界也高,收到后不肯要,交给团支部,团支部便调查谁做的好人好事,当然查不出来。调查过程中我三哥脸上装作无事,心里无比快乐。父亲读信以后颇赞扬他的行为,母亲却担心另外15元怎么够用。

对60年代全民学雷锋运动的政治后果(社会军队化)和道德逻辑(礼下庶人),我今天皆有保留。准备写给别人看的“雷锋日记”更是日记文体的一个“变种”。但我三哥当年及后来的行为却又以具体真切的实例,告诉我学雷锋运动也有某些积极意义。前几年,三哥从内地某石油机械厂总工程师的位子上退休了,有民营企业高薪聘他,他却婉拒。问其原因,说民营企业请他去就为了研制石油机钻头,一旦成功,他原先服务的那个国营大厂就得停产,五六千人都得下岗。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或世界级高科技,你不去,别的工程师也会去,迟早别的公司会击败你的老厂。哥哥的回答:“是。我知道,迟早的事,但不想发生在我手里!”……

从在大庆往枕头下塞钱,到现在的固执,有些东西的影响却是一贯的、深远的。

再说回1966年,某日三哥又来信了。父亲这次看了却脸色惨白。运动中发生多少事,没见过父亲这么伤心。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

父亲，我甚至不应该这么称呼，虽然在血缘上你生了我，但在革命事业和人生道路上，你却是我的敌人……

……从今以后，我要和你，和继母彻底划清界限，我再也不要你们的臭钱了……

那是一个黄昏，父亲也不开灯，久久坐在床边。我从未见父亲流过泪。这一次也没有，但坐了很久，很久。

……

这封信，和枕头下塞钱，和总工程师的选择，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三 我的造反经历

我对自己上小学以前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记忆。

唯一记得的是在幼儿园等父亲来接。那幼儿园很普通。后来有个外号“面包”的中学同学住在那个弄堂，才依稀辨认出来。父亲当时是一家地段医院的院长。以他 30 年代初同德医院的学历和在上海医师公会的人脉，1949 年要到大医院工作应该不难。他有同学是广慈院长，出了好几卷学术著作，也有朋友后来去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医疗小组。懂事一点后我就不怪父亲 1927 年没去苏联参加革命了，但一直暗暗遗憾父亲没有在学术上走得更远。他出过三卷“医论集”，余云岫写序，其中大都是反对中医、评论社会的医学科普文章。为什么会选择做小医院的院长而没有去医学院当教授做研究呢？一部分原因大概是人情关系，也考虑薪水收入等。父亲晚年时，我还问起过：40 年代何以忽略学术研究而参与医师公会的社会工作？忘了父亲是怎么回答的。但现在我发现，不知不觉，尽量严厉“审父”，我现在不也在重复父亲的道路吗？……

地段医院的院长有 200 多元的高工资，我儿时家里已有冰箱、电话等。母亲虽不工作，却忙得很，参加政协组织的很多活动。因为义务“去

闵行筑路”(“大跃进”期间颇时髦的活动),所以让我在幼儿园里苦等。记得,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领走了,仅我一人,老师也陪着。很晚很晚,天黑了,忙了一天的父亲才赶到。也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说我见他走过来,便“哇”的一声扑了过去,喊“爸爸!……”

我读的小学是“名校”,1949年是工部局小学,试行五年制。我是中队委员,班里“五个领导成员”之一,但从来不是中队长,只是墙报委员。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下课时常要留下来写检查,最多的“罪名”是三项:1. 楼梯两格一跳(下楼时男生常有的不守纪律的潇洒动作);2. 劳动课不带工具(工具者,抹布也。放书包里,多脏!);3. 讲上海话。原来学校规定校内均需讲普通话,一讲上海话便犯错。这条纪律今天看来倒有好处:我的普通话比一般上海人略好,能勉强上电视。写检查的格式,我记得比课本内容还熟悉,必须要深挖违反纪律的思想根源(自由散漫、好逸恶劳、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等等)才能过关。

很多事情是慢慢发展的,从量变到质变。小学最后一年,“文革”开始了,我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

我知道,今天看书的人,无论国内海外,看到“文革”两字就烦了,好像听到祥林嫂说“我真傻”一样。好奇心早没了,同情心也磨掉了。基本上又是政治禁忌,又是票房毒药。但我还是要写我的造反经历。不仅是因为和我后来的研究有关,更重要的是,当你小学五年级某天回到学校里,突然不用上课了。今天写不写这些记忆,我们好像有选择。可是当年发生在你眼前的事,却是你无法选择的!

我对自己所参与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有永久的记忆。

当时的不成文规定,中学生才能做“红卫兵”,小学生即使“停课闹革命”也是“红小兵”。红小兵不能用袖章,只用一个名片大小的纸牌,可以用别针别在手臂上,上书“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及某校红小兵等字样。但这红小兵的牌,要到学校教务处盖公章方有效。(可见“夺权”的重要性啊!)教导主任个子和小学男生一般高,满头银发,满脸忧虑。一再拖延

并警告我们“上街”的各种风险后(当权派总是企图阻止任何形式的革命造反活动),终于一一给我们盖了章。大约有十来个同学吧,别上这个牌子离开了学校,顿时身份不同了。最实际的效用,搭乘公共汽车可以不付钱了。于是我们一起上了94路,去长风公园(1949年前叫“丽娃丽旦”,有钱人郊游之地,茅盾小说有描写。地点也就在华东师大的旁边,所以师大有条丽娃河)。我清楚记得,94路过了沪宁路桥,桥边有个轧钢厂,火红的钢条窜来窜去,当时是桥边一景(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长大一些要到这个厂做轧钢工人……)。这时车后乘客大都下了车,突然发现全车只剩下我们这一群“红小兵”。女售票员苦笑着对我们说:“宣传员们,你们怎么不互相宣传呀?”当时我们太稚嫩了,面对这样公开的嘲讽也不好意思还击,大家只是低着头,熬到终站。万没想到,长风公园门口已有好几百和我们一样的红小兵聚集在那里,秩序有点乱,公园大门却是关着的。挤过去一看,有张红色告示,大意是“最高指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热烈欢迎全市各个小学的红小兵来我园宣传毛泽东思想……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今天来宣传的红小兵很多已经超过本园接待游客的最高限额……故希望其他红小兵们明天再来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真是没想到,刚刚参加革命,就已经迟到了?!我和我的同伴们无奈退出了混乱的人群,有人抱怨教务长拖延,有人骂公园当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能嫌人多?公园明明很大,有上海唯一的三十几米高的“铁臂山”,还有人工挖的“银锄湖”……我们绕公园走了一大圈,最后决定不能半途而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找了一个地方“翻墙”(像今天很多网民一样)……

进园以后的事就忘了,大概就像红色主题公园吧。记忆最清晰的就是在告示前一瞬间的迟到感。这种感觉后来在我的生活还出现过几次。

总之,第一次革命行动就以失败告终。后来在“三人行”中,文道被认为是革命派,我则总是改良派(文涛大概是调和派、逍遥派),我怀疑这

和我儿时第一次的革命经验有关。事实上,我这一生所参加的革命行动,好像没有一次成功。

四 革命风暴

小学高年级,大致上正好是可以独自上街走很远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南京路上“风景这边独好”。

记得上海最高的24层国际饭店(Park Hotel),当时好像改名为东方红饭店,一楼西餐厅卖豆浆大饼油条(可惜这个变革没有继续下来,以至于今天上海传统早点要靠台湾连锁店来变质变味地经营)。饭店前面的南京路,以前曾叫大马路/静安寺路,当时该叫“反帝大道”还是“毛泽东大道”还有争论,辩论的学生挤掉附近新昌路口街心花园平时热闹的打牌摊(现在是奔驰专卖店)。我也在那里想了半天,顾正红当年就牺牲在这条曾经是巡捕横行的路上,所以应是“反帝大道”;但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用他的伟大的名字来命名中国最有名的马路,也顺理成章。想了半天,觉得两个改名都很好,决不定——其实谁也没问我这个挤在马路上的小学生的意见。这种情况还延续到今天,我在文章、电视里犹豫矛盾揪心的很多事,人家实际上根本不要我来发表意见。

是日南京路人山人海,因为有一队队红卫兵在“破四旧”,具体在街上就是查奇装异服“三包一尖”^①:包头(烫发)、包屁股、包裤脚管及尖头皮鞋等。“破四旧”的暴风骤雨也是突如其来的,有些市民早晨上班时还没注意政治天气的变化,下班时发现自己已成了众人侧目的“四旧”了。看到有一个女人,当街被人拦下,裤脚管里塞不进一只酒瓶,显然太窄。于是,两个男红卫兵当时就用剪刀,从脚面往上,“嚓”地一下往上剪,一

^① “三×一×”这个数字组合,在当代中国人政治生活中频繁出现:三自一包、三尼一铁、三和一少、三包一尖、三来一补……

直剪到大腿处。女人(好像挺好看的,三十来岁)涨红了脸,羞愧多于愤怒,在众人喧闹声中匆忙逃去……

那一剪,其实很 Sexy 的。后来看意大利片拍民众当街惩罚曾经被德军“污染”的女人,便会想起 1966 年南京路上这一幕。同样印象深刻的是那日晚上,回家途中我走到南京路石门路口的公寓大楼前,就是南京理发公司所在的那幢大楼,起重机在满街群众的欢呼声中,吊起了大楼外墙上的几个西洋女性雕像。那几个雕像很美,至今,你去那个路口,仍能见到大楼外墙雕像移走后留下的空白痕迹!我后来在上海作协某日下雪天拍了张照,背景里也有希腊女神的雕像局部;这是上海很少几个被保留下来的西方雕塑。有网民引述我在节目中的一句话:革命就像大雪一样,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但融雪的时候世界更丑陋。

有一个时期,静安公园的一块地方,专门划为大字报区。那真是奇观,可惜没有录像!我可以在那里逗留很久,好几个下午,反正停课了,从这些大字报也可以学到的新闻、语法、美术乃至性知识想象力。黄昏以后,在一些比如主张一周改为十天(为什么是七天?为什么追随西方?)或某高干与护士有秘闻的大字报前,还会聚集一批市民在交换像章。参与的什么人都有,从中小学生到退休老工人,男性居多,甚至也有一些衣着讲究的“老克拉”式的人物。记得有一位,初秋时节便围着围巾,有些奇怪。他对人们热衷的“原子弹爆炸”、“井冈山”等也显出不怎么在乎的表情。我手头可操作的“资本”不多,只是好奇地围在一边。另几个货源较多的熟人却一直围着这个“围巾”。他头发有纹路,皮鞋也亮,表情颇沉着。终于,他走向一个角落,我们跟了过去。他环顾四周,犹豫了一下,然后突然一甩胸前的围巾:哇!一条围巾上全部都是各种各样毛主席像章,有上百个。如果他没出国,90 年代浦东股票市场开张,他可能就是常客了——我后来想。

这是在上海。革命也有上海的特点。

小学里第一个被斗的是教自然课的杨老师。我们私下一直叫他“杨

包头”，原因是头发涂蜡有光太明显，我们上课时想象，如果苍蝇在上面也会滑下来。他衣着外形比他教课内容更引起学生的兴趣(或厌恶)，不知这与他首先“被揪出来”有没有关系。对我来说，那天的场面还是很震惊，使我日后反复思考，还是理解不了这个场面的人性与社会意义。简单说，一群比杨老师矮小的出身过硬的同学围着他，开始是怯生生的批判、责问，后来不知谁动的手，扔纸片和粉笔，扔到他的衣服上……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惊讶了：杨老师垂着手，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这是杨老师吗？平常他声音略一提高，同学们就鸦雀无声，现在……然后有人扔了黑板擦、扔皮球。更大声地责骂，然后突然有人把糍糊甩到杨老师那黑亮的头发上……我问身边的同学，他有什么问题。同学压低声音，表情神秘地告诉我：“腐化！”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个同学可能也未必知道)，但也觉得事情一定很严重。

这一次只是惊心动魄的旁观。接下来就是心情激动的参与了。是去自己的班主任家抄家，背了木制的步枪(不知哪里来的)。小学几个班主任里，四、五年级的班主任对我较一般，但我去了以后还是怕正眼看到她。好在她也一直低着头。领头的是干部子弟体育委员。我之所以能参加也是他们对我的好意(我的出身似乎不硬，父亲至少是“反动学术权威”——这六个字是自动连接的，没听说过学术权威不反动)，所以不敢放弃这样一次革命行动的机会。抄家成果是搜出一把没用过的菜刀，怀疑是地主婆妄想变天的凶器。后来结果我也不知，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背木制步枪，以后就没资格了。

我还有一次“组织”以外的行动。我家住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所在的一条弄堂里，弄堂口有一个别墅是中药雷允上老板的家。我的一个好朋友就住在他家工人房旁边。老板没见过，但他家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和我们年纪相仿，当时令我们嫉妒得要命——因为他家有一张标准的乒乓球台。抄家那天我那好友叫我一起去。当时那幢二层的别墅小楼里已经到处是红卫兵、红小兵或其他人(又迟到了)。乒乓球桌已被人弄坏

了(可惜),其他房间也乱七八糟。我记得我的好友领着我,做的最大的破坏就是到厨房,将糖和盐混在一个瓶子里,他当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下次叫你们怎么吃,叫你们怎么吃……

也就在这时,另一弄堂里的小孩跑来叫我,说我家也被抄了。我听了愣,于是赶紧放下糖和盐跑回家去……

五 抄 家

很久以来,一直想写一部题为“抄家”的长篇小说。

《红楼梦》里的两次抄家,一次内部“扫黄”,另一次皇室抄家,对整个家族命运的影响,至关重要。“文革”初期,凡有“问题”者,抄家是例牌。我读过数千部描写“文革”的小说,不知为什么,抄家这个事件很少被描写成小说的核心情节和关键场景。我在《许子东讲稿第1卷:重读文革》里,也试图探讨其中原因,但仍是困惑。“家”,这是中国人精神、物质生活的核心啊!别的不说,租房买屋、装修布置、衣柜书橱、照片抽屉,哪一样不是家人的心血、“自己的投影”。有人进门,乱动乱坐,已感不适,何况“抄家”?!难道没有一些更具体、更琐碎、更难忘的伤痛吗?

我的阅读经验里有三部小说写“抄家”,笔墨较多,印象较深。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有很大篇幅写抄家。但被抄家的起义的国民党将军只顾和红卫兵男主角语重心长地谈话,对于家中财物、书籍、字画的损毁破坏几乎毫不在意。大约因政治问题而被抄家者,更关注的是抄家时的“罪名”,而非抄家的实际过程及损失。铁凝的《玫瑰门》写一个“剥削阶级”的女主角司其纹主动邀请红卫兵来抄家,还精心伪造现场,匿藏黄金于后园地下,再挖出来以表示改造的决心和对革命的忠心。如此扭曲变态的行为与心理也只有在光明灿烂的社会背景里才有可能发生。直接抗议红卫兵损害家中财物侮辱主人公人格的是郑念用英文写成的《上海的生与死》,作品(纪实小说?文学性的自传?)中详细描写明代瓷花瓶

被砸时女主人拿《宪法》抗争的滑稽场景(将来万一若还有类似事件发生,未来的红卫兵可能是马未都、王刚的观众,分不清真假也未必舍得“砸”了)。简而言之,我亲眼见过的抄家(被抄家)情景似乎没有在那么多杰出作家的文本里出现,作为目击者和读者于是总有点不太满足。

而且“抄家”如果作为长篇题目,写实层面是一个或一系列查抄财物、文件或侮辱、打骂的具体行动与事件,象征层面上却可概括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性质:对家庭伦理道德的一次革命。而且,动词“抄”也极重要。狂风骤雨、破门入室,满屋狼藉、呼啸而去……十年,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来说,只是“抄”家,而不是“离”家,更没有“毁”家,后来还要“回”家。“文革”以后,家庭伦理对革命道德的全面复辟,我另外写过文章讨论。

1966年秋,我家前后被抄三次。

第一次就是我在混合糖和盐以后奔回去那次。同一条弄堂,从2号到14号,我一路飞跑。到家门口,见一堆邻居和路人在围观,有一张不大的大字报,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及一些历史问题的揭露。我没细看,内容应和我在哥哥的入团申请书上看到的差不多,多的是一些形容词和感叹号。这次来抄家的是父亲医院的造反派。说是造反派,也包括支部书记、门房工人和很多父亲的助手、学生(护士、年轻医生等)。父亲那时已从院长贬为门诊部主任,又改任内科主任。但毕竟在这个医院工作多年,人缘不错,加上这是运动初期,总之,是一次比较“文明”的抄家。

我家住在三楼弄堂房子的第二层全层,两间朝南的大房间,分别有22和30平方,有一个马桶、洗手盆、浴缸齐全的大卫生间,在一楼与二楼之间还有一个公用的厨房以及厨房后面一个6平方独用的储物间。厨房对面是一个亭子间,住着“李家伯伯”,一个风趣风流的消防局职员,太太很漂亮(后来才知道是李先生从前从舞场里“救”出来的)。三楼全层住着陈家。“陈家伯伯”的弟弟据说从前和赌场有点瓜葛,后来好像也被抄家,但损失没有我家惨重。一楼早已被改成一个街道玩具厂,平时

应该很大噪音，奇怪儿时的我竟充耳不闻，全无烦恼。我的出生地在延安路、威海路胡同花园旁边，盖中苏友好大厦时搬来北京西路，我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4岁。气喘吁吁跑回抄家现场时是12岁。

医院的护士们都认识我，但都忙着，不和我说话。父母应该被分开坐在两间房间，分别看着抽屉、衣柜被打开，或主动打开。抄家的人大概有一二十个，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但不怎么乱，也没有把家具损坏东西乱扔之类（尤其和我刚刚“抄”的那个别墅相比）。当时和我有关的是两件事。一是我最担心的，他们在厨房后面的储物室看到了毛主席的石膏像！这个白色的大约二十公分高的石膏像是不久前“请”来的，（宝像不可以买，只可以“请”，但也要钱。）不知怎么他老人家鼻子上有点灰，我用手帕去抹，没想到手帕略略有点潮湿，灰是擦掉了，石膏上却有了一点灰的痕迹，之后竟怎么也清洁不了了。干湿都试了，越擦越不行！也没敢和家人说，一个人急出满身汗，也没有别的处理方法。（你们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最后只有用“请”来时的塑料胶纸重新包起来，扎上红丝带。玻璃纸有点反光，里面鼻子上的灰痕就不易看到了。但晚上做梦都“梦见毛主席！”后来我凡有心爱的东西，笔、车、衣服、墙纸等等，总会有污痕上去（不喜欢的东西则很少弄脏），但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紧张。不敢放在客厅，临时搁在储物室，其实是在想别的处理方法。结果，抄家的人发现了，问我父亲，父亲真不知道。我急中生智，大概解释成，这间也是我做功课的房间之类，医院的人最后也没追究。

另一件事是他们在我的床上发现几本医学书。两间朝南大间，一间叫房间，是父母的睡房，很小的时候我也睡这间。四面米色墙纸三面都有我大约四岁时画的一连串军舰大炮战车火箭作战图，我是独自在家用铅笔蜡笔一边想象战况一边在创作壁画，事后我屁股挨打时三个哥哥都在一起用橡皮等努力擦掉这形象的“军情观察室”（现在遇到董嘉耀马鼎盛，仍会想起此事）。但“战争创伤”后来一直隐隐可见。感谢父母，在这样的图画包围下睡了十年！另外一间我们叫客厅，前有阳台，后面

用玻璃墙隔出一小间，叫后房间。这就是我当时的卧室。朝北还有窗对着天井和李家的亭子间。我的床后是父亲的西装箱和母亲的一个漆柜，图案有点像张爱玲《茉莉香片》形容的屏风。我的枕下被发现书，这没关系，问题是都是医学专著，其中有关“生殖系统”的章节还折了角……

父亲有四个书架，每个五层，玻璃门可从上方推缩进去。其中有两个我结婚时重漆一下再用。在电影或照片中看到一些中西名人领袖也用这个款式的书架。四个书架有严格分工分类，两个是政治及文化书籍（其中很多书我后来仔细读过，如《联共（布）党史》等，《资本论》三卷至今仍在我上海书房），另两个全是医学书。我在知识上的“性启蒙”早于身体经验，忘了多大，最初是在沙发隙缝里看到一本计划生育小册子，完全无意地翻到其中几张图画。有的看得懂（男的），有的看不懂（女的）。于是乱猜，还去问母亲，母亲笑而不答。我把那些图画及文字反复琢磨推敲，终于自己“悟”出了人生的真谛。记得当初的第一瞬间的震惊和怀疑是：难道毛主席也这样……

进一步的自学就是家里现有的医学书。最初的身体觉醒也是伴随着科学名词而进行的。枕下藏书当时被医院的两个男医生发现，却只是怪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也没再声张。我可又吓出了一身汗。

抄家大约进行了两三个小时，近傍晚时，领队的人写了一张清单，上面是他们要拿走的文件、信件、银行存折、日记、照相本等等，父母签字。这一次抄家，主要抄走的是文件。走了以后家里看上去也不太乱，乱的是父母亲的抽屉、柜子和他们的心情。

母亲说：“你怎么有一千多元自己的存款，我完全不知道？”

父亲说：“你一直说家里没钱，可今天怎被抄出来五千多元？”

父母互相埋怨，竟没想到责怪抄家的人。至于父亲几十年的旧信、最早的非常美貌的私生女的照片、材料等等都被医院护士们抄走了，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第二次是母亲前夫家的单位来抄家。

母亲以前的夫家，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酒厂。母亲作为长媳妇，虽已离开，但留在婆家期间曾开过童装店，其资金也和酒厂有关联。所以这次抄家，以经济目的为主。无奈家中现金存款已被医院抄去，于是就翻箱倒柜，将母亲多年买的很多衣料全放在空浴缸里，将家里存积米、粮、干货、补品等全摆在屋中央。造反派把我叫到浴缸前，说，看看你的裤子已经太短，下边放长一圈还在穿。身上毛衣都是母亲拆了哥哥的旧衣帮我织成（我向往已久买拉链“大翻领”运动衫却毫无希望。母亲总是说：“小孩不能吃惯用惯”）。“你看！自己的亲生儿子，穿成这个样子！家里却放着这么多好料子、好绒线，也不舍得用。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吗？”说得众人称是，我也是连连点头。眼前果然整整一个浴缸，堆着毛料、绒线、绸缎及各式各样童装样品……后来也不知哪里去了。

当然，对我及我的家人影响最大的是第三次抄家。

那是半夜，我被灯光、喊叫和哨声惊醒。穿上衣服，屋里屋外到处是人，且大都戴军帽穿黄军装：啊，北京红卫兵！我打了个冷战，既是兴奋，也是紧张。

北京红卫兵当时在上海已是个传说，一则是大胆点火，号召反市委，二则是带铜头的皮带，时有抄家打死人的流言。我们住的那条弄堂的23号，前几天有资本家从阳台跳下，据说就是和北京红卫兵有关。但那天晚上我在后房间看到的，却是一群个子参差不齐的初中生，有的比我高不了多少，穿着军装扎着皮带留着辫子，态度也很温和。她们问我是什么人，和许××（我大哥）是什么关系。来抄家的主力是哥哥那家大学的另一派造反组织，查到他们对立派的头头家里居然是“历史反革命”，于是直奔上海。但不知怎么也有中学生，大概是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就在我被这些女红卫兵拉着问话的时候，只听到外面的房间、阳台、楼梯、走廊都是人声喧哗，十分吵闹。很多人进进出出，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有个红卫兵跑来，问我见到我父亲没有？我说应该在隔壁睡房。他们一群人哄地又走了，然后又听见要手电，要梯子，总之很乱很乱。两个漂亮

的女中学生摸着我的头说，别怕别怕，你还小，要划清界限。

原来早已睡下的父亲，听到是北京红卫兵，在我母亲开门应付时便穿着睡衣睡裤从阳台爬水管到楼下花园。他做医生几十年，体育运动也只会游泳，这大约是一生最危险最勇敢的行为了——因为对铜头皮带的恐惧。喧闹一阵以后，北京红卫兵终于在楼下玩具厂的纸箱堆后面找到了我父亲。他们把他拉到弄堂里，临时用纸箱搭起一个台，就在路灯下现场批斗。“妄想逃窜？！”“×××的反动老子还敢爬水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片愤怒的喊声，不知道有没有动武。开始女红卫兵们不让我出去，但有人说我应该受教育，所以就让我到楼梯口，从厨房后面储物室的窗口往下看。看不清楚，大约几十人，大部分都是北京红卫兵，少部分是看热闹的邻居，路灯不是很亮，声音杂乱，听不清楚具体地喊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站在纸箱上，仍穿着棉毛的米白的睡衣睡裤，他平时就讲究头发，总梳得一丝不苟，上床则戴母亲给他手工做的睡帽。现在睡帽掉在地上，一个女红卫兵又捡起来，给他歪戴上，于是像个小丑，还露出一半零乱的头发，在很凉的秋风中抖动……

不知为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没有恨北京红卫兵。这事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可我反复回忆，记忆已经是破碎零乱了，缺乏细节了，可是有一样却十分清晰：我当时并没有恨那些北京红卫兵！

为什么呢？是时代的原因？是我这个人幼稚没良心不孝顺？还是什么别的偶然因素（比如那几个女红卫兵的漂亮温和）？……我也不知道，以后再另作讨论吧。（后来在网上见到有个博客，说他/她一生听说过的最可怕的事，就是许子东在北大讲演时说过的“见到红卫兵在斗我父亲，自己却不恨”。）

是啊，直到今天我还在问自己，为什么呢？

我和那些红卫兵一起回到房间，她们说我还小，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时见到有些红卫兵在客厅墙上大书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个口号颇符合他们的需要：我父亲的“反动”，证明了我大哥这一派的“混蛋”。但也有另外的红卫兵又将对联涂改，变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口号是比较政治正确了，房间里却已一片混乱，像战场（或电影）一样了。这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直到我心爱的集邮册被撕破，梅兰芳的邮票都被撕碎，我才意识到灾难来临。

第三次抄家历时大半夜，他们走的时候将父母的睡房封掉了！“你们才三个人，住一层楼，太不像话了！”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内，要搬一些必需品，很多东西都被封了。不记得了，应该是一夜没睡。

很多细节都忘了，就记得父亲在寒风中爬下水管，然后被抓，穿着棉毛衫裤，睡帽歪了，一头乱发。而我却不恨北京红卫兵……现在才知，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六 天台山下

第三次抄家，真正改变了我们的处境。

首先，房子被封了一半，正房和厨房后间都贴了“北京政法公社”的封条（也许是“北京政法兵团”，我忘了哪一个是我哥哥参加的团体，哪一个 是来抄家的派别。后来知道抄家一派的后台是谢富治）。封条上盖了造反派的红色公章。北京红卫兵早走了，这薄薄几条白纸（还有黑字红章）却截断了我们的生活，虽被风吹起，自然剥落，但谁也不敢动，甚至上海里弄里的造反派也不敢动。直到几个月后“一月风暴”后刮“经济主义妖风”（工人、市民为了经济目的而造反），弄堂里住房困难的工人家庭便纷纷冲向那些“剥削阶级”被封的空房子，没有手续，直接占有。事后也变成合法。不过占领我家正房的一家工人后来和我们关系居然很好，父亲是裁缝，儿子女儿和我们常打牌，我二哥还几乎和他家女儿谈恋爱——那是后话。

其次是我出入弄堂，随时会被人扔石头。都是北京红卫兵效应，我

的造反资格一去不复返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位浙江家乡的亲戚来上海串联，父母就请他把我带走。于是，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0月，我来到浙江省天台县的一个亲戚家，有时也住黄岩路桥和温岭泽国，前后将近一年。

离开上海先到杭州，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山、美丽的西湖，但更让我兴奋的是自己也参加了串联，俨然也是红卫兵身份了。和表哥一起住进了西湖畔的一个接待站。黑白二层砖房，朴素清洁。登记以后找到铺位，十几人一间，有男有女。但秩序井然，吃饭没有争先恐后，睡觉也没见人乱搞（至少我看不见）。伙食不是免费便是极便宜。红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只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看西湖。这是我真实的经验：串联时期风气良好，还和表哥在玉泉喝龙井尝香榧子，周围一切是清，是绿……

天台山在唐代是座名山，李白有诗：“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台宗和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并列，是当时的一大佛教派别，后来尤其在日本影响深远。到我在天台时，著名的曾有八千和尚的国清寺已被封掉，佛像是否被毁坏，不得而知。据说，当时有日本友好人士向周恩来问及天台国清寺，总理并不知道天台宗，但身旁的郭沫若解释了一番，于是后来国清寺很早得到了保护和修复。可见郭沫若作为领导人身边的文化人，这方面的贡献还是不少，近来却被人们忘却了。我小时候只记得他为毛主席的一张照片题诗，那是毛主席罕见的飞机工作照（主席支持低碳经济，很少坐飞机），题的前四句大概是：“在一万零四百的高空，在图107的飞机上，难怪阳光是格外的明亮，机里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稍后几年我读《李白与杜甫》，我虽然也和郭老一样喜欢李白，但凭“新枯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就断言杜甫家有上万根竹因此属于地主阶级，或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说杜甫家屋顶有三重茅草，还不让劳苦孩子拿走，显然是剥削阶级的态度，云云，确实令我这个少年也无法接受他的“学术研究”。

但后来读书多些，才知郭沫若早期的诗文和研究是不应被忽视的——至少像保护天台山这样的建议，当时还有谁有知识又有权力来提出呢？

天台山上最令我着迷的是石梁瀑布，好像后来电影《少林寺》曾取景于此，在两山之间有一条天然石桥，上面最窄处接近两尺，长约十几米（当时印象，只觉得快跑一下就能过去）。石梁左边是山下飞溅下来的瀑布，巨大响声。右边则是这瀑布继续往下坠落，白花花水烟云雾看不到底。我和我表哥及他的朋友一起上山（主要目的是捉松鼠），事先大家都拍胸脯说可以走过去，说我们平时走路，哪需要两尺宽的路面？可到了现场，三个少年人，反复尝试，都不敢走过去。桥对面有香炉有烟火，说明天天有人去烧香，可能还是尼姑。可是我们就是不行。

由此悟出一个道理：我们平日基本生存及说话行为其实所占空间不大。再大的房子，睡着了也是一张床；畅所欲言，也未必有多少惊世骇俗之论。但社会总要多给一些空间尺度，人们才能活得踏实。多余部分是社会心理空间，看似无用，却是人的天性需求，也是安全保障！

在天台近一年，有三件事印象最深。

一是武斗。在1966年冬天离开上海，等于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久以后，陈丕显曹荻秋真的有麻烦了，王洪文等领着工人们在安亭堵住了未来的高铁线，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穿上军大衣，徐景贤朱永嘉（以及后来很有学术成就的朱维铮等），也都在一月革命中初试文才……如果我知道日后将从事有关“‘文革’集体记忆”的研究，当时我就不该离开上海了。可是，即使在偏远的浙东小县，我也一样亲身经历一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住在城门以外，一度几乎每日进城到县委附近大街看大字报。（我一生都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有莫名其妙的兴趣，此陋习至今难改，和自己切身有关的事，如心脏，如账单，有时反而不太清楚。）大字报每日甚至半日就被刷新，有点像今天上网：明知道没有太多新东西，总忍不住隔几个小时去追看一下。各种名称、口号、标签、争议，千头万绪，最后总是两三派。好得很！好个屁！是可忍，“郭”不可忍（读错写错字，也没人

敢笑)！说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却传闻林副主席有言: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是反动,好人打坏人是活该。我虽错过了后来上海“砸上柴联司”的武装行动(我二哥在此行动中受伤,据说当时主席亦在上海“观战”),却目睹了天台县城的独特武斗方式:石战。

战斗的原因我弄不清楚,大约总是口水开始,拳脚随后,发展下去,就找工具。人就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武斗就是喊政治口号打架。

不同派别控制了不同城区,巷战开始。以西城门为界,战况拉锯胶着。开始是扔石块,但大块扔不动,小石块再大力也扔不了多远,总在目测距离内,攻击性不强。但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很快就出现另一种战斗方式:用一至二尺长的粗麻绳,头上织成一个小套,放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将绳子前后晃,反复晃至180度甚至更大角度,然后突然让石头飞出去……这种土法的链球飞得很高,可以远至几十甚至上百米,落入“敌占区”犹如不爆炸的迫击炮实心弹。掉入水塘便无事,砸在屋顶会破一大片,正中行人不死也重伤。更重要的是,这种“石弹”从天而降,防守方看不见进攻者。我不止一次躲在城墙下死角,亲身体会到那种恐怖效果,但我当时不怕,且十分兴奋,全身格格发抖。

作家许杰在20年代“文学研究会”时期写的成名作《惨雾》(收入茅盾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写的就是天台乡民在民国初年的械斗。鲁迅早提过“台州式的硬气”(《为了忘却的纪念》)。不仅文人如柔石如此(想想他的名字,再柔和也像石头),械斗的乡民亦然。械斗的原因不详,械斗的方式、细节、战况和民众情绪是小说的重点。许先生是我父亲的同乡朋友。读幼儿园时随父亲去看“许家伯伯”,作为著名右派他已从小楼搬到师大一村一间平房,墙上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书。坐94路汽车看着窗外我随口说了一句:“绿油油的一片。”许家伯伯就对我父亲说,你儿子也许有文学才能。当然这也是事后的议论。旁观“石战”武斗时并没有读过《惨雾》,也不知中国的事隔了很久,也会很相似。

天台的武斗最严重也就是“石战”,没有动用真枪实弹。

第二件事是“初恋”。引号的意思是，不知能否用“初恋”来形容下面的事。其实最早的性觉醒应是在小学期间，某日中午睡觉，半梦半醒间突然觉得特别舒服——其实是某个睡姿压迫到了身体某个部位，而这个部位当时发生了自己都不明白的变化反应。以后我还想那个睡姿，却并不每次都成功。看父亲的医学书，很自卑书中说的“梦遗”怎么我没有呢？如有意去做，岂不是书中警告的对健康不利的“自慰”吗？这些问题到了天台，有严重的趋势。但客居朱伯远房亲戚家（当地著名的“开明士绅”，政协委员，但也被冲击），和两个表哥一个房间，诸多约束，也就淡了杂念。只是在从他们家进城所经过的一个池塘边，有一户人家，几次见到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女中学生（或者十六七岁），穿仿制军装，有时系皮带，短发。简单说就是漂亮。我现在其实想不起是怎样的漂亮，反正就是漂亮。于是，我每次进城，必绕路经过那池塘，十次有一两次远远望见，心情便好。这样好几个月，偶然也见她着便装，也漂亮。从没说话，想都没想过。偶尔梦到，更多的是经过那地方，即使她不在，那地方、池塘、村庄、树木，也都漂亮……

没了。这是“初恋”吗？上课时听香港同学引堂·吉诃德的话，“爱你是我一个人的事”。也许吧。这样的事以前没有发生过。

天台县城有始丰溪，水很清，映照远处赤城山塔。我也常去游泳。我是异乡人，没有什么同龄伙伴，多数一个人。溪边游水的人有大致的男女区域，可看见却不混合。女的大部分是小姑娘，也有成年的，很少人穿城里的泳衣，大都就是花花绿绿的短裤汗衫，湿了以后其实很性感。换衣地方女的在一个小树林里，男的几乎公开。那片小树林里常传出嬉笑声，引来人们目光，但也只是远远地望去。我喜欢在百米处另一拐角处游，水较深，较凉，暗绿色。虽被劝告说水草多有危险，但我小学里已游过黄浦江，胆子大。记得有次傍晚游完水沿一小路回家，忽然在另一僻静处树下好像见到女人，应该也是换衣，只有一人。多大年纪，什么样，完全没看到。只听到那女人用当地话好像骂人，又好像在笑。我头

也不敢回，余光里见到树木下暗白的人体。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像做了坏事一样。

不管怎样，理论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陌生女人的身体，凡事第一次，都很重要，当时我十三岁。

在天台第三件难忘的事是劳动。

在这件事上，我父亲的意见倒是和毛泽东一样。父亲在写给我亲戚的信中，闭口不说让我离开上海是因为家庭处境险恶，怕我受连累，而是一再强调要让我多见见世面，多参加劳动，多些锻炼的机会。我的亲戚家有兄弟八人，大哥是空军军官，和当时很红的《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是朋友。带我来天台的是二哥。三哥和七哥都在家里务农，八哥读中学。很多时候，我便跟着三哥、七哥下地干活（当然是义务劳动）。主要农活一是挑担，二是踩水车。三哥能挑二百多斤，七哥少一些，我最多只能挑几十斤，还不会换肩（几十年后才知道是脊椎有问题，不是世界观有问题）。印象最深的是踩水车，样子挺浪漫的，其实很枯燥，也不只是累。我当时颇为自己皮肤太白、脚板不够宽等城里人特征而自卑。总之，踩水车人的具体感觉与电影里看到农夫踩水车的样子很不一样。具体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我想所有同情弱势群体或歌颂劳工神圣的左派学者，最好自己也去踩一整天水车，而不是只在“水车屋”那样的日本餐厅里讨论问题。

还有印象很深的事是卖猪。卖猪前半夜，给那猪吃很多粥，还放糖。猪从未吃过人的食品，狂喜，吃得比我们今天在拉斯维加斯吃自助餐还要没节制。数小时后几兄弟便将它绑了，抬上疾走，近乎小跑，我气喘吁吁在后面几乎跟不上，直问为什么这么急。八哥笑了，七哥告诉我，为了不让这猪在半路大小便，说大便损失还不大，一次小便弄不好要丢七八斤，少卖很多钱。天刚亮正好赶到收购站。一路七哥都在对那只主要是他养大的猪说，对不起，熬一熬。

以后我每次旅行途中自己开车或坐巴士也有着急时，也总对自己

说，对不起，熬一熬……

那时不知道在天台的踩水车卖猪原来只是我农民生涯的一个开始。

七 中学时代

我的同行里“69届”特别多，王安忆、陈村、陈思和、陈平原……王安忆还专门写了长篇《69届初中生》，这一届学生有什么特别？当代骄子？值得专门写个长篇。因为“文革”虽然对当时各个年级的大、中、小学生都有影响，但“69届”的处境极其特殊：他们是第一代完全没读中学的青年人。之前的67届、68届初中生都在1966年前读过一两年中学。高中生更不必说。只有69届，正好1966年小学毕业，从1967年到1969年，名为“复课闹革命”，其实就是没读过中学，连一元二次方程都没学过。

但他们又是最后一代全体离城下乡的青年人。自70届起，相当比例的学生就可留城进厂。虽然当年张春桥在上海保证，上山下乡作为国家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但事实上，69届是最后一批没有选择全部必须下乡务农的中学生。换言之，王安忆想描写的，就是这样一批受教育机会最少但又必须全体下乡的中学生。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我的“中学时代”十分精彩，两三年时间没读什么书，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也不知做了些什么事。

好处也有，不用考学校，按地区划分，我进了培进中学。语文老师是后来华东师大的同学、上海出版局长孙颙的母亲。知名校友则有余秋雨。不过我入校时他早已毕业。

我被腰缠石膏的二哥从天台接回时，家里已搬到北京西路近陕西路口一间更小的房子里。二哥在砸联司事件中意外跌伤，却显得像个“战斗英雄”似的。第三次抄家后仅剩一半的房子仍然被认为超过了剥削阶级的改造标准。我家虽然刚和抢房进来的裁缝家建立了超阶级的友谊，

却又被“革命居民委员会”扫地出门。这个委员会的合法性很可疑，既非街道、里委、党组织，也不属于房管局或派出所。记得早在抄家前，还是1966年夏天，弄堂里就贴了一张纸，只有简单一句话：一切剥削阶级到革命居民委员会报到！下面是一个地址。为此我们全家四人在厨房开过一个很严肃的“会”（我大约是列席身份）。父亲说我们不是“剥削阶级”，“我是拿工资的，你们填的成分是职员、医生。你母亲是家庭妇女”。母亲不懂政治，谁说都是点头，二哥则耐心细致向父亲分析解释：“全国人民拿多少工资，你每月200多元，不是在剥削人民吗？至于妈妈，曾经开童装店，离开夫家时还拿了一笔钱，难道也是劳动所得？”于是，父母就心服口服去登记了。事实证明，有邻居当初不去登记，只是由自己单位来“批斗”，未见得会失去房子。思想改造太积极也不好，再有运动人们就懂了。我们搬出第六医院这条弄堂后，我家的房子分给一位区委干部。这位干部在往后的日子里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北京红卫兵抄家，封掉一半住房。“被搬迁”后，房子又再小了一半，仅16平方米一间。保留了父母原来的大床、衣橱、一个书架，还有餐桌再加我一张小床，于是站在房间中央，往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一抬腿，必然会触及什么东西——我在这个房间一直住到结婚。比面积缩小更糟糕的是“大卫生”没了。还有马桶，但无浴缸，从此要用脸盆拉起门帘洗澡了——我那时完全不知道，比起过几年我将要面临的生活，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天堂。

中学生活乏善可陈。不用书包，新发的书无论数学物理，一半都是语录。比如讲三角形稳定性，先要讲百万雄师过大江，引诗歌，有图画，最后才说解放军扎的浮水木排是三角形，等等。我通常就把书放在口袋里。男女生全不讲话。谁要和女生说话，必被其他人唾弃。当然也有少数男生，班上的捣蛋分子，会自我吹嘘有女人经验。记得邻班有个叫“长脚”的，告诉我们自行车如载女生，一定要让女生坐前面，我们不解，问为什么？他神色诡秘地眨眨眼，说骑得很快，前面一个红灯，一个急刹车，

他身体前倾，必定可以打个“铅丝”（沪语发言：开丝）。他把手指缠起来，后来才知“铅丝”就是“kiss”。

学校里有时办“抗大学习班”，接连几天住在学校，不能回家，晚上吃“忆苦饭”。次日早晨看篮球架上粘了很多没吃完的忆苦饭团。同学们都为这个景象而羞愧，谁趁黑夜扔的？学校的高音喇叭常放革命歌曲，重复率很高，我记得最牢今天还能哼唱的是歌曲版的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序言：“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肯下功夫……”

后来 80 年代见文学批评界很多人生吞活剥西方理论以改造自己的文学观，或者香港学生功利心很强，要有助求职“搵工”才选读某些科目，还有在海外也见到不少带着问题读福柯、德里达并且立竿见影的学人，我就暗自哼唱那几句歌词，心想林彪说得有道理，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啊！

中学期间还曾到郊县松江“三秋劳动”数月，记忆中比在城里“复课闹革命”要好玩。首先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松江大米，尤其是在灶头大铁锅用稻秆现烧，常常饭没好已围着一群闻到香味的同学，一顿可以吃一斤多，在城里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米饭（后来听阿城说，60 年代为了备战，城里的大米大都已在库里藏了多年，所以不香。这位作家一贯严肃表情、幽默姿态，也不知此话是真是假）。其次是农村妇女劳动服装，也令我们中学生十分好奇。松江乡下风俗，已婚中年妇女，夏天有时赤裸上身在干活，年轻一点的也就戴上一个类似肚兜一样的小布在胸前，意思意思，像今天北京“苏丝黄”里卖弄东方主义情调的女郎。既是乡俗，就是人人习惯见怪不怪。几天以后，我们中学生也不再好奇，更无猥亵联想。至于具体怎么劳动，倒忘了。只记得，半夜偷甘蔗，然后拼命逃跑。跑到实在跑不动，就对自己说。算了，抓就抓吧，于是停下——其实“我侬”贫下中农早已不追。比劳动更多的是排练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学唱样板戏。班里的“小分队”也分 A、B 两套，平日大家一样练，真

正为贫下中农汇报演出全是 A 组，我们 B 组的人自然不开心。等到音乐的高潮我们的女班长被人托起大腿在半空摆出一个琼花造型时，不知是谁，在男生堆中，恶作剧地叫了一声：鼻涕流下来了（因为排练期间班长一直在感冒，手帕用了无数条），引来一片哄堂大笑。万没想到，这事竟引来“三秋劳动”中最严重的政治事故。

当晚我们这批男生全部留下，当地生产队长坚持说这是“下流话”，你们上海的中学生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工宣队师傅也高度重视这“新动向”，带班老师只好陪在一旁。因为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和另一个同学都认了是我们喊的，只是开玩笑。第二天一整天我们全不用劳动，一直写检讨，交待事情背景、家庭背景、思想背景……我们怎么也不懂这是“下流话”，至今仍然不懂。

大概自己心理阴暗的人，看到的世界也是阴暗的吧。

不过，除了这个“鼻涕门”事件，大致上“三秋劳动”是愉快的，大米好好吃，不用带书，还能和女生说话。这也给我们中学生一个错觉，对以后真正的上山下乡也抱着同样的浪漫憧憬。

在学校里无聊平淡，回到家却愁云惨雾。父亲被隔离审查了，隔离期间偶然也能回家取衣服之类，头发花白，人瘦了，精神恍惚。他说每天有不同调查组，从早到晚问几乎同样的问题——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没那么复杂，而是有关“东方饭店”的案子。东方饭店是 30 年代上海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上的一个大旅馆（后来是上海总工会），曾有一位共产党人在那里被捕后来被枪杀，其中有一位是林育南，林彪的哥哥。当然这就使得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变得非常重要。原来几个调查组都查到一个后来任职华东师大的教授，当初是地下党，很可能是他的叛变才导致林育南等人的被捕。但要证实这个怀疑，必须找到这个涉嫌“叛变”教授通过什么途径和国民党联系。查了半天，好像和该教授接近的国民党人不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调查组的造反派都认为，如果我父亲能承认是他将这个教授的情

报转给当时的政府部门，这个案件——牵涉林副统帅兄长的重大案件就有了新的突破！所以我父亲接连几个月，被连续轰炸询问，有点支持不住了。他和我母亲说不清楚，也嫌我小，二哥又太谨慎了，所以回家也只沉着脸叹气，手直哆嗦。倒是某天二哥的一个同学好友来看望我们，父亲便将这隔离审查前后情况向他诉苦。二哥的同学姓王，他出身好，没顾虑，理科高材生却喜欢文学，快人快语，直问：伯父，他们问的事，有没有可能时间久了，您忘了呢？父亲说很多细节，饭局、客人来往、日期等等我也记不清楚了，但基本事实，绝对没有。不过他们说了，事情一过去这么多年，烈士死了也没法复生，只要承认，把历史弄清楚，也是立功，不会有事，至少不用再受眼前的苦！他们倒也不打人、不骂人，很耐心。只是反反复复，又不让我睡觉，不让我按时吃饭，我实在受不了了，实在不行了。要不，小王，我就认了？

“万万不可，伯父！”二哥的同学站起来，他一番话对我家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否则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坚定地对我父亲说，不管怎么苦、怎么难受，没有的事，坚决不能说有，不然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不久以后，父亲在洗药瓶时煤气管爆炸，几乎炸瞎了眼，满脸纱布被送回家。“东方饭店”的调查因不着边际，后来也停止了。

多年后，我父亲讲起这事，仍说“小王”比自己儿子还“可靠”（靠得住，靠谱的意思）。我听了也羞愧。

我的大哥造反失败后，很快又有了新的革命行动。他突然来信告诉父母，要和廊坊一个贫下中农姑娘结婚！大学老师和农民结婚，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前卫而且政治正确，父亲一时说不出话了。就在母亲还想和北京上海亲戚联络，如何劝导大哥回到现实主义轨道时，结婚照也寄来了。出乎我的意料，新娘子并不怎么特别漂亮，红扑扑的脸，很朴实的乡村妇女形象。大哥在信上说，和贫下中农的结合使他的世界观改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学校的工作大约也有改善。不过数月之后他又来

信，说女家要在乡下盖房，需要几千元，他的工资有限，所以要开口向北京的叔叔姑姑借钱。这时父亲真的生气了。

我的父亲母亲在许多地方都很不同。父亲是医生，母亲做童装；父亲反对中医，母亲喜欢煎药；父亲高血压，母亲低血压；父亲瘦母亲胖，我曾开玩笑说他们站在一起是个“10”字……但父母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对于钱的态度。父亲一生收入不少用得也快，不大计算也从不借钱，他有两句话我一生都记着。一是：“别人为你做的事，永远记住；你为别人做的事，赶紧忘掉！”二是：“你挣一百块用九十九，一生幸福，挣一百元用一百零一元，一生苦恼。”从他的价值观出发，儿子现在要问人借钱，他感到耻辱。

父亲在上海毕业做医生及院长后，理所当然帮助在天台乡下的弟妹进城读书。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将读大学的两个妹妹送往国外（这是许多他的朋友同僚当时的选择），反而将她们曲折送到苏北参加新四军。1949年后我的姑姑都在北京当了官，姑父还是国防科委的将军，但这些令父亲骄傲的亲人在运动开始后都不能和我父亲来往了——对她们来说，有历史问题的父亲成了她们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哥再去找她们，等于在讨回昔日兄长扶助养育之恩，又会触动现在“划清界限”的内疚之情……所有这些因素，使父亲极为不悦。更何况“借钱”本身又是他一贯反对的事。

前几年有次和上海儿童医院院长许力吃饭，席间谈起运动中她曾向其父（许杰）建议送些钱帮助我父亲，许杰摇摇头说：“我知道老范的性格，他会不高兴的。”（家父因从小过继给范姓姨父，故改姓，但子女仍姓许。）我想起在隔离审查后，当时他的200元工资已变成三人45元生活费，一天突然在旧衣服袋里发现20元钱，老人欣喜得连连咳嗽，涨红了脸。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他也真没期待朋友亲戚帮忙。他甚至也不相信

母亲的话“贫下中农嫁大学生，想的也是钱”。不会的，不是这样的，父亲说。^①

这几年，我的三哥一直没有消息。

八 广昌路上

1970年4月1日11时零8分，又一列满载知青的火车在上海北站启动了，《东方红》乐曲和一大片哭喊声同时响起。

送我的人，父亲、母亲、二哥，还有几个没走的中学同学好友，都没有哭。我也没有哭。几分钟前，母亲还喃喃自语，说比如送子东去外地读大学，我送过几个儿子出门了，等等……

本来，几年间虽然没读什么书，在社会课堂也见了很多事，应该成熟一些了。比如在街上看二军大红旗、红纵的激烈对立抗争，从宣传口号和政治纲领上简直弄不清有什么区别。再看流血受伤女生哭喊，哪边都青春热血值得同情。二哥悄悄和我解释，说“红旗”有张春桥的支持。那为什么还打内战呢？二哥说“红纵”后面却是总后。“你自己想吧。”总后，不是邱会作吗？噢，明白了，林副主席……

过于早熟的一代，因为木偶剧皮影戏的后台被拆得太彻底了。哪像人家美国儿童，十来岁还不知圣诞老人是假的。

无数次半夜上街游行、迎接、欢呼最新指示，走的路线就是白天“荡”南京路看橱窗的路线，有人领喊：“一个人有静脉、动脉……”几千几万人一起喊：“一个人有静脉、动脉……”

但有些事依然天真。69届毕业一片红，可以选择到北大荒或云南建设兵团，有30元基本工资，但因靠近边界所以政治要求较高。或到安

^① 大哥在“文革”后与农民妻子离婚。后来我这位前嫂子据说做生意发财了。两个子女均有出息，儿子参军，后做司机。女儿在北大读了研究生，做了法官。

徽、江西插队落户，据说，安徽农忙时间短些，但要吃小麦、红薯，江西种水田辛苦但可以吃米饭。犹豫不定时来了当地干部做宣传，有个江西干部在会上用带方言腔的普通话朗读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嗓音低沉，抑扬顿挫，全场鸦雀无声。几分钟之内，我和我的两个同学便决定了，去江西广昌！

因为我不爱求签算命也不懂星座血型，几乎所有人生决定都依靠所谓“理性”，因此实质上任何选择自己都要承担责任和压力。我平时作重要选择不会犹豫，小事反而想半天。不过最快的决定还是这一次，同学间拍一下手掌，有点像说周日去哪里玩，长风？虹口？噢，好，去西郊公园！

红色根据地也不少，井冈山我校没名额，但为什么不选宁都，或瑞金……回想起来，还真是一首诗的力量，“此行何处？……命令昨颁……”真是诗的国度，文学改变人生！

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广昌是红军失败的地方，毛泽东在稍后的宁都会议上被削军权，政治地位下降，是他很不得意的一个时期。

69届虽说“一片红”，我也有不少同学以自己有病或家长生病为理由坚决留在城里。理论上，上山下乡是自愿报名的，对不肯下乡的“钉子户”，学校、里委会会轮番“家访”。我完全没想过这条路，因为一则父亲“问题”还没解决，正在争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给家里添麻烦。二则父母和我，如前所述，从来也没害怕或轻视农村生活劳动锻炼。当然，仅45元生活费，我的行装没法准备。大哥在帮助贫下中农盖房子，三哥划清了界线，还是二哥帮忙，行李中有一套蓝色线衫线裤（薄运动衣），倒圆了我多年的梦。国家给每个下乡青年都资助一条绿色“经编毯”（社会军队化）。装行李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眼睛红红的。

出发日正好是4月1日——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日子的特殊含义。以后每年纪念倒多了一层反讽的意味。很多小说写过知青离城

下乡这一瞬间,《棋王》的开篇就是经典“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了……”(后来在1984年我写了关于这篇小说的第一篇评论。)小说描写很多知青挤在车厢一侧哭喊着和家长告别,主人公却和好棋的王一生在车厢里摆开了棋盘。“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哭什么?”回想我当时的心情,既没有多少改天换地豪情壮志,也未见得怎么惊慌痛哭。之前中学生早有过下乡三秋劳动的经验,我想车上的学生也大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离城的严重性。火车启动时是《东方红》伴奏着一片哭声,但开到松江后很多同学都若无其事拿出“凯歌”买的点心有说有笑了。处在史上罕见的人口迁徙运动之中,我们更像出去旅行。笑话放肆了,粗口多了,男女同学打招呼了,甚至看到有女生抽烟了,还潇洒地吐出一个烟圈。马上一个男生凑过去,一个更小更有力的烟圈从女生的烟圈当中穿过去,引来车厢里一片哗然和欢笑……

是会很苦,我想。但这么多人,如果他们行,为什么我不行呢?

火车从上海经鹰潭到抚州,然后要转汽车。接我们的汽车竟是从上海调来的49路公共汽车,这更加强我们的“郊游感”。一路上我们最关心的是谁是同队的女生。培进中学120人到广昌县甘竹公社,分12个大队。五人或十人为“一家”,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要去的是千善大队古坊小队,三男二女。我们三个男生原是朋友,曹兄雅号猫鼻头(或毛鼻头,从来没弄清楚),我的外号是老古董(小学里被人称为小冬瓜、长冬瓜,吵架时被人骂“臭冬瓜”,但最使我伤心的是说我“知识丰富”,当时觉得“知识丰富”是最恶劣的骂人的话),还有另一个同学姓张,外号“拐弯”(两个字也从不知怎么写)。然而女生却是校方乱派的。我们只知道一位姓陈一位姓浦,但直到上了“49路公共汽车”才远远瞥见她们的身影:个头不高,人好像挺漂亮的。我们谁也没说话,像在中学里一样,但都知道,明天就不一样了。

十几小时火车,七八小时汽车。大部分同学已下车(他们插队在平原),仅20人还在车上,天已黑了,路很窄了,上海的司机不敢再开了。

终于把我们丢在了离目的地还有 15 里的高州，“49 路”就走了。一片漆黑中，新的生活开始了！

后来，高州的农中学生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来了一辆从没见过的巨大的怪车，连国防公路都没法开（所谓“国防公路”，其实严重不合格，基本上是拖拉机路），车上灯火通明，还有音乐唱歌（有同学带了半导体收音机）。里面很多“阿拉”，说话伊里哇啦。（“阿拉”是沪语“我们”的意思，当地人听不明白，便用来代指上海知青。如叫两个知青去拔秧，他们就说：“叫两个阿拉去秧田”，等等。）最后大车轰轰地开走了，毛主席就把那些阿拉留在我们这里……

感觉像电影里巨大通明的太空船开走了，留下来一些“异人”。

高州离甘竹公社和我们去的千善大队各 15 里，村里没电（所以“49 路”那么显眼突兀）。第一个晚上吃什么忘了，大概没吃（身边还有城里点心），只记得饭不用碗盛，用瓦罐钵子（现在一些湘菜馆显示地方风情也用钵子瓦罐装饭）。睡的地方也全无印象了。只记得天花板上一条条横梁都是整根实木树干，粗细不一，且歪歪扭扭带着树结（再一次见到这样的木屋顶是近 20 年后在苏黎世的一个著名酒吧里）。当时只觉得奇怪。泥地、木床，居然也睡着了，路上太累了。

第二天坐手扶拖拉机到我要落户的千善，15 里山路风景很好。红土青山绿水白云。到千善后有 10 人继续前往在 5 里外的盖竹大队（其中有两位后来是我一生的好友）。有 5 人已到目的地千善大队。我们“一家”5 人则要走两里路到古坊生产队。（现在 Google 地图上都能看到。好想回去看看……）古坊生产队有百来口人，分四个小自然村，其实每个村就是一个大院子，前有水井、围墙、平地、大门，中间有天井厅堂，两侧有很多房间，房间外面又一圈走廊、很多房间，再外面则是后来盖的平房草屋猪圈等等。屋后有大樟树，整个房子的主体都是石块砖瓦建成，屋梁上还有些破旧了的雕塑。可以想见，如果是一家人家所有，颇有气势——当然，我们到达时，这里住了十几户人家，杂乱不堪了。分给我

们两个房间和一个没有门的厨房。这时一片锣鼓鞭炮响起——毛主席决定了千万人命运的“12·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后一句就落实在这标语锣鼓和一桌有很多猪肉的饭菜上了。我们也没吃，看了一眼，碗里的肉皮上都有毛！几个月后还听农民们在议论“阿拉”怎么傻，猪肉也不会吃，又说有人贪污，拿走很多，等等。

那年我15岁，另外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大我一两岁。说实在的，在4月初那几天，我们最关注的还不是全新的陌生的乡土环境，这片以后要生活很久的土地。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的“一家”中的女生，也是陌生人。我们三个男生住一个狭长房间，木窗木门，上面还有些木雕图案。两条长凳架起一副木板挂上我们带来的蚊帐。里面俨然是一个城市小天地：半导体、巧克力、手电筒、照相册、日记本、大白兔奶糖……但箱子不能放在地上，太潮湿，床下长草，后来发现也有蛇出入。后面木门对面就是女生房间，里面应该一样，开始两年都少有机会进入，只有歌声和口琴声时时从里面传出，神秘向往得很。

一个巨大打击在我们到古坊的第二天就来临了：次日中午我们几人正试着在自己的灶头烧柴煮饭，远远看见有一队人向我们村走来，村里孩子以为又有“阿拉”来了。事实也是，是甘竹那边的三个知青由当地干部带路，从几十里地之外赶来。而且，他们和我们连个招呼都不打，直奔女生的住处——后来我们才明白，其中一个来访的男生和我们村的一个女生，中学毕业时已经“敲定”！虽然没有理由，但我们当时的失望无法掩饰。这是第一个挑战，告诉我们今后的一切，不会那么浪漫、美好、神奇……

九 米 和 柴

毛泽东说的话是否“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敢说，但至少“再教育”这

个概念,有些道理。

我下乡时,虽然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入团申请书”,小学里的各种检查,南京路也是课堂,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时代的很多教育。可是,到广昌以后我的“期待视野”却遭遇了重大挑战。“再教育”的结果,有些是对原先教育的深化、补充、发展,有些则是对原先教育的怀疑、困惑甚至颠覆。

第一方面的再教育是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重新理解。

什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呢? WiFi? 安全套? 摩丝? 电脑? 这可能是“90 后”的基本生活资料。手表、收音机、风扇、粮票,这大概是上一代或香港本土派小说怀旧的常用道具。干柴、稻米、盐、灯油,这是我们当时生活中的必需品。

我们五个同学,起初有个分工,男生主外,砍柴、做米、挑水等等;女生主内,煮饭、烧火、做菜(友好时期还包括洗衣)。米在城里,是个不需要动脑筋的事。我小时候去买米,粮油店就在弄堂口街对面,粳米 16.4 元,籼米 14.7 元,付钱以后张开布袋子在一个木制滑口等,米哗地下来,背走。小时候背 20 斤,后来 30 斤 40 斤。没见有人用小车拖。还顺便拿瓶去零买红酱油白酱油及米醋等,真的“打酱油”。而农民的口粮,则全靠去年稻谷,我们“从天而降”没有“去年”,故第一年国家发粮(且有每月 10 元生活费)。凭粮票粮证买米和自己田里种粮,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差别,后来见到有人为跨越这一鸿沟,不惜在“性”与人格上作出牺牲。我们当时却是高高兴兴反向跨越,在上海迁出户口时还有说有笑,不知道中年女民警为什么带着怜悯的表情看着我们。现在知道米之难得了,买米要到 15 里外的高州,农民还羡慕地看着我们,至少可以买。每人 70 斤挑回来,已经把我们(至少是我)累死。我挑担不会换肩,每走数百米就要停下,越到后来,走得越短,停得越长。下午领米,半夜才回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尝试体力的极限。

第二年分到口粮了,是稻谷。稻谷做成米,先要到一个水车边的小

茅屋。这是另一种水车，后来在香港去过一家日本料理店就叫水车屋，门口便有很大的木制的轮子，上面很多木格，颇有风味。真实的水车运作情况是，山上有水流下，将木轮转动，其动力便驱动旁边小茅棚里的一个十几公分粗二尺长的石锤，不断打击一个石盆里的稻谷，使之分离为壳和糠和米。第一次很新鲜，以后就烦了，因为轮到我们做米时，要反复定时去山上，做很多辅助工作。我们男生心粗手笨，最后常常要吃带糠或打得过碎的米饭，桌上女生的脸色也不大好看。

近年有次在尖沙咀海港城 City Super 买袋泰国香米，撞见学生，说许教授，这种事你也自己来？“这种事？”我笑笑，不知从何说起。

比做米更麻烦的是砍柴。老俵们家家户户吃饭要烧柴，多少年来如此，所以虽是山村，方圆几百米草木全被砍光了。残留的树也都被砍了枝，光秃秃的竖在那里。为了吃饭，景象好不好看也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听说赣州一带到处挖稀土，对自然的破坏更大）。初到时村干部帮我们准备了一墙干柴，还有松油枝，烧起来同学们还觉得好玩，同时和灶前的女生说说话。不久就要自己砍柴了，村里孩童带我们爬二三里到山沟树林里，才担回一小捆湿柴，手臂腿上已鲜血淋淋。政治队长照顾我们，“特批”我们可砍一棵村边不远的大松树。树在路边，很显眼，树枝也早被砍光，因砍枝不砍树，不违反政策。树约有十多米高，两尺多粗，一个人抱不了。但砍树可不易，我们三个男生，操着斧头砍了两个小时，才砍进去 20 公分。路过农人看不下去了，来帮我们，原来要砍得深，口子必须开得大（像做学问，要有深度，先要有视野）。要砍倒这棵树，半径一尺多，至少要上下一尺多宽落斧。没过多久，我们手上都有了血泡，汗不必说。结果一个青壮劳力大约两小时能砍倒的树，我们砍了两天，也不知村民们当初看见我们砍树是什么想法。有的大概气愤（毛主席说不让砍树，为什么他派来这些“阿拉”可以砍？！），有的可能同情（这些城里孩子前世作孽，这世要还），有的在嘲笑，特别是小孩，实在不能想象这些身材高大的男人如此无用。会不会也有人像阿城《树王》写的那样有“天人合

一”的环保意识我不知道，反正如果没有禁令，农民也会砍。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硬道理（依据这个经验，我后来对哥本哈根会议也缺乏信心）。

树倒下时出了意外。以为会往我们砍得较深的那侧倒，没想到居然斜着倒，正往我这一边，慌忙想跑又绊了脚下的野藤，我本能趴下，竟和那树倒在一块。树顶那些松枝倒下来却也巨大，发出轰然巨响。静了一会儿，我爬起身来，拍拍乱草，自己不觉，对面我的同学拐差已吓白了脸。仔细一看，差大约一尺树干就会压断我的腿！后来想想也怕，要是我那次被树压到了呢？要是我残疾回城，那以后的生活不是完全不同了？我能像史铁生那样应对吗？……以后我再不去动这棵树了。同学们去了很多次，要一段一段凿开，才能成“柴”，太难了，我们后来宁可去远处砍细枯枝。这棵树大半年后还躺在那里，渐渐被草遮盖了，成了我们的一个耻辱。

京剧《沙家浜》里刁德一劝说沙奶奶投降，有句台词是“我保你从此不缺米和柴”。在上海时听不懂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在广昌后我才渐渐明白（多年后知道，是汪曾祺写的剧本）。

米和柴，不就是粮食和能源吗？

十 “同意杀尧毛仔”

“再教育”的第二部分，是革命历史教育。

从小就听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到自己做米砍柴，是由概念到“体会”。从小就“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到直接听当年的老红军讲述往事，却居然变成是对红色教育的一种活生生的怀疑。

大队里负责迎接知青的是农会主席金龙，一个身材矮小、左眼有些毛病布满血丝，能讲几句“官话”（普通话）的老汉，约五六十岁。他参加过“广昌战役”，令我们开始对他肃然起敬（我那时仍不知红军在广昌的实际战况）。但不久金龙整天盯着我队两个女生，连右眼也红了，吐出的

烟都透出酒气，终于大家有些害怕了。当年主持江西政务的军人程世清在我们下乡后不久专门下达命令，严禁农村干部调戏、侮辱女知青，并枪毙了几个人。文件传达后金龙就被调离“知青办”。后来我们知道他是老实人，也就是红红眼睛而已。他老和我们抱怨红军转移那天他正好肚子痛，躲在一个女人家，结果误了事。拉一天肚子，悔半世清肠。“要不，你们说我现在是啥？”“师长？”“军长？”我们望着他的红丝眼睛，他的腿上青筋暴得像条蛇，永远有泥。

装了两颗金牙，头发往后梳，胸口永远别两支笔的大队会计告诉我们，广昌在1934年有近三十万人口。1949年仅8万，我们下乡时有12万。山上层层梯田之间，常常有一棵一棵大樟树，树下荒草中皆有青石地基——原先都是村子。我们见过好几个老人，当年都是红军战士，也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长征，我们苦苦哀求，想听他们讲讲老根据地革命故事（想想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广昌路上”），可是他们都太谦虚了，太不会叙述革命历史了，他们说：“红的来了杀了一批，白的来了又杀了一批，很多村子从此废了……”“当兵要死，不当兵也活不了，逃啊……”

这算什么话？觉悟这么低？看看他们的脸，一个个就像罗立中画的“父亲”一般布满皱纹。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再教育”。

山里高高低低都是田，总可以看见某些小丘庄稼长得特别好，十分突出显眼，一问，必定是自留地——开会时，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尾巴。问农民单干好还是公社好，回答倒干脆：“当然单干好！”且一脸“你这也问”的表情。我们看《艳阳天》、《创业史》长大，开始以为这样说的必是中农或思想落后，不久便知，贫下中农也都这么说，而且一致认为以前的日子好。甚至政治队长，只要不在开会时，也会抱怨：“你们××在自留地时，我还在大队开会，等我去自留地，你们的手已经放在老婆的×上了！××！”这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人民公社好？

除了“下放青年”（这是当地人对“知青”的政治不正确的叫法）外，还有“下放干部”。我们村也有一位，原是南昌某大学老师。没事时他

也会和我聊高尔基或《牛虻》，但上面一有公事，他又代表“上面”执行政策。比如要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其中之一是“合理密植”，公社（可能是县里、省里）规定水稻秧苗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10公分，农民的习惯是15公分以上，于是，“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知青很快就成了下放干部的帮手，实际上，也成了“上面”的帮手。农民不敢反对，八字宪法是毛主席定的。谁说“文革”时是无政府状态，连每行秧苗的间距尺寸都由政府决定，何曾有一点“失控”？

下乡好几个月了，我们忙于应付米和柴、田里的蚂蟥，以及写家信、听半导体、关心同队女生动向等等，其实对于农民到底怎样生活，一个院子，近在咫尺却了解不多（自顾不暇）。但这期间有几件小事，是我难以忘却的。

某日下雨，我们以此为理由没出工（至今我仍喜欢雨天，审美之中，是否也有雨天能休息的利害考虑无意识地存在？），三个男生在打牌，突然有小白虫掉到牌上，抬头一看，虫是从曹兄挂在屋顶下的香肠里掉出来的。我们一面诅咒这鬼地方太潮湿，一面只好把这包从上海带来一直舍不得吃的香肠扔掉——扔到村后一个脏脏的池塘里。不想当天下午同村的松仔嫂跑来骂我们了，说他家对我们这么好（有时半夜偷他们干柴他们也不出来骂我们），没想到这些“阿拉”这么没良心！我们听了全然摸不着头脑，再一问才知几个农民已将偌大一池塘用木桶一盆一盆弄干，为的是要找那几根香肠！“你们怎么扔了也不给我们呢！这么坏！”我们哑口无言。再说生了虫之类，农妇及小孩都笑了，说那虫一洗就没了，猪肉可是好猪肉啊！解释很久，才言归于好，不记前仇。

又一日，同学们出工去了，我一人在家，写入团申请书（下乡后父亲一直来信鼓励我入团，每次五六张纸，说不要因出身不好自暴自弃，要追求上进，云云）。听到屋外厅堂里生产队长的几个孩子在讲脏话粗口，这时我已听得懂一些广昌方言。再仔细一听，还不是骂人，而是在描述男女之间的房事（其实那时我自己也不清楚“这事”的细节、程序，完全缺乏

经验和常识,后面会有解释)。因为这些描述器官及动作的话出自小孩之口,令我感到有点不舒服(我有时也在村里的小学代课),我便跑出去,责问其中最大的一个男孩,说你在和弟弟妹妹说什么呀!你哪里学来这些脏话?

松仔的长子(我忘了他的名字,却清楚记得他当时的样子),大约十三岁,看上去不到十岁,却已“定了亲”。他毫不在乎地回答说,都是晚上在家里看见的事。他的弟妹也在旁边点头。这使我有些惊讶,于是被他们领进了他家的卧室(其实就在我们房间正对面,不到四五米距离,中间隔着一个厅堂)。房间很暗,一股霉味(和我们一样),一张大木床,粗框,还画着暗淡了的红绿彩漆。大木床腾空而放,后面是木的马桶,床前有张桌子、油灯。墙上有主席像、阿尔巴尼亚电影海报及其他各种报纸、年画等。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床上只有一条破棉被,但要睡六个人,队长夫妇都三十出头(看上去有四十岁),四个孩子,最大十三岁,最小才两岁。当然孩子们的性知识是现场观摩来的。就一床棉被,蓝花的,已破碎成很多条。

后来 80 年代末到芝加哥,有人问起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差距。我说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生活差距,比中美之间的距离还要大。不是亲眼见到,绝对想象不到。

这么大的城乡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呢?

今天的中国纵有千般不是,在减少城乡差距和促进城市化方面,总是有成就的。50 年代的五年计划、苏援项目、军工建设等,都建立在农村的巨大贡献基础上。当时农民种出的粮食,先要给城里人,多余的才能自己吃;农民养的猪,草要自己去割,糠要自己去拌,肉却自己吃不到。猪是不可以随便杀的,因为要统购统销。

几个月“不知肉味”后,我们开始后悔刚下乡第一天怎么会浪费了那一桌带毛的猪肉。夏天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前,队里要开誓师大会,有人建议杀头猪鼓鼓士气,但这事要大队批准,村里不知怎么回事,

居然要我去千善找大队长批条。

他们这时有个印象,认为我和公社、大队领导关系较好。原因之一是我会插秧(这很重要,下节详述),劳动表现好;二是我写过几次标语(从小是墙报委员),村民们便认为我“文化高”(我的中学绰号叫“老古董”)。既然队长和村民们派我去大队,也算出工时间,胸前口袋装了弹药“大前门”,我便出发了。

我因为自己不抽烟(一度也抽,但不吸入,只摆样子,故很容易“戒”掉),有几次见了大队、公社干部说了半天话,却忘了给人家烟。烟在白衬衣口袋里,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知青在乡下,当时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影响”和“印象”(发音极接近),怎么可以这样不尊重领导呢?我一路都在提醒自己,见了大队长,千万记得袋里有包“大前门”。

没想到是日大队长极爽快,也没抽几支烟,也没问太多问题,就用烟盒里包装纸的反面作纸条,写了六个字:“同意杀尧毛仔”。也没标点符号,字与字之间的距离也不规则。我回村以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尧毛仔是大队长的名字。当然,谁都知道,这是可以杀一头猪的批条。国人办事,一贯不重形式,重要的是默契诚信。

之后的三四天,是等待誓师大会的三四天。田里拔秧、插秧甚至犁田的人,都在议论他们家希望分到这头猪身上的哪个部位以及他们会做什么菜来最大限度或最长时间地享受这份猪肉。我记得妇女队长,一连三天讲了三个不同方案,先是烧豆腐,但改为腌咸肉,后又不知想改什么菜。每天都有新的创意。等到真正分猪肉那个晚上,就在我们住的尧家大屋前空地,排了一列松油火把,村中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和队长一起主持分配,有拈阄抽签的公开程序。一来我们是知青,二来我还是“功臣”,故让我们“阿拉”在尽量公平分割后二十多堆猪肉前优先挑选。我们选了一堆有骨头的肉(当地没有“大排骨”这种切割方法,而我们无限怀念)。村民们异口同声说“阿拉”真是傻瓜:“应该挑猪羔(猪肉)啊!”“怎么会要骨头呢?”……后来猪肉排骨什么味道倒不记得了,村头一排

松油火把的场面却永远亮着。那也是我下乡以后最出色最受关注的一次表现。

同意杀尧毛仔。

十一 开头路

再教育的第三方面，其实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动。

下乡前就知道江西虽然“有饭吃”但劳动辛苦，但没想到这么辛苦。农民“出工”分为三段，清晨5点到7点多，是早工。8点多到12点多，是上午工。下午2点多到天黑（近7点）是下午工。农忙时还要开夜工（抢种抢收）。一般妇女、青少年不出早工，要在家里煮饭割草养猪。我们知青也不出早工，一来起不了这么早，二来也要劈柴挑水煮饭洗衣等等。全劳力最高一天10分，我们男生是8分，因不出早工，八八六十四，6.4分。我们在的生产队那几年算收成不错，每十分年底能值大约一元人民币（低的地方仅值两三毛，惨不忍睹），所以我们做一天十多个小时，大约赚六角四分。妇女劳力最高7分，女知青就只有6分。其实干有些活，比如耘田、拔秧，妇女做得比男的还快还好。

即使是在吃早饭、午饭的大约一个小时，男劳力也只有几分钟在吃饭，其他时间必定在自留地里，那其实是一天里最有效率的劳动时间。晚上如不开夜工，男人多数会几个一伙在田里捉青蛙甲鱼或到山上抓什么别的小动物，然后煮来吃，叫“打平伙”——一种带游戏性质的夜宵。女人则在油灯下做别的“副业”活，通莲心、织麻绳等等，赶集时靠这些东西换煤油和盐。广昌白莲很有名。当人们在甜品里吃到一口白莲数十粒，每一粒本来都有一根苦的芯子，都是乡村女人的手半夜摸黑一粒粒通掉了苦芯。所以女人工作时间更长。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五六个小时的睡觉，全天几乎都在干活。甚至在床上也干活——我在古坊几年，看到几乎每个已婚女人，平均每两年生一个小孩。和妇女一起，只见肚子

此起彼伏。

早饭后8点多，大家都聚在一块空地上，或站或蹲，吸旱烟筒，或八分一包廉价纸烟。队长松仔分配工作：“顺仔，严家细丘；刘毛仔和你弟弟，尧家海丘；平仔媳妇带几个女仔，李家弯丘……”（“细丘”是较小的梯田，“海丘”是大田的意思。）虽然合作化多年，地都是集体财产，但名称上全都留着私有制的痕迹，也没人想到要革这个“话语”的命。队长分配要公平，且自己需多做，挑重活，很像今天系主任的工作。怎么来划分男劳力们的工分等级呢？为什么有的是10分，有的是9分或8分或更低呢？原来当地农活中有一个不成文的等级制度：男人的活，最有技术含量的有三种，一是犁田，在干地犁田至少有8分；二是耙田，牛拖着铁耙在水田走，人得站在铁耙上，我看看是挺危险的，站不稳摔下来，分分钟脚会被划断。会耙田的有9分。最高10分，则是给插秧好手。这个插秧，我更要好好向今天城里的文明人介绍一下。

因为山里几乎全是梯田，古坊最大一块是严家海丘，八亩，但大部分都是一两亩甚至几分的水田，且弯弯曲曲什么形状都有。农民对水稻秧苗能否插得笔直有一种近乎宗教的重视和讲究，一来，这确是为了日后耘田方便（耘田就是在水稻长大过程中用铁耙清理秧苗中间的杂草），但更重要好像还是为了“美”——好像一块地秧苗笔直纹路清晰便象征丰收，秧苗弯曲连空隙都看不清则不好看，他们称之为“倒灶”。在一块弯曲的梯田里，要保证秧苗插得齐整，第一关键是“头路”要开得好。所谓“头路”，就是第一个下去插的人，不难想见，只有他插的六行秧苗笔直挺括，其他后来靠着他插的人才有可能直。（像不像今天大学里的“学术带头人”？）而且“头路”不单要直，还要对准弯曲梯田里面由山岩石壁形成的拐角处，如果六行下去，正好擦着这拐角石块而转弯，那就是完美的“头路”！如果太靠边了，转弯后六行成了五行半，这叫“撞了”。如果太不靠边了，转弯时还离石头一大截，转弯后成七行列，那叫“离了”。能够“开头路”且不会“离”不会“撞”的人，全队三四十个男人中仅有三人。

我现在还记得这三个人的样子。一个是李德（我那时还没读过《李德回忆录》，不知道这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和曾在广昌指挥红军的德国顾问同名），牙齿发黄且多处漏风，个子很矮还驼背，眼睛很小，很少说话。开头路时先在田里直线插六根秧苗，身体后蹲屁股几乎碰到水面，要瞄准半天，但插起来后就很快，比第二个人总要快一倍。因此早早上岸抽烟了。按老规矩，开头路的人不用在这块田里再插秧，一直休息到“转移阵地”。第二个是炳叔，个子很高，大眼睛，也有五六十岁，爱说笑话怪话，插秧风格完全和李德不同，膝盖不会往后蹲，只是弯腰，貌似低头不看路，摇来摇去，单独看他插的秧没有李德甚至没有一般人整洁，但最后总能不“撞”不“离”，远看却是直的。

第三个是二十多岁的双仔，很秀气腼腆的小伙子，人一夸他就红脸，像个女孩似的，插秧也极快，如李德的作风。在我看来，在乡亲们看来，他是个天才，水平比其他同龄青年高过好几个层次，还罕见地不抽烟。

可是很奇怪，这三个人成分都不太好。李德、炳叔都是上中农，双仔也是中农出身。村里“富农”“地主”早没了（不知是怎么没的，忘了打听），仅有一个富农婆，弄不清楚是女的富农还是富农的老婆，每次开会都照例斗一会儿，因为需要她去的地方挺多，有时还没空。所以上中农也是阶级敌人的边缘了。打听以后才知，原来“开头路”在合作化前是极吃香的农活。农民单干，农忙时都要请人帮工，请来犁田耙田的有干饭吃，请来插秧（且会开头路）的有猪肉豆腐。也就是说，待遇高，收入好。于是就致富快。到土改时就几乎成了“富农”。也就是说，要不是秧插得好，也成不了有瓦房的上中农。

下放干部曾经想帮村民克服这种对“头路”的盲目崇拜。他组织妇女在插秧时拉绳索，依着绳子插的头路，照样很直，女人甚至儿童也能插。但此法推广不开，农民都觉得靠拉绳子插的秧，齐了也不稀奇。他们依然分派男人插秧，尽量不让女人“跟头路”，依然顽固不化地尊敬那几个会开头路的人——不仅插秧季节如此，到了耕田、割稻时，大家干一

样的活,李德他们仍然拿 10 分,大家也不抱怨。真是一种对专业精神的迷信。

高手开了头路以后,也不是谁都可以下去跟的。因为第二个如果跟不好,后面的人也没法插。这时就有我所谓的“第二梯队”。队里大约七八个男人有这种资格,有时在重要的路边的大田,他们还会谦让客气一番才下去跟——哪像今天所谓学术界、文化界的某些人,完全失却专业水平还自我感觉良好,彼此称为大师,在我看来远不如广昌的农民!政治队长、民兵队长等,在插秧的时候一点都不神气,插得不好,就排在后面,免得影响大局。我当时之所以被农民以及公社干部称赞,就是在技术发挥良好的情况下,我也可以进入第二梯队。很多海丘的第二列是我插的,甚至在一些细丘,双仔、炳叔还让我(或教我)开头路!插完以后数月,每次经过那些田丘,我还都会望望我插的那几列绿苗,它们越长越高,“绿油油一片”,真的让我骄傲,弯的令我后悔……

我当时 16 岁,身高 1 米 82,体重才 115 斤,电线杆身材。插好秧需要身体不断后蹲,其实很伤腰。我的脊椎不好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弄的。但想起来,也并不后悔。或者也是别无选择。另外两个男生会犁田、耙田,我都不会也不敢。不知为什么,我指挥不了任何一头水牛。

劳动中最可怕的是蚂蟥。我数过,最多一次有 28 条蚂蟥在我双腿上,上了田埂把它们一一拍掉,然后满腿是血——蚂蟥吸了多少,还会流掉多少。父母在信中最心疼的就是这事,多年后还老和别人说子东腿上有 28 条蚂蟥。他们寄给我“创可贴”,这在当时是“先进科技”,两天就用了一盒,不行,后来还是清洗。女同学因为这样,小腿都肿了。邻队同学来串门,看见女生挑水就说身材要压坏了,怪我们不会“怜香惜玉”,我们真的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十二 “搞西洋”

完全是偶然被派到我们一个队的两个女生其实都挺漂亮，至少比邻近几个大队的绝大多数女生漂亮。小浦皮肤白皙，很风情娇媚的样子，小陈比较清瘦，“活泼”开朗，爱唱歌。下乡次日从几十里外来追小浦的是同届中学里的成熟文雅出名的王永路，后来陪他来的另一个校内体育明星小高也想追小陈，但显然不得要领。小浦和王永路的关系后来曲曲折折发展了很多年，详情我们也不知。开始几个月我们“五人家庭”生活还算和谐愉快，男主外女主内，大家十五六岁，陌生环境，新鲜感觉。但后来就分家了，分家原因表面上是她们嫌我们砍的柴太湿，做的米太碎，实际原因还是因为外来客人——来找她们的那些男生，有时和我们招呼也不打，就直接去了她们的房间（我们前几年都没进女同学的房间），令我们这几个“男主人”很不爽，又说不出。但我们的客人更多，都是来自很多不同大队的同届的男生，有的还是上海的街坊。一来客人我们就要动用香肠、火腿储备，烧鸡蛋，用很多油，等等，总之，次数一多，“女主人”们受不了了。不过回想起来，有朋自远村来，确是我们当时生活中少有的乐事。同队好友曹兄，中学时曾莫名其妙被公安拘留过几天，但其实是个极忠厚踏实的人（回城后从菜场卖鱼的营业员，一直做到江苏某市最大超市的总经理，还是上海某区的人大代表）。这段“入局”经历反使他在中学生里名声大震，那些喜欢抽烟打群架、“车拉三”（泡妞）的哥们儿都对他十分尊敬，连带对我也十分客气了。也因为这个背景来我们村玩的同学，大部分是曹兄的江湖朋友，比如之前提过的“老克拉”、“长脚”等，一来就四五个人，居然还坐在我们房间的后门口，大谈什么《少女的心》，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拐差”叫他们下棋，也不应，外国民歌 200 首，一首接一首，吹口琴、吹口哨。直到深夜，旁边女生房间的木窗关了，他们也就马上不唱苏联歌曲不谈文学艺术了。“扯那，打

牌了打牌了，啥人输塔脱裤子！钻台子！买鸡蛋！”讲粗口如标点符号。我这才恍然大悟，世上真是不能没有女人。床不够就通宵打牌，大家轮流睡觉。“长脚”等神秘秘地带给我们两本旧书，《少女的心》是手抄本，单看那卷起的黄纸就已经令人兴奋。另一本也褶皱破烂没封面书名没封底，里面却有很多有关“乳房”、“美丽的大腿”、“旗袍被风吹得飘起来”等字眼，一度也成为我枕边好友，功能一如小学里的医学手册。后来读现代文学研究生，才知那是茅盾早期中篇处女作《蚀》。要是当时就知作者是革命作家，曾任文化部长，还早在1921年参加建党活动，那本书在我床上就肯定会有不同的美学效果了。德国接受美学有些道理：文稿只是乐谱，只有不同读者在不同环境下的参与（阅读、演奏），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很多中学同学来过，其中金水的来访最令我难忘。我们曾是同班，他很文弱的样子，不大引人注意。分家后我和“拐差”搬到邻村住，因新房子比较干燥光亮。记得是1971年初秋的一个晚上，金水睡在我们这里，和我同床，吹了煤油灯不知为什么还睡不着，就讲起男女的事，真正给我上了一课。

金水说起他在上海的家（在静安区康定路蒋家桥，较破旧的一个区域，班长国庆家隔壁），某天在阁楼木板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小手指大的小洞，还听到隔壁传出水的声音，好奇一看，竟是一个女人坐在大脚盆里洗澡。虽然是侧后方，主要只看到“背影”，仍然令他兴奋不已，不肯走开。更令人惊喜的是，第二还是第三次偷看洗澡时居然还有男人进来，衣服也不脱，就扑在女人胸口，大概“吃奶”（这时对面床上“拐差”发出口哨声，表示不相信）。金水也不肯定那男人当时做了什么，被女人赤裸的身体挡住，确实看不清。但他说接下去，女人没洗完就被男人拉出来，推倒在铺着席子的地板上，然后男人开始脱衣服。金水停了一下，我们全不作声，很紧张。“接下去那男人就把那……塞进女人的那里。”金水说得很平静，“奇怪的是，进去好了，又拔出来。哆嗦一下，又进去，然后又出

来，来来去去好多次，不知为什么？”“乱讲！”“拐差”忍不住打断，“我知道女人，好不容易让你进去，为什么还出来？金水乱编！”“乱编不是人！我对天发誓。”金水很冤枉，“不信算了，我亲眼看到。”此时我们下面早已硬得不成样子。虽是双人同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床上，但男生之间绝无任何意思。后来见有些小说描写知青下乡的同性恋故事，觉得都有些为后来北美读者需求编造的倾向。金水却大概真不是编的。他讲的画面在我脑中久久抹之不去。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直接想象这类画面，太震撼了。没想到看上去这么老实文静的金水两年前就知道了！

“后来呢？”“看过几次，扯那，大约被发觉了，后来那个洞就被一块板挡住了。听还听得见，听到好像被人卡了头颈，透不过气一样叫……奇怪，进进出出做啥呢？……”

金水带来的震撼第二天更厉害，烧早饭时他煞有介事地轻声告诉我们：“小道消息，林彪死掉了！”

这次我们倒不怀疑他瞎讲，因为这种事，没人会瞎讲。三天后，下放干部来传达文件，消息被证实了。对我来说，金水告诉我的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一日一夜间，自己像是长大很多。“进进出出，怎么回事呢？”“主席被他骗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么英明伟大的人，怎么会被人骗了呢？

从那个瞬间起，我想我的政治水平和很多中国人“同步”了（借用itunes术语）。但生产队开会讲解“五七一工程纪要”时，老俵们大都一脸困惑，直到下放干部说林彪少年时强奸村里地主女儿，然后害怕逃走，才参加革命，村民们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场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类似方法，今天揭露贪腐大案时仍然使用）。

从此我在插秧砍柴打牌写家信之外，同时也关注诸如九大的消息和任何有关男女的细节，直到今天参与电视谈话节目，主轴还是“政治”和“性”。前者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高音喇叭广播和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可收听短波的美国之音、BBC，还有莫斯科广播电台，开始曲和《歌唱祖

国》有点像。也有台湾的什么台，不太靠谱，很少听。关于“性”的启蒙途径更有限。《列宁在一九一八》是个重大突破。电影在打谷场放映，瓦西里和他妻子 kiss 时放映员特地把电影停下，用话筒告诉乡亲们：“这是两公婆！”然后电影继续。尽管这样“消毒”，次日田里村民热议话题仍然集中在白天鹅被托起来时“里面穿了什么？”男人们争来争去，最后来问“阿拉”。妇女们红着脸听着，也是好奇的表情。原来广昌乡俗女人从不穿裙和短裤，永远是青蓝色的长裤，裤腿可卷到很高。男人夏天则穿花花绿绿的短裤。有次我队两位女生穿了裙子挑水，也引来乡亲们一片猜测：“里面是什么？”贫下中农朴实、可爱、直率，比如女人产后奶水湿了上衣（也没人用胸罩之类），调皮的后生会开玩笑：“别浪费了，大哥喝不了，留给我吧。”小孩如喝不完，挤出来给家里族内老人补身体也是常事。乡俗尽管开放，人口产量也高，但那个由士兵啃鸡腿伴随的《天鹅湖》双人舞，还是让他们疑惑了很久。后来小孩们偷看知青之间有 kiss 这类动作，都叫“搞西洋”——这就引起了我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疑问：难道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某些地区的农民的性行为之中不包括嘴对嘴的接触吗？此事我至今没有答案。

林彪叛逃之后另一件在小山村也引起震动的政治事件，是尼克松访华。记得那天夜里下放干部从公社开会回来，紧张召集全体民兵到打谷场排队，我们也被召集。他和队长、政治队长、会计、保管、妇女队长等生产队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一字排开，站在我们和民兵队伍（包括绝大多数村里男劳力）前面，场外还有不少妇女小孩闻声赶来围观。一时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何事，想必是大事急事。我以为是珍宝岛又爆发战争，没想到下放干部却告诉大家：“美国那个总统叫尼克松，过几天要到中国来了！”

一时间大家没反应过来，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下放干部看了看大家，又说：“毛主席决定了，这一次不杀他！”

打谷场上一片哗然，大家交头接耳，表示种种意外、气愤和不理解。

下放干部作了一番怎么样的解释,我现在忘了。

我们和乡亲们一样,后来再次看到了毛主席这个决定的英明伟大。

十三 上海图书馆

1973年冬我因急性肝炎回沪,在上海图书馆“生活”了整整一年。这个漫长病假把我的农民经历大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除了在生活资料、革命历史和劳动方式三方面接受“再教育”外,也有一些较难用文字记录的颓废与堕落。十六七岁的学生,在完全陌生的艰苦环境里,犯的却是和今日暴发户贪官一样的错。常见标语:“严禁黄、赌、毒”。“毒”在那里完全没可能,余下的问题还是赌博和涉黄。

一有同学来访,难免打牌,四十分、争上游、捉猪赶羊。起初是谁输谁去买一元钱鸡蛋(12只),大家弄个夜宵,有点像农民的“打平伙”。渐渐就加码了,一个半天可以进出几十元。我们第一年有国家补贴每人每月十元,居然用不完。大家箱底总还有家里带来的几十元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村曹兄,最多输过45元,连闹钟、大翻领(运动衫)等都搭进去了,后来还真翻本。我的最高纪录输掉28元,加上半导体收音机。其实我打牌技术不错,总体上是赢多输少。问题是赢的时间对方常没钱了,于是欠账,张三8元,李四12元,时间一久也不好意思再去要了。有个同学叫刘公正,会弹吉他,曾欠我16元,至今记得,从未预计能成功索取。对我来说,“讨债”比借钱还难为情。但我输的时候,总是有现金就支付。邻队盖竹有个同学绰号“面包”,当时在旁看到我的窘相,轻轻和我说:“你爸爸妈妈现在还是每人15元一月生活费吧?他们这么困难还寄钱给你,要是知道你这么打牌,他们会怎么想?”声音不大,在我耳边却如雷轰响,一生难忘。从那时起,我就再不赌钱。后来在LA,去过拉斯维加斯很多次,旅行也去过蒙特卡罗,每次只拉几十美金的角子机,等于

“锻炼身体”，也算支付当地酒店市政建设费。但不再多，也不求赢。就是因为“面包”这一句话。后来我们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

赌虽不好，牌却照打。尤其是在乡下“面包”教我们桥牌，一度很着迷。我们当时打的桥牌，基本和国际规则相同，只是多了一个“倒打”——庄家取得定约后，可宣布“正打”或“倒打”，“倒打”时，K、Q、J最小，2、3、4变大，A与王地位照旧。回城后才知正宗桥牌并无“倒打”一说。我曾有文讨论“倒打”与“文革”之象征关系，游戏规则突然一变，社会上本来的“高贵者”经理、医生、教授、明星等（K、Q、J）突然失去地位，本来的“卑贱者”（2、3、4……）则瞬间成为仅次于A的大牌。当然，A（军队）始终最大。王始终最大。问题是，谁决定这游戏规则呢？在我们的“土法桥牌”里，谁获定约做庄家，就有宣布“正打”、“倒打”的决定权。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几十年来价值观颠来倒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会车钳刨，肚子总归吃得饱”，“好心总归有好报”，“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等等人生规律，现在都不灵了。

“涉黄”的事有点难以启齿。自从金水来过以后，这方面的梦幻变得十分具体，一发不可收拾。外在环境，又毫无学习和实践途径。于是难免纯洁得有点变态。记得一日和其他队的同学，三人突然造访甘竹大队。去了才知那里只有一个男生（另两个已迁往别处），还有两个女生。天已黑，怎么办呢？两个女生（中学里见过，没说过话）挺友好，让出她们的闺房给我们一共四个男生，她们则住隔壁男生房间。两个房间仅隔一层木板，什么声音都听得见，于是这几个男生就兴奋得睡不着觉（被子也特别香），先是乱讲“黄色笑话”，后来发展到打赌：五分钟之内，不要手碰，单是讲故事，保证你的“弟弟”起来……余下的场面“惨不忍睹”（也不用看，灭了油灯），声音效果放荡，我不好意思地用被子蒙住头，只听他们说，硬就硬了嘛，干什么弄脏了人家女生的花被子……可第二天起来，那两个女生穿着花的睡衣（上海人穿着上街的那种），嘻嘻哈哈地烧水，若无其事。

这就是我的青春，在没有饭岛爱、苍井空的毛泽东时代。

并不是所有“涉黄”行为都这么既放荡又节制。甘竹旁边一个大队也是知青一户，两个女生之中有一个是全公社（也是我们全中学）公认的美人，那个男生比两个女生都矮。有天半夜他爬到女生房间的天花板上，不慎掉了下来，摔坏了胳膊，还被判了七年。后来大家都回城了，他还在监狱里。

也并不是一切和“性”有关的活动都是这么悲惨变态。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在乡下特殊环境里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真正的恋爱：因为相关的人，现在还是朋友，他人隐私这里不便书写。但我想说的是，无论男女，第一次真的很重要。女的如果第一次被勉强（哪怕是因为利害被家人甚至被自己勉强），其不悦与恐怖或会伴随一生。男人如果第一次喜欢了爱你的人，从此性格会比较阳光、比较自信，较少自虐与嫉妒他人的倾向。

有同学说他在那个环境下，曾经整整“一夜”十几小时不间断“兴奋”。当时我们都笑他，现在想想，也是很难得的体验。也有同学和女友同床第四天才完成第一次。前三天都没睡觉，不懂，不敢，又不甘心。我想，网络时代的人大概不会这么“笨”——那是多么可留恋的“笨”。

上海知青惯例，秋天回城，早春回乡。一来冬天农闲，二来也想家。1973年我却异想天开，准备一个人在广昌过冬。有点受到杰克·伦敦小说《马丁·伊登》主人公的影响。想有不同于常人的成就，也应有异于常人的行动。决心冬天也劳动，同时可清静自学初中数学。等到男女同学一个个都走，天气渐渐变冷，收工回来要自己一个人挑水、烧火、煮饭，还要在秋风中自言自语，情景真正凄凉。但同时，自己又有点享受这凄凉的心情，自己被自己的凄凉所感动……这样的情况维持不久，初冬时分，自己却发烧了，吃什么都想吐，小便很黄。队长松仔家的，见我“坏了”（病了），便叫到她家吃饭。我怀疑是肝炎，不愿去。农民们都笑了，他们不信。农民的灶很大，结构比我们的复杂得多。除两三只大锅可煮

饭可炒菜外，另有几个小锅，烧水煮粥，不用专门烧火，只是借用其他大锅的“余热”。我要喝粥，他们坚决不肯；原来粥只是给小孩、女人和老人喝的，为了省粮。男劳力，还有客人，必须吃饭！去江西可吃饭？这时我才知道，吃饭是个特权。

过了几天，情况更坏。于是坐拖拉机到广昌县城看病。前一夜宿县城农田基本建设前线（挖河工程）一个姓谈的同学处。谈兄也是知青，清楚知道我的“危险”，却挤在一个被窝，坦然说没事。否则怎么办？当时住旅馆完全不在选择范围。为那一晚借宿，我终生感激。

次日医院验出急性黄疸性肝炎，指标极高，住进县医院后医生又劝我回上海。于是在谈兄的帮助下，匆忙回城。事后知道，一路其实都有肝昏迷的可能。

这场病，倒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是外形变了，病前 115 斤，病后 155 斤，靓仔帅哥阶段，从此一去不复返。二是开始读书了。虹桥医院同一病房里有正被改造的音乐家、有参加革委会的工程师，也有在复旦当工宣队的装修工人。大家都在看《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等。我也有样学样，让二哥借几本给我。一读才知用“马拉的列车”厉害，原来国家不是指一个地方或一个民族，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正是在读书以后，我才开始体会前几年乡下生活所有细节的意义。正是在读书以后，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再教育”。

出院后，父母亲说要休养几个月，否则变成慢性肝炎，贻误终生。所以 1974 年春夏我就没有回广昌。家里狭窄，我只能每天去上海图书馆——这里以前是跑马厅，现在又改为上海美术馆。记得我儿时曾在附近马路边思考南京路改名的问题，再过若干年我的第一本专著《郁达夫新论》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时，市委领导们（记得好像有曾庆红）也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发奖。但当时，1974 年，我没有合法证件到图书馆借书。图书馆很空，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工作证？学生证？户口本？都没有，怎么办？他们很热心善良，说你可以用报临时户口的条子

(像电车票的长方形纸条)来借书。后来去的次数多了,我将这临时户口条装在一个透明证件套里,虽然没照片,服务台的人一看就认识,我就这样使用了一整年的上海图书馆——这个漂亮的西洋建筑的不同大厅、回廊、露台、阶梯及很多角落我都坐过,大部分目录柜我都翻过。每天早上离家时,父亲会善意地嘲笑我:去上班吗?午饭,总是图书馆对面的面馆(现在是保时捷专卖店)。整个上海,除了我家,图书馆这一带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而且那一种读书的心境和氛围也是最理想的:因为自己没有专业,没有职业,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做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实际的读书目的,也不需要考虑所谓学以致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凭兴趣出发,开始是“批判”《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悲惨世界》等(书前后都盖着“仅供批判”),后来就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读杨荣国、任继愈、冯友兰、周谷城等人的古代哲学史著作,其中文字最好读的是郭沫若《十批判书》,学风最平实的是罗根泽的书(这类阅读也受了当时“评儒批法”风气的影响,虽然又是谁也没问我的意见)。眼见阅览室里那些批儒的工宣队小伙子躺在长凳上呼呼大睡(他们是上班时间),我心里对现实的不满已经开始明确。知道书本果然是拿来批判用的,批判什么却是读者的权利!很快,自然而然,书会往经典方向去读,《论语》、《文心雕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甚至最难到黑格尔《小逻辑》。似懂非懂,胡啃乱嚼,十分贪心。前几年有次陪阿城到北大讲演,他推荐“素读”法,即不带预设、偏见去细读经典,如“毛选”、《圣经》、鲁迅等。这种“素读”以后,其他很多“复制品”就可不读了,书甚至可以如金克木所言“越读越少”。说起来也有几分道理,但至少我当时是感觉书越读越多。而且,说起来好笑,读小说会读到满脸通红,激动不已——比如读董秋斯译《战争与和平》第二卷,见已和安德烈有婚约的娜塔莎却喜欢上了一个花花公子,我曾放下书本看着窗外白云默默和她说话:别去,别去啊……

在上海图书馆这一年,只有一件事仍然使我和广昌千善公社发生关

系：夏天的时候，我得到“独家情报”，公社廖书记去大寨取经，会在某月某日经过上海，深夜入住石门路沪江浴室附设旅馆，次日傍晚离开。

这是很有价值的 Information，因为当年有几十个知青在廖书记管辖之下，上调、回城、读大学、参军等等机会都要公社书记批准。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和领导“搞好关系”。

上午我就赶到那个浴室顶层，果然找到廖书记。他是正书记，平时表情严肃，话不多。印象最深的是有次视察我队见我“开头路”，点头称赞：重要的是把屁股移过来。（“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的意思。现在做“三人行”，也常听到类似有关“立场问题”的劝告。）他对有知青来找他也不意外，一起上街却有些茫然。我想我的责任是陪他在上海玩，他说他不想去西郊公园或外滩看风景，但听说过南京路，于是我们就从南京路从西走到东，后又经过西藏路转到淮海路，前后几个小时，吃了一顿简便午饭（我抢着付钱，他很生气）。他为他的儿子、女儿及小孙子买了些小东西，好几次看到较贵的衣服、料子等，看看都放下了。我袋里其实有妈妈给我的几十元钱还有更重要的是上海布票，犹豫了好几次，想想刚才廖书记在面馆的生气表情，便不敢拿出来。路上断断续续也说些改天换地改造世界观之类的话，直到下午3点，我们疲惫地回到他住的旅馆，没想到有十多个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已经等在他住的房间（房间很大，很多床位）。其中也有我的好友“面包”。他们都用很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我怎么“独占”了书记这么久。然后坐下来大家讲了一番客套话，感谢书记关怀，知青锻炼有成果，大寨是好榜样，南京路上有好八连等等。重要的是，我注意到来的家长、同学都是大包小包。不一会儿，廖书记和其他的公社书记就要坐车去火车站了。大家忙不迭送礼，当然都被谢绝，还有给别的书记或者帮人转交信件（信封挺厚的），廖书记连这也不肯。下楼途中，还有家长同学跟着，这情景叫我看了真替这些上海小市民难为情（也庆幸下午没有鲁莽行事，否则“印象”多不好）。“面包”也提着一个黑色尼龙袋，里面不知是什么，一路随着廖书记出了旅馆直到公

车上，还在点头哈腰，廖书记勉强笑着，一直摇手。“面包”，唉，这怎么可能？我不忍心再看下去……终于，汽车开走了。家长和同学们也都散了。这时我又撞见“面包”，不料看见他手头空空！“你，怎么……”“是啊，收了。”他得意地笑着。这令我太惊奇了！半天没缓过神来。

当“面包”听说我几个小时和廖书记在一起，还去了中百一店，居然连布票都没“借”出去，便拍拍我的肩，说：“子东，你将来能做什么事我不知道，但大概做不了官，也做不了生意。”

“面包”说对了，所以我后来教书、写字。

和廖书记在一起的这一天，我的收获大致等于在图书馆里几个月。

联想到阿城的“素读”，心想大概人情世故也是如此。看过了经典的人类行为模式，以后再见到的，只是形式、手法、银码、技巧的不同，所以，世事亦是“越见越少”。

十四 1976 年

在上海图书馆生活了一年，再回乡时我已经很不一样。作为知青的前后两个时期形成有意思的对照。之前是真诚浪漫追求自己向往、相信的东西，吃苦亦不觉苦，受辱也不觉辱，尽管后来回想或在旁人看来是受骗愚笨无知，但苦难只在身外，内心纯净并无多大矛盾。通过书本和经验比较看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后，曾经的相信向往逐渐残破崩溃了，但人还必须在其间生存，处境并无改变。于是苦还要品味其甜，耻亦要以为是荣。若以当时报纸、广播及领导宣传的政治标准衡量，我的觉悟变低了，政治地位却提升了，入了共青团，变成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队农田基本建设突击队指挥部成员。若以鲁迅、托尔斯泰或杰克·伦敦教我的文明价值标准看，我的思路清晰了，行为却犬儒甚至“卑鄙”了，开始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了。

那时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情况后来竟一直延续几十年。

还是在生病之前,我曾被公社推荐在县里参加了一次高考,填报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当时上海师大由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五所高校合并而成)。我一共考过三次华东师大,这第一次后来被张铁生的白卷给破坏了——尽管考试成绩不错(语文是我的“强项”,初中数学完全是下乡后自学的),但家里党员不够多,故失去了做“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这或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文革”后期(1973—1976)能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一个青年对这个时代的总体看法。比如在知青作家中,梁晓声、张承志等“工农兵大学生”笔下就颇有英雄情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黑骏马》等),史铁生、陈村、阿城等没有在“文革”后期“读大学”的知青,对这个时代的描写就会更荒诞、更悲剧、更写实。一些文人曾在《学习与批判》或《朝霞》上发表处女作初露锋芒,后来有人非议也有人理解:说那个时候获重用,谁会躲开?连姚雪垠、冯友兰、刘大杰都晚节不保,更何况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我仔细回想自己少年处境心态,却觉得也不尽然。我在1975年也曾投稿省报一个短篇,写知青的高考,收到一封回信说可以修改,但修改方案与我的写作初衷完全反方向,我明知当时若在党报发表篇作品,对我在乡下的处境会有多大的影响,但犹豫半天,还是放弃——全是因为在上海图书馆中了历代文人之毒。所以,想想那些比我更年长更聪明的文人,他们当年的选择,或许别人应该宽容,但自己不应该原谅。

上海养病一年,除了在图书馆以外,还常常和“面包”等一班喜欢读书的同学打桥牌。牌友中有几位是千方百计“赖”在上海的69届,他们大都出身“资产阶级”,见面要文雅地握手,不讲粗口,裤子前面有条褶,躲在家里学英语、拉小提琴等等。我回乡后,他们常给我寄《摘译》等杂志,当时是大学者陆谷孙等干校里编的书。有一次一张包书的报纸甚至更吸引我的注意,那是周总理在机场迎接加拿大总理及夫人。我拿着那张照片看了半天,那是我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所见过的唯一一张这类的照片,特鲁多总理夫人的裙子及修长的美腿使我一时忘了自己腿上的

蚂蚱和床下的杂草，印象很深（看来思想改造还是不彻底）……

思想在“退步”，行为在“进步”。江西第一把手程世清曾推出一张理想农村的彩色图画，每村每队都反复宣传（当时邓小平也在江西，说不定也见过这农村美景图）。图画中间是一条笔直的河，两边是走拖拉机的机耕道，路旁有给农民住的三四层楼房，画得很漂亮，房后是梯田，远处是水库、电站……图画下方还配了诗，可以唱。这不仅仅只是宣传画，而是每村每队的若干年内的统一建设蓝图。我们村也有条河，弯了几个弯，所以冬天农闲所有劳力要去做“农田基本建设”，就要把河拉直。我作为“指挥部成员”，任务是要画一张我们队的地图，然后画出我们自己的彩色蓝图。我一个人爬了几处山顶，没有工具和绘图常识，折腾了好几天，终于也画出一张“散点透视”的古坊新农村蓝图。绘图那些天可以不出工，田里的农民都很好奇且尊敬地看着我，颇满足了一点虚荣心。但下放干部调回南昌前看到这张图，对我诡异地笑了一下，又使我心里很不好受。直到几年前，新的“三中全会”前后，天津还有人提出要为农民盖楼房，动因是城里房价太高，想要郊区“土地流转”。我不由想起当年农民也曾欢欢喜喜准备统一住进楼房，但又担忧该怎么在三楼养猪在四楼养鸡等等。心想历史怎么这样容易被重复呢？好在现在国务院负责农村的官员也曾是知青，想来应该不会再为农村画统一蓝图盖高楼圈地吧？！

我个人最受公社和县委领导表扬的一次“事迹”是负责青年收割突击队。广昌（可能全江西）收割稻子的传统方法是一只上宽下窄的四方形木桶（盆），用绳子在田里拖行。前面有四个人割稻（妇女居多），两个人传递（小孩为主），另外两个男劳力将割下的稻子在木桶边沿摔打，谷子打在桶里，稻秆留在田里。这种耕作法年代久远了。到我下乡的时候，开始采用脚踩的打谷机，以带铁刺的卷桶，代替人力摔打，也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一般还是十人左右一组，每日能割一至二亩，收几百甚至上千斤谷。

某日公社刘副书记到我们村蹲点，跟我说某公社有青年民兵突击队，创下了每日收割 4000 斤的纪录，县里也广播了，问我们能否赶超。刘书记不像廖书记那样不苟言笑，他比较随和，“创意”很多。于是，我们次日便组织了一个“知青突击队”，知青只是旗号，其实调集了全村大部分青壮劳力，其他收割机都停下，只用一台机器，二十人割，十人传递，踩打谷机的三人一组（多了站不下）。分成四组，狂踩，可就这样几十人紧张奋战一天，也就三千多斤。虽然搞形式主义，称分量倒不掺假。不行，次日再努力，田头竖起旗帜，专门拉了广播线。公社来人拍照，全村原先七台打谷机都停下，几乎全队劳力只为这一台工作：四十人割稻，二十人传递，三人组踩机，分五六组轮换，还有人夹在我们中间“以腿相助”，结果人工驱动比机动还快，机器踩到发烫，马上换一台，一分钟也不耽误，全生产队，数里方圆，决不同时有两架打谷机工作（犹如足球场上不会有两个足球）。从天没亮一直拼到天全黑，结果真的破了纪录。一日收割近十亩六千多斤——当然，这样的纪录只维持了两天，第三天大家都瘫掉了。全队又恢复了六七台机正常运作（本来每日也有六七千斤进仓）。我是突击队长，因为这个“纪录”后来在公社、县委开了很多次会——而且我这时发现，无论追求“印象”，还是“影响”，在上面开会远比下面工作有成效得多。

类似的经验，我后来在工厂、大学、作协……到处获得验证。甚至也不光是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各界”及美国学界亦然。对社会来说，工作创造财富，开会浪费资源。对个人来说，开会事半功倍，工作事倍功半。大抵如是。

除了“印象”（谐音“影响”）之外，另一个词逐渐在知青群中流行，那就是“上调”（谐音“上吊”）。参军、上大学、到南昌赣州的工厂，就是“上调”。退一步，到县团委或供销社工作，到公社广播站等等，也是次一级的“上调”（为进一步“上调”创造条件）。本来，刚下乡时努力劳动追求“印象/影响”，背后隐隐也为了有朝一日能“上调”回城。所以乡村环境

再“开放”(越闭塞越能开放)知青也大都只恋不婚,因为男女知青结婚成家也叫“扎根”,虽有领导表扬加物质鼓励,却罕有同学成婚生子。开始几年,大家都隐隐相信表现好(“印象/影响”好)与上调/回城之间应有必然或因果联系。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邻队有个女生,很少出工,成天打扮,突然被“上调”到赣州什么工厂,原因是和公社一个领导的儿子谈恋爱;甘竹有对知青兄妹,家里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资本家,兄长却让妹妹去当处境险恶“名声不好”的公社招待所服务员,据说目的就是要妹妹接近领导,以求光明前途(此事我后来写成小说《可怜的人》,发表于1981年第12期《百花洲》,一个江西省最主要的文学期刊)。

在表现与成果之间断了联系,原来是件极可怕的事,会逼着人们不再追求成绩而不择手段直奔结果——现在大学、商界或政坛见怪不怪的现象,我们当时却感到十分惊讶且困惑。刚下乡时改天换地也锻炼自己的浪漫热情不见了,取而代之是种种现实的考虑,有的可能会扭曲自己。越来越多的女同学们,开始和当地的干部及其子女亲戚“亲密来往”,这使我们这些男生很“胸闷”。曹兄幸运,1974年就因“独子”而调回上海了。这是因为有个叫李庆霖的人在福建给毛泽东写信抱怨农村知青之苦,毛泽东回信安慰且寄了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于是引出全国上下一系列照顾知青的政策。同队的“拐差”当时整天打架、喝酒,像是全没了方向感。我在这一片“上调”的焦虑中,还是徒劳无效地走个人努力的老路:参加突击队,负责公社很多宣传项目,画地图,更频繁地和书记们谈话、互相递烟……知青们私下的说法,是各有各的“混”法,“混”却是相通的。同学间很久不见,碰面最自然的打招呼方式,就是拍拍对方的肩:“最近混得怎么样?”如果有人获奖上调参军提干等等,大家就都会说他混得不错。这种情况,刚下乡时是没有的。不知不觉间,我也做了很多自己当时就知道没有意义的事,但是因为我无意识中有两条底线,使自己无法继续“成功”。一是前面说过党报要我改稿,我却不愿意;二是公社里有个20来岁的妇联主任,父亲据说是县委领导,她对我十分“友

好”，廖书记到上海的情报就是她写信告诉我的。我却一躲再躲，不仅因为她不是大美人（有时看看，也有动人之处），更是从心底里不喜欢靠女人改变自己前程。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我是个可以堕落（或妥协）的人，但不能在文章上和女人问题上妥协。

今天，在我极其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我会尽一切努力去维持“表现”与“成果”之间的关系。比如研究生面试，比如学校招聘新人。有同事推荐其学生，该同事帮过我，日后也还是我重要的朋友。他的学生原也不错，可偏偏申请人中有的条件更好。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朋友同事不悦而去帮不怎么认识的别的申请者呢？明明可以利人利己的事为什么不做？是不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纠结阴影？

我做不到“识时务者为俊杰”，进而也怀疑这句话，甚至对那个时代出来的“俊杰”都觉得有些可疑。

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后，国家政策明文规定有几种情况知青可以回城，一是严重的疾病（急性肝炎不算），叫“病退”。“面包”因心脏病，获得“病退”的资格，几个队的知青一起盛大聚会，热情欢送。二是独生子女，可回去照顾父母，叫“独子特困”，曹兄便是。三是虽有多多个子女，却全部不在老人身边，这时也可调一个回城，叫“独留特困”——我母亲为了使获得这个“独留”称号，前后大半年，去了几十次“乡办”（街道和区上山下乡办公室），排队、等候、出证明、掉眼泪。因为我父亲的亲生儿子均不在上海，大哥还在北京，家在郊区农村，已有子女；小哥已和父亲和好，派到陕西做技术员。最后在区委老郑（就是搬进我们老房子的那个人家）的帮助下，我的“独留”身份终获认可。文件寄到广昌时，公社正准备培养我做生产队副队长和大队团委书记。

那已经是 1976 年了。

还在 1975 年，甚至更早，我和我的几个桥牌之友，“面包”、济生（一个常年借病躲在上海不回乡，整天手抄《文心雕龙》的同学）等，已经自以为将中国的局势看清楚了：关键是两个人，谁能活得更久。中国之祸福，

均系于此。(连我们这些 69 届“插兄”都能这么看问题,那些当时还努力投身“学习与批判”的文人今日怎么能够自辩“受蒙蔽无罪”?)

我们那时,自然不知道总理已患绝症,王洪文等负责周的医疗小组。1976 年初,先从收音机听到消息,几日后到公社借《参考消息》,回村路上边走边翻,看到外电报道北京街头几十万人自发为灵车送行,我当时还走在窄窄的土路上,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是我此生(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为一个政治事件而流泪。我坐在路边土堆上,手上只是报纸上的几段小字。

等到各种手续办妥,已是 4 月初。临行前看看绿油油的秧田倒有些不舍得。知青们则喝得大醉,甚至打架。我一面整理简单的行李,一面关心天安门上的情况(自己大事临头不着急,却在忧心远在天边的事,这种毛病在我也是常态)。临走前一夜住县城招待所,半夜被手电晃醒,是查证件或公社证明的。同屋的人在悄悄议论广场上的情况,我又不敢听“敌台”,是夜睡不着觉。

该“敌台”最近宣布正式停止对华广播,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这个标志一个时代结束的小新闻。来港后才知 Voice of America 发射塔就设在香港岭南大学附近的屯门青山上。不知有没有人研究,如果没有这些“敌台”多年捣乱,那个时代中国的变化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与同样甚至更加欺骗人民危害人民的张春桥、康生等控制的高音喇叭电台相比,不知哪一个更像中国人民的“敌台”?

等我次日坐火车到南昌,高音喇叭已在庆祝首都民兵听从毛主席指令,在广场上清除打击了由邓小平指使的动乱分子。在雄伟的音乐声中,我参观了市中心的万岁馆——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纪念馆。不知这座建筑后来有没有改建,否则今天开红歌会倒是顺理成章。从南昌经九江上了庐山。仅就风景而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与黄山比差远了。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些旧的名人别墅,还有 1959 年和 1970 年开过会的礼堂会场(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地方)。

仙人洞当然也去了，其实不是洞，而是山崖凹进去一块，传说吕洞宾在此饮茶。“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几句诗，当时我站在山上，云雾飘来，春寒料峭，还是莫名其妙激动一番。

从九江坐船至南京，难忘的旅程。买票时遇到一个井冈山知青，穿红运动衫，相貌有点像我大哥。他说五等舱票价虽便宜但几十上百人坐地上，条件很差。二人同行，可买一张四等舱，双人合睡，既省钱又不受苦。我听从了他的劝告，后来证明是个英明的决定。

四等舱上下八个铺，大约四五个都超额睡着两个人。我们两个男的在近门口上铺，对面下铺两个女生对我们特别友好。她们甚至开玩笑说：两个男人怎么挤啊？不如和我们换一个，照顾你们。说说而已，毕竟不敢实行。船起航后不久，其中一个高挑一点也穿红衣服的女生就和我的同伴双双失踪了（想想不可能在甲板太久吧，怪冷的）。另一个女生睡着，却不断有眼神朝我这边（至少我这么感觉），也不说话。我心头乱跳，却又不知怎么办。这时另有一个原因使我没有下床去和这瘦弱女生聊天——我的头后面是邻铺一个女人的头，看不清脸，应是三十来岁少妇，一个人。床位之间只有浅浅栏杆，头对头睡不太雅观，头对脚却也不太卫生。距离太近，她的头发时时碰到我的头。换一个姿势，呼吸都感觉得到，使我完全睡不着，再转一转身，长头发甚至盖在我耳朵上，带有香味，我动也不敢动……

第二天我在南京下船了。那小伙子补票去上海，可以单独睡这个上铺了。邻铺的女人不见了，下铺的女生似乎不太高兴，留了地址以后也没再联系。什么也没有发生。

后来再没有机会这样坐船旅行了。

在中山陵旁边草地睡了个午觉，又在玄武湖边洗了个脚，一路歪歪扭扭写了几首不太合格的七律七绝。到无锡蠡园拍了张照，又游苏州狮子林拙政园等等，终于，1976年4月中，22岁的我又回到了上海。

十五 轧钢工人

“自己的故事”写到这里，基本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因为我后来所遇到的事情，学到的东西，思考的问题——亲情、革命、底层、性欲、历史、劳动、贪腐、广场等等，在 1976 年 4 月 5 日我离开广昌时大致都已经出现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将之前所见所想的東西，不断验证、操练、坚持而已。除了 90 年代赴美四年还有点新意思外（所以称为“洋插队”），现在在凤凰已经参与数千集“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我，和那个 22 岁小学程度的回城待业青年，差别不大。

我从不后悔自己在广昌的生活。教给我太多东西，我的生活从此不同。我至今认为，“插队落户”的概念原是对的，只是不该强迫迁徙，且用道德口号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美国也有“插队落户”，比如卡特提倡的 Peace Corps，国家政治方面的考虑不论，对每个自愿参加的美国大学生来说，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再住进当地百姓家庭，整整两年，像非洲人、泰国人、孟加拉人的普通家庭成员一样生活，既了解不同世界，又帮助当地人，不也是一种“插队落户”，不也是一种“再教育”吗？

这件事情，也只有年轻人会去做。相信中国今后也还会有人去做，但不是被人忽悠。

回城的知青，待遇也不同。“病退”多分配在“小集体”单位，里弄生产组，制造纸盒，包装玩具，月薪二三十元；“特困”也可以在“大集体”（如曹兄很早回来了，在一个菜场卖鱼）。不知为什么，我被分到上钢八厂，属“全民工矿”，同学们看着我的工作证，均羡慕不已。这是真正的产业工人，我也颇自豪了几天。

但实际上上钢八厂的劳动强度，比江西农村还厉害。不管天热天冷，我们只能光膀子穿一件劳动布工作服，因为面前是火红滚烫的钢条，身后必须有几个一米直径的鼓风机吹着，否则无法靠近钢条工作。这个

场面其实小时候经过沪宁路桥远远见过，觉得好像威武豪迈。真的自己肉身夹在钢条和鼓风机之间，不久便得了支气管炎。有次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和主持人调侃，说务农插秧弄伤了腰，做钢铁工人损伤了肺，后来弄文学，则伤了灵魂。（许杰先生的教导：文学家是“灵魂工程师”，教师也是“灵魂工程师”，因此在中文系教授文学，就是双重的“灵魂工程师”——哪里敢当！）其实，现在总结，弄文学只是“伤脑筋”，后来做电视，才真正“伤心”（心脏病，以及……）。

我所在的上钢八厂二车间，是个轧钢车间，三班倒，每班工人均分成三个组，锅炉组负责将不知哪里运来的钢锭烧红软化；轧钢组负责将钢块经过一道道程序轧成大约几厘米直径的钢条。其中最难的一道工序，也是全车间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岗位叫“塞条”，即用手持铁钳将已经不太粗的钢条塞进最后一个轧钢机里。厂里青工大都抢着要学这个工作，“塞条”出了问题，整个生产线要停下来。“塞”得又快又好，则受众人尊敬为老师傅们器重。有点像乡下的“开头路”。不过这次我既不钦佩也不想学，旁边的青工很惊讶我的态度。大概，我认为插秧“开头路”是久远的劳动传统，“塞条”只是因为机械设备太落后。还有，我之能够“上调”最后不也和插秧优秀毫无关系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成熟”。于是我只安心呆在“成品组”，相对来说，是只卖体力的一个部门。如果做直条（产品是十米长的直钢条），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冷床”前按电钮。“冷床”是一个大约十多米长八米宽布满锯齿会让钢条在上面横向滚动的巨大机器。本来按设计，出来的钢条会自动弹出，在冷床上逐渐由红变黑，然后由下一道工序“捆扎”。但我厂这台机器钢条出来常常会“撞头”，所以必须经人工提前大约半秒钟按钮，让钢条弹出。这半秒钟也只是大概，必须看钢条过来的具体速度、位置。还是坐在鼓风机前，目不转睛地大约每分钟按两次，要十分精准，一旦迟按早按，冷床就会乱（未冷却的红条是软的）。所以，要精神高度集中，体力要求倒不高。在冷床那头，还有一个工人（多数是老工人），就在我按钮的同时用长的铁钩将这

根钢条的尾部钩出(本来也应是机器干的活)。显然,他的活更累更危险,红条随时可能弹到他身上,冷床一乱老头会像跳舞般在上面乱跳——以免踩到滚动中的红钢条。组长照顾我,无须做那个位置。这使我坐在冷床上紧张按钮仍充满了幸福感。后来很多多次在美国欧洲连续四五个小时开高速公路,也是目不转睛,我便想起这“冷床”,钢条在眼前跳舞。

如果是做盘条(成品钢丝最后盘成大约一米直径的圆形),我的工作要更简单也更辛苦些。一个铁制手推车,上面落下一堆盘条,用手倒拉着经过了一个秤,通常五六百斤,然后不能怕烫,要用铁丝将这堆钢条扎起来。再转向,推到街上,整齐排列在路边。街上偶然也有热恋男女汗衫短裙地经过,远远被热浪吓到惊呼,我则面不改色,最后把钢丝包推上去的动作应该有点潇洒、神奇吧(至少在旁人看来)。

简而言之,这一项工作,比犁田耕田插秧都更累。这才想起,工农工农,总是工人在前。不论直条盘条,都是做三十分钟休息三十分钟,否则都成了“培根”,没人受得了。从小听父亲说,与人打交道,能让则让,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轧钢车间这段时间,我却空前“斤斤计较”。在“冷床”上总是按钮已是既得利益者,但推车的时间顺序却大有讲究。三十分钟换班铃响时,如你的车正在接钢条,那这半个小时,你可能要拉五车!反之,交接时你的车排在最后(一班有四辆车),则很可能再交接时正接条,你只需拉三车!当然,很明显,你拉三车,和你共用一辆车的另一个工人就要拉五车了(除非正好生产线出事故,暂停下来,谢天谢地,我老盼着红灯亮警铃响)。劳动态度因人而异,几个青工常常故意在换班时“正好”上厕所,多拉一车的老工人,多数边骂人边拉走。只有一两个老工人总是不做声,任劳任怨(其中一个副组长就是我在冷床上的partner)。下来劳动改造的原钢厂资方经理则一分一秒也不差,到钟他拉,过钟他走(管你上不上厕所)。我三种态度都试过,发现偷懒不好意思,任劳任怨不肯,学老板的作风也觉得有点做不出来,最后便有心挑选

换班之人。矛盾的是，车子有好有坏，好车多数被聪明狡猾的青工或老板占了，怎么办呢？这么琐碎，这么无聊，我天天计算，持续了大半年。上班时不由自主地不断看钟，预计自己的车子换班时的位置。人是处境动物，到了某个处境上，或许都这么卑微。我一生之中，最和人斤斤计较，就是在钢厂成品组，做盘条的时候。唉，那一车车钢丝，600多斤，太热，太烫……

在上钢八厂期间，除了应付繁重体力劳动以外，我还郑重其事地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工人阶级”。

刚下乡时，我也依着《艳阳天》等小说的逻辑，寻找肖长春，寻找隐藏多年的马之悦，关心觉悟不高的中农们。如前所述，农民们不愿让我对号入座，我当时想，大概小说归根结底是城里人写城里人看，和农村的人没多大关系吧。

可是“工人阶级”就不同了。“工人阶级”是先锋队，我们身处的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天报上都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我现在，正好到了上海这个工人阶级的基地（党就在这里创立），而且钢铁厂，又是典型的产业工人基地。我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活生生的工人阶级（受了《马丁·伊登》的影响，我那时隐隐有点觉得自己将来会写作）。

为此，在无数个休息的三十分钟里，我开始观察身边的工人。

青工肯定不行。虽然根正苗好，大都父辈已在钢厂，苏北籍居多，工作或偷懒或勤快，下班进浴室时像黑乎乎的“赤佬”一样，冲下来一摊煤水，出来时却都是头发涂油，一身的确良，崭新单车，吹着口哨而去……不行，不是典型的工人阶级。

一些老工人倒是劳动模范的样子，像成品组副组长倪师傅，做冷床总做“站位”，拉车时不计较多少，换班下来也总不闲着，到处收拾车间杂物，坐下也是补工作手套（青工常笑他傻。因为劳动手套是随便拿的）。但是这些老工人都没有文化，基本不识字，这就像乡下的老农一样，怎么

能够领导一切呢？

一些中年的工人，工作本分，坐下也看《解放日报》，照说是工人本色了，可大都喜欢喝酒骂人，一旦福利待遇有些问题，可以整个星期都板着脸，全无工人阶级宽广胸怀。

轧钢组有几个技术好的工人，引起我的注意。特别是其中一个杜师傅，休息时老看《参考消息》。我有次在角落里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书中有很多群交、性交的字眼，被支部书记叫去责问。当弄清楚是恩格斯的书后，杜师傅也对我刮目相看。闲聊之后才知，他曾被派去上海音乐学院做工宣队，颇得意了一阵。现在又回到厂里，心理不平衡，比那原钢厂资本家还郁闷。看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也不容易。

想来想去，成品组的老陈在我看来，应是最典型的工人阶级了。工作负责，从不计较，态度温和，也不讲粗口，几乎找不到什么缺点，平时甚至也很少说话。但是最后，他也令我失望了——有青工在他工作服里发现了八张女人照片，都是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的剧照，花红柳绿的，哎，这怎么能叫“先锋队”呢？

结果，自己做钢铁工人一年多，还是不懂什么是“工人阶级”。

推盘条实在太重了，所以总厂一有赛诗会，我就去参加。什么“铁水奔流、钢花怒放，工人情怀，一心向党”等等，没想到写几句“诗”，可以少上几天班，少推很多车。我开始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有了亲身具体认识了。后来，我在《百花洲》发表第一篇小说，写了三天，稿费108元。对比我下乡一整年，出工200多天，最后除稻谷口粮外，分到68元。

领导上发现我这个拉钢条的青工还读恩格斯，便有意培养我，可能先做车间团支部书记，或争取入党，将来或调总厂宣传部。这时上钢三厂有个青工，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一篇由读者来信改成的短稿，就被作为“理论苗子”直调总厂团委。当时《朝霞》、《学习与批判》等杂志我也都看，心想这样做文章我也能写，肯定比做“冷床”轻松。但想来想去，还是写不出来。回家吃饭时讲起，母亲说不管写什么，能不拉这么重的

钢条就好。她心疼我整天发气喘，上夜班白天死睡，睡梦中还直咳嗽。父亲倒理解我的选择，说这年头，很难写东西。台州人。

结果“理论苗子”就只是参加赛诗会，还有赛歌会，也光荣参加“文攻武卫”（早就“唱红打黑”了）。一天下午，正在总厂排练《长征组歌》，我正在攀登一生最高艺术顶峰：模仿贾世骏领唱“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突然有干部拿着收音机进来说有重要广播。听完后继续排练。3时整，广播开始，一听低沉的声音，读出一系列最重要的机构名称，我已猜到了广播的内容。我清楚记得当时在心里说：是的，您是个伟大的人，但在这个时候，您离开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当时自然不敢出声。即便今天，这样说也不知是否“政治正确”。但是的确如此：如果1976，主席再多活几年，接下来的中国，不堪设想！

我们的《长征组歌》就此无限期暂停了。马上有老工人哭着冲进去，扑在收音机前，眼泪鼻涕，大喊您不能走！您是我们的恩人！房间里顿时哭声四起。我也低着头，心里仍然在说：对不起，这个时候，您应该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不同。

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同。很多人也像我一样想法，只是大家都不说而已。接下来几天，无数次的三鞠躬。这辈子鞠躬最多的就是那个时期。作为“文攻武卫”，还要天天上街巡逻，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趁机破坏。追悼会那天，南京路大白天没有一个人，其景象极为怪异罕见。我和楼上邻居一起躲在家里看电视转播，印象最深的是华国锋在万众（万万众）瞩目之下，从上衣下袋里慢慢取出几张纸，手指在嘴唇上蘸些口水，然后打开稿纸……

十六 “七二一”

若干年前的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全民都要上街游行庆

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最新指示很口语化,说明真是口头表达的。就像今天有些最主要的文件,有很多“搞”字一样。

这段最新指示的潜台词,一是当时可能有人主张从此就不办大学,主席不赞成;二是主席认为理工科比文科重要。现在无论干部选拔,大学管理,院士制度设置乃至求职市场,都确实是理工科压倒文科,看来七二一指示精神代代相传。

第二年,我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七二一大学”。

学校位于上海西南角桂林公园附近,原是工科大专。所谓“七二一大学”,实际上,是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入学以后,有三件事麻烦。一是要恶补中学数学物理。严格说,我当时只受过小学教育,曾在乡下自习初中代数,同学发现我会三角函数,但不知 $\sin$ 、 $\cos$ 怎么发音(因为没在课堂上学过,从没有老师教过)。现在一下子要读微积分、基础物理等,几个月内极辛苦。但读书怎么也比不上拉盘条钢丝辛苦,一个学期以后,我的成绩已在班上前十名(电气自动化专业共五十名学员,均来自上海各钢铁厂)。

二是初次碰到自己不喜欢的干部。以前在乡村、工厂,尧毛仔也好,廖书记也好倪师傅也好,从来没有个人爱憎。到学校后,反而很讨厌一个姓黄的矮矮的政治辅导员。不知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还讨厌。逼我们早起跑步,这没关系,但为什么非要说这是改造世界观呢?起不了床就是世界观有问题?有同学晚上返校迟了,大门紧闭,只好翻墙。被揭发后(居然有“卧底”揭发),几乎全年级“批斗”,至于吗?后来才知,黄辅导员原是某厂门房,多年来一直在不同学校当工宣队,之后就不肯回厂里。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人在工农中,没有人说你是工农,也没有人同情或轻视你。到了大学机关上层建筑里面,“工农”(尤其是“工人”、“无产阶级”)才成为一种符号。既然索绪尔语言学告诉我们“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是依据上下文历史语境的,那么我们也应认识到这

种权力符号与这群人生存状态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必然的。即使在今天，农民工、弱势群体云云，其实际具体的社会存在是一回事，抽象的网络政治话语又是另一回事。

这时我想，还好我做过农民和工人，否则，真要被“话语”捆绑了。

第三件烦恼事是在我就读七二一不久，七七年底恢复高考了。我打听了一下，说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次我填的是复旦中文系和新闻系，还有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高考的地方就在沪宁路桥旁的一个中学，正是我作为红小兵去长风公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条路旁，上钢八厂轧钢车间也在附近。记得考试前我坐在操场一角，看着很多考生还在念念有词作最后的复习，我却一点也不紧张。想想张铁生、李庆霖、赛诗会等等，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今天香港学生谈会考变色，内地很多人在批评高考制度，但在我来说，参加高考是一种幸福。如果照福柯深刻的理论，医院、监狱和学校结构相同，考试等于申请入狱，那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确就是鲁迅所言，“想做奴隶而不得”。

成绩倒也不错，应该可以被录取。但就在这时，我的七二一大学改名升格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属于大专。既然已是大专生，自然没资格再参加高考。这是我第二次想考华东师大但又以失败告终。

同学们却为升格高兴，宝山钢铁厂正在兴建，我们毕业后很可能先要去日本进修。班上大概只有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我的成绩在第二年上升到大约前五名，但我只有一半精力在读“电气自动化”，另一半时间在做别的梦。说到成绩，也不必太骄傲。因为学校设备陈旧，两个人一张桌子，考试时难免互通有无，很多时候成绩是“teamwork”的结果。老师也管不了。记得有一次考电工原理，有道占15分的大题，经过复杂演算后我的结果是一5，但身边孔同学却是+5。一时犹豫便通过身后团委书记小陆向再后一排的“权威”郑某请教，等待许久，回答上来是+5。这时坐在我们前面的袁姓同学（性格极可爱，不知何故平时随口能报出食品店各种糖果饼干的价格，也不在乎大家笑他），早早完卷了，却

迟疑着不肯交,反复检查,生怕出错。他原算出是-5,见到我们的情报,皱着眉头犹豫再三,最后也改了。交卷出去后,在教室门口碰到了之前最先交卷的班长(他的成绩总是最好),然后我们只听到袁同学在门外走廊上一连串大骂“扯那!扯那!扯那!”(沪语F字粗口。)我们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全都改成-5。结果这门课,我们的成绩都不错,全寝室里只有袁同学最后一名。

这是我今生所犯最严重的一次作弊行为。毕业二十年冶金局同学聚会时还说起此事,大家捧腹。任课的李老师已退休。仍一本正经警告说:许子东,你自己是教授,怎么还可以这样说,怎么还可以嘻嘻哈哈……

我一半时间在读工科,一半时间仍在发文学梦。那个时期我一直留意一些主要文学期刊的变化,从《朝霞》到《人民文学》。1977年在刚出版的《人民文学》上读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当时还没有任何评论,我已兴奋地跑去和济生、“面包”等同学说:“现在可以这样写了!”等到第二年卢新华《伤痕》在《文汇报》上整版发表,我则几乎有点嫉妒了,因为这和我当时自己私下写的小说稿,至少在我看来差不多啊。和郑某、班长等数理基础扎实的同学作了一番冷静的比较以后我发现,如果学理工科或医学外语,那从15岁到21岁(其实是12岁到21岁)这段“空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要让自己过去那被浪费的青春重新产生价值,唯一途径就是文学。是杰克·伦敦的启示:只有在文学艺术里,人生中的任何垃圾都是财富,任何失败都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变为成功。这样的想法,为我从小的文学兴趣找到了理性依据。于是在学电气自动化的同时,我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关于知青高考,关于乡村初恋,等等。我向《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杂志报纸投稿,退稿是正常的(马丁·伊登当年不也是一直被退稿吗?杰克·伦敦自己在1899—1900年间,写稿近百篇,退稿300次),编辑部夹在稿子里的铅印的退稿信还使我很受鼓舞。信上都说感谢我的投稿,稿子很有新意,只因最近稿件太多,恐一时无法

采纳，还望今后多多赐稿支持，云云。后来参加作协之后才知道，这类铅印退稿信，说明你的稿子编辑根本没读过。原因也不一定是稿子不好，因为我甚至没有用方格纸写稿！我把稿子写在普通信纸上，夹了蓝印纸抄稿可以一式两份，所以常常纸面很不清楚。也难怪当时没有编辑发现我的才华。开始是《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后来退一步寄《萌芽》、《青春》，乃至《清明》、《百花洲》等等，都被退稿。我甚至急中生智，将一份稿子寄到“上海作协李芾甘先生收”，大约我写了作家的原名，巴金真收到了我的信，还亲笔给我回信，大意是“许子东同志，我虽写过一些作品，但不会评论。大作已转给我的一位编辑朋友，他们会答复你，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巴金的回信令我十分感动（现在常收到一些陌生作者的稿子，有时也没空翻看推荐，想起来有些自惭），但那篇稿子仍然没能发表，编辑回信要我修改，修改方向竟与当年省报的建议相仿，使人很失望。更令我生气的是《文汇报》不用稿子罢了，还给我寄了一份宗福先的剧本《于无声处》（我早看过），意思是要我好好学习。以后和福先兄成了好朋友，还谈起此事，一笑。

听朋友讲过一个“将军打靶”的故事。

一群士兵在江边打靶，风急云低，打得不成样子。将军很生气，过来给他们示范。第一枪，打出8环（10环是靶心），将军自语：西北风六级。然后第二枪，7.5环。再一枪，对面靶边士兵又报8.2环。这里，士兵的列队开始有点松动。将军再瞄准，又打了第四枪，还是8环，这时士兵队列里已经有些哗然了：怎么回事，还骂我们，瞧这靶打的……将军也不理会，自顾自瞄准了很久，终于打出第五枪，然后说，不必报了，把靶拿过来吧。对面士兵把靶拿到士兵面前，众人惊呆了：原来将军打出了一个五角星！

对这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诠释是：每个人的人生，一开始都求10环，想入好的幼儿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想进名校，重点中学，北大清华，最好去剑桥、牛津读硕士，到哈佛耶鲁读博士等等。可是，一

开始,或半路上,打不到“10环”怎么办?进不了名校,考不到好成绩,或者初恋找不到理想情人白马王子,等等,怎么办呢?承认自己是“二等”,只有7.8环的水平,只能是剩女,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将自己所有的“不成功”,组合成一个独特的“成功”?

我在学校里,在电视里,都讲过这个故事。以为是 the story of my life,一种自勉。可是在我24岁时(想想曹禺、杜波罗留波夫在这个年纪已写了什么),我还在七二一大专里被不断退稿,我已打了一大堆7环、6环甚至3环、4环,我的“五角星”或别的什么怪图形在哪里呢?

十七 废“铁”从文

有两个偶然原因,促成了我的“考研”。一是被女孩子抛弃,二是有老人指点。

回城以后,家里还是16平方。父亲政治上虽平反,但因不是私产,地位也还不够高,房子便很难“落实政策”。(那里已住了两家人家,能让他们搬去哪里?)年纪大了,整天在九英寸电视机外加一个放大玻璃前听京戏。母亲经过运动,变得很积极,常常煞有介事地说“黄菊同志今天有指示,晚上全市统一烟熏灭蚊”,或者说要去政协开会,“明天要去参观宝钢”(其实只是参加政协外围的学习小组)。我在家里没法呆,周末也只好跑图书馆。这时图书馆已经常常满座了。有个年轻女工问我借笔,随意聊起,也是个夜校学生,便约了看次电影。她说有个照相馆把她一张私人照片放得很大,在橱窗展览,说话时十分自豪兴奋,我也不觉这女工肤浅可笑,还约她周日吃饭。结果她通过传呼电话取消了(里弄阿姨在后门高喊,1118号姓许的,有个姓王的小姑娘讲,夜饭不吃了)。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很多该透明的事不透明,不该透明的很透明。我又和她说好下周六下午见。我在静安寺原百乐门舞厅(当时是个电影院)门口等了半小时,没人。又打传呼电话,没回电。直到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才

明白：人家不来了。当时我站在电影院旁边一家旧货商店门口，正好橱窗里有个镜子，照出一个 20 多岁青年，戴黑边眼镜，紫红翻领汗衫，黑包尼龙裤。我冷静地看着自己：样子没什么特别之处；七二一大学，也不是什么光荣；家里 16 平方米，还有病着的老人，根本无法请人去玩；才华？如何证明？更不必说财产、地位……是啊，我想，许子东，人家为什么要来呢？人家喜欢你什么呢？

这个瞬间很长，我看到了橱窗镜子里的自己，也看到女人眼中的我。是啊，人家为什么要喜欢你呢？

说来我的人生动力，比那个夸耀相馆橱窗照的女工更浅薄。

这个女工的名字我也忘了，相貌却还记得。她大概想象不到，她可以对另一个人产生这么久远的影响。

正好这里看到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我便去找了父亲同乡朋友许家伯伯。许杰先生虽已复出，但还住在一邨平房。进他家前见里面出来一个看上去 60 多岁的乡下男人，出门后随口在地上吐了一口浓痰，然后用脚一擦，一边咳嗽，驼着背慢慢走了。我见了许先生，说明来由，许先生证实师大中文系也招研究生，而且在读大学生如考取研究生，等于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他也理解我转读文学的想法，说“爱好和工作合二为一，人生等于多了一倍时间”。但他也告诉我开后门是不可能的。除非外文及其他科目十分出色进入最后阶段，否则教授根本不会看到考生的卷子。许先生说，尝试可以，但机会极小。即使这样，我也已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

我又好奇地问起刚才走的客人，原来那是一个 50 年代中文系的学生，因不赞成批判自己的老师（许杰、徐中玉、施蛰存等）也被划右派，没毕业就流放青海，劳改 20 年。现在“落实政策”，属于“错划”，可回到原籍浙江教中学。“他脑子已经不大对了。”许先生感慨地摇摇头。

许先生怎会是“右派”呢？1949 年就是他劝我父亲不要去美国和台湾，要迎接新中国。如果我是当时的学生，大概也会有同样的疑问。突

然想到从 1957 年到 1979 年,这个学生最多也是 40 多岁,怎么像有 60 岁呢?我忘不了他那口痰、弯曲的背影……

直到现在,2011 年,1957 年“反右”运动据说仍是正确的,只是不应“扩大化”——从六个右派,扩大到几十万。“右派”当中,后来有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文化部长王蒙,也有我在许先生家门口见到的那个吐痰的男人……

明知文科险,偏向险境行。报名之后,一面仍然上电气自动化的课(很可能考不上,工科学业不能停),一面则将中文系本科 4 年课程,在 3 个月内压缩完成。古今作品当时无法临时抱佛脚,好在 1974 一年在上海图书馆已有超过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的阅读量。几本文学史,以前翻过,重新做笔记也不难。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以我自己乡村、工厂视角,边读边觉得好笑: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为工农兵服务,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直担心若真考这些,不知该说真话提出异议,还是为了分数照抄“原理”?真正最难,是准备外语——我的一外是日文,这科若不及格,其余免谈。但也只有外语,我在治专的课和考研复习可以合二为一。不像在别的时间,教室黑板上教微积分,自己桌下是刘大杰的书。我从此养成了一心两用的能力,现在常常电视屏幕上 is 巴塞隆那对皇马,音响放的是拉赫玛尼诺夫,人却坐在餐桌前写论文分析《小团圆》。

我的考研经历告诉我,如今要重来一次,我大学本科基本不会读中文系(陶杰有杂文,《不读中文系》,不过理由和我不同)。大学本科中文系如果只按课程要求,太容易,尤其是现代文学,很多作品都可自己阅读,但在中文领域日后要做研究,却可能很难。需要涉及的领域有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本科不如学外文吧,日后多一条腿。我对我中文系的学生说,如果你们现在觉得学校的功课已经太多,或者刚好应付,那就有问题了。你应有另一半时间学别的东西。

研究生入学考试一共有政治、外语、文学史、作文等四五门(好像还有文学概论?忘了)。其他都一般,过关而已,印象最深是作文课,题目

是“给友人的一封信——谈谈中国现代文学”。我确实用书信体写，主要内容是讲郁达夫。我其实是在考试前两个月才第一次读到郁达夫的作品，是50年代丁易编的一个选集。我在《郁达夫新论》的后记谈过自己当初的阅读经验：

大概是1979年4月的某个下午，我在上海福州路（即从前北新书局所在的“四马路”）上的一家图书馆里，偶然借到一本薄薄的、纸张已经发黄的《郁达夫选集》。这是我初次读到《沉沦》。第一面的印象是：清新，别致，真率得近乎大胆的水样的春愁里仿佛又隐含着某种轻微的刺激……后来，当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搞评论了，当我被各种高深的理论和翔实的资料包围着反而有些头晕时，我常常忍不住要去回味，去追忆那最初的一瞬间的感觉。记得当时，我把书摊在膝盖上，看着窗外变幻的游云，听着街上混浊的噪声，品尝着，思索着，味道说不清是浓是淡，我也没有感到像在杰克·伦敦、鲁迅或海明威面前的那种震惊，沉思与倾倒，离开图书馆时，我只是觉得，郁达夫的身影，有点特别，而又不无魅力。（《郁达夫新论·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这段话讲得比较文雅，其实我真实感受是，依照当时的美学标准，这是有点“黄”的文字，自慰、偷窥、听人做爱、宿娼未成之类，怎么文学史评价这么高，鲁迅、郭沫若这两位彼此不和的最重要的人物却都和这个颓废作家是好朋友，怎么回事呢？

我就把这个疑惑写到“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去了。结果获得了老师们的认可。事后知悉，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大约十几个进入复试，最后录取六个。考生中有王西彦的儿子王晓明，后来是我的同学；还有最早的作协会员孙颔，没录取，现在是上海作协党组书记、新闻出版局局长。

许先生具体帮了多少忙我不清楚。但即便不在考试环节，之前之后的教诲提携，我也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十八 第一篇论文

我的导师是钱谷融先生。中国大学里“先生”和“老师”的称呼原来有重要区别，“旧社会过来”的学者，称之为“先生”。1949年后党自己培养的，叫“老师”。扩大一点，党外民主人士，称“先生”，党内人士则称“同志”。鲁迅、柳亚子是先生，周扬、丁玲是同志，不可混淆。所以后来很多同志们想得到“先生”的学术名声，先生们则向往“同志”的政治待遇。记得有一次徐中玉先生访美归来，在系里开会说：“我见到了旧金山大学的负责同志……”大家笑了，他还不知道笑什么。钱先生在为我的书写序时，也称“许子东同志”，应是“与时俱进”，证明我政治进步。李欧梵后来帮我另一本书写序，则称“许子东先生”，完全不同的语境。

钱先生是“先生”之辈中最年轻的一位，1956年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受批判，险些划成右派，因此做了几十年讲师，直到收我们这第一批学生时还是讲师。但学界名望很高。据说直到“文革”前夕，一直穿西装打领带上课。即使“文革”中下乡，晚上也喝酒，在学术上和生活上，都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入学以后，先生并不给专门授课，平时都可在下午找他闲谈，正规活动则是每月一次讨论会，由一位学生准备报告，先生和其他同学提意见。第一个作报告的是后来研究赵树理很出名的戴光宗，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居然一下子拿出一份上万字的讲稿，《试论胡适之五四文学革命的地位和影响》，云云。读完之后，我们均傻眼了：太正式了，太出色了，几乎是篇论文。下个月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办呢？

问钱先生，他说你不是对郁达夫有兴趣吗？我晕。也不敢说只看了几篇。于是恶补，两三周内看遍郁的几十万字小说散文，匆匆想了个题目：《郁达夫和日本》。因为郁留学日本，处女作写于日本，作品又受佐藤春夫等私小说作家影响，抗日前又去过日本，风雨茅庐后又为日军所占，最后流亡南洋，被迫当了日军翻译，还被日本宪兵暗杀……我就把这些

要素连贯起来，作报告时心慌意乱。报告完了以后，同学们都很鼓励，钱先生帮我改了六个错别字（汗颜！），说可以推荐到“学报”看看能不能发表。

这是我从小到大，做的第一件可以称之为“成功”的事情。在大学学报发表论文，不要说是一个学生，就是对大学教授而言也算是学术成果。此后两年，我便一本正经名正言顺做“郁达夫研究”了。

师大三年，无疑是我读书最好时光，所读的东西，至今仍在在使用。和在“上海图书馆”无功利的自由不同，现在是有使命、有方向、有规律、有效率。（两种读书状态各有各的好处。）通常早上读理论书，或古籍，每次只读一章一节，详细做笔记、卡片。下午读作品，细读一本，然后泛读三四本，傍晚到资料室翻杂志，一个小时“随便翻翻”几十种。晚上是写作时间。零碎空隙都是外语时间。总之，在师大三年，好像没有什么时间是可供浪费，各种边角料时间都能物尽其用。看今天学子，哪怕是哈佛北大高材生，见识能力视野条件等等一定比我们那个时代好，但只有一点，即读书的习惯和数量，恐怕今天同年龄人也不会超过我们（他们大都在电脑上读书）。我的读书地点白天多在丽娃河畔校园，或到隔壁长风公园——就是小时候翻墙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宿舍五个人一间，上下铺，其他几位均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或“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我八到十岁。有时关灯后还能讨论很久，收获极大。那时不讲房子，不讲女人，只讲李泽厚、钱锺书、王国维、别林斯基等等。我入学时连《文学评论》是什么期刊都不知道，室友可以说教了我很多东西。《郁达夫新论》这个书名是我上铺曹兄随口建议的。对面上铺研究巴金的戴兄最年长也最认真，记得某天半夜，听见他还在辗转反侧，我轻声问：“老戴，怎么还不睡？不舒服？”只听他重重叹了口气，说：“巴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关于自己的文章呢？话都给他说完了，我们怎么办呢？”听得我们大家都笑醒了。

研究生宿舍很简陋，我也只有几十元保留工资，但衣食无忧，80年

代的气氛实在令人怀念。同层对面房间住着施蛰存的学生赵昌平,后来做了古籍出版社社长。隔壁房间绰号“小海军”的吕宁思,现在凤凰做“总编室”。……

写论文也有很苦很困难的时候,比如我在仔细读完曾华鹏、范伯群写于50年代的《郁达夫论》以后,就十分绝望,觉得我的想法都被他们说完了。问钱先生,先生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在作品中读出你自己,找到你自己。钱先生的文学理念,显然并没有把评论只当作客观的科学研究,而更强调学术之中也有个性、主观性的因素。钱先生又在为我的书作序时,替我把大言不惭的“新论”两字作了解释:

“日光之下无新事”。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世间并没有什么全新之物。但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则任何事物,任何思想,只要你真正亲自考察过、体验过,就总会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自己特有的认识,自己特有的体会的。这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东西。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评论,也是如此。只要这作品,确已经你的心灵之眼观照过来,在你的感情之海里浸染过来,那么你的感受、你的意见,就都带上了你特有的个性色彩,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它就是新的。……许子东同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评论,自然不见得都得到读者的同意,但读者听到的,总的确是许子东同志个人的声音,总实实在在是一种不同于他人的,他人未听到过的声音。那就一定会使读者感到兴趣,并且有所启发。

我当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钱先生这些话,其实在替我补救书中的弱点(当然,重抄一遍,发现也正是钱先生的这番话,在鼓励我今天写“自己的故事”)。从学术角度回看,我当初的郁达夫评论还是关注文学现象多于讲究理论范式,呼应感情个性多于客观科学考证,模仿勃兰兑斯方法多于操作形式主义技巧。一则是和80年代学术气氛有关,讨论五四作家的“颓废”、“色情”(以及“绝望”、“抗争”等等),其实也同时是在讨论

文学中如何表现忧郁苦闷、如何写“性”、如何直面惨淡人生等当代课题。二则还是和我自己的性情、兴趣有关。钱先生说,文章,若可写可不写,则不写。除非真有话说,不说很难受,才写。我的理解是,作家研究,也是可做可不做,则不做。除非真有个人趣味,有极大困惑与诱惑,才去探讨。

我的《郁达夫新论》,从论文到成书,看来一帆风顺,其实背后很多波折,有些事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西方人强调个人奋斗,中国人注重集体精神,看上去价值取向不同,实际也是社会条件使然。在中国,做一件事,某个人突围而出,自己或以为是拥有不同的能力,做出了过人的努力,人们可能也只看到这件事这个人,然而背后总有很多其他因素其他人,在合力支撑,在承担风险,甚至在做出牺牲。

我读硕士期间写了十来篇有关郁达夫的论文,有一半发表在北京《文学评论》和《文学评论丛刊》上。我一直和编辑王信联络。每次信都很短,王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也不知道。到哈尔滨第一次参加有关现代文学的学术会议时,看见很多大学教授、学者,努力想和《文学评论》的编辑“套近乎”,他们很惊讶我已发了几篇文章,居然不认识谁是编辑。事实上,我们这一批弄现代文学的研究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温儒敏、王富仁、陈平原、凌宇、陈思和、王晓明、黄子平、刘纳、蓝棣之、汪晖……谁都知道王信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幕后英雄。我在《文学评论》获奖时,曾和樊骏、子平去过王信的家,极其普通的北京老百姓的家,走道有煤气罐,吃的是水饺,餐桌很小。王信的样子,倒像钢厂的工人。至今仍默默无闻,心里却什么都清楚。后来还有一次我去建内大街社科院大楼,王信关照我,说不要说从上海来,要说从香港来。因为上海正闹肝炎,社科院里谈沪色变。上去以后果然,很多人见面离得很远,先问我从哪里来。王信留饭,但说不去餐厅(这个学府重地人人生命尊贵),他把他的饭盒给了我。这个饭盒和我在谈兄那里一宿,同样难忘。

樊骏是另一个幕后重要推手,极其敏感而又睿智的才子,形象风格

有点像海外的郑树森，当然政治和学术背景都不同。他有次还带我和王富仁去看望任职中央某部门的著名左派评论家陈涌。出乎我意料，陈涌家里到处挂着西洋名画，鲁本斯伦伯朗安格尔等等。我虽不大赞同陈涌的一些左派主张，但也尊敬他一贯坚持自己的左派主张。

书在浙江文艺出版，我也完全不知其间的曲折困难。当时的编辑，后来写寻根派笔记小说的李庆西最近告诉我，出版社总编姓夏，曾是右派，复出后极为小心。年轻人的稿子，又讨论郁达夫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作家，“颓废”、“色情”都是敏感话题，所以破例要求编辑部每个编辑都要全部看过，都要签字。若有一人质疑，此稿便通不过。所以庆西说，子东，你真是好运，那真是奇怪，当时居然没有人反对或提出问题。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不是说我的研究怎么杰出，而是那个时代，大家都有一份热忱，想打破局面，想支持一点新东西。《新论》出版后没有问题，反而受到好评。浙江文艺便以此书为例，编了一套“新人文论”丛书，作者有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蔡翔、程德培、吴亮等等。这也就是后来被研究当代文学批评者称为“八十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一个基本阵容。其中大部分，也成了我几十年的私人朋友。

《郁达夫新论》一书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影响，让我在 29 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好像一度是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不过复旦国际政治学的王沪宁，比我更小一岁）。后来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李欧梵教授，就是研究五四浪漫文学及郁达夫的专家。我在日本讲学，也是专门研究郁达夫的伊藤虎丸教授的邀请。伊藤虎丸和铃木正夫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比所有同类中文资料更早，我正好习日文，论文中已有引用。

凡事相对互动，郁达夫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也介入了“郁达夫研究”。我和陈思和负责修订 1989 年版《辞海》中的现代文学和作家条目时，我就把以前旧版郁达夫的条款中“颓废”等词句都删了。1985 年为纪念郁达夫去世 40 周年，北京要开一个纪念会，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胡愈之作一个报告，也是给郁达夫的政治地位作一个官方总结。找谁帮胡老起草这个报告呢？据说筹备会议的中国作协及郁达夫的众多子女家属之间有不同意见，郁与孙荃生的长子郁天民（曾编《达夫诗词抄》）和郁与王映霞之子郁云（曾写《郁达夫传》）都提名不同的研究者，一时争持不下。最后郁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较年长且更有声望，提议说不如找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学者，有个年轻人叫许子东，文章不错……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中国作协通过华东师大党委找到我，于是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第一次登门拜访“党和国家领导人”。北京市中心不起眼的四合院，门口有军人守卫。只记得胡老话不多，他夫人再三叮嘱，再三强调郁达夫是烈士。他们简述了1945年日军投降时的混乱情况，说当时他们只顾着和印尼共产党一起试图接管政权，一时疏忽了曾帮过他们地下党的郁达夫，结果导致达夫被害。说话间，两位老人充满歉疚之意。作协说我可以住在一个高级宾馆住七天起草这份几千字的报告，可我一天就写好了。余下的时间还参加了一个关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讨论会，会上发言的有汪曾祺、李陀、雷达、陈建功等。这也是我第一次涉足“当代文学”。几天后开郁达夫会时，原定夏衍主持会议讲5分钟，没想到他一讲就有些激动，讲了40分钟。作协的人也不想（或不敢）打断他。夏衍和周扬一样，经过“史无前例”的运动，便“史无前例”地清醒和反省了，他检讨当时左联对郁达夫的态度，忏悔之意十分清楚、十分难得。

原来郁达夫在1945年8月29日，被两个印尼青年叫走后，一去不回。到底去了哪里，被谁所害，事关重要。如果被日军所杀，他就是烈士（胡愈之便如此回忆）。如果被印尼游击队所杀，他就可能是汉奸（文化界也一直有人私下持上述看法）。又或者在战乱中被人谋财害命或死于意外或神秘隐居，历来都有各种猜测，但也都缺乏实证。我曾拜访横滨大学的铃木正夫教授，他就曾经怀疑达夫为日本人杀害的说法。他还通过对昔日宪兵队员和印尼当地华人的调查，推翻了胡愈之关于郁达夫9

月 17 日死于丹戎革岱的说法。但是,毕竟,学术原则高于民族感情,最后他还是找到了亲自下令暗杀郁达夫的宪兵队长,用证据确认了“达夫之死”的真相和细节。

两年前,我又在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录制了六集“郁达夫传奇”。我发现郁达夫的苦闷,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民族”,二是“性”——这和今天网络上的热点完全一致。中国的网络时代一般帖子涉及“民族”(比如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如何看不起中国等等),点击率就高,什么帖子涉及“性”(走光、艳照、全裸接受采访等等)此帖必红。但如果又是民族又是性(如女星穿日本军旗拍半裸照之类)受关注程度更是几何级数上升。于是,我把这本将来要出版的讲稿,题为:《民族·性·郁闷》。何为“郁闷”(近年网络流行语),不就是“郁达夫式的苦闷”吗?

那我为什么对郁达夫感兴趣呢?是否因为我在 26 岁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前整个青年时代,也同样可用“郁闷”来形容、概括?

十九 杭州会议

《郁达夫新论》不仅影响我的工作,也影响到我的生活。

就在我研究生毕业、出书、升副教授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燕华,第二年结婚。因为年轻老师出版了专著,系内负责分房的同事帮我向学校打报告,校长袁运开(画家袁运生的弟弟)特批,分给我 12 平方米住房。

具体方法是我将父母那 16 平方米的房子换给学校,学校分配南京西路重华新村一大一小两间 28 平方米给我。重华新村是虞洽卿 1940 年修造的新式里弄,钢窗蜡地大小卫生,属于上海较高尚的住宅。记得我和燕华第一次晚上骑自行车去那里看房,看到弄堂里很清洁有很多

树,家家窗户灯光昏黄^①,不知哪里还传出钢琴声……十几年后才从陈子善的考证中得知,重华新村原来也是张爱玲的故居之一。据张子静回忆,1949年夏天,张爱玲就在重华新村沿街公寓里,看着解放军进城。原来我的“张缘”,始于新婚之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郁达夫新论》的稿费1400元,能买当时最先进的21英寸日立彩电。燕华全部嫁妆,则是1600元买的聂耳牌钢琴(“梁祝”作曲者陈刚,最近还来弹过,说音质不错。现在摆在琴上的任何一件西班牙陶瓷摆设,都比钢琴还贵)。平日特别节俭,把“铜钿”看得极重的母亲,也出资1700元帮我们买了一房家具。这就是我们结婚时的全部财产。陈燕华当时已在《上海电视》主办的全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奖中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赵忠祥,第三名是宋世雄),但我们住进新房时仍买不起冰箱。墙纸是我在七二一的钢厂同学们帮我一起贴上去。在杭州度蜜月的钱是靠新婚宴会前“面包”、济生等“插兄”送的几百元“礼金”(每人常例二十元)。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电视明星居然会下嫁穷困的教师。

婚宴倒是在丁香花园举办,餐厅外面有偌大的花园,感觉良好。许杰先生是我们的证婚人。父母那天很高兴,虽然他们为了我的婚事,要到西安、北京的弟妹家旅居,半年后电视台分房才回到上海。想起来,无论如何,子女对父母的回报总是有条件的,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总是无条件。父亲少年得志,青年丧妻,中岁再婚,五十岁再得子,没想到耳顺之年被扫地出门,在16平方米蜗居20年。直到两年后,“燕子姐姐”要生孩子,市府特别照顾,市长签字,分给陈一套房子。父亲八十多岁才重新住进两居室的公寓。世界变成什么样了,他看不见,他仍然信奉自己的价值理念。搬家那天,很多邻人及孩子听说是明星搬迁,故都来借口帮

^① 一般说来,“高尚住宅区”,窗户内多为黄色灯光。凡窗户内白光闪亮,则不是办公大楼便是廉租屋。香港上海均如是。

忙拿些杂物，其实是上楼好奇看热闹。父亲看了直感动，说现在的人真好，个个像雷锋一样热心……

当时市长是江泽民，有次在一个文艺晚会前和燕华打招呼，说我来上海后第一次签字分房，就是给你。燕华当然十分感激。这套房子大约40多平方米，后来卖了60多万。燕华后来开玩笑：要是他晚一些给我签什么字就好了。

新婚到杭州，住杭州饭店，窗台外就是西湖。可我次日就发烧，燕华到岳坟买药。过两天稍好，参观虎跑，有个弘一法师的展览，见到法师有字，忘了原文，大意是即便幸福快乐，也不要去到十分，要留一些余地。在那个时刻，这些句子印象极深。

婚后家中有一抽屉，来钱就放在里面，要用就拿，没有存折，也不缺钱，两人均有稿费（后来出国后，便再也没有这种“理财境界”了）。很快买了冰箱、录影机，音响烦好友蔡翔帮我搬来。从此，生活方式大体定型：音响数次升级，唱片CD内容却基本相同（莫扎特等）；学院环境后来也不断变化，研究课题却仍是“五四”（还是郁达夫、张爱玲等）。总之，婚前的时光慢，婚后的时间快。

过了一月，又到杭州，参加一次在文学史很有名的会议。人在历史中，当时没感觉。会由上海作协主办，与会者有李子云、茹志鹃、李陀、黄子平、阿城、郑万隆、陈建功、曹冠龙、陈村、陈思和、蔡翔、季红真、韩少功、李杭育、李庆西等等，忘了有没有王安忆。因为这次在南方开的会，与当时北京《文艺报》主流有点抗衡，史称“杭州会议”，对1985年的“寻根文学”有直接影响。其实会上很少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涉及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主要是从贾平凹《商州初录》和阿城的《棋王》谈及“旧白话”的新生，谈及当代新潮小说如何避免片面接受翻译腔影响等。会上的明星是阿城。一向颇有抱负的韩少功很少发言，却在西湖边上散步时对我说：“我回去要弄点东西出来。”果然，会后他就发表了《文学的根》，触发了一个文学潮流。学界关于此会已有很多回忆录，此处不再详

述。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城和黄子平。子平日后成了最接近的文友之一。我们一起到芝加哥，一起去香港教书，还一起到台湾开会，一起编书，等等。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里登了一张杭州会议与会者的黑白照片。岭南大学有次把此书做教材,学生惊讶地发现子东老师怎么这么早就挤在“文学史”里?这一下想“扮后生”(装年轻)也不行了。

于是,我毕业不久,便直接参与了1985年中国文学的转折。

开了几个重要的会。一是《文艺报》在北京开了一个青年评论家的会,我作了《三种现代主义姿态》的发言,那也是第一次认识王蒙。二是在万寿寺现代文学馆开了现代文学创新会,好像是在那里,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纪念“新时期文学十周年”的会,刘再复作“主题发言”,我则作为青年学者代表也被安排第一天第一场发言。就是我的论文《新时期的三种文学》。事后报纸就特别关心我为什么要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社会文学并提。四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会在深圳大学举行,请了詹姆逊、叶维廉、佛克玛等很多名家演讲。我很想去但没有经费,乐黛云老师就请我去做个讲座并提供旅费。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其他讲者都很有名。后来知道,因为钱锺书、杨周翰等一代学者不愿来讲,中年学者不肯来讲,于是乐黛云老师想出奇招,找我和陈力川两个年轻人,讲好了自然光荣,讲砸了也不出奇,刚毕业的新人嘛。

我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张贤亮为例讲中俄文学中的忏悔主题,这次讲座在学术上是失败的,至少是不自量力的。郁达夫研究发表太顺,使我对学术道路的艰辛有些估计不足。我在比较文学这个领域其实没有多少发言权,缺乏基本准备功夫。刘小枫当时帮我赶印论文,开始很热情,后来则对我的论文也客气避谈。此文去年被收入陈思和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理论卷》,令我十分惭愧。但讲座的会场效果却很

好，一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刚发表，张以性无能隐喻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我再批评张的士大夫洋洋得意的使命感，昔日右派“走在人民大会堂红地毯上感谢千千万万的马缨花”等等，颇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也因为在深圳会上的讲话，不久我就收到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坤耀教授的邀请，去港大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后来知道，真正想请我去的，另有别人）。

所以，深圳会议对我来说，是个挫折（心里知道），也是个转折（外表看来）。

1985 到 1986 年间涉足当代文学，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奖励，二是“惩罚”。

奖励是 1986 年获教育部“新时期文学研究”青年科研基金——据说这是教育部首次资助同类项目。也难怪，“新时期文学”总共才十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当时人才济济，和当代文学有关的就有王晓明、宋耀良、夏中义、殷国明、李劫、夏志厚、杨扬、吴俊等等。学校曾有意让我牵头弄个集体项目，可是一来华东师大学风强调个性，人人追求自己风格，二是我也没有组织领导才能缺乏学术抱负雄心。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报个人项目，不久以后也离开了上海，有点愧对师大的栽培。不过那个时候“项目基金”没有像现在这样甚至比论文、著作更重要。（我一直觉得这是学术的异化。获得研究经费的目的是出研究成果，怎能以经费数量项目级别而不是论文质量学术影响来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研究成果？）

“惩罚”是因为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张承志和张辛欣的梦》，比较《绿夜》和《在同一地平线上》两部小说。正好碰上“清除精神污染”，张辛欣一度也有“污染”嫌疑，名字不能提，作品不能评，用今天的术语，就是“封杀”。我的文章原先登在《文艺理论研究》第一篇，目录见报后，据说是北京胡乔木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打招呼，然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致电徐中玉主编，决定临时撤稿（王元化当然是为了顾全大局，也为

了保护刊物、保护年轻人)。但杂志已印好,结果动用了很多学生、研究生,几千上万份,每份撕下几页,然后重新装订发行。参与这项“撕稿”行动的研究生南帆(现任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当时私下保留了一份稿子,数年后拿到《当代文艺思潮》重新发表。王蒙后来还特意称赞此文。

“撕稿”的时刻,我不在现场,也不知内情。但感受到周围人们异样的眼光——这个人“出事了”,“出问题了”。出什么事?什么问题?说不清楚,但好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觉得你出问题了!有几个月,我就活在这异样的目光下。好在80年代思想解放是主流,“清污”并没有持续下去,等到文章重新刊出时,我已出国了。

现在回想,重要的不是文章好坏对错,而是处理文章及言论的方法。几十年来,这类事情发生过无数次,几乎没有一次最后不是证明文章没错,错的是干预、批判、封杀。但为什么,这种干预控制方法,还是会不断重复呢?

比如一个人,每次生病都吃某一种药打某一种针,效果总是不好,他会不会一直坚持用这种药打这种针呢?

1986年我已担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上面也让我和一起留校的王晓明写入党申请书。格式大致照抄我二哥的入团申请书,只是简单一些,也不批判家人。后来王晓明通过了,我还要“进一步考验”。理由是因为有老师说我们穿牛仔裤上课,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懂,牛仔,不是放牛的人吗?

二十 初到香港

1987年2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在港大亚洲中心一个月,公务就是做一个学术演讲,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初次见到陈炳良教授和梁炳钧教授(也斯)。和陈坤耀教授也只是公式寒暄,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会到岭南

大学教书，而他会做大学校长。其余时间则和比较文学系的黄德伟博士讨论怎么在台湾出版大陆作家作品（这是他力荐请我的真实原因）。黄博士性格豪爽，脾气不好，在港台学者中人缘很差，对中国大陆学人十分热情。之前已招待过阿城、张辛欣等，凡有大陆学者作家来，他都愿意开车、请饭、拍照、聊天。我手头还有韩少功、王沪宁、郑万隆、刘索拉、王安忆、北岛、钱先生等人在他家客厅的照片。

初次出国境时经过深圳，当时深港两地，差别巨大。深大开会时，曾散步海滩，对面香港灯火通明，这边一片昏暗杂乱。再往前二十年，60年代据说这个海滩常有偷渡者尸体浮上。再往后二十年，今天这个海滩早成填地，深圳湾豪宅已贵过香港新界，大运会体育馆闪闪发光。在罗湖过关时，我把想买相机的300美金藏于袜底（这也在郁达夫小说里有例可循，不过他是想践踏金钱，我却是躲避海关）。刚到港岛只见高楼扑天盖地而来，我一眼看到一幢高楼顶部像个军舰，原来那果然是当时香港最有名也最昂贵的后现代风格的汇丰总部（1987年贝聿铭的中银还没起来）。再看到薄扶林道港大高级讲师宿舍，200多平方米全部海景，当时我愤愤不平：教的课差不多，为什么他们薪水四万多，住这样大宅和开两辆车，而我学校特批照顾才分12平方米住房？我立刻发现自己是贪图物质享受之人。询问如何可到香港的大学教书，回答是要有海外文凭及海外身份，“至于学问，你已足够”。

第二次到香港是1987年9月，Sino-British fellowship（中英文化基金访问学者），但赴港的手续不太顺利。师大外办的一个工作人员对我说：许子东你是副教授，破格提拔的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这是一个光荣。你知道香港大学一个副教授月薪多少？至少三万！他们给你多少？七千！这不是侮辱吗？怎么能够接受？

我听了觉得有理，连连点头，就退了出来。可是骑车回家路上突然又想到：是啊，七千是少了。可是我这个副教授现在月薪多少？一百四十元！

于是，再去申请。但听从有关领导劝告，夜访该工作人员的家。送些上次带回的小礼物，剃须刀之类，果然他的态度全变，不仅马上批准，还忠告我回来如何可买几大件，不要浪费了名额等等。比当年的廖书记好对付多了。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后来有没有变化。现在国力上升了，经济差距缩小，这方面的矛盾反差应该不会这么突出了吧？至少当时，我理解很多出国人员逾期不归，他们恐怕大都是顾虑再见到外办的人。

第二次到港住在位于半山的伯立基学院——港大的外国专家楼。英式早餐免费，熟鸡蛋要放在小铁架上用勺吃，窗外松鼠在树枝上蹦蹦跳跳，远处是海，洋人说话轻声。办公的地方，每个老师一个房间。我的办公室就在著名的陆佑堂里（电影《色，戒》中汤唯演戏的那个地方）。我试着从薄扶林道大学体育馆走到港大本部，30 分钟一路看海，皮鞋上都没有灰尘。

所有好印象都是一开始留下的。时间一久就知道冷气很吵，空气很坏。人人忙碌。在中环散步，我也不自觉拿了个皮包，作匆忙状，不知为什么。站在学校露台上眺望对面密集住宅大楼，几百个玻璃窗户，有几百种家庭风景，但只见闪动同样的灯光——都在看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现代化原来也可以很无聊。

妻却对我赴港很高兴，她应香港儿童文艺协会邀请，也来访问一次，拍了很多很美的照片。在尖沙咀丽晶酒店（现在是洲际酒店）那家风景最好的咖啡厅眺望对面港岛全景，灯火辉煌，她由衷感慨：这一切，应该出现在浦东外滩（她刚在那里主持了一场国庆晚会，当时外滩一边亮一边暗。没想到她这句感慨，20 年后成为现实）。之后她甚至希望我去美国。去做什么，不知道。总之，那个时候，突然间“出去”，像一个 magic word，含义不清，魅力无穷。有点像当年的“上调”。反正我们这些人，总在被时代潮流卷携着。刚刚学会造反，就要下乡了。刚刚要扎根，就想“上调”了。刚刚回到城里，人人要恋爱结婚了。刚刚分房安家，又兴

“出去”了……

“出去”就“出去”吧，反正我人已在“外面”。还在赴港之前，在金山汉学家会议上，见到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他说要申请一笔基金，以便让他认为很有希望的一批中国青年评论家可以有机会到美国游学，他举出名字有北京的黄子平、陈平原，上海的许子东、王晓明等。

但是就在这时妻怀孕了。这可是和“出去”的计划有点矛盾。一度我们甚至在商量去医院流产的可能。有两个人坚决反对，一是陈的母亲及其他老人，认为第一胎不宜放弃，并承诺不要我们管，她们帮我们带；二是孙维聪老师，她是前市长汪道涵的夫人，她甚至在我访港期间将陈接到康平路住，努力劝说要生下这个孩子。

和孙维聪老师的来往，始于一段流言和一篇散文。80年代中期，陈燕华不仅在电视台开设有“燕子姐姐”专栏，主持包括国庆晚会、全运会、卡西欧家庭大奖赛等重要节目，还拍了《邮缘》、《穷街》等电影电视剧，中国唱片厂的《燕子姐姐讲故事》录音带亦十分热销（后来还获得北京颁发的“金唱片大奖”）。主持人一红通常就会伴随流言蜚语，其中之一是说她是汪道涵的媳妇，之二是因洗衣机触电而死。某日她戴着口罩坐电车，真的听车上乘客如此议论。正好《新民晚报》约稿，她就将此次事写成散文发表，意在辟谣。不料次日便接一电话，说是汪市长的夫人，并约我们“便饭”（也不知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我们不知何事，摸不着头脑，也不好不去。结果就在西郊虹桥宾馆，见了一次面。原来并没有特别的事，孙维聪是交大英文系副教授，比汪市长年轻很多，当时大约四十多岁。她赞扬燕华的文章，“这些谣言都听过，可我们还真不便出来澄清。汪的媳妇，你们看，他的儿子才十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汪雨，十分调皮的小孩，对我女儿却很耐心。原来有很多人不会来澄清这些谣传，有人甚至会利用这些谣言，“谁是某某的什么人”，从中还能获益。这些事，我们想也想不到。从那以后，我们也就“攀附权贵”，和汪家有了些稀疏的来往。原来汪认识的知识分子很多，其中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年轻

学人。因为无事相求(这是我和汪家交往的底线),故说话也随意,如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法轮功、九七问题、港人游行等,都有讨论,求同存异。他原则性强,但也听不同意见,是个喜欢买书读书的共产党人。孙维聪自己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但没有想到她在“燕子姐姐”怀孕的事情上这么热心。我女儿出生当天,她便到医院看望。现在回想,出国事小,女儿事大。“出去”好不好,看你怎么说,若因此少了女儿,我会后悔今生。

1988年冬,父亲去世,听到消息我在香港中环,周围一片圣诞气氛,令我格外伤悲。追悼会上,有位党报总编,致词说我父亲1949年曾同情、帮助很多地下党。我的亲戚们都说,为什么“隔离审查”时没有人说呢?

在“文革”后期,我曾问过父亲,1949年没走,后不后悔。他没正面回答,只是说子东,那个时候,国民党真是腐败。他曾是国大代表,说这话一定有他的道理。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对不起父亲。在我开始发表小说和论文的时候,父亲十分高兴,逢人便夸自己的儿子。可是那时老人已“背”,语多重复,常常客人坐下时说了一遍,临走前他又要郑重其事拿《文学评论》或《上海文学》给人看。客人们笑着,我却有些不悦。几次和父亲说,以后不要跟别人说我的事,好不好?!某一天,记得是中秋前后,我回家开门前已听到家里有客,是二哥那位姓王的同学——自“文革”以来,他仍定期来看望我父母。我开门进去时,只看见父亲坐在床上,忙不迭将杂志塞进枕头下面,因为动作太急,头上的压发帽也弄歪了,就像当年被北京红卫兵批斗时那样——他显然又在向客人卖弄儿子的作品了,又怕我说,所以慌忙掩饰,又拿起床头柜上的月饼,说子东,“小王”送来的,不甜,很好吃……

现在回想起来,哪里是老人虚荣,明明是自己矫情——连这么一点能够宽慰高兴的机会也不留给老人!

二十一 “芝加哥学派”

在香港参加陈映真讨论会时又碰到李欧梵教授，说已获鲁思基金会资助，可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同期也请了刘再复、李陀和黄子平，都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有影响的评论家。赴美手续前后也办理几个月（要到国家教委审批），等到办妥 visa 已是 1989 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我当时都在上海，观察和参与。陈燕华应邀去联邦德国访问，之后留在特立尔（马克思的故乡）的一家大学教书（和朱德的孙女同事）。征得芝加哥大学的同意，我经由欧洲飞美。所以在到达美国之前，先去了汉堡、科隆、日内瓦、洛桑、维也纳……我一直觉得，在赴美生活之前先看欧洲，是很重要的。按阿城的说法，美国有很多 China Town，是中国文化的拙劣翻版和变形；而整个美国文化，就是一个大的欧洲 Town，是欧洲的复制仿造。“文革”后直接赴美的中国人，比较容易崇拜美国社会文化。倘若从欧洲的视角看，则对美国会更多一层批判的眼光。

在复旦认识的一个学生梅兰希在瑞士山区开车陪我们。虽然穷得在维也纳街头连麦当劳都不敢进，但初次欧游感觉极佳。尤其是从 1989 年的中国过来。再看到欧洲的田野、村庄、教堂、花朵，心想世界原来应该如此。后来多次再去，条件好了，又租梅赛德斯又住好酒店，却再也找不回第一次的兴趣。学一句张腔：旅行要趁早，尤其是去欧洲！

从欧洲飞到芝加哥，感觉太不一样，铁路、大楼、汽车，什么东西都是粗犷、粗鲁、粗糙多了。我总觉得，每个地方都有一种基本的物质感：日本是树木的感觉，香港是玻璃、金铝片，中国是土，到处是土。欧洲是石头、石块，美国则是钢铁、水泥。

芝加哥大学当然不同，牛津式的美丽校园，在城南一片黑人贫民区包围之中。图书馆旁边有原子弹之父的雕塑和罗丹的真品。风之城，冰

天雪地，零下二三十度，我在这里度过了 1989 年寒冷的冬天，和几个 80 年代中国最出名的文学学者在一起。

当时到美国的中国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集中。前者较政治化，后者倾向于从文化学术角度讨论现实问题。刘再复前几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从体制内推动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贡献很大。虽然他也被人误解为有不同政治意见，其实从思想到情感都“主旋律”得很。比如有一次我们一起去芝加哥艺术学院（闻一多留学的地方）看莫奈特别展，十几幅珍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的“稻草垛”竟汇集在同一个大厅，场面壮观。再复也顾不上细看画作，却直感叹：“瞧人家这画展办的，我们的工作真不如人啊！”我们在旁边都笑了：谁是“我们”啊，谁把你当“我们”啊！不过想想我自己小时候也站在南京路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改路名，以及后来在“三人行”中依然为不相干的国家大事皱紧眉头，大概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李陀是 80 年代中国新潮小说的重要推手，艺术感觉极好。到芝加哥后准备研究“毛文体”，后来好像有点从研究“毛文体”到钦佩“毛文体”，越来越多意识形态话语操作。其实我最近还听过他讲“新、旧白话”之异同，只要回到小说，他的批判眼光还是很犀利。

黄子平读书认真，沉默寡言。话虽不多，却常有名句广为流传，如“中国的文学太政治化，中国的政治太文学化”，如“大家都被创新这条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也没了”等等。他的研究题目是 50 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巧妙地在这个文学现象名词中间加了两个点，便拆成三个不同概念：革命·历史·小说。其间理论关系确实比“三红一创”等文本更复杂。他的著作后来在香港出版。我在芝加哥的课题是“当代小说如何叙述‘文革’”，最后完成也在香港。

我们这个小小“芝加哥学派”的主持人当然是李欧梵。他之前已有两本英文著作论五四浪漫一代和鲁迅。后来在哈佛出版的《上海摩登》则已成为海内外文化研究的必读书。李教授在学术上视觉敏锐，态度包

容，为人方面也是出了名的热心，属于那种帮了别人自己很快忘掉的人。（有些人除非对己有利，否则不会帮人；也有些人会帮别人，但总会提醒对方：我帮了你。像李欧梵教授这样的性情，学术界为数不多。）除鲁思基金外，另一个美籍华人班杰明·李，当时也以一个研究中心的名义，参与支持我们的研究。班·李（三联的朱伟英文发音不准，老叫他“笨·李”）当时正和北京女生小查（查建英）“拍拖”，所以查建英也参加了很多次我们的讨论会。

还有甘阳，刚进芝加哥大学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博士，苦闷得很，也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路过或专程来参与我们这个鲁思访问学者计划的还有杜维明、林毓生、刘小枫、杜迈克、郑树森、王德威等等，真是外面风城天寒地冻，芝大图书馆里如沐春风。

戴厚英当时也在芝加哥，到她女儿处探亲。一方面她的《人啊！人》80年代初全国被批，一方面她又是“文革”及五七年的造反派，所以李陀等北京主流评论家似乎不大愿意与戴来往。我和燕华倒是去过她家，和她女儿一起去滑雪（生平第一次，摔了无数次，仍感觉良好）。眼见戴厚英在芝加哥还在用小说写安徽三年自然灾害，空闲时间也不出门，只看港台武打言情片，真是他乡是地狱。后来她回了上海。因常常向安徽贫困地区捐款，被人误以为藏富，小偷入屋她还反抗，结果被杀害。

在芝加哥的那个冬天，是我除了广昌岁月以外，最铭心刻骨的一段记忆时空。

刚到芝大第二天，李教授就和我在学校餐厅一起吃午饭，各付各的，每人4.99美金。他开门见山地分析了我今后几年的道路：本来研究计划一年后要回国，现已取消这个限制。你们可以留在美国，大约会有绿卡。一年后你可以继续申请做访问学者，你也可以申请读博，但学英语会很苦；当然你可以离开学界或选择回国回香港……选择是你个人的，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会尽力帮助你。真是美国作风。换在中国，这些不同前途，通常是要你自己慢慢猜测、摸索、试探、争取。

我后来选择了第二条路，原因是我比同一访问计划中其他各位都年轻一些。

城市在密西根湖边上，湖大得像海一样望不到边（据说有两个台湾那么大，没有查实过）。花 2000 元买了辆旧车，室友和语友（交换语言的美国女生）分别教了两个半天我就独自去考了驾照。第一次开车正赶上 7 月 4 日美国国庆。在芝加哥市中心塞得不能动弹。前后左右的驾车者都烦躁发怒，只有我很开心很兴奋——会开车与不会开车的区别，远比开宝马与开破车的区别要大！“芝加哥学派”诸位学者都努力学习英文考过了笔试，我却是第一个获得驾照。李陀永远光说不练，子平因太太张梅珊会开车（我们发明了新歌后语：太太开车——跑不到哪里去），再复后来到科罗拉多居然也自己开车，载着李泽厚到处走，阿城说：美国交通又多了一个不安全因素。

Luce fellow 们一周两次在马泰来当馆长的东亚图书馆上讨论课，时间很长，常常从中午到晚上，或有来访学者或我们自己轮流主讲，然后大家讨论。从形式主义、雅各布森、布拉格学派，到德里达、后殖民主义、巴赫金等，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福柯理论：知识如何成为权力，思想怎样变成暴力。有时还要牵涉到康德、培根等等。李陀、子平和我，都是文本批评实践多于系统理论训练，所以这种“理论集中营”也有好处。

否则怎么办？外面乱云飞渡，凄风惨雪。接许杰先生信，言王瑶因女儿事伤心，在上海客途去世。所有国内朋友的来信，都劝我珍惜在美国的机会。

每次讨论会都连着聚餐再连着在班·李家的电影晚会。大家坐在地毯上，背后落地窗外是风雪密西根湖。通常前两场李陀、李欧梵讲欧洲文艺片，《八又二分之一》、《战舰波将金号》、《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等。第三部则放“007”轻松一下。通常前两部再复都快睡着了，第三部则看得满脸通红，说还是这样的片子好看。李陀直笑他：“这些中年人，真没办法！”（其实他们年纪差不多。）

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公众空间”也是我们的重要议题。好像刘小枫、甘阳都讲这个题目,最有感染力的讲者是杜维明,讲了整个下午还不够,晚上又对着再复女儿讲了数小时,虽然新儒家观点,我和子平都不大赞同,但看着杜维明诚恳的表情,我们都不停点头,十分佩服。

在芝加哥,我有意识在研究方法上寻求改变。其实从上海到香港,离开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反而看清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意识到海内外文学研究的区别。中国的文学批评关心现象与问题,海外的学院研究讲究理论和方法。前者如火线医生急救,后者似外科教授示范。在港大期间我主要只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为《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的“现代主义”卷写了篇两万字的序言《现代主义与新时期文学》(该大系因刘再复主编,最后没有出版);另一篇是以《血色黄昏》为例讨论当代文学中的青年心态。也曾在港大帮某英文期刊选摘中国内地的文学论文,便发现我的同行们(也包括我自己)喜欢用“几个特点”、“若干倾向”、“主流”、“发展趋势”等大题目讨论文学作品,常常从论点出发而找对自己有利的文本证据。这个反省使我以后对“以论带史”的方法有所警惕。

记得是在汉堡阿尔斯特湖边上看书时,突然想到借用普洛普的方法讨论“文革小说”——我想做的是既实验一种形式主义学术理论,又尝试回答当代文化(乃至政治)课题。李欧梵教授提醒过我:结构主义在美国学院已经“过时”。但我想,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与时俱进”或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台州人嘛。所以在芝加哥,我只是多看多听多想,老想起在广昌砍树那时,口子开得不够宽,斧头便无法砍得深。

燕华也从德国过来了,在芝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了没几天,报上见到一个华语电视台聘人,便打电话。不想台长竟是原上海电视台导演迟晶,马上录用。不久汪道涵随上海市长朱镕基率领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来到芝加哥,他给我们打电话(也不知怎么知道我们的电话)。那是1990年,美国各界对中国十分冷淡。次日朱镕基等参观芝加哥期货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市场。所有美国传媒都回避,仅陈燕华代表芝

加哥华语电视台采访。谁能想到,再过二三年,浦东也有了股票市场,而且后来有这样规模的发展……

在图书馆讲起朱镕基来访,李欧梵不知是谁(可见文学爱好超过政治兴趣),李陀插了一句:这个人很重要,将来是总理人选。

怎么一个中国的小说评论家,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

今天回头看,芝加哥的这些“同人”后来却走了很不相同的道路。李陀、甘阳近年的文章言论,以及第二年也是李欧梵请来的访问学者汪晖,现在已被国内某一倾向的知识分子视为领军人物;刘再复二十多年来出版了不止二十多本书,主题都是漂泊流亡赤子之心,寂寞却不孤独(尤其是和李泽厚合作的成果,影响深远);子平研究“革命历史小说”和我讨论“‘文革’集体记忆”的书后来都在香港、台湾以及北京、上海出版。我们在香港的学院里,仍以边缘角度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查建英编《八十年代》,李陀、北岛编《七十年代》,都在有意无意中为那个时代“代言”。查建英还和我一样参与“三人行”,将当年在芝大图书馆讨论的有关“公众空间”的话题实践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上……虽然文学倾向政治态度已不相同,但是芝加哥这段岁月在各位的人生及学术道路上的转折意义,却是大家都难以忘怀的。在这个意义上,戏称“芝加哥学派”亦无不可。

二十二 UCLA

1990年9月,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重做学生。这是我第五次到大学考试(第一次是“文革”工农兵大学生考试,未成;第二次是七二一大学;第三次是恢复高考时被取消资格;第四次是考华东师大研究生),也是第三次进大学,第二次接受“再教育”。

没想到,重做学生是这么困难。

1990年李欧梵想离开芝大,有四个可能的去向:哈佛(母校)、斯坦福(校园美丽)、圣地亚哥(讲座教席)及UCLA(也给兰兰一个教授职

位)。李教授和聂华苓的女儿兰兰名副其实“爱情长跑”很久了，每个周末开车从芝加哥到爱荷华三四个小时。我们问他辛苦吗？他笑言没事，在车里听一场瓦格纳歌剧就行了，表情很可爱。李教授的每段爱情故事都是尽人皆知。

虽然 UCLA 会给我奖学金可以支付学费，后来还有研究助理的收入应付生活费，但前提是我必须通过一个类似 GRE 的入校英文考试。我的第一外语是日语。英文是到美国后恶补的，每周和一个来自科罗拉多的女生交换一下午语言，三小时英文三小时中文。后来索性从“理论集中营”逃课，满屋贴满英文单词卡片，再次学习马丁·伊登，每日只睡四个小时，紧张到胃也痛了。但比起李陀开刀住院、张梅珊得忧郁症，我在芝加哥的状况还不算太坏。

考试总算通过了，身份一变，心态也不同了。一切从新开始，生活又有了新鲜感。当晚参加大学为各国留学生办的 party，之后就有个黑人同学带我们去日落大道的迪斯科。他赤膊穿西装，直说我的服装不对，最后把我的 polo T 恤领子竖起来，半夜戴个墨镜，才算勉强可以入场。迪斯科场里见一大约西班牙裔的靓女，白纱袍下只穿配套的胸罩和三角裤，上面分别绣着三个汉字：“我”，“爱”，下面绣着“你”字。她大概不知道这符号的意思，舞跳得很欢，眼睛放电。同去的一个台湾学生忍不住想告诉她，但乐队太响，无法说话。出来后我与一个巴西女生聊天，她学过几句中文，知道中文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思，当场解释我的名字：孔子的子，毛泽东的东，隔了两千年，这中间，有许，许多事发生。

UCLA 校园很美，常被福克斯、派拉蒙取外景，尤其是我们东亚系所在的 Royce Hall，楼下便是交响音乐厅。砖红的西班牙建筑，门廊外绿地斜坡，很多松鼠。不过只有刚进校以及后来毕业时才有心情欣赏校园风景。背上书包一切从新开始，也包括自找住处（这时陈仍在芝加哥工作）。之前我到芝加哥时因为是 Luce fellow，有人接待。现在是学生身份，一切要自力更生。看了学生服务中心很多“合租”广告，大都写明

要男要女,我找了几个要男生或男女皆可的帖子寻去,同房(不同室)的室友不论男女,都“尺寸太大”,眼光太热情,令我犹豫却步。然后到 LA 市区找,有一处窗口能看见 Hollywood 的牌子耸立山间,可惜租金太贵。另一处就在著名的罗斯福酒店(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的地方)附近,房间倒也不坏,只是上下电梯时发现邻居们都有文身鼻环。向台湾同学打听,说是风化区,万万不能住。一段有惊无险的有趣经历后,终于在一个美国老年夫妇的房子里租到一个小间,不到 6 平方米,200 美金。合用厨房,偌大冰箱只给我留了很小地方。之后几个月,一直听东欧移民女主人向我传教:“许,为什么不马上敞开你的心胸让主进来呢?”我点点头,心想:为什么不多给一点冰箱的空间让我可以放盒饭呢?

在做过所谓“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以后,在和最佳节目主持人结婚以后,在和一班全国有名的学者共商研究计划以后,突然又变回学生,住在厨房边的小房间,申请 America Express 被拒绝,只花 2500 美金买的旧车却因走错线收到 264 美金的罚单,一天辛苦上课回来等着我的只有快速面和明天要交的英文功课……重新做学生,接受“再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李欧梵在为我的论文集《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写序时说:许子东“随我到加大洛杉矶分校做研究生,这是一般人不愿为的‘下地狱’做法。记得我曾警告他学英语之苦及美国学院压力之重,但毅然决然咬紧牙关苦下工夫,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便已完成学位课程,而在英文写作上更是突飞猛进,目前可以用双语写作。……”这里后半段是鼓励,前半段却是实情。

相信过去、今天乃至将来很多出国“洋插队”的中国学生,都能理解我的这段回忆。许纪霖在访港后总结,说中国学者在国内是个“人物”(却不是自由人),到了海外是个自由人(却不再是个“人物”)。我当时就在这种转变之中。

在 LA 没车不行,看到一广告 Bule Dream Car,见到才知是笨重福特外壳还有点损伤。车倒还结实。车主也是香港人,我们一说中文,那

个西班牙语口音的经纪慌了。当然我们很君子，还是让他赚了经纪费。车主住比华利山，丈夫任职里昂银行。随车还送我一堆生活用品（大概一个男人流落他乡，也颇令人同情）。多年后竟和他们在上海锦江饭店一饭局重逢，女主人说，那辆车没问题吧？还好没有骗你，人生真是不知道。

又有了旧车，又有了蜗居，可以上课了。就在这时，我又觉得有些胃痛。UCLA 的医院世界著名，很多尖端科技都在此诞生。那天医生略作检查就平静地对我说，90% 是 ulcer，10% 是 cancer。Ulcer 是什么我当时听不明白，cancer 却是如雷贯耳。马上到图书馆查医学词典，说胃癌的治愈率是 50%。10% 的 50 名即是 5%。是夜躺在 5 块美金买来的旧沙发上，望着天花板，想想 5% 是怎么回事。小时候记得毛主席说 95% 是好人 是人民，5% 是坏人 是敌人。怎么我到处见过人们被批判被抄家被审查呢？可见 5% 不是一个小数目！

5%。我怎么办呢？

更糟糕的是要作进一步检查时，诊所说我的保险不能支付检验费用，原因是我说在芝加哥已有胃痛，所以这是 pre-existing condition（先前存在的状态），UCLA 的这个研究生保险要等到 18 个月后会生效负责我的医疗费用。

这就是说不仅眼下几千美金食道检查、胃镜等费用要自付，如果查出来是 cancer，也要等 18 个月才医？

和我的美国同学们商量，他们都怪我不该告诉医生以前看过类似的病。难道要我说谎？难道人必须说假话才能生存？我原来以为只有特殊时期的中国才会这样。如果是这样，我来美国做什么？！

美国同学说 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限制不仅合法，也有其合理性，否则人人平时不买保险，有了病才买好的保险，医疗保险业如何营运？

可是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借钱？清晨去贫民医院排队？美国

同学摊摊手，耸耸肩。我这才体会到法治社会理性至上，情理分得太清也有问题。我这才体会到社会主义也有优越性（可惜后来该改的不改，这种优越性倒越改越少。有同学激愤地抱怨：美国的好东西不学，学来的多是垃圾）。

所以说，知识青年到国外去，接受现实世界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国的人民，都应该欢迎他们去。

医生说，要不先吃药观察。吃药后，胃痛时有时无。药再加重，有一日，医生说这是治 ulcer 最重的药了，再观察几个星期。言下之意，如果再痛，必须做下一步治疗。那几个星期，果然不痛了。这时，妻已到 LA 华语台上班了（北岛介绍了一个在电视台的朋友）。我们开着破车，从芝加哥到洛杉矶，整整三天，横穿美国。离开芝加哥时正好下大雪，和子平梅珊道别。子平临别赠言极有哲理说：“开慢点，前面也下雪。”

一路风雪弥漫居然无事。小心翼翼过了几星期。不久又从 LA 开车到拉斯维加斯，不料车驶入恺撒宫宽阔的停车场时（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地方），忽然胸口上腹一阵熟悉的疼痛。我绝望地趴在方向盘上，很久不动。

结果先作食道检查，欠了医院 2000 美金。贫民待遇，可分期付款，每月象征性还 10 元。终于违反了父训，要借钱了。很长的管子从鼻孔插入 24 小时，腰间挂一个仪器，还要自己开车走高速 30 分钟回家（住院太贵）。最后结果仍然不甚了了。后来倒莫名其妙好了。李欧梵的解释是：“ulcer 多因心理压力，不知病因，造成了你的病因。”总之，这大半年病痛后，使我很理解希拉里、奥巴马等为什么整天折腾医改法案，也使我很担心中国医改前路漫漫，远非“红包合法化”就能算是“中国模式”。更使我第一次正视“死”的问题，第一次感觉“死”也会与我直接有关。在被 5% 那念头折磨的日子里，看着路上的行人车辆，心想如果我走了，这世界原来没有任何变化！心想我辛辛苦苦在这世上，for what？

其实命运安排我到 UCLA 读书，或者是有目的的，只是我当时还没

意识到，可能正与我的缘分擦肩而过。

在美国买车不贵，但用车贵。主要还不是因为汽油（90 年代初加满一车油不过 20 美金。现在也涨了，但仍便宜过中国——全赖国际强权的保护与开拓，美国国民的低油价与国际上的很多战争密切相关）。开车的费用还有保险、修车、停车等。几万美金的新车，一年保险 2000；2000 美金的破车，一年保险也至少 1000。不平等吧，但资本主义就是不平等。法律规定，再穷的人也要买车险。据说洛杉矶当年发展出这种以高速公路平面铺开城乡不分的都市格局，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几家主要的保险公司在背后参与城市规划。这种所谓“新城市远景”已被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证明是不成功的，但城市已经建成，千万穷人每天开着没有冷气屁股冒烟的旧车在堵车上上班，已成为每天大众生活内容——我只是又一个新加入者。UCLA 位于 LA 西部的一个好区，校园风景美丽但停车费很贵，每月一百多美元，仅校园泊车已超过我们的基本伙食费（又是另一种的“米”与“柴”问题），而且下车后还得走 20 分钟穿过广场斜坡绿地大楼，才能走到我们通常上课的北校园。所以第二学期后我就听从从美国同学的劝告，索性不用学校停车场，而是把车在校园南面 westwood 和 rochester 交叉路口附近的路边免费停车，然后搭乘公共巴士一块美金就直抵我们的教学楼。但是在那几条可以免费泊车的路口，也常常找不到位，有时要转好几个圈。一年下来，我对这个路口的街景、商铺、楼层甚至路边的灯柱树木广告牌等等，都已相当熟悉了——所以，当我后来在《最后的苍凉》看到这条路口的照片，看到这些眼熟的街景、楼房、商店等，我十分惊讶！原来张爱玲最后的住处就在 westwood 和 rochester 路口，而我那个时候，即使在寻找车位时，也在构思有关她的论文，心中暗暗和范柳原、七巧、葛薇龙等人对话。

当然，我知道，我们同在一个城市，这是偶然。张爱玲大概不知道附近著名大学里有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讨论课，其中一半时间在讨论她。主持和参加讨论课的有后来任教哈佛的李欧梵，现在任教

UCLA 的史舒美,任教威斯康星大学的黄心邨,任教清华的孟悦、汪晖,任教长岛大学的明凤英,现在香港科大的陈建华等。讨论课上的人们倒是知道张爱玲隐居在 LA,但大都想象这么出名的作家,应该住在比华利山或者圣塔莫妮卡海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戴文采曾打听到张的住址并试图采访,结果张次日便“失踪”了。最后记者只拿着一袋张的垃圾作了一篇有名的报道,吃什么快速面,用什么牙签、牙膏,好像有什么伤病,等等。所以张的神秘已出名,我们当时也知道找不到她,真没想到,她就住在我们“眼皮底下”,和我们同用同一个邮局,同一家 Kinko's 复印店,可能还曾同乘一辆巴士。

后来和负责料理张爱玲后事撒骨灰入大海的南加州教授张错谈及此事,张错说,子东,你很可能已在街上或超市见过她,但擦肩而过,你也不会认识她。因为在人生最后几年,张走在外边,只是一个 bag Lady,永远穿 2.99 美金的中国产塑料拖鞋,衰老到毫不起眼的样子(在美国超市,见到一个 bag Lady 摔倒,路人都不敢去搀扶;未经授权的身体接触,可能要对老人未来的病残负法律责任——在美国的和在广昌路上一样,“再教育”会挑战我们以前的价值观)。

当然,我知道,在上海住在张爱玲旧居的弄堂里,也是偶然。

在 westwood 和罗切斯特路口,想象一个没有车的上海老太的生活,这还是她晚年最好的住宅。之前她住过 North Hollywood 的 motel (我曾在那附近“风化区”找房),连两个月租金押金都付不起。“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长满了虱子”,这是作家少女时代的佳句,晚年却真的怀疑到处有虫到处搬家。死后数日才被发现,屋里没有家具,只有一批跟随她搬来搬去的华丽衣服以及几个纸箱(纸箱里的一些文稿《易经》、《雷峰塔》等等从来没有发表过,最近才被翻译出版)。

可以放弃做个“人物”,却一定要做一个自由人!

我有次和台湾作家钟玲谈起过哪些中文作家两岸三地都雅俗共赏,既为大众喜爱又可作博士论文题目,结果列出张爱玲、白先勇、阿城三个

名字。不知是否偶然，三个人后来都住在加州，都不大写作。白先勇在洛杉矶北面一个小城做讲师多年。阿城住过 LA 附近很多地方，不知靠什么为生。他说教钢琴，但有友人说他的琴其实一般；他说修古董车，但据说只修好一两部旧 BMW。他替人装修，这我眼见。那家人家就将房子借给他住，他在木板上特地做个记号，是最佳听音乐的位置，对面放着香港电影剧本稿费买来的极贵的音响。我和李欧梵、北岛等造访，照例要欣赏一番卡拉扬，也感叹一番前后极真空管放大机。

在美国，坏处是没人理，好处是没人管。

为什么张爱玲、阿城等愿意住在加州？张爱玲是隐居，拒回上海。阿城是换一种生活方式。有次在李欧梵家里有个 party，另外有个美国教授和我聊了很久，在了解我的背景后，好奇地问我为什么重做学生。李代我回答说：“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吧。”我当时奇怪，为什么是“一段时间”呢？不是可以有绿卡吗？我当时和大部分在加州的华人一样，没有想过离开美国。

在中国，做普通人要比做个“人物”难；如果不是个“人物”（或不认识什么人物），有时连看病、上学、买奶粉或出了交通事故都“搞不定”。所以，只要有可能，人人想做个“人物”（只是定义不同）。但在美国，做个“人物”则要比普通人难得多。一般人中小学健康快乐就好，进研究院以后就要拼命。精英不好做，且“社会待遇”方面有些特权也有些特殊限制（比如擅自建住房或和小秘开房就比常人更难）。

为什么做普通人在美国比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容易呢？原因之一，是社会空间大，穷人富人彼此看不见，或是说活在不同世界里（一般人很少用 LV 等），或是表面平等（迪斯尼公园排队者看不出身份差别）。不像香港，九龙塘与石峡尾数百米之遥。也不像中国大陆，同届中学同学，十年后再聚会拉开巨大阶级鸿沟。

原因之二，是普通人生活有底线保障，大部分的生活内容不需要特权。我后来一度住 LA 东郊阿罕布拉，500 美金租一个二室公寓。楼下

住一皮肤稍黑的混血女人，单亲妈妈。在泳池边聊天，知道她是超市营业员，月薪 1300，500 租房，300 分期买车，200 食物，等等，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不必靠男人，也不忙于结婚，不时有不同男友来约。我想如果上海、香港的底层女性也能如此生活，何必去做小三觅大款？

我们留学生也是穷人，但安定下来，只要不生病，生活也不错。每周会去海滩，每月会开车去不同城市。冰箱是看广告 15 元买的，只是要自己去人家家里取（我花 25 元租一小卡车，同做中文课助教的王斑帮我去搬。 he 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见面仍记得搬冰箱之事）。周末打打教汉语的散工（降低身份，给 ABC 孩子教教 Family tree，怎么称呼姑婶叔嫂侄媳外甥等等），便可买较大的电视、真皮沙发。RA 之外兼做 TA，多几百元收入，我们便能将女儿从上海接来，并换租亨廷顿图书馆附近 850 美金一月的两层小楼，门前有草地，窗外都是树。叶惠贤 1993 年带上海电视台摄制组来采访陈燕华，叹为“豪宅”。如果开 party 也不费钱，客人每家自带一个菜，有胡金铨、汪晖、邬君梅、阿城、吴天明等聚在一起，话题便很丰盛。总之，在 LA 我们的生活经验是，低于标准线是很困难，过了标准线差别就不那么明显。所以很少美国人整天为“起跑线”操心。也很少美女非得找个上市集团主席才算“嫁得好”。按甘阳（还是王蒙的）说法，美国的老百姓比较“笨”（简单），美国的精英确实“精英”（换言之，中国的精英不怎么“精英”，中国的老百姓却确实是“聪明”）。

张爱玲、白先勇、阿城三位，皆出身名门，当然都珍视（超乎常人地珍视）自己作为“人物”的名声（白先勇与人合作反复翻译《台北人》；张爱玲见弃稿被人发掘，十分生气；阿城写香港电影赚钱，从不署真名）。但他们，尤其是张爱玲、阿城的创作，有意推崇日常生活——既是挑战五四宏大叙事忧国传统，也有个人生活的习惯与选择，所以宁可生活在没人管你也没人理你的加州。

我当时其实有两份奖学金，第一年就买了车，三年里没有在餐馆打

过一天工,为什么重做学生就要抱怨失落呢?是不是无意识中,不愿意不甘心做个普通人?

写到这里,我明白了。在“自己的故事”这个题目下,为什么我写得最详细的就是在乡村和在美国的生活。因为在其他地方其他阶段,我都想努力追求事业,暗暗希望做一个有成就的“人物”。只有在这两个接受“再教育”的阶段,生活告诉我怎样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怎样做一个穷人。

而在生活从小康陷入困顿的过程中,总会学到很多东西。

洛杉矶有最早的迪斯尼,第一次和妻一起去,感觉不好玩,什么 The happiest Land on the Earth,穷学生只觉得连杯水都很贵。以后几次都是陪女儿去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女儿教我的东西、给我的快乐,实在比我所教她的所能给予她的更多。她让我重拾单纯目光去感受四周、感受世界。她在排队等着与“米老鼠”握手时,激动得身体发抖,我也被她感染。所以后来听说香港迪斯尼扮“米老鼠”的演员空闲时就把帽子摘下,虽属劳工权益,我也觉得不应该,不该破坏儿童们的梦——人生能有多少梦啊,梦实在比现实更宝贵。过几年,你就不会再激动了。

还有一个六旗山公园,据说有世界上最高难度的过山车,我是带(陪)汪雨一起去的。那时汪雨有十五六岁了,父母怕他在上海太受宠,故忍痛让小儿子来美住读。周末到我家算是放假。在排队等坐过山车时天真的汪雨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男女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他应该不是问具体的动作,而是问人生的意义,便随口胡诌说你看这么多人排队等坐过山车,等上30分钟,在上面只有3分钟。但你看下来的人个个满脸通红,十分兴奋。大家心甘情愿,没有人后悔。这就是sex在生活中的意义——没有“性”,生活无意义;只有“性”,也没意义(整天连续坐过山车谁也吃不消)。正因为前后等待回味过程,才是“性”的真正意义所在。说过我也忘了,若干年后在上海再见汪雨,已在和赵薇“拍拖”,竟和赵一字一句重复我当时的“性爱”理论。看来真是不能乱说话

(最近汪雨又被列为“新京城四少”，更是想象不到。当年耐心喂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还在)。

在洛杉矶常有国内客人来，如北大的乐黛云教授、孙玉石教授等，见到他们我是又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马上回想起昔日国内学术氛围，重新回味种种 80 年代旧事。郁闷的也是回想旧事，更觉眼前学生生活艰难。乐黛云同情孟悦脸色十分憔悴，说人家子东怎么看来还好。殊不知我胃痛无语。我一向不愿在人前显示自己的辛苦，至今如是，不知是坚强还是虚荣。最直接向我表示同情的是王沪宁，在洛杉矶 westwood 一家 Hotel 见到他时，他是西装领带(刚见过美国国会议员)，我是汗衫短裤(学生便装)。因为同在 80 年代中“破格”升到副教授，曾经常在一起参加上海的各种活动。我到复旦上课时，王沪宁说我的课堂爆满但前三排都是女生，此语流行颇广，当时觉得是对我学术成绩的“污蔑”，现在才知是对一个男人的夸奖。“你在美国读什么书嘛！来复旦，先做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王沪宁直接劝我。我心想，好不容易走到这里，哪能半途而废？关于 90 年代初国内情况，他说中国正在发生极深刻的变化，外面还没意识到，比如说中国人家家有了冰箱，有了电话，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现在想想，他讲的也有道理。

二十三 慢 船 回 港

香港大学的陈炳良教授，家也在洛杉矶。1992 年他被聘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在蒙特利尔公园吃饭时告诉我或有新的位子可以申请。

我去问李欧梵。又像刚来美国的一顿午餐一样，我们各买一份三明治，在加州阳光下谈了 30 分钟。他说如果你觉得前半生都在中国，余下的时光想在美国生活，那就读完博士，这里草地多、空气好、房子大，全美

50 多个大学有东亚系，教书的位子总归能找到。但假如你想继续你以前在中国的事业和影响，仍想直接为中国做些事，那就再去香港。那里大学人工高，位子少，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是不知 1997 年会怎样。

据说十多年前有个调查，问留美中国学人，如果有合适机会愿不愿意“海归”。结果百分之八十的男的，选择回去；百分之四十的女的，选择回去；几乎百分之百的小孩，想留在美国。

我没有征求还在幼儿园的女儿的意见。妻也是有保留的。所以 1993 年秋，我一个人回到香港教书。

次年，我将女儿也接到香港一家讲普通话的小学读书，又帮妻子在 TVB 找到一个播音员的工作。经过一番犹豫，她最后放弃了刚开始的中美电视合作项目“飞越太平洋”，也来到香港（后来常常后悔）。

这时离我第一次来香港，已经六七年。我的生活，终于可以慢下来一些。上一次生活比较平静的时期，是 1984 年，搬入重华新村，1985 年参与当代文学转折，曾有过轻舟已过“数”重山的短暂错觉。之后便是“出去”，便是折腾。从香港到日本（客席研究员），到德国（游学旅行），又到芝加哥，再到洛杉矶。仅在 LA 三年，便换了五个地址，年底不知明年如何，这月不明下月“钱票”。GPA 若低于 A-，下学期奖学金便成问题，难怪有次《诗经》课论文得了 B-，我和孟悦（重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之一，另一位作者是戴锦华），颓坐在 Royce Hall 的漂亮石阶上，绝望得很。记得在 deadline 前赶到研究生院交论文时，大理石楼梯上坐着好多个看来也几夜没睡路都走不动的未来博士。唉，本是学院同行，学术相煎何太急？

可是，到香港以后，我也要不断搬家（虽然有学校出钱），学院里互相折磨也很功利残酷，九七前大局势也风云莫测，为什么多年“漏船载酒泛中流”，现在突然有了“慢船重回避风港”的感觉呢？

两个原因。一是初次感到收入与工作的合理平衡。1986 年，我曾应邀到复旦中文系开一门课“郁达夫研究”选修课，竟有一百多学生，很

多当年的学生，现在遇见，都已是报社总编、集团经理、航空公司高层等社会中坚。那是我“教学生涯”中颇为得意的一段。但整整半年每周骑车 50 分钟到复旦，学期末收到讲课报酬记得仅二百多元。之后不久到香港大学，在校外部讲当代文学，只有十来个只知戴厚英白桦不知林斤澜汪曾祺的学生，随便闲谈两个小时，工资 1600 港币。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既做有意义的工作，又有合理的收入呢？什么是“合理”的收入？This is a question. 我想一是超过生活必需，二是不低于你的同行（李泽楷、任志强等也是和他们的同行相比）。在海外已经持续发展了的经济体制下，人们一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职业大致会有什么收入，早有预知。所以文科教授不会羡慕牙医的收入，公务员也不会嫉妒性工作者的外快。但在我们长大的这几十年间的中国，从一度全体赤贫（社会差别仅依赖政治话语阶级划分），再恢复发展到各行各业都争夺要有“合理”收入，是一个混乱痛苦、矛盾百出且充满不合理现象的合理过程（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在我这里，重新成为教师其实比以前“降级”了（从助理教授做起），却得到比以前多出数百倍的收入，这使我有“慢船进港”的职业认同感。横向与香港以外的同行比较一下，也就不觉得天气热房子小噪音大草地少了。

当初计划出国时心里就有底线：“出去”可以，改行不行。现在既能讲鲁迅张爱玲，又能坐以待“币”，难怪有慢船回港之感。说到底，有一点钱的好处，只是可以让你不再想钱的事情。就像有了电影票，目的是看电影。如果在影院外折腾电影票，那就是和电影无关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位置与距离感。我在以前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批评中的“入”与“出”》的随笔：“清人周济论创作时说，‘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我们以为，在文学批评中，同样也存在着‘入’与‘出’的问题。这里的‘入’，是指批评家对艺术作品的欣赏、理解和感觉，是指研究者对作家的某种沉浸、渗透和陶醉；这里的‘出’，也就是批评家对艺术的审视、鉴别和评判，也就是研究者对作家的摆脱、超越和俯察。”（《文学评

论》1984.3)我大概的意思是,批评家对他的研究对象,不“进入”不好,太“进入”,距离太近也不行。“在考虑批评家对作品和作家的态度与关系时,我们也该听听托尔斯泰那段‘稍稍离开一点’的意见,托翁认为:作家在创作中,应当稍稍离开他笔下的主人公”。

同样道理,批评者若关心、研究中国的现象,也应稍稍离开他的研究对象。太沉醉在“中心”或体制内,或精忠报国或愤怒绝望,都不容易看清庐山真相;但是距离太远隔洋眺望,不管极右抑或新左,却又常常隔靴搔痒。因此,窃以为香港是个从边缘观察中国的好地方。这里的大学,制度规矩僵硬但清廉,学术节奏缓慢但少贪腐,师生大都本分,信息比较自由,生活环境有山有水,学术名家来来往往,最主要 pay 得不错,假期多,亦方便到世界各地旅行。所以从 1993 年起,一教十几年,从副教授到教授、系主任,还获得了终身教职,“慢船进港”竟暂时不走了。当然,我也看得很清楚,香港社会太功利,学院里英文统治中文,“科学”管理文科,和北京或北美比,学术气氛不够浓,大学与公众社会关系疏远,且老师们学术动力不强(评审机制公平却不合理,比如英文书籍可能比中文著作更受重视,单篇学术论文也许比汇集了十篇论文的集子得分更高,等等)。但这些社会缺陷,哪里没有? 时间一久,也就逐渐缺之锐气,有点 cynic(犬儒)的倾向了。记得钱先生早就警告过:年轻人总有点傲气,但迟早会由方磨成圆。最好是外圆内方……为了使这个“慢船回港”的故事,有时也变成“慢船到中国”,我做了三件事:一是多旅行,多开会,多兼职;二是从边缘角度讨论“中心话题”;三是“锵锵三人行”。

香港文学研究界有个术语叫“过港心态”,意思说批评外来文人(大都是不同时代的南来作家)人在香港心在中原,并没有准备在港常住,缺乏“居港心态”,更少替本土发言的“香港意识”。我一直觉得这些概念也有片面性。窃以为巴黎的知识分子,如果只考虑巴黎市的事情,能体现巴黎精神吗? 纽约的读书人只想一辈子住在纽约,能代表纽约或美国文化吗? 慢船停在港湾里,不代表它不应该关注外面的航道潮流和台风

海啸。事实上，这个港口的意义从来就不只是给人避难，而是一向对整个周边乃至世界航海地图有重要影响。所以人在香港可以做香港以外的事情，这从来正是香港的价值所在。否则，与“中国作家，首先要爱国，然后才忠于文学”这样的狭隘民族主义有何区别？

题外话，打住。说旅行。我常对香港的同学说，住在香港而不去外面旅行，浪费了香港的好处（金钱只是部分因素，不少同学打工数月只为买名牌手袋）。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租车旅行，除了在埃及（危险却必须去）、柬埔寨（吴哥窟颇壮观）和印度（实在太热）等地实在不适宜自己开车外，其他国家我都尽量租车自由行。人家说日本东京道路挤，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交通乱，东欧城市如布拉格乱收费等等，实际上都不是障碍。在香港开过车，哪里不能开？（当然，埃及或当时的大陆例外。）在芝加哥开过破车，什么样的 rental car 不能开？

以前的计划是每年去一个中国的风景点（九寨沟、五台山等等），还有一个国外的旅程。现在算算生命有限，这个计划好像还不太够。一般都是一个人或一家人旅行，偶尔也有旅伴——如去西班牙，就和李泽厚、刘再复同行，挤在一辆小车里，载着“文化使命”。去马德里的博物馆看晚期戈雅，我和女儿说，跟着前面的这位伯伯，他写过一本书叫《美的历程》，很好看。可是不久女儿就沮丧地坐在凳子上：“‘美的历程’不见了，他走得太快了。”（李泽厚是想好了要看哪几幅画，进馆便直奔目标。）结果还是刘再复慈祥耐心，先陪我女儿去博物馆小卖部，买了该馆的一沓明信片（一般“镇馆之宝”都印在上面），详细解释一番，然后按图找到原画，告诉我女儿说：“Dorothy，你刚才看了这些图画的介绍，现在又看到真品原作，这些艺术品的灵魂就会进入你的血肉……”

刘的日常口语就是这样书面体抒情化。我女儿在香港的女拔翠 DGS 读到一半就去美国，后来在伯克莱大学读建筑、经济双学位，既爱好美术设计又担心经济前景。直到去年考进了哈佛的建筑设计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才终于下决心去追求她自己的“美的历

程”了。

旅行其实也是读书,以开会名义旅行当然更名正言顺,学校每年会资助教师参加学术会议(不花这钱等于表现不好)。1994年就去哈佛参加一个关于香港文化的会,我用英文写了篇关于西方电影两岸三地不同中译的文章。英文写作真累,会后我便一个人租车去英格兰、蒙特利尔和魁北克(一个北美的“小法国”)。1995年去苏州参加一个散文的会,我写了篇文章讨论两岸三地散文中的猫狗、老鼠和蜜蜂及牛蛙之关系。记得从上海到苏州居然坐小巴走了6个小时“国道”,余光中等一路抱怨。最近坐高铁到南京才75分钟,社会巨变,超过诗人想象。1996年初次去台湾开会,和子平、平原、夏晓虹等同游中正广场。会后作为国民党的统战对象到台中等地环岛游。我怕晕车,总坐在巴士前排,同样喜欢坐前排的还有高行健和李泽厚。在阿里山宾馆听张贤亮痛说革命家史回忆“不举”往事,耶鲁来的康正果当场质疑:你以前有没有自慰过?张于是顾左右而言他。旅途上,严歌苓一直被人“英雄护美”,因为其他都是男的。古华则一路感叹当初怎么有贼心没贼胆,现在有了贼胆没贼力,等等。1998年和刘绍铭(当时岭南中文系主任)一起到山西太原开会,要住武警宾馆(而且是师长大套间),令刘绍铭教授“受宠若惊”睡不着觉。又见到钱理群、赵园、凌宇、王富仁等北大旧友,其实都比我年长很多。因为研究生同一时期,故已习惯称兄道弟。1999年去九寨沟开会,回程大巴走夜路(在藏区珠宝直销店耽误了太多时间),把同车的荷兰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教授吓出一身汗。这期间也参加了徐中玉先生主持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几次会议,被选为副会长,虽只是名义,却已是本人最高“官阶”。我本以为读书人的这些头衔只是虚名,后来得知也并不尽然,现在教授们激烈争夺民主党派里的领导职位,因有晚退休多津贴可住高干病房等多种好处。招安良方。研究沈从文的凌宇有次告诉我,不要和他还有南帆打架,他打我们最多罚款道歉,我打他们要被捕入狱——因为他们是全国人大代表。

说到开会,还有两个会值得一提。一是2000年我们岭南召开张爱玲研讨会,夏志清、郑树森与刘再复、温儒敏在首场研讨会上已有针锋相对的意见,讨论激烈。刘再复说他最喜欢五个作家,鲁迅、萧红、丁玲、张爱玲、李劫人,其中鲁张最重要。不过终是鲁迅伟大,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拿美金资助写反共小说,有点“夭折”,令人失望。夏志清马上反驳说,张的“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30年代因虚荣为左联利用,更不应该。作为会议的组织者,看到会场气氛热烈有思想交锋,心中暗喜。次日又有场有关张爱玲影响的公开论坛,王安忆、朱天心、戴天、也斯、苏童、蒋芸、须兰等都到场发言。我在会议结束时说,台北、香港都已召开了这样规模的有关张爱玲的学术研讨会,其实最应该纪念张爱玲的城市是上海,希望下一次这样的学术会议能在上海召开。五年以后,上海华东师大果然筹备了一次有关张爱玲的国际研讨会,海外很多学者也准备与会。结果会议被临时取消。理由据说是因为这一年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张爱玲非正式结婚的前夫胡兰成是汉奸。我不明白的是国内有关周作人的研究和会议一直都有,还曾专门有学术会议讨论竹内好——竹内先生曾是一个侵华日军士兵。

之所以对这件事特别留意,不仅是因为这是我的研究对象。想想我这些年的生活历程,上海、香港、洛杉矶,这不都是张爱玲生活写作的城市?在上海,不在一个时间,但空间太接近。在香港,我也在港大的好几个宿舍寄居。在洛杉矶就更不可思议。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居然在同一个街口。偶然,当然都是偶然。

另外一次会议是在上世纪末,上海作协和《文艺理论研究》策划了一个由百名评论家选出十位“九十年代最重要作家”的活动。我和黄子平(他也在1993年从美来港教书)是海外评委。虽然我们在90年代“缺席”,但还是凭之前的阅读经验投了票。到上海开会宣布结果,好像是王安忆、陈忠实、贾平凹、余华、莫言、韩少功、史铁生、余秋雨、张承志、张炜等十人当选(次序或有误)。大家都惊讶王蒙、张贤亮一代人很不应该地

被人“遗忘”，而 90 年代新人亦一概被忽视。更有趣的是，会上还公布一百个评论家中有谁的选票和公布结果最为接近，有两三个人，其中就有许子东（好像十个中了九个，“九环”）。事后年轻评论家谢有顺以此质疑这次评选的价值：缺席大陆文坛十年的 80 年代批评家，居然最接近评选结果，说明这个结果不够“与时俱进”，评论家们的共识太保守。这个评选有没有学术意义我也不好说，但也许可说明从香港这个“边缘”，同样可以参与“中心话题”，甚至可能旁观者清——如果距离不是太远。

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在香港完成了《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叙述文革》一书。这是从芝加哥开始的项目，1997 年才完稿。当时正在中文大学访问的汪晖，将书稿推荐给北京三联。名编辑许医农一见章节目录就喊“太沉闷”，读了全文后则热情支持。时任“哈佛燕京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季羨林教授，曾质疑此书是否要为“文革”翻案。送审时间很长，最后据说是董秀玉和几位总编一起支持，但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出书后其实并无政治问题（因为是研究 80 年代叙述“文革”的小说，并不是直接研究或重评“文革”历史）。此书脱销多年，最近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这本书有没有学术或文化意义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没有 1985 年前后的那些批评实践（“入”），或没有 1989 年后在芝加哥、香港的理论操练（“出”），此书的写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安忆说，我以前认为读中文的人出国是浪费时间。看了你这本书，觉得也不尽然。

总之，在香港教书有很多好处：清廉、本分、山水、自由，还有边缘视角，最重要 pay 得不错……但不知为何，总觉得有些缺陷，有些不足，有些遗憾。说得“酸”一点，就是觉得对中国没什么贡献。

就在这时，梁文道约我上了一次电视节目，叫“锵锵三人行”。

二十四 “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刚刚筹备策划时，曹景行就给我打过电话（他是作家曹聚仁的儿子，他的姐姐曹雷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曾在电影《年轻的一代》中扮演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当时曹景行已在凤凰工作，说是个三个人的谈话节目，知识分子话题。我一听每天要录影，就马上说不行。我是教书的，每周三天上课，怎么可能天天去录影？挂了电话后，陈燕华还怪我，她是专业电视人（来香港后一直在无线电视台播报普通话新闻，2003年后被一家国际金融投资公司派去上海），“有人请你做节目，你问也不问清楚就拒绝了？”电视人的职业本能是做节目第一，做什么节目第二。这和我们这一行的行规不大一样。我们写文章，应该是写什么第一，能不能发表第二。

虽说拒绝邀请，却也记住了这个节目的名字。现今电视几十上百频道，栏目恐怕上千吧，能记住就已不容易了。偶然也看过一两集，印象是梁文道没头发，那个台湾靓女（后来知道叫孟广美）则头发很长，说话时常常用手理头发。

我和梁文道也不认识。有次中文大学开香港文学研讨会，忘了是我读论文还是讲评，在听众席上见过文道，相貌、衣着都挺特别。他是香港的文化名人，报上常有文章。见面便打了个招呼，也没交谈。

大约2000年底，某日梁文道给我电话，说“三人行”想访问我一次，话题随意，我便答应了。去到凤凰台，竟没有见到梁文道，而是和主持人窦文涛及女嘉宾郑佩芳一起谈话。说什么完全忘了，反正一期节目除了广告才22分钟，每个人大约也就是讲七八分钟，只记得节目录完后窦文涛说我们在附近茶餐厅吃午饭，问我以后可不可以再来，比方说每周一两两次，也不必每周，每次两个小时，就像今天这样闲聊，话题随意，衣服随便，形象也不必担心，想想文道等等。我说，要先问问学校，应该可以吧。

没想到,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在过去十年里,有时一周几天,有时一月数次,一不小心,我在“三人行”做嘉宾总数已在一两千集以上。以至于今天在 google 或百度输入许子东三字,几十年教书生涯毫无痕迹,学术研究成果也少人关注,反而音频、视频和文章,大量都和我越界玩票的电视言论有关。

这个情况,完全在我的人生计划之外。

我的电视节目,对我在大学里的工作、职称等没什么影响。正面效应看不见,负面影响不想见。在制度层面,只要申报即可,也不干涉,亦无鼓励。学界或者有同行会觉得我有些“玩物丧志”,“不务正业”,或者至少损失了研究的时间。但也不会明说。久了以后,也听说这个节目的名声影响。逐渐听到一些鼓励,但人们心里想什么,我也无法知道。

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被问到为什么参与电视。我说自己生平有几个爱好:一好聊天,天南地北,没有功利目的的聊天(一有目的,说话便紧张);二好铜钹,人生战略上轻视,生活战术上不反感;三好美女,此理也至明,妻就漂亮,朋友圈亦多美人。想想,在“三人行”里做嘉宾,不就是和美女聊天又能拿钱吗?这样的活儿,当然愿意接手,乐此不疲。

但这也是说笑而已。一则节目中当着几百万人谈话,实际上诸多限制(后面再说);二则钱也不多,尤其和大学收入相比;三是最多面对的是光头文道,有时见了美女还真不知说什么好。

所以,总还有些别的原因,让我参与这个节目,而且十年之久,人生有几个十年!

在电视工业圈,这个节目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而且最久的谈话节目。很多别的电视台曾经或正在 copy 这个节目形式,均不成功。一个节目能维持十几年,总有其道理:观众不弃不离,广告商愿意赞助,领导一贯支持,从业人员忠心耿耿……也有电视专家说,这个节目的意义现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将来人们在研究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这个节目会提供很多社会学意义

上的世态民情人心资料。

但至少主持人,不会往这方面去想。文涛很专业。他最关心的是,今天讲什么,明天、后天怎么把节目撑下去,怎么让你们喜欢看,让你们笑,而且我们不被批评……至于说什么观点,管他呢,什么都行,文涛老批评我和文道:你们为什么总想说些什么呢?你们不说人家就不知道吗?说了也没用,说了你们有什么好处?

总之,对传媒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有说话的资格,而不是说什么话。对我的职业来说,或者正相反。所以矛盾。

回想十年来,什么话题没有涉及? 911、山西矿难、孙志刚、芙蓉姐、豆腐渣校舍、土地流转、华南虎、换妻案、最后一个钉子户、阅兵、六十年变迁、剩女、谢亚龙、黄段子、房奴、建国大业、人肉搜索、躲猫猫、小团圆……

我想,大概这是我人在香港又要和故土同呼吸的一个渠道。因为这个节目,我也又自愿又被迫地生活在网上虚拟世界,也继续生活在这苦难神奇的土地上!

因为这节目,我也多了很多社会关系。为了改变知识分子不上电视的习惯,我还特别代邀李欧梵、白先勇、葛兆光、汪晖、陈冠中、戴锦华、郑培凯等国内同人,有的如王蒙、查建英等后来成了常客。我自己也认识了不少各界朋友。恩格斯说人的性格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即使认识再不相同的人,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命运。想想这个“自己的故事”里,我二哥、尧毛仔、孙维聪,还有偶尔一起吃夜宵的王菲,或者在许杰先生家门口吐痰的男人,每个认识的人,或者都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

别的谈话节目是说给别人听的,我们的节目,至少在状况较好时,是说给自己朋友听的,否则我为什么要说母亲丧礼或自己的心脏病?对我来说,事先想好要说什么,结果没机会说,片尾字幕就上来了,这是较差的水平发挥;想好的话说了,发泄了,但没交流,这是中等状态;在交流过

程中说出事先没想过的话,这是上好境界。第三种情况,在和文道、文涛聊天时较多出现,故观众反应也较好。我们三个人,都戴眼镜,目光不同:文道追求平等理念,子东珍视自由权利,文涛喜欢博爱和谐。连籍贯也不同:是粤人、北方人和江南人凑起来的男人世界。

这个节目以前多在香港制作,一度有编辑,每星期策划、写稿。后来越来越依靠主持人和嘉宾的临场发挥——有点像爵士乐,大致有个基调、旋律,但演奏起来每次都不同,每人皆有即兴发挥。

欧美电视谈话节目很多,多是两人或多人。唯独“三人行”这个格式是“中国特色”——“三”这个形式在国人文化心理习惯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研究电视工业的人应该会讨论这些问题。

这个节目的发展方向,电视台内部及文涛本人一直有纠结。既想坚持三人老友记,又想成为“城中话题”——多请热门事件的当事人,或有关专家及时讨论热点话题。现在分开在香港和北京录,大概想两者兼顾。在香港以老友记为主,在北京多请不同嘉宾。好友吴亮对我说过:俗东西,可以讲成雅;雅题目,一讲就俗。此言极是。所以不管哪种形式,在我看来,随波逐流然后到中流偶尔击水,虽书生意气但不敢也不能浪遏飞舟……

文涛是个十分敬业的主持人,不仅幽默,反应极快,且善于倾听,过去这些年的进步和努力,有目共睹。表面的轻松,其实是做了很多功课。主持人的职业道德,是他必须时时考虑作品要“娱人”。不像我们客人,常常只顾自己“娱己”。

这个节目十多年来能够“持续发展”,也和网络科技最新的革命及文化效应有关。电视言论,与微博、博客、Facebook等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当然在技术环节上,还有改善的空间)。这个节目的困难,或者也是观众很难想象的,不是一句“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就能概括或应付。想要玩世不恭,又难免愤世嫉俗;努力风花雪月,却仍在剃刀边缘,如履薄冰。毋庸讳言,“三人行”,和凤凰其他几个知名栏目一

样，客观上已处在中国的舆论边缘。虽然理论上是香港的节目，但既然在华南落地，又进入了全国的涉外、高等及政府住宅（观众群甚至决定了电视台的取向，很少有哪个电视台大众传媒谈话节目比电视剧收视率更高），“影响有影响的人”，结果当然也要受有影响的人的影响。“擦边球”一般都不是有意打出来的。擦边得分无法奖励，出界失分有人问责。有时还不清楚界线在哪里，上一局打在这里是好球，下一盘同样位置可能就犯规。好在节目背后有不少明白人，有不少有良心有担当的人在默默支持。其实除了观众以外，他们才是“三人行”的力量所在。

做电视和写文章不同，你会随时随地遇到观众，直接听到读者意见。多年来听到的意见大致有三种。一是北京知识分子的反应，如《文艺报》的应红（李辉的太太）就对我说：你怎么也去耍嘴皮子呢？其他学者如子平、平原等客气一些，不直说，但也暗示这不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你讲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吗？说了也没用。但后来时间久了，贵在坚持，看的人多了，学界对大众传媒的看法也在改变，或许批评就已少些。第二种情况是在公众场合被陌生人盯住看了半天，然后过来眨眨眼睛，拍拍肩，说你是何亮亮（或郑浩，或梁文道）吧，不认也不行，紧跟着你，也是好意，最后目的是打听“窦文涛住在哪里？”“孟广美嫁了意大利人吗？”等等。甚至，自始至终不知我是谁。这样的观众数量最多。第三种反馈是仔细看节目的人，一来就觉得你是熟人，甚至能说出你讲过什么什么，我挺赞成。多数是中年人，偶然有美貌少女也打招呼，却说：“我爸爸挺喜欢你的节目。”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深圳某大楼乘电梯，完全真人真事，进来一老人，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没出声，等电梯开到一半，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许老师，你们的节目很受欢迎。”我说：“谢谢。”隔了一会儿，又一字一顿说：“为老百姓说话。”我又谢谢。临开门走时，回头又说一句：“可惜黄山松太多。”

以上三种观众反应，我都记在心里。

我的业余体会是，在中国做传媒，既幸福又郁闷。幸福在于社会变化快、问题多。很多常识亦演变成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使传媒人觉得自己很重要，好像颇有用武之地；痛苦在于管理不规范，政出多门，太多关心和帮助。所以明明这也不能说，那也不宜讲，还要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其实心情十分沉重，颇为无奈，还要谈笑风生，指点江山……

而我，说到底，只是一个“嘉宾”，做了十年客人。基本上，我就是个教书匠，写过几篇文章，在不妨碍教书与研究的前提下，继续和美女聊天赚点散钱。我和“三人行”的关系，也仅此而已。

二十五 两个梦魇

近年来常做梦，有的醒来就忘了，有的依稀记得一部分。其中有两个梦，印象比较深，不妨记下，作为“自己的故事”的小结。

第一个梦是我在一个大雪天开车到维也纳，不，大雪天开车到维也纳是真的，且入住一家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堡式 hotel，在世界 500 Leading Hotel 的书上都找到的。大约在冬季雪天，房租特价，还可以接受。从布拉格开了很长的路过来。决定奢侈一下，正好酒店又帮我升级到一个阁楼套房。其实也不是真的套房，只有一间，但颇大，很长。靠花园那面屋顶是斜的，基本上像个小书房，房间的另一头是卧室，都是旧式家具，浅棕色的木头。床很大很松软，洗手间极漂亮，大毛巾挂在恒温水管上，拿下来就是热的。侧面的窗，可看见对面法国大使馆。因为太累了，很快睡着了。睡梦中我却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上，好像从高州到千善，弯曲崎岖的山路，拐角处一边下面就是山崖。轮子还在公路上，车斗已超过路面，人则像悬空坐在山崖边上，在巨大的马达轰鸣与剧烈颠簸中，随时有可能掉下去，双手紧紧抓住拖拉机的铁栏杆……

吓醒以后，起身到正面的窗前。下面花园一片雪白，有灯光照着雪地中间的几个大理石雕像。

第二个梦更加诡异一些。睡在香港自己家里，梦里有很多其他内容，已经模糊。其中一段，我回到了古坊尧家，我走进自己住过的那个农家院子。砖墙、土路、破旧的天井走廊，都和以前一样，有妇女在挑水，还有鸡狗和小孩。但没碰到认识的老乡，我穿过回廊，走过石板厅堂，来到我们曾经住过的房间前面，木门半掩，里面有人。仔细看里面是个瘦长的戴眼镜的穿蓝色线衫线裤（薄运动衣）的青年——那不是我吗？我很清醒，那就是过去的我。接着我们好像还说话了，具体说什么我忘了，总之我大概告诉他，我就是你以后的样子，香港教书，做电视，出版了若干著作，等等。他说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清清楚楚他摇摇头，不相信。是不相信我就是他，还是不相信，或者说很失望他将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有点生气，那你想怎样，你以为你会怎么样，等等，他（我）没有再理我，怎么离开的后面又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梦就醒了。

第二天我将这个奇怪的梦在一个饭局上告诉几个同行朋友，记得席间有郑培凯、平路、黄子平、钟玲等，他们都说这可以写小说。

但在我这里，这不是小说，就像我的“自己的故事”一样，这梦是真的。

无论是从革命时代的要求来看，或就自己从前的期望而言，我的前半生迄今为止，大都是郁闷、无奈和失败。所以，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有勇气如实琐碎记下，只是想说明一个过程：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2011年2月28日—3月27日

后 记

本卷《讲稿》中有很多和友人的对话，感谢王蒙、陈丹青、刘索拉、吴淡如、孟广美、王跃文、张鸣，还有特别是窦文涛、梁文道允许我在文章里直接间接引用他们的言论谈话。也感谢凤凰网，我在整理自己谈话录音时，常常参考他们的文字稿。

感谢我的老师钱谷融教授，陈炳良教授和李欧梵教授，无论是我的学业、工作还是个人生活，都得到他们重要的帮助和影响。很庆幸在我的文学和学术圈，能认识李泽厚、王蒙、徐中玉、王元化、刘绍铭、郑树森、刘再复、黄子平、陈思和、陈清侨、葛兆光、王德威、钱理群、汪晖、王晓明、陈平原、王富仁、吴亮、王安忆、陈村、阿城、查建英、北岛等等师友（太多遗漏，乞谅），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他们总是我的“假想读者”，在被大众媒体或网络微博包围之时，他们也使我不会孤独迷失。当然也同样感谢所有在电视上和网络上关注我“瞎三话四”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在“序言”中说过，本卷中的所谓“越界言论”，如有任何可取之处，皆是和你们一起创造的。

在“自己的故事”里谈到了我个人生活中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等等，倘有不妥望你们原谅。你们总是我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

当然，我最应该感恩的是我的已在另一个世界的父母。父亲晚年每次看到我有文章发表有书出版，总会骄傲地反复向亲友邻居夸耀，当时

虚荣的我还为此责怪老人。儿子不孝啊，在 1966 年你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儿子不懂事，什么也没能帮助你们……

感谢陈燕华，本书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她帮我打字，她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也希望我的女儿 Dorothy，是本书出版以后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现在学业繁忙。

最后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郭娟、刘伟，感谢潘凯雄、管士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是我的荣幸。没有郭娟的建议、催促和参与，这套检查我学术文化工作的三卷本《许子东讲稿》便是不可能完成的。

2011 年 7 月 14 日